

湯若望傳

第一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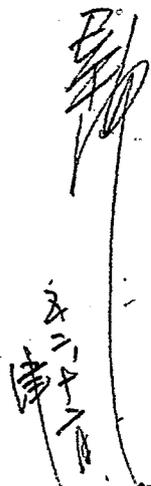
魏特著
楊丙辰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湯 若 望 傳

第一冊

魏 特 著
楊 丙 辰 譯



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date: 湯若望傳 丙辰

商務印書館發行

湯若望



Le Père Adam Schall S.J.

湯若望傳

第一冊

原序

第一章	湯若望之家世，他在可崙城的幼穉時代……………	一
第二章	在羅瑪——肄業德意志學院，入耶穌會，中國之呼聲……………	二二
第三章	赴東方之航程……………	五一
第四章	澳門……………	七三
第五章	湯若望到首都後之開始時期，西安之轉赴……………	九五
第六章	明朝末後皇帝統治下之各方面……………	一二六
第七章	明朝國基之根本動搖與皇室之顛覆……………	二〇三

第八章 滿廷攝政時期……………二三二

第二冊

第九章 「尙父」和他的皇帝學子……………二五九

第十章 傳教士與中國基督教之總機關……………三二九

第十一章 湯若望之性格——他爲他的美譽令聞之奮鬥……………三七四

第十二章 關於欽天監監正職務的爭議與關於曆書問題之聚訟……………四二〇

第十三章 湯若望晚年所受之陷害及其逝世……………四七一

第十四章 後世毀譽中之湯若望……………五一九

註釋部份容另出單行本

原序

我們直到如今，尚不會有一本略少與湯若望之價值與偉大相適合的著作。為世人之所知曉的，僅只是幾種簡略通俗，但却缺點百出的傳記，此外就是在各雜誌，以及人名大辭典與百科全書中，所發表的那些短文——這些短文中最佳，而錯誤最少的要算布魯克爾（Brucker）在天主教百科全書（*Catholice Encyclopaedia*，亦有譯作公教通典者）中之所寫的一篇了——此外最大作品歷史談述（*Historia narratio*）以及其更名為歷史記錄（*Historia relatio*）的新板，並芒塞格（*Mansseg*）底德文譯本，對於湯若望的敘述，則僅只是片面的，不完全的，並且記載敘述亦是不甚清晰的。因此社會上的一般人士們，對於這位中西皆知，但却多所誤會，到中國傳教而為歐洲科學在中國首開道路的偉人要有一種較大傳記著作之志願，早已都經吐露出來了。

但這個任務上困難之點，人們馬上也就認識了出來。為湯若望寫傳記的，應當是一位聚集傳教會歷史家，數理天算科學專家，以及中國學術專家於一人之身的人物。像這樣一位合適的人物，

人們當然最先希望，是要向中國傳教士羣隊裏去找得的。但是在中國傳教士方面，因傳教工作之常川壓迫，便沒有餘暇再從事於冗長時期之研究工作了，況且在這宗工作上勢必不能不參考歐洲各國之文書庫與圖書館，而這與居住在中國的傳教士們却就難辦了。實際上在中國徐家匯兩位卓越優異之學者，一為中國學術雜俎 (*Variétés Sinologiques*) 之創辦者耶穌會神甫夏鳴雷 (Henri Havret S. J. 卒於一九〇一年)，一為耶穌會神甫德禮賢 (P. Pascal M. D'Elia S. J.)，確曾計劃寫一本關於湯若望之著作，並且已經蒐集了不少的材料，但後來却又將這工作放棄了。

這種困難之點，幸而又獲得了另一方面的一種解決辦法。因為下面所陳述的這本傳記底著者曾自一位從前中國傳教士耶穌會神甫路易·望·海 (P. Louis Van Hee S. J.) 處得到了一批真正有力的助力，這位傳教士既為一位特別出色的中國學術專家，而同時又為一位專門研究中國數理天算的學者。自一八九二年至一九一一年，共十九年的長久，他居住在中國，曾充上海公教震旦大學 (Aurora)，及非基督教之南洋大學 (Universität Nanyang) 教授之職，並為中

《自然界 (Natur)》之出版者，此外尚爲許多中國書籍之著作者，以及多種較大叢書之共同編輯者。他因身體健康受有損傷，所以纔又返回他歐洲的家鄉，然而在這裏仍尚盡他能力之所及，宣力於學術界，直到如今，他因他所發表的一些關於中國學術的專門著述與論文，已經證明他是今日研究中國天算數理與同類科學最優良專門學者中之一位的了，並且最近他尚在北京魯賓（魯賓爾城內又建立有中國研究院 (Das Chinesische Institut zu Peking)）一所。這樣著者因有了一位適當的人材，可以向他諮詢一切，所以大規模利用中國史料，以及獲得關於中國文學文化，和禮俗道德種種問題上之可靠解答，並批評湯若望數理天算工作之價值，方得有可能。

從其他一位現已不在世的學者方面，著者也還得有許多促進與贊襄，這位學者就是耶穌會 神甫安謙·航得爾 (P. Anton Hunder S. J.，卒於一九二六年。) 他對於德國傳教事務，以及天主教傳教會雜誌 (Die Katholische Mission) 之偉大功績，是沒有一個人能駁擊的。不過他研究傳教歷史的工作，却爲世人之所不甚知曉。他已經得不到時間，把他在三十餘年的勤勉工作中各方面所蒐集來的豐富珍貴的史料，整理成較爲巨大的著作，貢獻給社會了。他的研究對象尤

其是十七十八世紀德國耶穌會傳教士之歷史，關於此項歷史，他在一八九九年已經就發表過一篇偉大的論文，深為各方面之所讚許。他原來的計劃，對於整個對象，是要寫三部總著與六本較大專門傳記的，並且那一大批預備工作，尤其是為總著所做的預備工作，已經有了很深的進步了，然而他竟中途溘然長逝，使他的工作在他的手腕下，未能得以完竣。他這工作，現已有人為之繼續，而我們的希望，便是在最近的時期，把全書完全弄到完成地步。六本專門傳記之中，原定一本是要寫湯若望底傳記的。著者這一本湯若望傳，因為已經先寫了出來，所以便是所計劃的各部數中，首先與世人相見的一本了。

著者多年文書庫中之搜索工作，發現了一批豐富得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種一等史料。這史料中所包含的，有函牘，有著作，有手跡稿件，共約二千餘件，俱為著者寫這本書時之所採用。根據這些源頭史料，設計湯若望一生的傳略以及他時代背景，便不會透露缺陷與模糊不明的種種缺點了。著者又絲毫不憚煩不畏難地自行置備了相關連的，見諸印刷的各項著作，以便可以能將湯若望與湯若望時代景像上的細末處一一加以完成。上述夏鳴雷神甫與德禮賢神甫所蒐集之材料，

一開始即決不自私自利地供給著者作了參考之用。

最後著者還會計劃赴中國，做一次考查旅行，以便在徐家匯，在北京，或在其他湯若望曾從事過工作的地方，並在博物館與圖書館中，盡可能地蒐索其他史料，並親自一視環境的真實狀況。但因祖國日漸增加的困窮，著者相信不得不放棄這個計劃了，況且著者又曾聞，在北京他並沒有多少能獲得新發現的希望。而自中國友朋的一方面，著者一有所諮詢，便可獲得著者所須要的啓示答覆，所以赴中國之一行，自是大可不必了。

在這裏把那一大批在這本著作上，曾予以促進與襄助的熱心人士們底全數，都一一敬書了出來，這是不可能的。關於這一層，在本書以後之適當地位，儘可能地予以實現。在這篇序言中，著者以至誠向他們全體表示謝意。特別應當致謝的，還有德國學術救濟會（*Notgemeinschaft der deutschen Wissenschaft*），因為救濟會為促進這一部著作的完成，向著者特撥有一筆研究補助金的。

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序於德國萊因河畔之波恩城（*Bonn*）。

湯若望傳 原序

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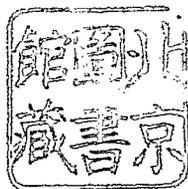
六

湯若望傳

第一章 湯若望之家世，他在可崙城的幼穉時代

湯若望，原名約翰·亞當·沙爾·封·白爾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所從出的氏族，世系之遠，可追溯到紀元後十二世紀。最初他這一族的始祖大概是移住在日耳曼 (Germania) 國境內羅馬人 (Römer) 所關的居留地阿各利皮納 (Colonia Agrippina) 的弗郎聖族 (Franken) 自由民。在十二世紀這一族尙屬平民，但因家道隆盛，在當時已經騰達到了封爵敍勳的貴族階級。(1)

沙爾族底世系，我們當以羅伯特·沙勞 (Rupert Schallo) 爲開山祖，這是出現於一一五〇至一二〇〇年間的一個人名，出現的地方就是由方纔所說的羅馬人居留地阿各利皮納所發展而成的德國可崙 (Köln) 城，而他便是在這城裏聖阿波斯特爾 (St. Aposteln) 和聖勞倫爵



(St. Laurentius) 兩個教區內有房產的人，對於他的兒子盧伯特 (Lupert)，我們知道，他是住在聖阿波斯特爾教堂對面的新市場街 (Neumarkt) 上的。這一家人家漸次擴充他們在聖阿波斯特爾并在城內其他區域內所置的產業。這種情形引起社會上一般人對於這一家人家特別的敬意和重視，因而使它們在社會中的地位便日見增高。一七八二年左右，始有阿爾伯勞·沙爾 (Albero Schall) 底名姓出現，這位阿爾伯勞·沙爾續娶克利斯悌乃女士 (Christine) 爲家室，克利斯悌乃女士爲維斯特法倫 (Westfalen) 貴族封·豪爾特 (von Holte) 的女兒，封·豪爾特族與可崙城守伯爵封·阿爾伯 (von Arberg) 爲近戚。(一) 所以這一種結合便愈加增高了沙爾族之威望，並且愈加增益了它們的財產。這一位阿爾伯勞更在可崙城之西南臺爾白爾地方 (Horbell) 購置田園別墅，封·白爾姓氏便由這地方而得名，在一張一三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所成立的文書上，我們發現第一次簽署着這個名字。(三) 在後此的幾代中，我們發現封·白爾族同可崙城內的城市貴族奧威爾史妥爾慈 (Overstolz) 封·得·阿培黑德 (Von der Adncht) 二族聯婚，再後又同卑克林族 (Birclin) 舍爾富金族 (Scherfgen) 封·斯皮格爾族 (v. Spiegel)

聯婚。在當時沙爾·封·白爾族大概不是屬於可崙城市貴族團的，因為自十三世紀之中葉起，這城市貴族團已經實行了對外封鎖，非本城市底舊紳舊世家不能加入的團體了。一三五〇年有名亨利·沙爾·封·毫爾白爾的騎士（Ritter Heinrich Schall von Horbelle）出現，他同着他的貴紳共同簽署了大主教維廉（Wilhelm）和可崙城所訂之攻守同盟條約，並且是大主教所出六個人質中之一的。在這裏我們頭一次見到了沙爾族之紋章。這位騎士底兩個兒子亨利與約翰於一四一一年被稱舉於選侯城可崙（Kunzeln）貴族之名姓中。

因在選侯城可崙和雨利騰（Jülich）二縣境內田產之購置和采邑以及各種特權之獲得，沙爾族對於社會之影響權勢，遂愈久而愈擴大。這一族中武勇好戰的族人，是屢屢與可崙城處於戰鬥之中的。當在一位名字叫做約翰·沙爾·封·白爾（Johann Schall von Bell）之沙氏苗裔，同他的兒子戈捷特（Godart）和他的親戚亨利·封·臥爾斯特（Heinrich von Vans）於一四一九年自福來欣（Frieden）城外臥爾斯特堡出發，作劫掠生活時，可崙城人民便帶着他們的軍隊攻破和焚燬了他這個堡壘。（四）此後我們也時時發現一個沙氏底子孫或充當本篤會會士

(Benediktiner)，或充當齊斯德進會士(Zisterzienser)，或充當多明我會會士(Dominikaner)。這一族裏也有不少的女兒們，或充當女修道院院長或女修士。(五)

自十六世紀之初葉，在這個支脈繁衍廣遠的大氏族裏顯然透出兩大支來，一支是沙爾·封·密爾赫穆·刷多富(Schall von Mülheim-Schwadorf)，一支是茂倫合文·盧輔特爾北(Morenhoven-Lüttelberg)。(六)雖然這舊日可崙城裏的平民家族，在當時已經成了萊因州(Rhein)的貴族，但是他們同可崙城的聯合却並未中斷。在這裏這鄉間貴族每年總有一部分時期居住在他的那些爵邸之中，或者也甚至恆久居住。沙爾·封·白爾族之邸址在可崙城內新市場與依木·拉曷(Neumarkt-Im Laach)兩條街拐角處，阿波斯特爾教堂(Apostelkirche)之對過，這裏好像是這一族原來的住處了。茂倫合文·盧輔特爾北支系是我們應當詳細研究的，因為這是來中國傳教的湯若望之所從出的支系。

這茂倫合文莊田是一五〇三年居住在瓦爾多夫(Waldorf)和格來艾爾(Gleuel)兩個地方的約翰·沙爾·封·白爾所購置的，盧輔特爾北是他的夫人瑪嘉勒達·封·君尼禱(Mari-

sareha von Gymnich) 出嫁時帶了過來的陪嫁莊田。(七) 這一位約翰·沙爾·封·白爾和他的夫人就是湯若望底會祖父母。他們決不會料到，一百五十年後會受到了中國話贈的榮典的。這榮典當然是湯若望底父母和祖父母也都曾同受到了的。這茂倫合文和盧輔特爾北兩處莊田第一代創業莊主的沙氏所生的男子亦名約翰，並且是和麗洒·封·阿爾典堡庫 (Lysa von Aldenboekum) 女士結婚的。(八) 這一對夫婦所生的兩個兒子亨利·得根哈爾得 (Heinrich Degenhard) 和約翰 (Johann) 於一五七四年析產分居，各自另立了門戶。亨利·得根哈爾得分得盧輔特爾北和連帶所有一切莊田，約翰分得茂倫合文為自己的產業。(九) 亨利·得根哈爾得曾結過三次婚。(一〇) 他第三次結婚的夫人是瑪利亞·賽發爾得·封·麥羅得 (Maria Scheiffart von Merode) (一一) 會生三子。長子名約翰·來因哈得 (Johann Reinhard)，充當希爾得斯海穆 (Hildesheim) 大教堂之教士。其他二子名亨利·得根哈爾得二世 (Heinrich Degenhard der Jüngere) 和約翰·亞當 (Johann Adam)，約翰·亞當就是以後來中國傳教的湯若望了。這兩位弟兄之中，約翰·亞當或許是年長一點，但是未獲得確切的考證。

對於約翰·亞當產生時日地點的問題，當時的文件中沒有一個能予我們以說明的，後來所發現的許多報告，頗含有矛盾之處。但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仍能獲得充分確切的解答。約翰·亞當·沙爾是於一五九二年五月一日生於可崙城內阿波斯特爾教堂近處的爵邸中，這個地方就是現在的新市場街四十七號和依木·拉曷 (Im Laach) 街十六號房宅之所在 (一一)。

在那個時候沙爾·封·白爾這支脈繁衍的家族已是被一般人們視爲舊貴族的了。(一二)沙氏的紋章，藍色爲底，底上左右兩行，各畫兩條上下相並，而各有紅色與銀色方格十塊的橫樑；紋章上端畫盜頂，盜頂法鷹飛之像，色藍，口凸開，以成兩邊飛翅，翅上仍皆畫有分成方格之橫樑 (一三四)。

至於說沙氏之族是屬於萊因州之古代貴族的，這由沙族和舊貴族的屢次聯婚中，就可推想而知了。在關於約翰·亞當 (即湯若望) 進日耳曼學院 (Germanikum) 讀書時的商談中，他的貴族出身是決無可疑的。沙氏族人加入非舊貴族不得進入的各種修會 (Orden) 與修道院 (Stift) 者爲數頗多，并且多半都能升到很高的位置。譬如說在可崙城內大教堂所附設之聖瑪利

亞 (St. Maria) 高級貴族女修道院中，我們就達到三位沙爾·封·白爾之族人。其中一位是安娜·沙爾·封·白爾 (Anna Schall von Bell)，關於這位女修士早已就有人說過，她是：「出身與品行都一般高貴的，」自一五七九年至一六〇九年，就是正當約翰·亞當的時期，她會充當可崙城聖茂理爵 (St. Mauritius) 女修道院院長 (一五)。我們還會得聞，有一位沙氏族人會充當約翰騎士階級修會會士 (Johanniteriker)。但是沙氏之族人特愛入德意志騎士階級修會 (Deutscherorden)。

在這裏尚有三位會入德意志騎士階級修會的沙氏族人尤其值得特別稱述與頌揚，這三個人底名字與功勳經聖富蘭國 (Livland) 國史會於十六世紀之中葉記錄了出來。然而這三個人對於萊因州本族之詳細家族關係，已經是不可考了，因為凡屬騎士一入修會，就得斷絕家族關係。這三個人之中最偉大的，是斐理普·沙爾·封·白爾 (Philipp Schall von Bell)，曾被德意志騎士階級修會委充管領聖富蘭國瑪利恩堡城 (Marienburg) 的統治長官，並為全國兵馬總領 (Landmarschall)，換言之，就是聖富蘭騎士階級 (Ritterschaft) 之總司令官，從品級上說，也就

是犁富蘭修會總會長之下最高的一個階級了。他的兄弟維納 (Werner) 曾以次為塞格沃爾特 (Segewold) 的尉官 (Kuntpan)，米淘城 (Mitan) 的軍事長官，羅西敦城 (Rositten) 的行政監督和高爾頂根城 (Goldingen) 的統治長官 (一六) 充當全國兵馬總領的斐理普·沙爾·封·白爾 被敘述為最偉大的末後一位修會騎士。在一五六〇年八月二日他曾率領一小隊騎士在艾爾埋斯城 (Erms) 附近，直撲俄國暴君 伊望 (Iwan der Schreckliche) 底軍隊。他很勇猛地擊進敵軍中心，但終因寡不敵衆而遭失敗。他和他的弟弟嘉布理艾爾·沙爾·封·白爾 (Gabriel Schall von Bell) 還有一大批貴紳貴族都成了敵軍底俘虜，於十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城 內均被俄皇 處以殘暴的死刑。當時俄國軍隊 之統領，彌協爾·苦爾畢斯奇 (Michael Kurbski) 曾特向俄皇 進言，釋放犁富蘭 的兵馬總領斐理普·沙爾·封·白爾，並且向俄皇 獻策，封他為犁富蘭國君，俾作俄國藩臣。凶暴的俄皇 依望並不採納他的意見，竟把這位最後的騎士下令斬首。這勇猛的沙氏 族人當受刑時却毫無畏怯，而從容就義。苦爾畢斯奇 公爵在他所寫的回憶錄 (Denkwürdigkeiten) 中關於他有詳細的記錄，在他這回憶錄中為他樹立了一個永久不能損壞的光榮之碑。修會統治

國 (Ordensstaat) 聖富蘭因這位最後的騎士之死，也就消滅了，而德意志騎士階級修會在巴爾吞海 (Baltisches Meer) 沿岸的統治權之末後殘餘，亦隨之奄然沈淪於墓穴之中 (一七)。

另外在我們所發現的一六一八年和一六二三年的文件中，曾提及一位約翰·亨利·沙爾·封·白爾 (Johann Heinrich Schall von Bell)，這位就是在各來粉·布來特巴河 (Greven-Breitbach) 和萊因柏 (Reinberg) 充當德意志騎士階級修會統治長官的，但他後來却把他這職務辭去了。這個人大概是約翰·亞當會親身認識的 (一八)。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可崙城市史與教會史的學者肯益 (Kempen) 人埃及第優斯·改勒紐斯 (Aegidius Gelenius)，他在一六四五年所出版而很有名的著作論教會與平民方面可崙城市可驚奇的偉大 (Über die wunderbare Grösse des kirchlichen und bürgerlichen Köln) 裏會特別稱述了沙爾·封·白爾之氏族。他的歷史的見解和他對於沙爾這個姓氏及其紋章的解釋，却非常奇關。然而他這個說法足可證明當時人們的見解怎樣了。

改勒紐斯的著作裏有下列一段：由羅馬遷移過來，而階級不同的戶口——貴族，庶民，軍中的

士卒——在克勞孚斯 (Claudius) 皇帝時代和後此一些年數中，逐漸建築了萊因河畔這烏比爾 族的城市可崙 (Unierstadt Köln)。沙氏之族是由這裏的體面羅瑪遷戶之苗裔繁衍下來的，并且是屬於這城內一百家最體面貴族階級的。當時沙氏之先祖以忠勇出衆，所以就獲得了拉丁文斐德理斯 (Fridalis) 之尊號，即忠勇 (Threue) 的意思。他的後人之中有一部分當在這可崙城 變成了德國的城市 時，便更改姓名爲封·得·特羅因 (Von der Troien) (一九)。其他的一支在舊弗郎璽 (Altfranken) 時代，改姓沙爾，沙爾姓字也是忠信的意思，譬如由塞乃沙爾 (Seneschall)，馬來沙爾 (Marschall)，果特斯卡爾古斯 (Gotschalgus) 等等名字即可推測而知，因爲塞乃沙爾 即主人的忠僕之意，馬來沙爾 即馬廐的忠徒之意，果特斯卡爾古斯 即上帝的忠徒之意。對於上帝和對於人類的忠勇之德，在他們這一族底紋章上，也都表現了出來。據亞里斯多德 (Aristoteles) 底學說，一個勇敢的人因堅定，剛毅，不動搖的德性，所以就拿一個四方形做象徵。沙爾族 和封·得·特羅因族 之紋章上，都畫有一大批方格，排列得如同棋盤上的方格一般在分成兩行，上下合並一氣的雙檠上，這兩行雙檠之中的每一行都有一個尖角形式。雙檠象徵戰場上的行列。雙檠分作

兩行是標明兩族底祖先在兩次戰事中的忠勇，特別可爲模範地彪炳於世。這紋章上的其他一部分，也是意在使他們祖先底騎士德行得以流芳不朽的。封·得·特羅因支脈底紋章上畫着一個象徵忠信的獵犬，連帶着那些畫有方格的橫樑盤踞在頸環上。沙爾族底紋章上却是畫着一個兩翅展開的飛鷹之像的，這是武勇善戰底象徵了，而雙翅上亦畫有方格橫樑。他們的祖先選擇了這個紋章，意思當然是要鼓勵他的後人們做同樣的騎士德行了。改勒紐斯對於這與隆的家族，也是一樣有鼓勵他們做這種騎士忠勇德性的心理的，因此他就做了一首意境飛躍興奮，禱呼司戰事的白羅娜 (Bellona) 女神，司莊嚴的馬耶斯塔斯 (Majestas) 女神，司光華的阿斯特勒阿 (Astraea) 女神和司彩虹的依麗斯 (Iris) 女神降臨福祐的拉丁文詩貢獻給沙氏之紋章 (二〇)。

沙氏紋章底這一種解釋或許是沙氏家族中的舊日傳說。改勒紐斯和約翰·亞當·沙爾·似乎彼此都是故舊。他們兩個在羅瑪的時候，都在德意志學院 (Deutsches Kolleg) 居住過，雖然居住的時間是不同的，可是自一六一四年到一六一七年，他們兩個却同時在羅瑪學院 (Römisches Kolleg) 讀過三年書的。我們就可以推想而知，這兩個萊因河畔的人必定坐在一起，談論神

聖的可崙城和沙爾族祖先光榮的事業。並且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爲什麼他要特別給沙爾族寫了一首這樣頌讚的詩（二一）。

在約翰·亞當·沙爾·封·白爾後來所入的修會即耶穌會裏，一切階級上的區別悉行泯滅，只除掉入會時須貴族出身的條件之外，其他一概不問的。這個用意也是要鼓勵貴族子弟應當使自己的品行能堪當這個新階級。我們由約翰·亞當所寫的文件中可以瞧得出來，他是終身謹慎奉行這個用意的。此外他也並不以他的出身爲榮耀，所以只稱自己爲約翰·亞當·沙爾，而將表示貴族出身的「封」字去掉。在耶穌會的各種目錄和年報中，他的會友們有時寫他的全名沙爾·封·白爾——然而有時却也把他的名字離奇地歪曲怪寫。並且又因爲沙爾一字在一個歐洲南部人底耳朵內，聽着總覺有些生疏，所以在當時書翰往來中，他總是稱呼他自己爲亞當神甫（P. Adam），（譯者按，湯若望之湯字即亞當之縮讀譯音。）

關於約翰·亞當青年時代之史料，我們所發現的甚少，因爲他家族底文獻已失沒，而可崙城耶穌會會區之歷史，雖然能畀與我們以種種開啓，然而在這個時代中，却呈現着重大的遺漏。這是

因爲一六二一年四月四日夜間失火，焚毀了教會全部和學校連同圖書館與文獻。

當時的兒童們都是在教區，修道院，慈善道院所附設而當時所稱爲下等學校裏或在私人所設立的私學裏受初步發蒙教育的。然而像在約翰·亞當一個家道富裕的貴族子弟，自然會受到家庭教師底教育。在他這幼稚年齡裏，他已經開始學了拉丁文，因爲拉丁文是當時科程中最主要的科目。

後此，約翰·亞當（湯若望）就和他的兩個兄弟一樣，入可崙城耶穌會所設立之三王冕中學（Tricornatum）。這是下部萊因區最先設立而最優良，居於領袖地位的學校（二二）可崙城內耶穌會之會區占有一大片偉大建築物，在馬采輪街（Marzellenstrasse）和多明我會街（An den Dominikanern）之間。一五九九年多明我會街新建的中學大樓完成（二三）馬采輪街之東面，卽今日聖母瑪利亞升天教堂（Maria-Himmelfahrtskirche）所在之地址，耶穌會築有房屋一所，命名富樂敦北（Freudenberg），是當時做爲修士養成所之用的。這個修士養成所收留的學生以貴族子弟爲主體。而當時這個中學裏所收錄學生底數目總在千名左右。學生之大多數都是可崙城和

萊因州人，又有許多是來自鄰近德國州郡的，由比利時和荷蘭來的也還不少，甚至由盧森堡及邊僻遼遠的德國境內之小國，也有幾位來留學的。我們不知道，約翰·亞當和他的弟兄們當時是住在沙爾族自己的府邸中，或是住在修士養成所中。這個修士養成所于一六〇七年關閉了（二四）。

在制度上，那時的中學和現在的中學有各種不同的地方。那時的中學沒有今日中學的那兩班或三班最低年級。這最低年級的預備課程，學生須得在入校以前修習。然而中學本科班次之上，更附設論理學、物理學與形而上哲學三班，以作高級中學班。可崙城的三個中學——三王冕中學、芒丹中學（Montanum），勞倫爵中學（Laurentianum）——嚴格的說，這三個中學的高級班，便是造成可崙大學文哲科的班次。初入高級中學的學生先在論理學班註冊，經過學士考試之後，得了學士學位，就可以成爲大學的研究員了。在這個時候，大學舊生對於新入校的學員，就要舉行那一種有惡聲名的「新生入學洗禮」（Fuchsenraufe）了。約翰·亞當到北京後，在他年齡很高的時候裏，都還記得這種粗暴的習俗（二五）。

約翰·亞當（湯若望）僅畢業於中學本科。當在他入這中學的時候，這中學還是有原有的四

班，就是初級和高級文法班，詩學班（這就是希臘拉丁文學班）和修詞學班。低級文法班底劈分是在一六〇六年或一六〇九年按照一五九九年課程編制而實行的。當時的規定是每一班一年修業完畢；只有修詞學則尋常所預定的修業時間為一年半。然而因為由低級升入高級，皆與學期考試之結果有關，所以天分高的學生們，往往有例外，於半年後即可升班了，可是天分低的學生們——這差不多是全校半數的學生——往往在一班裏頭不得不滯留至一年半或兩年的時間。

這耶穌會底中學所視為教育的主要目標，是養成學生們虔誠善良的人生操守。因此宗教底示教與實行便視為最重要的課程，雖然為宗教課程本身每星期所規定的鐘點只有數小時。一種主要的砥勵學生德性的工具，就是瑪利亞教士協會（*Marianische Kongregation*）。在三王冕中學裏，像這樣的教士協會有三個，就是：貞德成年會（*Parthenica Major*），是為形而上哲學與物理學班底學生們所設立的；貞德幼年會（*Parthenica Minor*），是為論理學班、修辭學班和古典學班底一部分學生所設立的；天使弟兄會（*sodalitas angelica*）是為年級較低底學生所設立的。天使弟兄會經過長久的商談，就是自一六〇七年至一六一〇年，方得經羅馬承認為正式的教士協會。

之一，而直隸於羅馬學院總教士協會，因而便為全體教士協會之一了（二六）。

天使弟兄會底記錄簿，幸而脫出了可崙城一六二一年的火災，這未經焚燬的當時各項事故的登記冊子，差不多可以說是唯一的一個能向我們報告約翰·亞當在三王冕中學求學時代情形的史料。由這本記錄簿子裏邊，我們摘出幾條報告，抄附在這裏。約翰·亞當之入天使弟兄會係在高等文法班讀書的時候。在一六〇五年十月初間，他曾被選舉為這個會中底兩個助理員之一。一六〇六年二月十九日，他又被選舉為天使弟兄會底評議員兼秘書。同年四月間他升入古典學班，因得進貞德幼年會（二七）。在這一點根據之下，如果我們假定他由低級文法班開始，每班修業需用一年，那麼他入這中學的時期，大概總在一六〇三年了。他的長兄來因哈德入學的年齡是先於他一年的；他的弟弟亨利·得根哈爾却在他一年或兩年之後（二八）。

在天使弟兄會裏，約翰·亞當是一位年齡同他差不多相等的會員斐得利·史斐（Trieb Spe）底伴侶，斐得利·史斐在三王冕中學讀書為期不久，後來就轉入芒丹中學肄業了，不過始終並未脫離天使弟兄會（二九）。約翰·亞當的其他一位同學，就是後來充當了耶穌會總會

長的高斯文·尼克耳(Goswin Nickel)，不過高斯文·尼克耳在當時已經是在高級班讀書的。

在那時的一切學校裏，一律偏重希臘與拉丁兩種古典語，而拉丁文尤其重視。即在耶穌教（新教）的學校裏，亦和天主教底的學校裏一樣地重視。拉丁文之在當時，是學者作學術論文和實際上書翰文，就是連親弟兄之間的往來信札，甚至在日常談話上，都要用的一種語言。在耶穌會底諸級學校中，自高級文法班起，學生間彼此談話即須開始純粹用拉丁文，並且用種種不同的練習方法與競賽方法，令學生盡力追摹齊采羅(Cicero)之典型，務求文詞優美與流利，而這努力在當時也實在曾達到了一個很高的程度。譬如約翰·亞當·沙爾後來遠處在中國的北京，一直到最高的年齡裏，還能輕妙可驚地寫出一筆無愧於羅馬文人的優美的拉丁文。其他的課程像德文和歷史，並非分開教授的課目，都是附在主要科目中連帶教授的。歷史科主要的講授，反而附入修辭學底講授中，而德文科則在一切班次中都借翻譯和談話為練習的機會了。

當在約翰·亞當在可恩城求學的時代，在馬采翰街耶穌會會區充當院長的，是亨利·余倫神甫(P. Heinrich Schenau)，這耶穌會會區除了辦學校之外，還展開一種多方面的神事工作。

(三〇) 但是當時對於約翰·亞當這一個男孩子遺下了最深刻的影響的，却是籍隸閩佛禮城 (Lutich) 的亨利·富樓司神甫 (Henrich Follaus)，他在天使弟兄會裏當了多年的精神上領袖。其次對於約翰·亞當有影響的，就是校內課程指導員約翰·列與神甫 (P. Johann Leo)，他是一個歐洲南部人，道德成熟圓滿，且富有教育經驗，深為全校之所敬重景仰(三一)。

由遺留下來的一本人名冊中，我們那時這個中學裏的一切教員底名姓，竟能得以全行知道。在初級各班中授課的教員，都是剛修滿了哲學課程，而在大學裏獲得了碩士學位的耶穌會修士。他們向例開始在低級文法班充當教員，而連同他們的學生們一併向上升級，可以升到詩學班的。如果上面我們所說的假定，就是約翰·亞當在一六〇三年年底開始了他低級文法班的課程是對的，那麼他三年的時間所有的一個教員，就是籍隸巴登大公國 (Baden) 外浦城 (Waibstadt) 的約翰·雷稀碩士 (Magister Johann Reisig) 了。為教授希臘文，學校聘有一位專門教授，同樣為修辭學也聘有一位固定教授。約翰·亞當底希臘文教師是籍隸奧特馬森城 (Ottmarschen) (三二) 的格拉爾得·亨利琪神甫 (P. Gerard Henrici)，而他的修辭學教授是籍隸安海模城

(Arnhem) 的格拉爾得神甫。

自一六〇五年起至一六〇七年止，是可崙城一個大不幸的時代。在一六〇五年可崙城全年不斷地有「一種惡性虐疾」流行，但是三王冕中學仍能全班課業不輟。在這一年的七月有一支意大利拿破里 (Napoli) 城的軍隊沿萊因河而下，直侵荷蘭。可崙城須担負四百名傷兵底治療與給養。耶穌會教士們負責照管他們，爲他們尋找住處，爲他們募集卹款。在次一年中，瘟疫病又流行起來了。驚懼惶恐的市民成羣結隊地到耶穌會底教堂內祈禱禳災。但是最困難之年，却是一六〇七年。瘟疫病愈來愈凶，不間斷的流行着。學校底課程因而亦受其影響，是年秋季的三個月，三王冕中學就因此完全停課了。

這一年年底，約翰·亞當決意加入教士階級。接着對於他入羅瑪德意志學院的接洽和他離別家庭與萊因故鄉的準備，也都開始了。

他這一別，却成了終身永訣，因爲自此之後，他從沒有回過家鄉。這樣，我們也要告辭沙爾·封·白爾之家族，追隨着約翰·亞當，以敘述他一生的偉跡。不過，對於他家族以後的歷史，我們還要

在這裏做一極簡略的報告(三三)。

約翰·亞當底父親，就是那位亨利·得根哈爾得一世，似乎是在他兒子離別之前去世的。而他的母親則確係于一六二一年以前去世的。他的長兄來因哈得於一六一五年承繼盧輔特爾北的產業。但是當在後來他充當了希爾得斯海穆大教堂之教士時，他這產業就又輪到他的弟弟亨利·得根哈爾得二世之所承襲了。這位亨利·得根哈爾得二世曾充當富來爾慈海穆 (Flenzheim) 和紐其欣 (Neukirchen) 兩個屬於選侯城可崙 (Kurköln) 管轄的鄉區區長，其後又會歷充來因巴河 (Reinbach)、高特斯北 (Godesberg) 和麥來穆 (Mehlen) 三個鄉區的區長。可是因爲他對於巫婆 (Hexen) 之撲滅，過於暴烈慘酷，所以並沒有留下甚感流芳。一六二一年他娶了一位出於密爾赫穆·胤多富支脈底遠戚女子。他這夫婦只生了一個女兒，名依利沙白 (Elisabeth)，所以盧輔特爾北之沙爾族系，亨利·得根哈爾得二世之後，在男統方面已經絕後了。他的整個的產業都轉移到依利沙白底丈夫手中，就是斐理普·封·臥爾斯特·隆百可 (Philipp v. Vornst-Jombek)。

因爲封·茂倫合文爵爺，約翰·亞當底伯父約翰 (Johann)，依然無子，所以這一支脈也就絕後。可是後來茂倫合文底產業竟是落到了富來爾慈海穆支族了，這一支是屬於密爾海穆·刷多富底脈統的。後來這一族還獲得了可崙城郊外的望恩 (Wahn) 莊田。

由這密爾海穆·刷多富·望恩正支上的一個旁支，產生下來撒克遜 (Sachsen) 地方高西薩地方的帝國伯爵沙爾·利約古耳 (Reichsgraf von Schall-Riancour zu Gausse) 的一支脈，將到中國傳教的沙族偉人之紀念和舊日家庭之傳述，都耿耿忠心地保存着。沙族因爲已經沒有甚麼人在萊因州，所以一切財產，在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初葉已全部出賣。

第二章 在羅馬——肄業德意志學院，入耶穌會，中國之呼聲

教皇如流第三(Julius III.) 照聖·依格納爵·羅約拉(Ignatius von Loyola)之建議，於一五五二年創辦德意志學院(Deutsches Kolleg)於羅馬，而將其管理權畀之耶穌會(一)。教皇格勒高爾第十三(Gregor XIII.)因這個學院經費不足，不能有相當發展，遂於一五七三年八月六日從新創辦，給與這個學校豐富的設備與經費，竟至使其到了可以收容學員百名的地步。因此這個學校遂得於一五七三年十月十八日，連同二十三名任校學員遷入得拉·瓦來殿第(Palast della Valle)，慶祝他們這學院底第二個誕辰，然而經過多年遷移變動之後，於一五七四年一月在聖·阿波里拿勒教堂(St. Apollinare)所包括那一片廣闊宏巨建築物中尋到了他們最後固定的住處，這聖·阿波里拿勒教堂亦竟於翌年撥歸這個學院專作晨夕禱告之用。到了一五八〇年，剛建設完成之匈牙利學院(Ungarisches Kolleg)便又同日耳曼學院(Germanikum，即德意志學院之拉丁名稱)施行合併。當時學員之聽講上課均係在羅馬學院(Römisches

Kolleg) 中，羅馬學院爲耶穌會之中央教育機關，經教皇格勒高爾第十三升爲格勒高爾大學 (Gregorianische Universität)，並且爲全體基督教第一個講神學的學府。一五八四年四月一日教皇關於日耳曼學院所下之詔諭，關於日耳曼學院 (Ex Collegio Germanico) 規定了日耳曼匈牙利學院之組織大綱(一)。

德意志學院之設立，原只爲選拔最優秀的青年學子。一開頭人們，本想建設一個純粹貴族教育機關，以便盡量造出一大批學識卓越而忠於教會的貴族俾可昇以德國各修道院各大教堂中爲貴族保留之位置，更可藉他們的出身，學術與道德底勢力以獲得對於主教選舉之影響。可是這個計劃既而又經過了一番修改，纔得施行的，修改之點在入學條件，原擬非貴族出身，不得入此院，修改之後，即平民出身，亦可准其入學，不過天資却須確實特異(二)。關於正式入學的年齡，教皇詔諭之所規定者，爲二十歲。但是在這一點上，對於貴族却特別優待。凡屬能按照大教堂所要求之祖先輩數證明其各輩祖先確爲貴族的青年子弟，年滿十六歲，即可准入這學院，但須以已畢業於文法班爲前題(四)。

這個學院底學員都是先經過教區中的主教或大教堂，一番選拔後保送來的。而在耶穌會底學校中經會區總區長或院校長選拔保送。選拔手續至為慎重，耶穌會的歷代總會長曾下過許多訓令，嚴格規定選拔手續。投考這學院的學員須先填寫一種三聯的，上面開列種種問語的表格，並須親自和數位有經驗的神甫共同簽名，由當地耶穌會的領袖神甫轉呈羅馬。經羅馬批准後，學員方許動身赴羅馬（五）。

此項表格得以保存的頗為不少，而其中填寫的亦不在少數，對於考證工作，這一種表格是極有裨益的史料（○）。例如下列問語是要答復的：請求入學者自幼為天主教徒否？他的父母是否信奉天主教？他是否德國國籍？是否通曉德文與拉丁文？是否尚未失去德國人民忠誠天性和德國人民性格上那固有的質樸？是否品貌端正？是否已經獲有有收入之教士職務？或是否有獲得一個這樣教士職務的希望？是否允許於畢業後舉行接受聖神儀式（Weihe），以便返國為教會宣力？曾在君主宮庭，貴族貴紳府邸，或曾在國外大學鬼混過的請求者，都不受歡迎。即在貴族請求者之選拔中，耶穌會歷代總會長亦是三令五申地要求年齡迫近二十，或至少具有身體與精神成熟的青

年。因為依據經驗（這是他們訓令中的言詞），過於年青學子，大半都服不了羅瑪底水土，因之很難遵守學院的日常規條；他們的心裏時常發生劇烈思想家苦痛，于是乃不得不令他們退學返家。當時凡學員一經選拔妥當，即須盡量於每年九月望與九月晦之間，到達羅瑪；因為在十一月初開講之前，他們還須經過一個四十天的試驗時間。此外他們於赴羅瑪時，即須備帶充分款項，以便作為萬不得已時返回之路費。

可崙城的大主教按照他所管領教區之大小與重要，盡量遣派學員赴羅瑪日耳曼學院留學。自一六〇〇年至一六五五年所遣派之學額，恰好達到百名了，其中三分之一為貴族子弟，三分之二幾乎悉屬可崙城內之貴紳與舊世家。^(七)而此百名學員中，屬於帝國貴族階級者則僅只有曼特爾色得伯爵（*Graf von Manderscheid*）一人，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可崙城的大教堂教士團體之份子，就是那些所稱之為「大教堂伯爵」（*Domherren*）的教士們，向例不接受高級聖神儀式；其結果，日耳曼學院無形中排除了最高級貴族階級入院求學。可是日耳曼學院是很願意收留一大批出身最高級貴族底子弟們的，這是日耳曼學院院長斐理普·利納爾抵（*Philipp Rinaldi*）在

一六〇七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一封信中會秘密地向可崙城耶穌會區院長亨利·余倫(Henrich Seheren)表示過的(八)。

因有這樣多可崙貴紳貴族赴羅瑪日耳曼學院留學，所以無怪乎約翰·亞當·沙爾也動了同他們合夥赴羅瑪留學去的心思。堅固了他這個志願的原因，或許是出於他母系的一位親戚底榜樣的，他這位親戚就是對於教會很有功勞的哈得利昂·賽發爾德·封·麥羅德(Hadrian Scheffart von Merode)(九)。他這個志願是終於償還了的，由可崙大教區選送羅瑪日耳曼學院留學的學員輸到他恰好是第一百二十四名，而在全學院的學員中則為第一千一百三十八名。可是使他得以錄取，是經過很長久的交涉的。

自一六〇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三月二十九日，耶穌會(Jesuitenorden)在羅瑪開第六次全會(一〇)。由耶穌會萊茵教區所選派參與大會之代表，為該區總區長特奧多爾·補索斯(Theodor Busäus)和可崙城的耶穌會區院長亨利·余倫。在大會開會的時間，這兩位可崙代表會和羅瑪日耳曼學院院長斐理普·利納爾祇，商談收錄約翰·亞當和一位其他的貴族子弟約翰·

亨利·封·愛倫普特 (Johann Heinrich von Elmpt) 入日耳曼學院的問題。日耳曼學院院長對於這件事情原則上贊成；因此在三月八日會要求可崙的代理院長約翰·列奧神甫 (P. Johann Leo) 向這兩位志願者舉行選拔考試，並且要求他把試卷與文件從速寄往羅瑪 (一一) 這一切都照辦了，但是關於最重要的一點，他們的報告却過於不貼切。利納爾祇在四月二十四日的一封信中，要求對於志願者底年齡再加詳細報告。他信中又說，據原來的報告這兩位青年都是十七歲。如果他們到了是年九月達到滿十七歲，那麼他們在學院留學七年之後，便可舉行接受聖神儀式，成爲神甫。如果是那樣的話，他們就應當於本年九月赴羅瑪入學。如果不然的話，他們還得再等一年，於次年赴羅瑪入學；這樣他們的身體和才能就可愈加成熟，愈加合適了。總之，對於這種過於幼稚的青年們，日耳曼學院所抱的宗旨是收錄愈少愈好的。而日耳曼學院中的德籍協理也有同樣的意見 (一二)。在這封信尾有一段附言，其文如下：「若是我收錄這樣幼稚的學員，我就免不了要受重大責難的，而這一種收錄本來亦不能算絕對有效，如果七年學歷之後，他們尚不能升爲神甫，行動還似小孩子。在這一點上，我完全以先生底見解爲依歸。如果先生覺得這兩位青年已經

脫離兒童稚氣，至少在本年十月已入十八歲的年齡，那我決定要迎合先生底請求的」(一三)。

替代繼續向羅瑪呈復，或許是當在這一封信到達可崙城之前，可崙城的耶穌會當局就又想了另一個方法，就是比較書面交涉更速達目的底方法。這好像仍是余倫神甫所設的一個辦法，因為他這時已經返回德國了。

在一六〇八年五月之底或六月初的某日，一位青年德國人，爲一僕所伴隨，騎着馬由大衆門 (Porta del Popolo)，走進羅瑪這座永久城市。當他在一個旅店找妥了房間，略事料理之後，他就去尋找德意志學院，直接叩院長之門。院長利納爾祇神甫當在這位生疏的青年說他是可崙城約翰·亞當·沙爾時，他心裏所起的，並不是一陣驚異，而是一種輕微的驚恐了。六月六日他給余倫神甫的一封信，宣瀉了他這位院長底心情。他這一封信底原文如下：

「一件錯事已經鑄成了，這件錯事給我生出不少憂慮。就是關於約翰·亞當·沙爾·封·白爾的事件。他竟出人意料之外地突然到了此地，——一個真真正正的小孩子。可是在這裏，我們還覺得他對於德意志學院尙未成熟。至於說怎麼會鬧出這麼個錯兒來，這是我所不能明白的。」

利納爾祇繼續着把全部交涉的經過作了一番敘述。他又說，教皇爲貴族所規定的年齡固然是達到了。但是在他寄給列奧神甫的末後一封信中，按照耶穌會歷代總會長底訓示所開列的兩個條件，就是遲於九月須達到滿十七歲的年齡和成年的外觀，却并未得以滿償。他還把原信抄出一份，附於信內。他又說，沙爾現在到羅瑪是最不合適的時期。他曾把這個男孩子登時引到日耳曼學院德籍協理那裏去，互相商議之後，決定不在日耳曼學院中收留他。「我們要把他安置在羅瑪神學院（*Römisches Seminar*）。但是在這件事情上，爲設備、服裝、與飲食，是需要許多花費的，而這個小孩子手中却是分文都沒了。因此，我們最後決定，在一個有體面的寄宿舍裏安置他。這寄宿舍的管理權大部分是委託羅瑪學院院長的。他把賣掉他那一匹小馬所得的款項，一部分支給他來時所住的旅店，一部分給返還家鄉的僕人做了路費，剩下的一點，也還將就能維持他在這個寄宿舍裏一兩個月的生活。在這個期間，諸位在可崙可以決斷，是否要約翰·亞當·沙爾在羅瑪神學院或在別的地方等待至翌年入學期……這個青年使我很滿意，只是他還過於幼小稚弱。我很抱歉，這件事體竟這樣發展。甚願先生一顯才能，妥爲處置此事，俾任何方面皆無傷氣，爲至感盼……

。在這裏利納爾祇又特提及羅馬神學院之費用，他說，羅馬神學院之居留連帶一開始預付款項，約需二百四十五個都卡金幣（Dukat，譯者按：一都卡合九馬克五十五芬尼，約合現行我國國幣十五元），在羅馬其他帶有寄宿舍之神學院中用費還能略微減少。最後日耳曼學院院長用下列的一句話結束他這封信：「約翰·亞當我一定要從優關照的」（一四）。

這封信一到萊因地方，當地的耶穌會士們就很疾速決斷地辦理起這件事情來了，這時余倫神甫已於是年六月二十二日升任下部萊因教區總區長，所以就更能爲力了。於是爲這一件事體最高一層外交，乃開始活動。可崙之副主教巴燕公爵斐得南（Herzog Ferdinand von Bayern），當時代理他的叔父有選舉皇帝權的公爵恩斯德（Kintherst Ernst）管領巴燕大公國底政事，會由波恩（Bonn）寫了一封密給耶穌會總會長阿誇維瓦（Aquaviva）的信，迫切地請求批准約翰·亞當·沙爾入日耳曼學院。他這請求的確有力，當時就經耶穌會總會長阿誇維瓦之所批准，阿誇維瓦回信會說：「此事之批准，純粹爲對於殿下及全巴燕王室，對耶穌會之優渥盛情和異常重大功績的感謝表示」（一五）。

沙爾正式入德意志學院在一六〇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在這個學院一本同學名冊中，最末後一頁曾有關於沙爾的一段登記，即：「約翰·亞當·沙爾·封·白爾，籍貫可崙，爲可崙天主教教區之教友，父母均係貴族，家庭自來信奉天主教。本人亦自來信奉天主教，并未入過其他宗教。在可崙會畢業於修辭學班，爲該處瑪利亞會及天使弟兄會會員二年半。保薦人，可崙院長約翰乃斯·列奧（P. Johannes Leo），入學日期，七月二十四日。未得有神甫之職，亦未享有教區產業之主權。」

本年五月一日，達到滿十七歲。入論理學班」（一六）。

在羅瑪于每年七月最後一星期和八月間，開始哲學之切實研究，爲學生并非順利時間。加之這一學年已將終結（一七）所以插班的亞當·沙爾功課愈形加重，可是這日耳曼學院的新學子，登時就開始勤奮用功，甚至是用功過度的。四十天的試驗時期，在這期限中入校新生須習慣校內生活，閱讀各種規章，並且練習施行各種義務，沙爾也很快地得以安然克服。九月八日他具誓願書，願遵守學院之規程及教皇關於學院制度所下之詔諭（一八）。自此之後，他就穿上了日耳曼學院之紅色學士大衣，而正式成爲日耳曼學院之學員了。

九月十三日利納爾祇神甫向可崙耶穌會區新任院長約翰·柯排爾神甫(P. Johann Coppe) (一九)作一篇關於此事進展始末順利之報告，并且聲明諸事皆首肯。但是他又加上一段說：「我看他(指沙爾)很面黃肌瘦。我不願這個資質優良，而出身高貴的青年人——(著者註：一個幼稚的「小孩子」，一轉而成了一個「青年人」，竟有如此快速！)在他這羸弱的年齡裏遭受損傷毀滅。我要運用一切小心與注意，保護他的健康，不致稍受任何虧傷，如果有什麼不合適的情形發生時要隨時向先生報告」(二〇)。

此後在這位院長所寫的些信件中，沙爾底名字迄未出現。(二一)這大概因為是一切順利，無可報告。自一六〇八年十一月初間起，青年的沙爾每日和其他的日耳曼學院學員一般，由聖·阿波里拿勒教堂走十五分鐘的道路，到羅瑪學院聽講。這座壯麗的建築物在今日仍還不會改其舊觀，在當時已經是數十年之前(即一五八四年)建築，而經教皇親自舉行落成典禮的(二二)。

第二個試驗期，連同第一個試驗時期，尋常是要經歷六個至八個月的。在沙爾因為他到羅瑪來得過早，所以他這第二個試驗時期就不加多幾個月了。經過這個試驗時期之後，日耳曼學

院學員更須舉行一次矢忠於學院之種種章程與規則的宣誓儀式。約翰·亞當·沙爾遵照校章於一六〇九年五月二十四日，舉行這宣誓儀式。同時同他一起舉行這宣誓儀式的，還有十二個其他的學員（二三）。

我們也獲得了關於報告他接受宗教堅信儀式（Birminns）和低級接受聖神儀式（niedere Weile）的證件（二四）。此外沙爾之名姓亦是記錄在一六〇九年瑪利亞會之會員冊子中的。

由那個時代所保存下來的人名冊，為數過少，使我們對於他當時的教員與同學，不能獲得確切證據。大數學家兼天文學家克利斯托夫·開拉微尤斯（Christoph Clavius）當時還生活在羅馬學院（二五）。但是這位七十歲的老人似乎未曾在學院中授課了。雖然如此，亞當·沙爾從他所得來的啓發，也一定不會少的。當時的數學教授為克利斯托夫·格朗穆伯閣神甫（Christoph Gramberger）。

一六一一年九月初間，約翰·亞當·沙爾以優良的成績，修滿三年哲學課程的限期。可是這時享受假期的自由，則僅有數週之久。然後他就作了決斷他一生命運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他自

動地加入耶穌會爲會士。這許是因爲他所受的教育始終都是在耶穌會所辦理的學校中的緣故。按照日耳曼學院規章，關於這一點是沒有阻礙的。許多日耳曼學院學員，其中也有可憐人都已在他之前加入耶穌會，給他在作着榜樣。或許這時他的眼光已經遠越重洋，而注射到遠東了。

他在日耳曼學院中留有良好紀念。日耳曼學院總人名冊中，後來有人曾作下列一段關於他的登記：「他於一六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加入耶穌會，一位出類拔萃的青年人（Opimus iuvenis）並且已赴中國，在那裏他建立了不少特殊功勳。」他自己也把日耳曼學院保存在親愛的回憶中。他尤其所愛懷念的是籍隸狄堡（Dieburg）的雅各·篤斯保穆老神甫（P. Jakob Nusbaum），因爲這位神甫是他的良心指導者。爲了這個緣故，所以他由遠東寫的第一封信便是寄給這日耳曼學院的。

羅馬七丘中的魁以利納爾丘及丘上所建宮殿（Quirinalpalast）之對面，安安靜靜聳立於一個花園中的，是聖·安德勒（St. Andrea）大樓，即耶穌會羅馬教區之修道院（Noviziatshaus）。在這座大樓之旁，有今日多爲人所參觀的爛爛的圓形小教堂，却爲較後的時代之所建築。修道院

大樓大部分也都是後來所建築的，雖然那原來的，經聖方濟各·保爾吉雅（*hl. Franz Borgia*）所建築的部分仍還存在。

聖·安得勒大樓（二六）在十七世紀之初葉頗具有國際性質，因為這裏頭所收錄的修士不僅是由意大利半島各地所來的，就是由其他一切歐洲的民族中，也差不多都有子弟們來到這裏的。在修士底人名冊中，我們可以看到波蘭，匈牙利，法蘭西，愛爾蘭，蘇格蘭和英格蘭等國底人名，而尤其有許多是出身於德國各種族的。這些修士底教育程度是不同的，而其中却有許多神甫們。這修道院在任何一個月內都可以加入，但是大部分的人們都是在秋天纔來入院的。意大利藉以外的修士們在修道期滿後，或在修道期中，都可以返回家鄉，或居留在耶穌會羅瑪教區中。

是年十月二十日約翰·亞當·沙爾自日耳曼學院遷入聖·安得勒大樓。至於說他隨身帶了過來的服裝是甚麼，這修道院裏一個收藏入院修士服裝的修士在一本簿子裏記載得很詳盡：一頂氈帽，一件深棕色絨造的輕外套，一件教士服，一件紅色短外上衣，一件深棕色的布褲，一雙黑布襪子，一件襯衫，一條手巾，一雙家常便鞋，一雙皮鞋，沙爾還在簿子上簽字證明這收存數目底不

誤(二七)。由這裏看，日耳曼學院所給與這位離校學員底服裝，僅只是他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了；因爲入院修士馬上就得要另換一種新服裝的。

一六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是沙爾欲充當修士，而先行見習時期的開始日(二八)。在這一年中在不同的時日來充當見習的共有四十六名，其中有七名是德國人；這七名德國人之中有四名是自日耳曼學院來的(二九)。年齡已經到了三十五歲，籍隸德國空斯塘次(Konstanz)地方，於是年十一月一日入院的約翰·特倫爵(Johann Terentius)(三〇)。「譯者按：此係拉丁名，其德文原名爲施來客(Schreck)」，中文名爲鄧玉函，便是後來同沙爾一齊到中國來的神甫了。一年之前亨利·沙黑特(Heinrich Schacht)已經入院，這位就是後來在歐洲北部各國傳教極收效果的傳教士。沙爾入院後半年，就是在一六一二年四月十四日，亞利山大·得·羅得斯(Alexander de Rhodes)來入院，這便是後來到交趾支那和安南東京去的偉大傳教士。見習修士在兩年見習期中的數目，因見習修士時來時往，未能固定，然而亦總在六十名與百名之間。除了這些見習修士之外，這座大樓裏還有許多年老的耶穌會會士住下，所以當時在聖·安得勒大樓所居住的人們底

總數總在百名與百二十名之間。

在這一個人形成一個小世界的團體裏的生活，決非單調而毫無變動的。這修道院底編年錄，誠忠實地記錄全校活潑潑青年們底生活，和他們底高尚的奮勉。日耳曼學院的學員，總之，凡屬德國人都特別被稱讚，因為「德國人能把他們那民族裏所固有的謙虛慎重的態度，與潔白天真的生活和合爲一的」(三一)。

由各國和各修會赴羅瑪朝拜的人們，都在這座有益於康健而地勢華麗的修道院內做他們每年的宗教上修養。在這些人們底隊裏，有修道院長們，主教們和紅衣大主教們。紅衣大主教白拉爾敏 (Cardinal Bellarmine) 曾於一六二二年在這裏住過一個整月，爲的是要用宗教上修養來準備臨終。——這是他自己說的。他「對於他親愛的弟兄們」所作的訓詞，曾遺留下一個很深的印像。(三二)

見習修士，在院外習作博愛工作。他們一部分在大街上和公共場所上向兒童們或貧寒的人民們授以宗教課程。另一部分到牢獄裏去，予囚犯們以精神安慰，轉移他們的心思向高處去，並且

以食物供給他們。一六一一年這些見習修士以他們挨門乞討的錢財，竟能由牢獄中贖出六名囚犯。隣近聖·微達理絲 (St. Vitalis) 教堂之前，每星期三便爲貧窮的人們會聚待賑之期，其中各國人都有，數目總可達到七百；而在聖安得勒瞻禮日，其數竟要過千的。可是當場維持秩序，用虔誠的言詞鼓勵貧民，向他們散佈聖牌聖像和施賑的，却盡是這些見習修士。有時大主教和主教們也都到場，目睹這全盤的舉動。

尋常兩種較爲困難的習作，是保留給二年級的較爲成熟的修士們去作的。一種就是每年春秋二季各練習一次看護工作。供他們這種練習工作之用的，有兩個醫院，就是拉特蘭醫院 (Lateranospital) 和聖母瑪利亞慈悲醫院 (Spital von Maria der Trösterin)。這兩個醫院裏所有一切職務與看護工作，每年一到四月和十月便全部交給這些修士担任，此外他們還要施神工於病人底靈魂上。約翰·亞當·沙爾在見習期終結時，就是在一六一三年十月，也担任了這種病院看護的職務。修道院編年錄曾記載關於沙爾的一件事情：沙爾担任看護一個患病兵士。沙爾勸他作告解懺悔神工 (Beichte)。然而徒然而已。因此他就呼喊人類原祖亞當與夏娃 (沙爾的名字爲

亞當，所以他特別敬重這兩位人類原祖）降臨佑助，他說：「神聖的原父母，幫助你們這位苗裔吧，因為他現在已經奔上投入地獄裏去的最好的道路了！」同時他又虔誠地念了些禱告的經文。翌晨，這位當兵的老罪人，竟居然澈底痛悔改過了（三三）。

另一種練習工作，是一種朝謁聖地的旅行，這朝謁聖地的旅行，於每年春季或秋季舉行，做這種練習的，也都是二年級的修士，出發時例以三人為一組，為期一月，並且路上不許帶路費，他們一月之費用純粹依待施捨。這種旅行是為可以澈底練習克己自制的功夫（三四）。在路途上他們因無路費，所以往往竟不得不投宿病院。旅行的目標，尋常都是一個知名的靈場聖地（三五），沙爾當時率領他的那一小組修士，向朝謁目標地桃柢城（Todi）（三六）聖·十字教堂（Hl. Kreuz-Kirche）出發了。桃柢是在意大利國翁不鄰（Umbria）地方的山上風景如畫的一座小城市，路途上有一次，他們不得不宿歇於一個小店之中，規規矩矩地，他們退入客屋裏的一個牆角裏宿歇，然而，在他們的傍邊，一夥子旅客却在大吃大喝，並且口裏在說着些放蕩不遜的言詞。當場有一位老年莊嚴的神甫，然而這一羣放肆的人們却毫無顧忌。他們仍無絲毫震懼斂跡之意。這時這一羣

人中有一個人忽然瞧見了牆角裏的三個青年朝聖者，并且低聲向他的一個伙伴耳語說，有耶穌會的教士在這裏。這樣彷彿一個閃電擊入了他們的羣隊裏，登時他們那難聽的言詞便都寂然。這或許當時沙爾已經向他們使了個他那人所共知的憤恨的眼色，因而使他們驚縮起來了？

一六一三年將近十月底，約翰·亞當結束了他的見習時期，并且遷入羅馬學院，開始作他四年之神學研究。他這研究神學的四年歷程，由大部分尚保存的冊籍中，一直到現在還可以詳細循跡追查（三七）。

在一六一六年底第二本冊子中沙爾名姓之下記有下列的一句話：「將到中國去」（三八），在次年的第一本冊子中登載着：「約翰·亞當·沙爾在四年級研究數學與神學」（三九）。他多年以來所懷的志願後來終於償遂了。

一六一六年一月二日沙爾向耶穌會新總會會長穆爵斯·維特理施基（Martinus Vitelleschi）呈遞稟帖，請求派遣他到東印度或中國去傳教。他並且說這是他自從見習時期以來心中已經所起的一個志願（四〇）。

至於說一個像沙爾這樣高尚的青年，心中能起這樣的一個思想，自然是無須驚異的。自從一五九〇年以來，中國傳教士——利奇 (Ricer) 即中文名之利瑪竇，龍高拔爾地 (Lungohardt) 即中文名之龍華民和其他的人們——已經都向歐洲寄了許多關於中國興奮熱烈的信件與年報。當時中國在西方人們底眼中，是一個新發現的大陸，是給基督教又開拓了一個非常大的信仰區域。當時的歐洲人士，可以逐步瞧出基督教向中國首都之進展。他們聽得說，中國皇帝怎樣優遇利瑪竇神甫，高級官僚與學者怎樣信奉天主教，中國人民對於西洋學術怎樣感到興趣。在利瑪竇指導之下，保祿·徐光啓 (Dr. Paul Hsu Kuang-chi) 和列奧·李我存 (Dr. Leo Li Ngotsen) 即李之藻，翻譯歐幾里 (Euclid) 的幾何學和開拉微尤斯神甫 (Clavius) 之數學書籍，和其他數理天算等著作作為漢文。利瑪竇會把這些譯本寄給他的住在羅馬學院的古老的業師開拉微尤斯。在耶穌會裏，尤其是在羅馬，大家底期待非常緊張。一位方濟各·沙勿略 (Franz Xaver) 底夢想，使東方底偉大文化民族歸依天主教，似乎要成爲事實了。這在修士與神學學員們，常常會作為談話的資料的，尤其是如果有一種新的印刷物出版，或在餐棹上宣讀自東方來的新消息時。

因為數理天文的科學在中國能獲得了一種這樣高的價值，所以恰切一位像沙爾的人物纔能覺得貧有到中國去的使命，因為這些科學底研究在他是毫不覺費事的。

一六一四年十二月間，在羅馬有一個人出現，這一個人曉得把大家對於中國的興奮熱烈燒到了明明亮亮的火焰的地步，這一個人就是尼可勞斯·特立高爾（特甫）（P. Nicolaus Trigault，即中文名之金尼閣）（四一）。他是一六一〇年纔來到了中國的，但是這位纔三十三歲中國人底價值登時被認識了出來。金尼閣是一位天性火烈，魄力雄厚的人，他的頭腦很明敏，作事很能幹，很會在最高一級社會裏活動，能操各國語言，是一位有高深文學天才的演說家與著作家。他一到中國就被委任編輯一六一〇年和一六一一年之年報，因之他對於中國傳教之前途與困難得以一窺真像。當時中國所有的五個傳教總區，他都親自一一考察。他又會朝拜中國皇帝，換句話說，就是向着空空的皇帝寶座行朝拜禮，而這竟是當時中國朝儀上的一個最高榮典。

當時在中國傳教的總管龍華民神甫久已就計劃遣派一位神甫作代表（Procurator）赴羅馬向教廷和耶穌會管理處報告中國傳教狀況，為的是可以向教皇請求重要許可，并且向耶穌會

總部請求重要問題之解決與更加有力之救濟，并且還爲的是要喚起全歐洲底贊助。在金尼閣他發見了一個適當的這樣的人物。他於一六一三年二月底離開中國，於是年五月在可勤城（Cochin）上陸，步行赴臥亞（Goa，舊譯：科雅），自臥亞起，爲要加速前進，他以第一位中國傳教士，選擇了奧爾穆次（Ormuz）·巴格達（Bagdad）·阿勒波（Aleppo）·屈伯命（Cyrenn）的路線。一六一四年年底，他經過了一個延歷二十二個月的行程到達羅馬。

在羅馬金尼閣停留的時間總在一年以上，雖然中間會經過一度時期較長的中斷。他和教廷的交涉所得結果，便是一六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教皇那一紙有名的詔諭，這詔諭是准許把禱告儀式的書籍翻譯爲中國古文，准許中國本國教士用本國文字舉行禱告儀式，並且在大禱告舉行之時准許用中國士人的幘巾。教皇保祿第五（Paul V.）又把整整一庫珍貴書籍贈送給中國傳教會。

同時他同耶穌會管理處的商討亦在進行着。阿誇維瓦于一六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去世。金尼閣被邀參加耶穌會第七次全體大會。這次大會於是年十一月十五日選舉穆爵斯·維特理施

基神甫爲總會長。這樣他便得到了機會向耶穌會各教區之代表陳述中國傳教會之希望，俾大家注意到中國傳教會。他所獲得的是准許中國傳教會脫離日本教區，爲一副教區的論旨，可是兩個教區仍須隸屬於同一個，爲總會長之代表的視查員之下（四二）。

在羅瑪，金尼閣也完成了三部拉丁文著作，悉行於一六一五年在德國奧格斯堡(Augsburg)出版，這三部著作中，一部是修訂一六〇九年至一六一二年之日本年報。一部是一六一〇年和一六一一年之中國年報，這部年報原係於寄到歐洲的路程上，擱置在可勤城，而經金尼閣於路經可勤時又親自携回歐洲的。此外就是那部論基督教在中國傳教之奮鬥 (Über den christlichen Feldzug in China)。這部大著作是利瑪竇底意大利文手稿的拉丁文譯文，而他這翻譯工作在中國已完成了一大部分的（四三）。這一部歷史作品一出版馬上就翻譯成了各國底文字，在歐洲引起很大的注意。

然而，這一位勤勉自強的中國傳教之代表，在羅瑪的工作并不限於上述多方面的舉動。他很有行地去鼓勵耶穌會會士們赴中國傳教的興趣。在當時羅瑪各方面對於向中國傳教都是很樂

觀的。大家未能得知，在那個時候，對於規模尚小的中國傳教會，又起了一次新的仇視和迫害。紅衣大主教白拉爾敏還給中國底基督教徒們寫了一封祝賀的信。金尼閣也還同沙爾親自結識。沙爾最後的決斷，向耶穌會總會長呈遞上面已經提及的那一張請求的稟帖，或許是先同這位中國傳教代表商談之後纔舉行的。無論如何，一點却是確切無疑的，就是金尼閣在他爲中國大募集的全歐遊行上，願意沙爾這位傳教後補者做他的隨員。這對於這位青年人，確切是一個極有誘惑力的邀請。因爲這樣，他便可以瞧見歐洲各樣局面並且還可以再望探家鄉一次。但是羅馬學院哲學教授方濟各·皮考老米尼神甫（P. Franz Piccolomini）却向他勸阻。因爲對於他更較妥善的，是使他的學業不中斷。沙爾聽從了他這勸告，並且對於皮考老米尼爲這一件事至誠地感謝，這是他又過了三十五年，由中國寫給後此被選舉爲耶穌會總會長的皮考老米尼的一封信裏可爲證據的（四四）。這樣沙爾便以最優等的成績於最後的一學年中，即於一六一七年夏天完成了他的研究，便升了神甫。

沙爾卒業於神學科後，接續着就準備到葡萄牙國去。一六一七年十月十八日尋常出國所需

要的旅行證給他備妥。他的同伴爲安謙·瑪噶爾哈艾斯神甫 (P. Anton Magalhães) (四五)。我們無需乎驚怪的，若是不會再探訪了他的家鄉。因爲當時的章程，只是有十分重要的原因時，纔准許於出國之前回家探望的。這樣約翰·亞當在一六一七年未終了之前，必定已是到了葡萄牙國的。他在葡萄牙的主要任務，是學習葡萄牙國的語言文字。

在這個時間，金尼閣神甫已經完成了他爲中國大募集的旅行(四六)。在一六一五年三月間，他已經到過陶斯克納 (Toskana)。大公爵高西摩第二 (Grossherzog Cosimo II.) 除其他贈品外，還贈送給他一個製造非常精巧的坐鐘，鐘上置森林之神 (Faun) 一，一手持弓，一手持箭，以所發箭矢之數指示鐘鳴之數。(四七) 至於說金尼閣在這一年中短時期越過阿爾帕山 (Alpen)，到奧格斯堡，促進他的著作底印刷事件，這很可能是可能的。在一六一六年之開始，他赴歐洲北部，作一時期較長的巡迴遊行。一六一六年以後的兩年中，他的行動和他所巡遊邦國的次序，是不能確切考證了；然而在這個期間，他却也是又有一次返回意大利與羅馬的。可是我們知道得很確切的，是他曾漫遊意大利北部，法國，比利時，鐵利耳那 (Das Thierische Land) 和可崙那 (Das Köhnische

Land) 以及巴燕國 (Bayern)。一六一六年八月間我們已經發現他在巴燕國的首都明興城 (München) 到處他都自那些國王們底手裏獲得贈送給中國傳教會和贈送給中國朝廷的豐富禮品。

最豐富的禮品却爲巴燕國公爵家族之所贈送。這些禮品當在金尼閣離開巴燕時尚未齊備，不能向外運送。這是到了翌年，纔派兩位德國神甫給他送往葡萄牙國去的。在這些禮品之上，有一大批書籍，是專贈中國傳教士，以備披閱之用的。再者還有一架天文儀器，能自動表現天體之運動，及指示鐘點時刻。據說這一架儀器後來呈給中國皇帝之後，中國皇帝會命他的工匠六十人再照樣仿造一架，但這却是給他們未能成功的（四八）。

尤其被人們所稱揚的，是這巴燕國老公爵和在位的少公爵底許多贈品。號爲虔誠者的維廉第五 (Wilhelm V. der Fromme) 於一五九七年會放棄了巴燕御座。他於其他珍貴物品之外，還送了一大批聖徒之遺物，兩隻輝煌燦爛金聖爵 (Monstranzen)，一個銀質十字架，用寶石嵌鑲的基督和宗徒聖像，用琥珀所雕刻的神聖物件，再還有許多鐘錶，鏡面和其他日常用物，悉屬價值

昂貴，而藝術精純之物品（四九）。可是這許多捐贈之中最珍貴的，應屬維廉底一筆捐款了。他還特用文件作證，每年捐贈中國傳教會五百個古爾盾銀幣（Gulden，約合現行法幣千餘元。）文件上的日期是一六一六年八月十六日。并且他還表明他希望他的後人永久每年捐助這筆款項。（五〇）

當時操有巴燕統治大權的大公爵馬克西米良第一（Maximilian I.）所捐贈的物品之中，有一件精美絕倫非常出色的，這是當時需要忍耐性的細小精緻工作，具有令人可驚奇的尖巧心思的時代，纔能創造了出來的。這個物件會引起當時一般人們底驚奇。因此就有一位希臘羅馬古典學者特作一篇意境非常飛躍的拉丁文章，以描寫牠的構造與內容，而這篇文章也還是儘着一位富有閒情耐力的古典學者底能力所寫了出來的（五一）。這個東西就是一座由烏木所雕刻的非常精緻的短櫥，高三尺長三尺寬二尺，全櫥之構造分六層，每層皆有許多為絲綢所鋪設之方格方斗。櫥中之各個部分皆以鍍金之鎖鑰司啓閉。方格方斗個個不空，其中皆整整齊齊置放着一批一批的物件，悉屬散瑣的，上百的，玲瓏小巧的珍品，大部分皆為銀製，因為銀子是歐洲人相信為中

國人比金子還要重視的物質，這一批批珍貴精巧的物品，或仿造歐洲的動物與植物，或是能自行活動的小玩意；或是能自行演奏的小樂器；或是種種的香精香料；或是小燈，鐘錶，幾何學與外科儀器；或是基督，瑪利亞和宗徒等底聖畫和聖像；或是細美的絲織物，微小的文具；此外未及細敘的物品還有許多許多。這個神奇的箱櫥之中所包含的，除了上述各物之外，還有兩件異常珍貴的物品，關於這兩個物品，我們在下面還有許多的話可以聽得到的。這兩個物件之中，一件是用蜜臘所捏成的耶穌嬰孩，和耶穌嬰孩前面跪着的三位國王朝拜之像。其他的一件却是全櫥中最奇偉的，一部裝釘華麗的關於救世主一生的聖蹟圖冊。在這一部冊子底封面上寫有拉丁文呈獻之詞，即：「我主耶穌基督，天主之子，貞女瑪利亞之子之一生，按照四聖史所繪之聖蹟圖，謹以此圖送呈中國威德遠揚之大皇帝與君主陛下，進呈者係萊因宮中伯與兩部巴燕國之大公爵馬克西米良，時在紀元後一六一七年。」至於這聖蹟圖怎樣奇偉，我們留待以後再行描寫。

在德國各地耶穌會之分會當在金尼閣神甫尚未來到之前，對於中國傳教會之興奮熱烈程度已足夠強盛的了；因為大家久聞他的大名並且都知道他的著作，他所到的地方，處處都開盛大

歡迎會。所以在這幾年中，耶穌會會士之間向中國傳教的運動，就充分展開了牠的能力。第一組傳教士，共四人，於一六一六年之開始已經決定派赴南美洲（五二）。由德意志各邦所組織的第二組是要隨同金尼閣派赴中國的。這些被選定的傳教士們，都是在不同的時日，與在不同的道路上，悉行赴葡萄牙國的。

金尼閣在他的巡遊期間，最後已到西班牙。西班牙國王斐理普第三（Philip III.）對於派遣西班牙耶穌會會士出國傳教，並捐助傳教會款項，表示很大的同意。但是因為政治上的緊張，（西班牙葡萄牙二國已經在斐理普第三統治之下合併為一，然而這緊張仍還存在着的，）所以西班牙底神甫，無一位能加入金尼閣底傳教團了。一六一八年二月底金尼閣到葡萄牙里斯本（Lissabon）。

第三章 赴東方之航程

每年三月爲由歐洲赴東方之最良好的行期。因爲船在這個時候起碇，到印度洋正趕上信風（Passatwind）吹起的時期，能加速東航船隻底航程的。因此赴印度的船隊自二月底起，即在里斯本準備停當，以便一起順風，即可揚帆出發，而旅客們亦應事前在城內等候，俟船主一發登船號令，即可立刻上船。這樣那一大羣傳教士，以前本在葡萄牙各修會內散居着的，現在便都到里斯本各居留地內會聚了來。

但是這一年三月已經過去，而人們仍不能作出發思想。這樣與金尼閣神甫反而合適了，因爲他還有許多箱件行李都已誤期，未能準時運到的原因。此外金尼閣神甫尚有許多其他延誤麻煩的事體。因爲在葡萄牙皇室議會方面和幾位葡萄牙耶穌會士方面，因比利時與德國傳教士人數過多，曾表示疑慮不安的態度。他們以爲兩位比利時傳教士，已經就足够了。金尼閣意興十分沮喪，

因爲他，耶穌本會底會士，也給他做出這樣的困難來，但是他的奮鬥與努力，終究克服了這些阻力。

(一) 他在里斯本候船開行的時期中，曾完成四卷日本對於天主教徒迫害的記錄，因爲他要把這四卷書發表，於四月五日呈寄巴燕大公爵馬克西米良一世，郵件中尚有附函，報告巴燕皇室捐贈之各種禮品已平安到達里斯本，并且又從新表示誠懇謝悃。由這封信裏頭，我們得知，船底航程是要於四月六日開始的。(二) 但是這却仍是一次枉然無效的警報，船終究未得開出。金尼閣方面又新發生了些困難。因爲金尼閣曾得到報告，法國皇后所捐贈的禮品在特舒江 (Tschou) 入口地方被海盜所劫。四月十四日金尼閣得知，運送帕爾麻 (Parma) 大公爵禮品和許多箱件的那隻法國小船，因懼某夥強盜搶劫，已在里斯本之南塞士巴爾 (Seirhal) 海港着陸。因此他就很急速的決斷，親自赴塞士巴爾，并在耶穌復活節早晨，就是在四月十五日，用盡一切氣力把船裏箱件起卸了出來。但是時間終究來不及了。因爲海航所需要的順風已經吹起。金尼閣不得不從速奔回里斯本。(三)

一六一八年四月十六日，復活節之星期一，東航船隊一律開出特舒江口。這在傳教士們，就是

對於祖國的終身別離，並且是一次非常困難與充滿危險的旅行底開始了。同會會友們底親愛幫助着減輕別離的苦痛滋味。里斯本的耶穌會會士都聚會在主要居留地之教堂內，舉行照例的送別教典。一切的人們都給離別出國的傳教士行吻足禮，並且口裏都唱着聖經上葉塞亞的言詞：「播揚和平的使者之足，多樣可親可敬呀！」（見聖經葉塞亞第五十二章第七句。）船本來是停泊在里斯本西關前柏勒穆（Belém）地方的礮號一響，船即拔錨開行，並且在希羅尼米特修道院（Hieronymiterkloster）院脚下，所有的修會會友和修士，會聚着向他們送行（四）。送行的朋友們尋常都要乘小舟追隨出發船隻遠送一程的，並且還把一些新鮮的食物與菓品，遞給他們遠別的親友們，以便補助着克服馬上就會發生的暈船病。但是這一次風力却過於大了，小船不能追隨送行，這樣一切的傳教士們，除掉能傲風霜的剛強的金尼閣之外，就不得不各自忍受各自的苦痛了。

對於沙爾和他的貧有到中國傳教使命的同伴，一直到臥亞的行程，和他們在臥亞的逗留，我們都得有確切考證。在當時和現在都是一樣有許多人寫旅途日記，或在船上寫信，一遇着郵便機會，便可把信寄回家鄉了。當時像這樣略大略小的些報告，或手稿或印件，被我們所發見的，竟有一

打以上然而最富有啓示能力的，是沙爾於一六一九年二月九日自臥亞所寫的一封信（五）。

赴臥亞的航船一起共三隻。本來還有第四號的一隻，已經裝設齊備，但在將出發前，竟在碼頭遭火焚毀。爲替代這一隻焚毀的船，人們又遣派兩隻較小一點的船隻，隨同大船一氣出發。這一種船據沙爾信件上所說，「是人們當時所稱之爲胡爾克墊（Anlicken）的，」即單桅載重船隻的意思，而這種船在現在是人們所稱之爲屋爾裏斯（Uras）和虎克爾（Hiker）的。在爲這一隊五隻船底統率船的聖·加羅號（S. Carlo）船上載有十二位多明我會士。在這隻船上發號司令的人是大船長克利斯托夫·得·納隆哈（Christoph de Noronha）。在聖·茂羅號（S. Mauro）船上載有到日本傳教去的主教瓦倫特（Bischof Valente），傳教會代表得·馬洵斯（de Matos），和十位傳教士。赴中國傳教的二十二位傳教士，所乘的船隻名善心耶穌（Der gute Jesus），亦簡稱耶穌號，船長爲約翰·蘇瓦賈慈·恩里克慈（Johann Suarez Enriquez）。二十二位赴中國的傳教士之中有十位葡萄牙人，五位比利時人，三位意大利人，和四位德國人，即約翰·特倫爵（Terrenz 卽中文名之鄧玉函），溫采斯勞斯·龐達來昂·奇爾微采爾（Wenzeslaus Pantaleon Kir-

Witzer), 約翰·阿爾伯利薩 (Johann Alberich) 和約翰·亞當·沙爾 (六)。這一羣傳教士的數目很有可觀，是葡萄牙東航船隊很少次數所得能運載的，而這些傳教士中頗有幾位在中國底傳教史上作過重要的脚色。所奇的是這船上的乘客之中，沒有一位是赴印度與摩鹿肯羣島 (Molukken) 的耶穌會傳教士。但是這些傳教士於到東方之後，多有將爲他們所原定的傳教區變更了的。加之在路途上或在臥亞城內，這些東航傳教士中竟有病死的，所以二十二位赴中國傳教的教士們，真正到了中國，爲教會宣力工作的僅止剩了八位 (七)。他們底行李都是分置在聖·茂羅與耶穌號的船上；在這耶穌號船上，存放着全部行囊中最珍貴的部分，就是巴燕大公爵家族所捐贈的禮品與聖徒遺物。

同時和這赴印度的船隊，由里斯本港口出航赴西非洲海島與赴巴西 (Brazilian) 的船隻，尚有十二艘。這一同出發船隻數目底強大，是要令那窠藏在海邊的海盜們，不敢下手截劫的。在加納利羣島 (Kanarische Inseln) 底地帶上，赴印度的船隊與這十二隻船隊分離，爲的是每一隻船可以盡量急速向前奔馳，因爲時季已經很晚，時季一過，將於航行不便了。

沙爾和他的同伴們，在路途上，很有時間可以觀賞驚奇他們所乘船隻底巍峨龐巨。這船底甲板上四層樓廈高高聳起，遠處觀望，直似水上飄浮的一片崇樓巨閣。一個這樣的船隻內部所包藏的，有千名以上的乘客，連帶貨物行李與八個月的食糧。在返回歐洲的航程上，這些船隻裏所堆集的，是非常巨大一批的香料，譬如百萬磅胡椒，然這還只不過是全船載貨十分之一，此外還要有爲能盛二百名水手的空間。海上的暴風雨，對於這樣的一隻船絲毫不能損害。英國和荷蘭大礮所射出的，尋常是十五或十六磅的礮彈，不能鑿透這船底船牆，也不過像些釘子一般，插入船牆中而已，然而葡萄牙大礮二十或二十五磅的礮彈，往往能把敵船兩面的船牆打碎，或把一隻船，由首端至尾端直劈成兩半。因此一隻葡萄牙國底船是能和許多的敵船相抵抗的。

在開始出發時，耶穌號船上有六百三十六位乘客，如同一羣青魚一般，散佈在貨物行李與食物之間。還有些商人們弄到船上來的活的家禽，竟達萬隻之數，這都是船上一位姓羅（Rho，卽中文名之羅雅谷）的傳教士所報告的。

傳教士們在船上所佔的房間，是以六百克倫銀幣（Kronen）之代價所賃的，原爲船長所備

的後甲板上的房間。這是一個小房間，寬長都沒有多少尺，並且還有一個越出船邊之外，四周蒙蓋起來的走廊。他們所佔的這小小房間，食宿皆在其中。惟船上教士與船上乘客之間的宗教生活，都是有很好的辦法的。在全航程上只有很少的幾天，不能舉行神事作彌撒 (Mass)。在星期日和其他的祭祀之日，總要唱莊嚴的聖詩聖歌，以舉行宗教儀式的。差不多每天晚上向船上的乘客都施以宗教問答課程，課程完畢後，便一起唱和着讀聖經。在宗教方面船長和較高一點的職員都以身作則的，引導全船底職員。因為派駐船上的教士於船開行後一個月間，即已死去，所以金尼閣便代替了他的職務。傳教士之間，每日下午都有一點鐘通例的功課。星期一與星期四枯心神甫 (Cousin) 演講道德上的各種散瑣問題；星期二與星期五特倫爵神甫作數學講演；星期三與星期六金尼閣向這些新進的傳教士們作引入中國語言文字底神秘的講演。特倫爵，羅奇爾，徹采爾和沙爾四人很勤奮地作觀察星象，流星，風向，海流和磁針移動等工作；他們又作確定航船底位置，以及由船上所見的海岸與島嶼底位置，為的是要把他們這研究工作底結果，報告給歐洲的學術界。

船上每日由管理處所供給的例餐，也不過是一份略可充飢的口糧而已。有錢的人們是可以另備飲食的。無錢的人們，都被神甫們所資助。船上為病人設備的也有藥品和較佳的飲食，當時都是委托金尼閣神甫保存與分配的。當在後來全船數週間完全變成了一個大病院時，這一點的設備却是許多人命底救星了。

因為在佛特角羣島 (die Kapverdischen Inseln) 之南，船帆必須移轉向基那阿海岸 (Guinea-realität) 航行，方可不致被一強猛海流流至北部巴西。在這裏就得要非常費力，甚至幾乎是不可能的。去克服那奔向墨西哥海灣 (Golf von Mexiko) 去的勇猛海流；當時一經誤入這個海流的船隻，便都得到返還葡萄牙的命令。在基那阿海邊，他們的船會走到了那夙為人們所懼怕的無風的地帶裏，就是當時人們之所說的「死氣層」(Region des Todes)。在這裏是幾乎每一隻船上的人們，都要患那種有惡聲名的基那阿瘧疾 (Guinea-“Fieber”)。這種瘧疾之感染，是因天氣非常熱燥，因而呼吸滯塞不舒，更加飲食惡劣，而水質愈加惡劣，和衛生設備欠缺的種種原因。在中國傳教士所乘的船上，這種惡劣狀況超越尋常程度。學識淵博的特倫爵認為這是火星與土星在

昇星圖 (Sternbild der Plejaden) 中相交合的原因。沙爾對於這一說自然不否認，但是他對於這天災流行的主要見解，却是歸根於非洲那充滿了瘴癘之氣的海岸的，這海岸是人們偶一不慎走得過近了的。

這傳染病先是肆虐於船上職員之間。船上的耶穌會教士們，爲病人底靈魂與肉體皆盡力周旋照料。船上並無正式船醫，僅只有一位略曉外科手術的理髮師，他的任務也不過有時給人們割血管子放血而已。然而，傳教士中的特倫爵，却是一位很能幹的醫士。他每天一亮就同着幾位耶穌會教士，到下面那疾瀉肆虐的恐怖艙間裏，盡力盡他的職責。旣而這瘟疫病也傳染到了教士之間，而頭一個被傳染上的，便是特倫爵自己，他的生命幾瀕於危，然而過了十天之後，他的身體竟克服了這一種病症，這是全部旅行人們底幸運了。

船上的人們未被這病所傳染的，寥寥無幾。有一次竟有三百三十人同時病倒牀上，這換句話來說，就是船上過半數的人們了。船上所有的教士，全都很沈重的被傳染，只有羅神甫略覺頭痛而已。對於這個病症最有效的醫治方法，就是放血。病人一晝有放血至三次之多者。據羅神甫底記載，

當時專爲給病人們放血的，六個人尙不足用。這種治療方法，在當時是很收了效果的。後來他們也用鏢（Antimon）作治療的藥品，亦很收良好效果。因爲金尼閣對於醫藥和較佳食物的分配，非常審慎節減，所以他們的儲藏品，竟能達到疫癘克服之期。因爲這一種傳染病所死去的人數，在羅神甫底報告中，是說「僅止」四十五名的。在這四十五名之中，有五位傳教士。可是金尼閣會說，如果沒有耶穌會教士底幫助，就要死去二百人了。虔誠的沙爾却以爲大多數人們底得救，是因聖·方濟各·沙勿略（Franc Xavier）向上帝所請求了輔祐的，因爲人們曾至誠地向他禱告。路途上誤落海中溺死的水手尙有五名，所以這一隻船上，一路上所喪失的人們，總數恰恰五十名了。

死去的五名教士都是在六月上半月去世的，這五個人就是比國人 崑吞·枯心（Quintin Cousin），胡柏爾特·封·聖·勞倫特（Hubert von St. Laurent）和約翰·得·采費（Johann de Celles），德國人 約翰·阿爾伯利禱（Johann Alberich）和意大利國人 保爾·客瓦利納（Paul Cavallina）（八）。這五個人底喪失，是令人們尤其感到惋惜悲痛的，因爲他們都已完成他

們的研究，並且一到中國都能開始他們的傳教工作的。

關於其他的兩位和特倫爵共同克服了這種熱病的德國人，嘉亞諦（G. A. E.）曾作報告。奇爾 微采爾神甫，他本來是很勤奮地襄助特倫爵醫治了船上的病人的，到五月二十七日自己也被染上病症了。六月二十六日沙爾神甫，因在救治病人的工作上過於奮力，也竟被熱病所傳染。及他恢復康健之後，仍照常作他這救濟病人的慈善工作（九）。

然而，在六月十六日於一切其他傳教士之後，金尼閣竟傳染了這樣重的病症，使他不得不作對於死之準備了，但是經過數星期，他竟居然也痊愈了，同時他的弟兄斐理普也染病症，而不得不倒臥床上。

在這瘟疫病尚且盛行於船上的時候，這隻船因受海流順利的影響，竟轉移牠的航路赴南部巴西，爲的是可以由這容易致人死亡的地帶中逃出。因爲船在這些緯度之中航行，已經脫出被海流引入墨西哥海灣的危險。在這個時候船上的記事冊子上就有一件極可喜的事情登載了。因爲在六月十三日這一隻船在南緯十度的地方，碰到了一隻返國的葡萄牙帆船。船上的乘客與船員

都很急速地寫了些短短信札，交付這一隻帆船郵回葡萄牙國。這些信件中有一封是羅神父寄給他的父親的信，這封信是直到如今還保存着的。連正在患病的沙爾，也還給他羅瑪的朋友們寫了幾行問候的話。他的信中表現出當時他的愁悶的心情。他願意人們爲他禱告，如同爲一個死人禱告一般。這一封短信可惜現在已經遺失了（一〇）。

在巴西的海程上，人們曾瞧見了離巴西海岸不遠的馬爾丁·瓦次島（Insel Martin Vaz）。這時船就又轉舵向東南航行，於六月二十二日越過麝蠟宮之回歸線，而回頭復向好望角駛航。清涼新鮮的空氣，使船上一切人們的災病悉行痊愈，除掉金尼閣弟兄之外。教士之間中斷很久的研究，這時一律又恢復。七月二十五日好望角在遠處浮現。在納塔耳（Natal）近處的海面上，船還受了三天三夜暴風的襲擊。八月二十三日船長去世。金尼閣和解了因繼承船長底位置在船上職員之間所發生的鬥爭，並且辦理了新指揮底選舉。船穿行於遠遠可見的哥摩羅羣島（Komoren）與北部馬達加斯加羣島（Nordmadagaskar）之間，直向印度航行。

船長曾作使船先駛孟買海港（Bombay）之命令。這個消息透出後，就發生了一次極危險的。

騷動，因為船上所存食物已不寬裕，因此人們就要求盡量急速的達到最終地點。金尼閣和其他的傳教士們又挺身阻止了這一場毆鬥。於是孟買之行方得作罷。十月一日船在臥亞之西北「火毀島」(Verbrante Inseln)停泊。十月四日船達到航行之目的地臥亞。自里斯本同時所航出之船隊中，僅有那兩隻小船中的一隻首先達到目的地。全部航程所需之時間，不過僅止五個半月。他們所預定的時間，至少是需要七個月的。五十年以來，從未見有一隻船出發得這樣晚，而能到達得這樣早的，這是當時人們底言詞。沙爾以為航程這樣迅速與幸運的完成，是應當歸功於可崙和鐵利耳(Ther)二城底聖徒在上帝前的代言的，因為這二城聖徒底遺骸是人們帶到船上來的。

巨大的快樂充滿了旅客們底胸懷，當他們在軍艦上一排一排禮砲聲和歡迎的樂聲中駛入廣闊的漫多渭江口(Mandovi)時，臥亞城便是位置在這江岸上的一片優美異常的景色，展現於他們眼簾之前，這是印度最優美景色之一的，更加這時正值雨後時期，一切俱皆閃耀着淨明碧綠的色彩。許多的小蜜蜂擁着這隻大船。小船中有一隻是臥亞教區的長上所派了來迎接新教士的。這小船中所載的歡迎的人們，都口裏唱着讚美的聖詩：「讚美吧，那以主子底名義來降臨的。」因

爲當時天色已經很晚，這隻小船把新來的教士們送到江口，就令他們上岸了。次日一早，月尚明亮未落之時，他們就又乘着這隻小船到城裏去，太陽剛透曙光，他們已經就上了陸了。

新來的教士們，在先前人們是把他們先引到聖·保祿學院 (St. Paulskolleg) 裏去的，在這裏這大修道院院區的人們和城內許多體面紳士都在大門口等候迎接他們。然後新來的教士和迎接的人們，又都一起在樂聲與歌聲中步入綠色彩飾的院內教堂之中，作感謝天主的神事。神事後，新來的教士還須朝拜肉體長眠於教堂聖室內之方濟各·沙勿略 (Franz Xaver) 和殉教聖人魯道爾扶·阿誇維瓦 (Rudolf Aquaviva) 和與他共同殉教的同人們。最後新來的教士們對於他們的身體也予以所需要的修飾。他們沐浴之後——人們試思，這因他們這樣多屢數處於一隻塞滿了旅客和塞滿了穢污的船上的原因，對於他們會發生多麼清爽的效力的——一律換上印度服裝，理髮師給他們整容理髮，然後便同赴歡迎譙會。金尼閣在第一次赴中國的行途上，也還受過一番這樣的歡迎款待的（一一）。這是以往的情形，但是這時聖·保祿學院已經成了一個極不合衛生的處所，所以現在他們顯然是把新教士們立即引到了聖·羅古斯學院 (St. Rochus

就是新聖·保祿學院裏去，作盛大的歡迎的。

以後的數週便是他們休養精神和遊覽城市的時期，他們曾參觀修士宿舍 (Professhaus) 和舊聖·保祿學院，並到碼頭邊那些明媚可愛的各島嶼上去遊覽，也會到過聖·安娜山莊教堂 (St. Anna)，這教堂在一個島嶼的中央，環境有着樂園一般的美麗。臥亞在當時從外面看還是輝煌燦爛。人民富庶，觸處宮殿，教堂和修道院的一座城市，這時還是人們所稱爲「金黃的臥亞」(Das goldene Goa)「亞洲的羅馬」(Das asiatische Rom)的。但是，這座城市底頹廢衰敗已經開始了。因爲當時荷蘭國的人們，他們是最後把葡萄牙國外殖民地給破壞了的，和那仇視程度較淺的英國人們，已經開始在東亞的各海洋上縱橫巡航起來了。過度的奢華和道德的墜落，使這自羅馬時代以來富有榮譽，居處葡萄牙的魯西丹民族 (Lusitanier-volk) 底精力日漸衰微。因衛生設備的完全欠缺，瘟疫病症已經在這座城內種下鞏固的根芽，而使城內居民不得不漸次向外遷移。方濟各·沙勿略創立的聖·保祿學院連那一座尊嚴的教堂，位置恰在城內最不衛生的區域中。在沙爾到臥亞前後之數年間，教會所辦的學校學院俱已遷至新聖·保祿教區中。兩年後連那

修士見習所也遷移地址了。這所舊聖·保祿學院，自是之後，僅作為教士會區辦公地址和教會神事中央機關之用了（一一）。

開始數週休息時間過後，新來的教士便被分散到臥亞城內與近郊各地方之宿舍中，以便等待他們來日的新使命，或赴中國起程的日期。他們在他們這等待期中，也能到撒爾塞特（Zalsette）鄉間各教區去，參觀那些質樸的基督教農民之虔誠狀況。

耶穌號東航船隻到達臥亞以後，恰好一個月，聖·茂羅號載着那些赴日本的傳教士們，纔得到達。這隻船上的乘客，在航程上僅止死去三十二人，其中有一位傳教士（一三）。但是這船上病人底數目却大得多了。任何船隻一靠岸時，岸上便已備妥可以抬架的病牀，為的是可以把病人登時送入為兩位耶穌會士所管理的皇室醫院。又遲兩個星期之後，全隊司令船方駛入港中。這隻司令船在遠航好望角時，曾撞見了六隻英國船。替代運用他的優越的兵器，同這六隻英國船開戰，他却以八萬噶啦（Tala，譯者按此係當時流行之銀幣名，一噶啦約合現行法幣三元餘）（一四）之代價自行贖買。英國船隻對於這一點非常滿意，雖然他們知道船上所有的價值超過這個數目不止

十倍；因為他們是不高興和這隻葡萄牙的巨船戰鬥的。他們把這筆款項收到後，還很客氣地出了一紙收據。自里斯本一同出發的那兩隻單桅小船，其中一隻，在此事發生之前很短的時間，還會同這六隻英國船整整開了兩天仗的；然後這隻船就被他們所捕獲，并且被他們洗劫一空，但是他們承認和敬重這隻小船底勇敢行動，所以到了莫三鼻給海島 (Mosambik) 就把他們都釋放了。當時一切人們對於這隻司令船底卑怯，都非常氣憤痛恨，連沙爾亦復如是。為懲罰他們這一種行動，全船都予以貶黜處治；司令官和高級軍官皆繫以鐵索，押返葡萄牙，受國王御前之判決。

到臥亞後，赴中國的宣教士們，纔第一次聽到一六一六年至一六一八年，中國對於基督教徒迫害放逐的消息。這個消息使他們覺得對於目的地已經這様近的快乐，無形之中受了打擊。此外在他們的人數之間，仍尚有生命喪失之悲哀發生，十二月六日斐理普·特立高爾特 (Philip Triguault) 去世；後來經院學派學者剛擦落·抵亞斯 (Scholastiker Gonzalo Dias) 亦相繼辭世。所以五個比利時國籍傳教士之中僅止剩下了領隊的金尼閣一人。然而他也又陷入了一場沈重病勢之中。

在十一月間，天空會有兩顆彗星出現。這是當時大家所視為重大的事故的，所以當時各位教士都作有報告。因為按照當時的信仰，這信仰也是沙爾所贊成的，是視彗星底出現為不祥預兆的。傳教士中通曉天文學的，每日都在用着臥亞學院裏那種不全備的天文儀器，作他們的觀察，因為他們所帶來的儀器尚未由箱匣中取出的緣故。奇爾微采爾神甫曾寫了一篇科學的報告郵寄歐洲（一五）。

在這些報告裏，我們得到了一點關於沙爾和他幾位同伴行動居處的消息。羅神甫在這數星期裏，是居住在臥亞新聖·保祿學校內的，特倫爵神甫是居住在撒爾塞特地方上的拉火耳（Rechol）的，在這裏他也尋到了機會為他所計劃的自然科學的百科全書「印度之普里紐斯」（Plinius Indicus）搜尋材料（譯者按：普里紐斯係古代羅馬之自然科學家）。奇爾微采爾神甫和沙爾神甫在猶阿里島嶼上（Jhar）作觀察彗星之工作，猶阿里位置在臥亞之東北，他們居住在這島上，是自十一月二十四至十二月十日；此後他們因事赴聖·保祿修士見習所居住，在這見習所是自十二月十三到十二月十八日。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三日，他們又在猶阿里島上居住；十二

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他們又第二次在聖·保祿修士見習所居住。因月光過於明亮，他們對於彗星觀察的工作停頓了一個多星期。自一月七日到九日，他們兩個又住在這猶阿里島嶼上，一月十日他們乘船赴撒爾塞特島上的拉火耳。一月十一日他們到空闊林（Chocoma），這裏就是撒爾塞特五位殉教者殉教致命的地方（一六）。可是因為這彗星後此並不會再出現，所以我們對於沙爾和他同伴底行止亦無所聞了。

一月二十五日沙爾在聖·保祿教堂親身參與教會裏的一個盛大舉動，就是大批新教友受洗的莊嚴典禮。這典禮是在每年聖·保祿宗徒歸化瞻禮日（Patronatsfest Pauli Bekehrung）舉行的。這次受洗禮的人數約近七百，一律作節日整潔裝飾，排列成行，步入教堂之中。聖·保祿學院底學員在前頭引導着。日本教區之主教特告奮勇，自願為這大規模的受洗典禮宣力。總督與貴族貴紳們也都到教堂裏來為這些受洗入教的人們作見證，作教父，並且拿他們自己的教名給受洗禮的起一個新教名。

在這等待期中的數個月內，這些傳教士們有豐富的時間，寫他們的信件與作他們的報告。

其是金尼閣神甫，雖因他兄弟喪失的悲哀和自己的病症，然而仍在不疲懈地工作，並且親手準備停當一大包信件，付最近一次的郵便郵運（一七）。沙爾寫寄羅瑪，日耳曼學院他的朋友們的一封信，末後所書的時日是一六一九年二月九日（一八）。他這封信所寫的是關於中國和日本對於基督教徒迫害之事件，是關馬達加斯加（Madagascar）海島和馬都拉（Madura）海島漁人所居住邊岸地方傳教的問題，在這裏同可勤城（Cochin）主教的爭論事件，似是已經調解停當了——這時羅伯特·得·瑞比利（Robert de Nobili）恰好在臥亞居住——他又寫了關於荷蘭人與英國人在海上的活動，而葡萄牙人反而是處在睡夢中了，關於葡萄牙在莽加羅勒（Mangalore）城外一場戰爭沉痛的損失；關於一六一八年幾乎將巴森（Basen）毀滅的一場暴風和洪水，關於三比西（Sambesi）河畔摩諾摩塔帕國（Monomotapa）銀礦之發現，並且最後關於印度大國王（Grossmogul）對於征服波斯的一場戰事的巨大準備，可是在這一件事情上，他對於他自己說「值得信任」的傳言人，未免過於輕信了（一九）。

二月底或三月初，這是自臥亞開赴葡萄牙國的船隻起行的例期。一六二〇年二月十三日德

國明興城 (München) 拉德神甫 (P. Rader) 證實金尼閣寄給他的郵件的到達 (二〇)。

由中國這時又有較佳的消息傳到臥亞。在中國這次對於教徒的迫害，原並非普遍性質的，所以已經減輕。那麼，人們希望由歐洲所帶來的那一大批禮物，可以發生一點效力，使那些仇視教會的官僚們底心情，略得和解。這樣一六一八年年底金尼閣神甫就自遠東傳教會視查處（或監督處）得到示諭，協同數位傳教士加遼動身赴澳門 (Macao)。

這一次赴中國傳教在海洋上未曾喪命的十五位傳教士中，僅只有五位已經完成了他們的研究，除掉領隊的金尼閣之外，就是富爾達多 (Furado，即中文名之傅汎濟)，特倫爵奇爾、微采爾和沙爾等五位神甫了；其他赴中國的傳教士們仍暫留臥亞。

然而，等到船向東方開行的時候，是又過了好幾個月的時間的。一六一九年五月二十日準備啓程的號令已經發出。赴日本的主教與返回日本的傳教會代表，率領傳教士數位與五名中國傳教士，分乘不同的船隻奔赴澳門 (二二)。這五名中國傳教士中，金尼閣神甫和特倫爵神甫首先乘船出發，並且於七月二十二日到達澳門。沙爾和奇爾、微采爾爲伴，同時出發。他們所乘的船是較後

自臥亞出發的，到麻拉甲海峽(Malacca)中，因受暴風影響，竟駛到了一個沙岡上頭。人們把船上所載的物品拋入海中一大部分，以便減輕全船的重量，使他得以浮起，但是這船却終久未曾得以立即脫出這沙岡的。這情形令人瞧着很是寒心的。這時虔誠的乘船者，却想起來了他們所携帶的神聖底遺骸；這遺骸中有一部分是可崙城一萬一千殉教童貞女的，爲人所非常崇敬的遺骸。人們把這神聖的遺骸取出供在甲板上，並且向這遺骸作了一個虔誠的誓願。登時暴風即行息止；船又可以活動了起來，並於六月二十八日，又繼續他們的航程。在交趾支那海中，他們又第二次遭遇了一場暴風，這暴風不停地直吹了三日三夜，然而，亦因上天的保佑而克服了(二三)。這隻船雖經這兩次的延遲，然而於七月十五日亦竟達到澳門碼頭。富爾達多神甫是和日本的代表同船的。他與奇爾微采爾和沙爾同日在澳門上陸。

第四章 澳門 (Macao)

一六一九年七月十五日約翰·亞當·沙爾安全地結束了他赴東方的行程。一切傳教士，尤其是德國傳教士們，根據奇爾維采爾底記述，都被備極熱烈地容納於澳門宗教學院；他們一直到這時所受的種種待遇與經驗，在這裏竟愈加豐富愈加超越了（二）。他們所帶來的一切珍貴禮品和那大批書籍，暫時都被妥當地收藏於學院之中。然而澳門尚屬葡國商埠，在宗教方面歸日本·印度支那教區之所管轄。沙爾仍尚不得不在這裏作數年的準備與等待，然後方能向他的傳教的目的地中國本部進展。因為中國在當時是有封海的禁令的。可是這個原因是怎樣起的呢？

在中國當時明神宗皇帝尚在位，他的年號萬曆，在位年限係自一五七三年至一六二〇年。他在天主教傳教史中獲得了他的聲名，因為天主教之入中國，並且能在中國首都立定了基礎，都是在他在位的時候。但是統治着這個巨大國家的君主，因他天性寬大仁慈，溫和因循，對於他這主宰

大權，就極其不能勝任了。明朝本來早已就透出衰頹無能的朕兆，及至到了這位皇帝，竟把國家任何能力都喪失了，所以或早或晚總逃不出倒塌滅亡之途的。真正擁有國家統制大權的，並不是皇帝，乃是一位寵臣，一位太監，或朝中與宮中一大批朋比爲姦，阿諛佞倖的男女人物。當時的人們如欲得高官顯位，是非同他們勾結串通不可的。忠誠能幹的文武官員，如果鄙視朝中這黨子姦惡小人，或功勳才具過於優異，必將遭這些人們之仇視和暗算。因有這種原因，所以鄰近的敵國，纔得安然從各方面危迫巨靈一般的中國，而受不到任何懲罰，譬如日本、緬甸、蒙古，尤其是東北部滿洲之游牧小民族，都是虎視眈眈地向中國侵略了進來的。這滿洲游牧小民族，即盤據在高麗、西北邊界上的各部落，已經在努爾哈齊會長之麾下團結一致。一六一六年二月十七日，他自加皇帝尊號，名其年號曰天命，宣言與中國皇帝平等，甚且他心目中或許已經視自己爲中國皇帝寶座之後補者了。而在繼續的時期中，他便以中國底國體爲他行政組織的模範(二)。數年之後他曾擊破二十萬人之中國大軍，一六二一年他佔據瀋陽與遼陽(三)。

當時北京朝廷中的狀況，竟這樣惡劣腐敗，自然會使我們明白，只要有一個獲有朝中當權惡

黨底寵幸的人，如果對於基督教仇視，那他便能弄出一次整個基督教徒之迫害，因為由這次基督教所受迫害之歷程上看，對於這件事情，官僚方面與老百姓方面，皆非有嚴重之參與的。因此這次教徒之迫害，情形亦並未見十分嚴重（四）。

爲這一次教徒迫害之主動人物的是南京禮部侍郎沈灌。他對於南京城內信奉天主教之官吏李之藻和楊廷筠之關係，在表面上很是規規矩矩的。他決不令人瞧出，他的主要目的，是要打擊他的信奉基督教的同寅同僚，他所談論的只是傳教士，他所直接打擊的，也是傳教士和信奉基督教的老百姓。當時的傳教士們因爲相信奉教官吏之權威可作靠山，所以都開始要擺脫掉利瑪竇（Ricci）所主張的暫避態度，而公然實行傳教。在南京，王豐肅神甫（P. Yagnoni 又名高一志）（五）尤其喜歡儘量壯嚴地鋪排教會內之神事。他甚至還會備妥一份上皇帝的奏摺，在這奏摺中，他所請求的，頗非小事，就是請求准許基督教自由傳佈的事宜。奉教官吏們，尤其是人人知曉的徐光啓勸阻進呈這奏摺。因爲他們認爲那時時機尙未成熟。總而言之，當時傳教士們欲到社會裡公開傳教的舉動，或許是過早了的。無論如何，這個舉動底結果確是更惹起沈灌底敵意，而加深了他

的憎惡的程度。

一六一六年五月這位基督教徒仇視者向朝中呈他第一次的彈劾天主教的奏疏。疏中列有北京與南京數位傳教士之姓名，而其他住有傳教士之城市，疏中亦皆一一列舉。疏中所開彈劾條款之大意是說：謠詐不測之外國人，宣揚主宰全世界之天主之教，到處勸人信奉，以為非此不足以救贖靈魂，在他們的天文學中，為天空之每一座星宿皆另畫軌道，而禁止教徒奉祀祖先。老奸巨滑的奏疏作者所選用的詞句字樣，俱都閃灼影射，亦可作惡劣意義之解釋。如果一位中國人對於教會懷有猜疑心，那他便可以讀到下列的字樣：國外之狗彘，危險學說之傳佈者，志在破壞承天命統治世界大皇帝之主權。他們到處宣講叛亂，到處允許任何一位官僚以自主之權。這本奏疏底結論是：人們應當把這些夷族拆諸八萬里之外，沒收他們的書籍；人們應當追究他們何時到中國，人數若干，款項自何處供給，何人曾幫助他們編纂他們的書籍——這句話是沈澗意在奉教的官吏們了。然後國家可得太平萬萬年。他這奏疏呈上之後暫時並無批答。奉教的官吏們用語言與文字勇敢地為傳教士與基督教辯護。沈澗又一次連續一次地作了些新奏摺向朝中彈劾。最後於一六一

七年二月三日批准的諭旨，自朝中頒下，可是沈淮這時已經私自擅行開始了對於教徒之迫害。沈淮並不會耽誤了運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他用錢買動了一位閩老，和那些有權能權威的太監。

他這奏疏所收效果，只有四位傳教士被驅逐，就是住在北京的龐迪我 (Jakob de Partoja)，和熊三拔 (Sabatino de Ussa)，住在南京的王豐肅和魯德照 (Alvarode Semedo)。其他的耶穌會傳教士，一共為數十四名，都乘時藏匿，多半都是在奉教官吏底家庭中。這在官廳一方面，自然也是求之不得的，因為這樣他們也可以省除許多麻煩。住在北京的兩位耶穌會傳教士被驅是在一六一七年三月十八日，不過他們這兩位驅逐却是很光榮地被遣送到廣東。然而在南京 沈淮對於他這兩位在南京施以逮捕者的處置却就毫無顧慮了，當時王豐肅曾受腳心板刑十擊，竟使他一月之久不能站立。然後他和正在病中的魯德照如同囚徒一般，被置入囚籠中發送廣東。一六一八年一月，他們又將這四位傳教士發往澳門，在這裏龐迪我在同月中旬即已去世。

這樣沙爾和他的同伴們到澳門時，已經發現有六位屬於中國傳教會之教士了，就是三位被驅逐的王豐肅·魯德照·熊三拔再就是李瑪諾 (Manuel Dias senior)，陽瑪諾 (Manuel Dias

junior) (七) 和勿賚曼 (Uremar), 勿氏係於一六一六年由歐洲經印度到澳門來的。(八) 因爲澳門爲日本·印度支那傳教區之重鎮, 又因爲日本當時亦有海禁, 所以在這裏在規模宏大之聖·保祿學院 (St. Paulskolleg) 中, 所居住的耶穌會士竟有六十, 八十, 或八十以上之名額。(九) 長久的等待時期, 在沙爾並未荒廢喪失。他現在有時間可以澈底研究中國的語言與文字了。爲他們這一羣同金尼閣一起到了中國來的新教士們的中國語言與文學的教師的便是王豐肅神甫 (10)。

澳門 (一一) 在一個岩石嶙峋的小半島上頭, 這小半島更處於較大半島香山之末端, 香山半島沿珠江入海, 島嶼羅列之港口, 突入海洋之中。一點鐘之內, 人們即可將葡國這塊屬地底經度步量到底, 牠的最大的緯度也不過一千五百米達。自澳門這座小城市東北邊界之岩石山嶺上, 就是自當地人們所稱之爲芒特 (Monte, 譯者按: 此本係葡語之山字) 山嶺之高處, 人們便可以把葡萄牙世界帝國這重要防禦堡壘很便利地一覽無餘。這個地方最高之山峯, 其高度也不過一百零一米達, 但其位置已經是在這座小城市之外, 南部的海岸上了; 這座山峯上有聖堂諾撒·森霍

拉·達·啤 (Nossa Senhora da Guia 卽啤頂護祐行旅之聖母堂之意) 一座，爲海面船隻航行之路標。一段窄狹的地峽使這個小半島與中國土地得以連絡不中斷。在那地峽上，中國政府築有隔絕之橫牆一道，牆內僅開門洞一處，只爲放入飲食糧糈時纔得開啓，餘時皆嚴行扃鍵，不許任何人出入。這一種經濟上之從屬關係，其結果竟使澳門不能保存了牠政治上的獨立性，然而澳門之落入葡人手中，尙非毫無功績可言之強霸白佔，因爲一五五七年葡人曾在這裏與海盜作戰，而將其自石洞窠穴中，悉行驅逐剿滅了的。這個地方又須向中國繳納許多租稅，對於中國政府算是藩屬城市。這個城市的主權雖仍歸中國，但海外貿易之專權却歸葡國，而爲中國方面之所嚴格遵守。在當時僅只葡國船隻纔能在中國輸入與運出各種貨物的。這種輸入與運出貨物之交易，每年只准舉行兩次，就是在陽曆四月間與十一月間。而作這一種廣東貿易的船隻在停泊期中，都受有中國政府方面嚴重監視。因有這一種原因所以這座小城市就達到了極富庶的地位。

當在沙爾在這裏居住的時候，澳門之居民也不過八千至一萬之數。然而，這個數目中之大部分，尙屬不奉教之中國人民，而這些人民們是歸廣東方面派駐的官吏所管轄。因有這一種情形，所

以這便成了兩方面時爭鬪的起因了。在這些爭鬪之中，尋常總是澳門政府吃虧的，因為中國政府方面可以將全島封鎖，截斷澳門食糧之來路，而使他們非屈服不可了。當時僑居這個半島的葡人，數目約九百至一千名，其中有商人，有水手，有軍人，有教士，會社中的人物。其他一部分人民，則皆係服從葡國習俗之奉教的中國人民，此外還有少數奉教的非洲黑奴和數位奉教的日本人（一）。

（二）照這座小城的大小說，這裏所建立的修道院與教堂，實在不能說為數不豐了。除耶穌會教士之外，在這個時候，在這裏已經有了方濟各會（Franziskaner），多明我會（Dominikaner）與古斯定會（Augustiner）的基礎機關。耶穌會之聖·保祿學院在澳門山之西坡。這學院中之巨大天主聖母教堂（Muttergotteskirche）係於一六〇二年在舊教堂焚毀之後，以日本教友之捐款所建築的，為雄據全市之最優勝場所（一三）。

澳門以地位說，若是之重要，但其軍事方面之設備，却極不能與之相適合。況且自這一世紀之初葉以來，已經有重大危險自荷蘭人方面發生了過來。為葡國一大不幸事件的，是葡國自一五八〇年至一六〇四年隸屬西班牙國王統治之下。因為荷蘭與西班牙係世仇，所以荷蘭人最愛在葡

屬殖民地以攻擊牠的世仇西班牙。葡屬之各香料島，已皆喪失。在繼續的時期中，荷蘭東印度商業公司（Hollandische Oostindische Handelskompanie）幾乎是要把東方全部葡屬殖民地毀滅了的（一四）已經多次——譬如說，一六〇〇年，一六〇三年，一六〇七年等次——有敵人底艦隊出現於澳門，而劫走了葡國裝載豐饒的船隻。於是一六〇九年，乃有十二年休戰條約之締結。在這個時期中，關於澳門軍事防禦計劃，固然已曾略有實現，但是為防禦強敵計，却還不足。在這一點上，為葡人卸責的話，可以說，或許是他們怕懷着猜疑心的中國人們，對於較大的防禦工作要起反抗的，所以他們就不願充分作這一項工作了。

會聚在澳門的中國傳教士們，對於自荷蘭方面所發生的這一種危險，自然絕少有所思及。因為他們全盤的性靈，時時刻刻都為一種愈快到中國內部去愈好的念頭之所充塞，無心於其它問題的緣故。當在由中國內部所驅逐的幾位傳教士一到澳門時，他們還是作着能返回中國內地的思想的。因為奉教的中國官吏，在這一方面仍在不停息地奮鬥工作着，而為他們的首領，教會之支柱，已獲有崇高威望的，便是徐光啓，再就是李之藻，他在對於滿洲之戰爭中獲有製造兵器，教練軍

隊，把守北京城門之任命的（一五），楊廷筠，他在杭州爲基督教徒之保護者。根據當時滿洲對於中國威迫之情勢，在教徒之間便成熟了一種很聰明，而亦與教會有益的計劃，就是中國奉教官吏事前並未向傳教士們徵求意見，直接向中國政府建議，招募澳門葡國補助隊，以便對滿作戰。傳教士自然可以同着這些軍隊到中國來了。這是葡國方面亦可以此作爲報酬的要求的；除此之外，傳教士關於數學與技術之知識，亦是有極大的用處，而可聳動中國政府的。

這個計劃獲得了中國朝廷方面的同意。一六二〇年，有兩位教徒張燾（*Michael Chang*）和宋（孫）保祿（*Paul Sung*）被徐光啓遣派赴澳門，以便探訊當地的意見。澳門政府會立即選派炮術技師四名，大炮四尊。但在廣東四名炮師被扣，而大炮亦不過僅只運到江西，即行停頓（一六）。可是在次年，即一六二一年，上述二位基督教徒爲中國的「天子」正式派赴澳門之欽差，在澳門他們受極隆重的待遇，因爲中國朝廷肯向「西夷」城市派遣欽差，這還是破天荒第一次，而二位欽差學識修養均皆高深，更兼熱心奉教，所以對於一切人們都有深刻印象（一七）。他們向澳門政府宣達皇帝意旨，正式請求澳門政府，遣派大炮，軍隊，和尤其重要的是炮師。這些炮師也是應當教練

中國兵士使用炮彈的。澳門政府於先一年中曾自一支在澳門附近擱淺的英國船上獲有大炮三十尊（一八）。所以澳門政府便於十一月間決定，迎合中國皇帝之意旨，開始由印度，馬尼拉（Manila）和日本募集軍隊。可是軍隊雖經募集，然而終究未能得以成行。中國方面一般的猜疑，廣東官吏之躊躇，沈澗之妨害，沈澗這時在北京的權勢是愈來愈上進的，種種原因，竟使這偉大計劃終歸失敗。一六二二年三月間，人們自廣東函復澳門，感謝澳門政府之好意，和所耗費的款項，但是所募集的軍隊却是無須要了（一九）。

由這一件事情上看，當時的朝廷已經是把一切決斷力都喪失了。況且當時的時日也實在是極不順利的。一六二〇年竟是一個有三位皇帝的年頭。因為在這一年裏老皇萬曆晏駕，皇子光宗繼承大統，年號泰昌，國家泰昌這是愛國的人們之所切望的了，但在位僅一月即薨，據其它報告，則謂在位三月，而其致死之由，則係受毒，這是當時能知此事確鑿真像的傳教士們所言的。光宗之子御極，年號天啓，可是他僅係一位膽怯無識的沖齡幼主，完全為太監魏忠賢之所脅制，竟至「無魏氏之許可，連自己的脚都不敢一動的。」這是沙爾關於這位皇帝所加的義憤的批評（二〇）。這種

種情形都與傳教會不利。再加之一六二二年年底所發生的一件不幸的事故，更使這有利於明室的計劃受打擊了；因為在這個時候果然有幾位葡國人弄了四尊大礮到北京來，其中有一尊在前線上會燃着一筒火藥，其他的一尊又在北京爆炸，兩次變故，皆有重大人命損失，惹起惡劣印像的緣故（二一）。

因有上述種種情勢，所以令傳教士充當從軍教士與軍事專家，隨軍入中國內地的計劃竟不能成功。然而在一六一九至一六二二數年之間，竟有六位教士能得成功，以極秘密的僑裝分三組，每組二人，連續暗自潛入中國內部。這六位傳教士就是陽瑪諾和勿賈曼一組，金尼閣和魯德照一組，富爾達多（即傅汎濟）和特倫爵（即鄧玉函）一組（二二）。

一六二二年之中間，還要有一批範圍較大之傳教士團體，繼續向中國內地出發。李瑪諾會於六月十日寫信寄給奇爾微采爾，因為奇爾微采爾於一年之前已被派為傳教會代表赴臥亞去了，信中會說：「我們準備於本月十六日或十八日即行動身，如果為我們領隊的邱良稟修士（Br. Dominik Mandes）屆期能到廣東時，這次同行的人是約翰·亞當神甫和費樂德神甫（Roderich

de Figueiredo) 和我同着黎伯度 (Br. Melchior Ribeiro)，他是唯一的一位歐洲籍無會籍修士] (三三)。

可是這一小組傳教的人們，還是未能得以立即動身的；這反而竟會成了一個好現象了。因為這樣亞當·沙爾在澳門竟能參與葡國最榮譽之一場戰事，這場戰事對於中國傳教會之運命也是有着決斷的意義的。

西班牙與荷蘭十二年休戰條約於一六二一年到期。在這一年中荷蘭已經作進攻澳門之計劃了，因此他們就設法以重大允許招募日本軍隊，但在日本方面對此竟加以拒絕。澳門政府對於這種危險亦有所覺，因此特派耶穌會神甫一名到馬尼拉備辦鎗礮。他返回時，攜帶口徑較小之火礮六尊。大口徑之火礮，馬尼拉政府固然已經批准發送，但并未得準時到達。此外自馬尼拉尙更遣派西班牙軍一小隊，到澳門協助軍事。但在當時澳門總督出缺，尙無人補充，因此人們就向臥亞總督請願，任命一能幹之軍官駐紮澳門。羅保·撒門討·得·加瓦羅 (Lopo Sarmiento de Carvalho) 是被委充這個職守的人。在澳門，這位軍官竟立戰功擊退強敵 (二四)。

一六二二年荷蘭方面對澳門最後竟要作嚴重的舉動了。荷蘭駐南洋巴達維亞 (Batavia) 之總督若望·皮特爾斯·康·望·曷恩 (Joan Pietersz Coen van Hoorn) 向海軍大將考乃理斯·雷頁爾斯 (Kornelis Reyersz) 下令與中國通商，並且爲與中國通商計佔據澳門 (二五)。他們所派出的侵略艦隊係於四月十日航出巴塔維亞的。他們預計在海面上還可將其他的船隻拖入他們的侵佔隊裏。荷蘭人民都以爲他們這一次出發，必可完全獲勝利。因此他們侵略的艦隊上就帶有許多商人和多年從軍而已退伍的老朽士卒，這些人們都是打算着於佔據澳門後，在澳門落戶久居的 (二六)。

許多大小報告多半都是由當時目擊戰事者述的，敘述荷蘭對於澳門之進攻 (二七)。關於這場進攻始終經歷的大致情形，他們的敘述都還相合。但在其餘一切細微處，他們的報告可就彼此完全不同了。這自然是無足怪異的；因爲當時的戰鬥是無計劃的亂戰亂鬥，未能作一致觀覽的緣故。所以每一個人所敘述的瑣屑情形，就是他自己所目擊的了。

五月二十九日荷蘭船兩隻，英國船兩隻，出現於澳門之海面上。但是這四隻船却並未敢開始

進攻，即行退入多斯·維亞多斯 (D. S. Veigas) 海島之中，他們的目的是要截却由印度航來的葡船的，但是此舉却未得與他們成功。六月二十二日大隊荷蘭軍艦馳來，戰艦九隻，小巡邏船四隻，和先來之四隻，爲數竟有十七隻之多。但是參與戰鬥的，僅只十五隻，因爲英國的兩隻船僅作旁觀，始終未行參與戰事的。葡國司令當在第一批荷蘭船隻一出現時，已經作了防禦的準備，把沿海岸所有礮台礮列俱已備置妥當，並且佈告全市市民連帶教會中之教士與夫役準備作戰。雖然澳門許多商人俱皆遠出貿易，但這座城市却不像荷蘭人之所推測的那麼完全無抵抗力的。最巧而最幸運的，是半年前曾作了爲中國遣派協助隊的計劃，而實際上招募了軍隊，可是並未將軍隊送走。再加上還有西班牙所派來的軍隊。甚至連澳門之中國居民和那一些做奴隸的人們，也都還明白一點軍人底勾當的。

不可理解的，是那座能控制自陸地方面來的入口的芒特山嶺，並無火礮之設置。因此充當耶穌教士學院管理人，兼臨時院長之布魯諾神甫 (P. Bruno) (二八) 就令人們把他們不知在何處所尋來的已經拆卸了下來的大礮四尊，拖至芒特山頂，澳門軍事司令對於他們這個舉動，還

很嘲笑地搖了搖頭。葡國之婦女與兒童都到這學院中來躲藏，因為這學院位置在山後的高處，顯然爲全市最安全的地方了。價值高貴的物品，人們也是拿到這裏收藏了起來。

六月二十三日晚間三隻荷蘭船和澳門半島上聖·方濟各要塞 (Fort S. Francisco) 之間發生火戰，方濟各要塞是澳門城市軍事設備最充足而最鞏固的地點。葡軍之發礮甚爲準確，出乎荷軍意料之外。

這一日過去之後，一六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東方已白，這一日就是夏至日 (Johannstag)，居然却成了澳門市最堪紀念之日了。日出後二小時荷蘭戰船兩隻，向澳門島東部的卡西耳哈司 (Casilhas) 海岸射擊，這地方已經是在澳門城外的地帶了，他們這礮火會擊毀一道於匆忙中所掘築之土牆，並且將土牆中所排列之六十名葡兵和九十名澳門兵驅逐至岬山 (Gua) 上。然後就由爲數六百至八百名之一大隊兵丁，多半都是正式軍隊，連帶大礮數尊由戰船上下來，向陸地進發 (二九)。可是就在沿海的陸地上，荷蘭軍之不利即已開始。因爲荷軍總司令官雷葉爾斯登時就被一子彈射穿身體，他們留兩連人在海邊作後備，兼且亦可防護由大船上再行起卸重礮。他們

的主力軍把岬嶺 (Guis-Hugel) 撤置左方，搖旗鳴鼓奏軍樂，由那廣闊的地帶上向城內奔來。城內固然警鐘齊鳴，但是却無一人作抵抗的思想。

這時芒特山上突有大礮子彈聲發出，全市震動，出乎一切人們意料之外。一顆重礮子彈飛落荷軍陣前，擊起地上沙土，飛揚天空。接着又是第二礮第三礮與第四礮。兩個或三個荷兵被礮彈所中。這登時使他們軍隊裏起了一點紊亂。可是荷兵並不知山上的礮彈俱已放完，急切之中決不會再有礮彈飛來的。因此他們轉奔岬嶺坡處，尋找較優地勢，以避炮彈。可是他們不隄防，身後正是自卡西耳哈司海岸所逃回之葡兵會聚之所。因此他們的眼前可就活動起來了。

他們的前進這樣一停頓，布魯諾神甫就抓着一個鼓，盡力敲擊着竄越街市。市民和教士們多半都已藏匿，一瞧見他這樣，膽子竟也都壯了起來，追隨在他的身後。繼而他又把這個鼓交給了一個其他的人，手中抓了一把長劍，殺奔敵軍陣中。修院之僕役來回奔跑，口內連聲喊叫「得勝」。如瘋如狂不可描寫的興奮，起於全體市民之間，這種興奮的狀況只是在一個歐洲南部為家，為宗教而奮鬥的民族，纔可以令人理解的。這時凡是拿得動一個兵刃的人們，都向着敵人奔去，更為他們

的總司令和一位名字叫約翰·蘇亞來斯·維瓦司 (Johann Soares Vivas) 的青年軍官之所鼓舞。荷蘭軍隊看到他們奔來的人數過多，立即秩序大亂，轉身向後退却。因而全部軍隊竟是異常地恐慌起來，手裏的旂子與兵刃也都拋棄地上，只顧逃命了。軍官們固然盡他們的職責，但是他們對於他們這個敗勢已經不能挽回。海邊後備隊也受逃竄人們底影響，而被裹捲後退。他們一到海邊，又全都爭搶海邊停泊着的駁船，或竟嘗試着泅水返回大船。這樣這一場戰事就算完結，自始至終，所歷時間僅兩小時。

據荷人幫特可 (Bontekoe) 底報告，則謂荷軍之失敗係另有其原因，而他所舉示的這另一種的原因更完全歸咎於小筒火藥底炸飛，這是牠們偶然被火所引的緣故。葡軍由日本投降人之口中，得悉了他們這一種惡運，因此他們纔敢開始迎敵反攻，這當然是荷軍之所不能抵抗的，因為他們已經沒有火藥了。他的話雖然這樣說，但是實際上似乎是因荷蘭軍官以為佔據這個小地方，不會有什麼阻碍，深覺有確實把握，所以給他們兵丁並未散發子彈，因而竟招來這一場的敗績的。況且他的這個報告也不見得是有確切證明力量的。我們總然可以相信這位正直的榜特可底話，

以爲有幾小筒火藥炸飛了。但是他們這惡運却不會到了一個這樣惡劣的地步，如果葡軍僅由投降人底口中得知這個消息時。況且經過訓練的軍隊，單用白刃也可以能禦退了那無秩序無經驗的烏合之衆的。

據葡軍底報告，則謂他們僅止陣亡四人，四人之外還有兩位是西班牙人，但是他們的奴隸却陣亡不少。至於荷軍方面底損失，却就非常重大了。據幫特可所報告的數目爲一百三十名，其中有戰死的，有淹死的，然而按照荷蘭官方之報告，陣亡者則爲一百三十六名，重傷者則爲一百二十名。上陸隊之總指揮恆司·陸飛隱 (Hans Ruyter) 將軍，六位上尉隊長和十八位准軍官，這換句話來說，差不多是全部的軍官了，俱皆陣亡。連兩位爲荷蘭宣力的英國軍官也都死於這一場戰役中。據英國方面的一個報告(三〇)，荷軍全部喪失竟達三百人。葡國官方報告，所列荷軍陣亡與淹斃人數爲一百八十名，這幾種相離不遠的估計，雖然不能說是全對，但所差也總無幾了。其他的報告則不免過於言過其實而不足信(三一)。被葡軍所俘擄的是一位上尉隊長連帶六名或七名兵丁。荷蘭方面恰恰在這一個人喪失上，感到最深的痛惜，並且他們情願以三百名葡人交換這一名隊

長，可是他們這一種提議竟被拒絕了（三二）。葡軍所得的戰利品爲軍旗十面，大礮一尊，鎗五百餘隻，和許多其他的兵刃。

在這裏尤其使我們感到興趣的，是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之中第一個，就是誰在山上發射了那大礮，使葡國軍隊底形勢得以好轉？第二個問題，就是沙爾神甫是否也會參與戰鬥？

巴爾淘利（Barthol）對於這次戰事所搜集的最好的材料至爲豐富，他以爲解除澳門之圍，出力最多，這個榮譽是應歸之於兩位意大利耶穌會教士的。這兩位神甫就是布魯諾和羅（三三）。布魯諾底功勞怎樣，我們由上面的敘述中亦可得知。其他一位教士底功勞，就是描準發射山上的大礮了（三四）。然而在這一一切的情形上並無妨碍，其餘的，也略知礮火的耶穌會士，以計劃與行動在旁邊幫助了這兩位意大利人，以便使這舊鋼鐵能得應用，並且在戰鬥時能得發射的。我們很可以假定，在末後決戰的時刻裏，沙爾必定也會加入戰鬥，共同宣力的。因爲他是具有所需要的戰鬥知識的。甚至他後來也曾親自鑄造過與發射過大礮的。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們却是能作一個完全確定的答復了。因爲活捉了荷軍隊長的那一個人，

就是沙爾。這個報告是來自布魯諾神甫，而是我們不得不認爲確實的。（三五）如果多明我會底報告，把捕獲荷蘭軍官的事件歸功於澳門總司令時，那這報告同其他的報告亦並不矛盾；因爲每次戰勝，部下軍民底英勇行爲都應當算作領袖人物底功勞。照這樣說，沙爾當在荷軍前進一停頓時，一定也是如同其他的教士們一般抓着一個兵刃，聚合了幾個人，共同地獲得了全部勝利上頭至優美部分之一。

澳門之圍解，荷軍卽行遁去。可是于這次失敗之後，荷軍竟把澎湖羣島（die Pasardores）佔據，並且於兩年後更侵佔台灣。在中國方面人們對於葡軍之勝利極感快感。廣東長官鮑送大宗白米作爲慶賀禮物。澳門這時也獲得中國方面之允許，澈底修築要塞。一六二六年這工作方得完成。自是之後，澳門遂成爲一個非常鞏固不可奪取的城市了。

從當時的形勢上看，如果當時澳門陷落，爲葡國，爲中國和爲中國傳教會，所遭不利之影響必將不可計量。中國對外之貿易勢必落入荷人手中。信奉加爾文派（Calvin）耶穌教的荷蘭人們，他們那時在東方已經絕無顧慮地打擊天主教派基督教的，必將施行封閉天主教傳教士入中國的

門戶。這在當時在中國尙未紮穩基礎的天主教傳教會，自必因此而全被毀滅。因這種原因，所以全部葡屬東方領土對澳門之捷報，都非常歡迎，到處開會慶祝，舉行遊街之謝天神事，和燃放歡騰之礮炮（三六）。

第五章 湯若望到首都後之開始時期，西安之轉赴

一六一六至一八年之間的教徒迫害，這本來是沈澗和他的二三黨徒之所掀起的，數年之後，大致已算平息。傳教士們又都很謹慎，絕不惹人注意地從事他們慣例的工作，更爲自澳門來的新教士們之所輔翼。但是仇視基督教徒的沈澗，也改絃更張地更作了些新計劃。一六二二年他達到了他經營的目的。因爲在這一年裏他受命入閣爲「閣老」。恰切在這個時候，就又有了一種可以借口：從新攻擊基督教的事變發生了出來。因爲當時許多省區中，尤其是在山東，民間爲經濟的困苦之所逼迫，而不得不到了叛變流血地步。可是官吏一方面把這叛變的責任，都歸之於白蓮秘密教（一）。而沈澗竟借這種事變，誣基督教徒爲白蓮教之黨羽。因此在南京對於基督教徒之迫害，就又暫時發動了起來。但是這在信奉天主教的官吏們，對於這樣的誣讒中傷尙屬容易駁辯的。既而迫害基督教徒者在朝中終於失寵。一六二二年十月底他竟解職，而一敗塗地，而於一六二四年四

月十九日去世(二)。這樣，奉教官吏和在沈、淮指揮下與他們爲敵的人們之間的多年鬥爭，至是乃得登時解決，而勝利終歸傳教會方面。

當在這種危險還未曾完全消滅之前，就是在一六二二年之夏季和秋季間，已經有一新傳教組自澳門出發入中國內部。這一組人們仍還是在六月間所組成，而未得成行的那些人們，就是約翰·亞當·沙爾、費樂德和理柏羅修士；爲他們的領導的，是李瑪諾神甫，他是奉有傳教會視察人員底委託，視察各處教區的使命的。他們所選擇的路程是人所共知的，向中國北部去的大道。自廣東省城他們乘船沿北江上行，越過廣東與江西邊界間的梅嶺，沿贛江繼續北上。他們第一個旅行目標，似乎是杭州，因爲杭州是當時傳教總站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說是剛建設完成的嘉定。這一小組人中，只有沙爾一人過了一些時間之後，轉赴北京。他是隨同龍華民神甫一起北上的，龍氏於一六二二年之中間，特爲此辭去傳教會會長之職，而以羅如望神甫 (P. Johann de Roeha) 爲替代者的。

人們會費長久的時間酌量，他們兩個是否可以冒險作北京之行。因爲當時北京政府因山東

亂事和滿洲之迭次入寇，時感不安，而多事猜疑。雖然如此，而這兩位宣教士竟於十二月五日成行。保祿博士（譯者按此為教會中對於徐光啓之稱呼）於事前會給他們寫許多荐信，致沿途所識官吏；彌協爾博士（張燾）之一位信奉基督教之僕人隨行，以便沿途照料。路途上因天氣酷寒，痛苦殊甚。一六二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即中國新年前六日，龍華民和沙爾行抵北京，這是頭一批公然又在城內出現的傳教士，可是人們因為正急欲要過年，所以對他們就不甚注意了，他們居住於位置在北城（Nordstadt，即後來之所謂韃子城 Tatarstadt，亦即現在之所謂內城）靠近西南門，利瑪竇（Matthäus Ricci）於一六〇五年所獲得的房屋內。在天主教徒難期中曾有一位教徒收買了這所宅邸，所以竟得保存而未被破毀。

但是舊日所下驅逐傳教士的詔諭仍未收回。因此人們就不得不向官方申請居留允許。奉教官吏們與那位對天主教有好感的第一位閣老（張問達）關於這一點並不覺難辦，而想出一個特殊計劃。因為政府方面還懷着利用葡國砲隊以禦滿洲的計劃的思想，所以在假借「軍事專家」的名義之下，人們是很願意容留傳教士們在首都居住的，這樣可暫蒙混，後來傳教士們再說實話，

請求人們原諒，也就無妨了。這個計劃決定之後，龍華民、神甫和陽瑪諾就經中國官吏並不將他們的計劃說破地引荐到兵部衙門，這陽瑪諾是暗自在北京已經居住得很長久的時間的。在這裏人們很和藹地招待他們，並且向他們發問，能否可得葡國大砲；然後就又問他們，是否精通砲火事務。關於前一個問題，他們說，他們相信，是能辦得到的，關於第二個問題，他們加以否認；他們說，他們是宗教之師，但是他們可以勸誠葡國砲師忠於他們的職守。這幾句話已經够了，居住的允許已算默然授與（三）。

自是之後，我們在本書中，稱呼沙爾也可以用他的中國名字湯若望了。他這名子底第一字是我們歐洲氏族之姓相當，特選用「湯」字的原因，是因爲這個字在聲音方面，與亞當之第二音節相切合。至於說「若望」二字顯然是他的第一個名字約翰的譯音了。

中國朝廷中位置崇高和最崇高的官員對傳教士們的友誼，使傳教士們不久即感覺處身安全，不怕有何危險了。保祿·徐光啓博士於一六二四年入禮部爲侍郎，並且自後常川居住京師。內閣第一位閣臣對於教會時時都在懷着一腔忠誠熱心的同情。這位閣臣就是吏部尚書（四）張翰。

林，爲行政方面最高官吏，即呼爲「天官」者（譯者按：即張問達）。更加湯若望在他到北京後不久，便又獲交新友不少。他又將由歐洲所帶來數理天算之書籍列爲目錄，呈遞朝中，並且還將所帶來的科學儀器一一陳列，請中國官吏參觀（五）。自是之後傳教士們方敢在城中自由行動。尤其可以說是一個最大的成功的，是湯若望無多些時日，竟使戶部尚書成了他的一位朋友。關於這件事情奇爾微采爾在一六二四年之教會年報中，報告得最爲詳細（六）。

一六二三年十月八日據曆書上說是應當有月蝕的。這位戶部尚書對於天算問題很感興趣，因此他就令湯若望預先做成一份關於月蝕的計算書。常在十月八日月蝕出現，人們作詳細的觀測時，就發現他的計算書和月蝕的實際情形有至確切的吻合。月蝕後的翌日，這位地位崇高的先生同着一位其他的官員，特來拜訪耶穌會士湯若望。在他的歡欣與感之中，他誠懇請求湯若望按照中國的習俗收他爲弟子。當在湯若望非常謙虛恭敬地辭謝這崇高的榮譽時，大臣就對他的隨來的官員說：「實在的，在這一世紀裏中國已經有兩位學識與道德特別卓越的人物呈現了出來。第一位就是利瑪竇，第二位就是我們這一位大師。」說道這裏，他又說了許多至爲崇讚欽仰的言

詞。同時他又請求湯若望預先算出一六二四年九月間所期待之月食。湯若望關於這一點會寫長文一篇，分爲上下二小冊，在這兩小冊子中，他所作的工作是關於月食歷程底時間確定和一張圖式的說明，此外在其中還討論了其他有關之問題。他到中國後這是第一次的，我們現在仍尙得知的天算著作，他請耶穌會修士邱良厚 (Br. Martes) 在文字方面加以修飾，因爲門德司是一位非常精通文墨的學者的。徐光啓辦理印刷方面的事務，並且又將這小冊子呈交禮部(七)。那位戶部尙書更邀請湯若望到他的家庭內共同觀測月蝕。這次又是一切都完全相吻合。戶部尙書經過這兩次的親身經驗之後，極願向管轄天文事業之禮部動議，向朝廷爲湯若望請求一份國家之俸祿。但是湯若望請求暫且先不要提到這一層，因爲這時他還視爲有些不合適的(八)。

一六二三年十月八日之月蝕，給了湯若望一個機會，用一種同羅瑪關於月蝕之報告的比較方法，以計算北京子午線圍對於羅瑪子午線圍的距離。中國史官認爲這一件事情有記錄的價值，所以竟詳細的把這件事情記入了明史之中(九)。

這一些事故過去之後不久，鄧玉函 (特倫爵之中文名) 神甫自杭州轉赴北京。他到北京後，

登時就從事於天文學之著述。可是在這時爲鄧玉函與湯若望，數學與天文學僅只是附帶工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研究中國的語言文字與文學。他們兩個一定是在一六二五和一六二六這兩年度北京教會目錄中所載的兩位研究中文的教士們了。徐光啓是被人們所稱之爲湯若望的漢文教習的（一〇）。他們兩位的確也會盡能力之所及參與了傳教的工作。那個時期的教會年報，關於這一點也略有所記載。

一六二四年在北京新奉教者四十名；四十名新天主教徒中有一位是皇室近戚。在次年之中奉教領洗者僅有十九名，但是十九名之中有三位是官吏。傳教的工作當時亦不能不算順利，但是仍不能不特別慎重。因爲欽天監裏又出了一位極其痛恨天主教的官吏，就是魏公（*Wei-kung*，譯者按：即魏文奎）對於他，我們在下面還有許多報告的，特用他的偵探專門監視各傳教士。因此教民尋常都不到教堂裏去，傳教士都是到他們私人的家庭裏做神事。再就是那一位宦官底親族們，這一位宦官底別墅經朝廷賜給利瑪竇作墓地之用了的，也是時時刻刻地在伺機中傷，以便達到將這產業仍舊弄回他們手中的目的。可是皇帝底這個恩賜現在又從新加以一次認可（一一）。

翌年就是一六二六年，在北京新入教受洗者數共爲四十人。這些新教徒之中有一人是一位有名望的數學家，他自三十年以來對於精通天算的傳教士們都持着和藹的態度，但是他總在懼怕，他會丟掉了他的位置的，如果傳教士們把他們的書籍譯成漢文，而改革中國的曆法時（二二）。

一六二七年受洗入教的僅有二十八名。鄧玉函、神甫和翰林王徵（Dr. Philipp Wang），關於他，我們馬上還有更多可報告的，共同著書一冊，爲人們控告傳教士造反之事件辯白。此外還有許多爲中國人所愛好的那宗短篇論辯在這時又都寫了出來。傳教士們仍得安然從事於他們的工作，雖然在中國內地盜賊蜂起，叛亂日增。可是對滿洲之戰爭竟得暫時之停頓（一三）。

一六二七年中間或秋季，湯若望曾離首都他去數年。

我們對於湯若望這第一次在北京所居住的四年半時間裏所作的工作怎樣，僅能有少數確定的情形可供報告。因爲教會年報中，向有慣例，只敘事實，少有列及姓名者，加之湯若望僅僅只是一個新進人物，尚在學習準備期間，年報方面對於他們自不能特別注意，像他的同伴龍華民和鄧玉函一樣看待，因爲他們已經是都有聲望地位的人們了。

至於說傳教會中之會長們對於那個時候的湯若望評語怎樣，這在一六二六年之第二本目錄中有所透露。在這一本目錄中說他精神方面的資質，判斷的能力和他在科學中的進步，頗為優良，但他所缺的還是機警與人生經驗。他的天性卓越優異，性格火烈爽直，而樂天無憂，但是還未成熟地步。他很懂得交友之道，能從事於著述，不過以之充當上司，尙嫌能力有所不足（一四）。在一種的評語上，我們應當注意的一點，就是葡國人們和一位意大利人（即龍華民）怎樣來批評一位德國人，而並且是一位可崙城的德國人。所以湯若望也無須過事傷心的，當他在於一六二六年他的時機已臨，但却不得同時與鄧玉函施行最後的宗教誓願典禮時，因為北京的傳教士們對於他表示了他們的躊躇（一四）。

一六二七年之秋天和夏天，湯若望被派遣赴陝西省城西安府（一六）。

西安府（一七）位置在渭河之灘谷中（陝西呼渭河爲右河），在渭河之南，距河岸約有數點鐘之路程。明太祖洪武帝賜與這個城市以西安之名，是說西方邊陲安寧的意思。這座城市在以往是以不同的名稱稱著於中國的，就以長安之名稱爲最顯著，而這個名稱直至今日仍尙沿用。

西安府在中國一切城市中爲最富有光榮之歷史者。其四周之山川卽爲中國文化發源之搖籃。周秦漢隋唐（一八）五朝皆以此處爲建立中國首都之所，不過地點略有不同，而其城池周圍之大小亦時有變遷。雖然如此，然而古代之遺跡遺物仍尙不甚豐富。在這些古代遺物中有一件是基督教歷史中最著名證物之一的，就是紀元後七八一年二月四日所建立的聶斯多利安派教會之紀念碑（Nestorianische Gedenkssäule，譯者按：卽大秦景教碑），這座紀念碑大概是在一六二五年之年初在西安府與整厓之間出土者，而整厓是處在西安西南之西之方向，約距西安府一百啓羅米達的地方的，並且這座紀念碑於出土之後，卽行陳列在距西安西門外兩個半啓羅米達的崇仁寺中（一九）。

當在湯若望的時代，這座城市形成一個正規的，爲厚重的城牆所圍繞的四方形，其自東到西的方面略長，並且據衛匡國（Martini）之報告，城市周圍是有二十二啓羅米達零四分之一的，衛匡國的報告或許是得自湯若望的。四面城牆，每面之正中皆有自明初以來所建立之城門一座，四座城門與建於其上的城樓，崇峨壯偉，爲一切行旅者所稱讚與誇耀。自城牆之高頭俯視全市，則頓

覺一片美景展現眼前；但在近處觀察，則全市廬舍荒廢，街市穢污，只見其爲以往華美繁盛之一個遺影而已。

當時在一切傳教區之建立上，都是奉教的官吏們先把路子打開，掃除了立於最前面的困難的，陝西傳教區之建立，亦是這樣得以成功的。這些奉教官吏們對於教會之熱心，樂意輔助，以及種種特殊功勳，傳教會之年報中一經敘及，便不勝其讚揚誇獎。因此人們也是特別努力勸化官吏們奉教的。所以傳教會差不多到處都有居於權要地位的保護者與輔助者。這些人們底榜樣對於人民也是能發生影響的。甚至不奉教的官吏們也爲這個事業，就是他們的奉教的同寅同僚們那樣熱烈關心的傳教事業，效尤促進，這一切的情形在中國的這個西北犄角古城裏，馬上就又重演重現了（二〇）。

一六二〇年傳教士艾儒略神甫（P. Aletti）爲一位奉教官吏之所伴隨，赴西北作傳教之旅行。到西北作這樣的旅行的，在艾儒略還是第一位。但是後來在陝西組織鞏固傳教區的尙屬金尼閣。當在這一位置有着至堅強而不可破滅的工作能力的人，在中國南方從事數年譯著工作之後，於

一六二三年他被派赴河南省城開封。他在這裏建立傳教區一處，勸化河南巡撫，和他的全家悉行奉教，並且在費樂德（即得·斐格費多）神甫身上獲得一位繼任者之後，他就於次年開始時到當時山西省府絳州去了，他到這裏來是應韓氏兩位弟兄之邀請的，韓氏兩位弟兄皆係奉教的士人，聖名一爲斯德望（Stephan），一爲多默（Thomas），（即韓霖、雲兄弟）。在這裏他居留一年之後，就爲王豐肅（又名高一志）神甫之所替換，王豐肅到山西不久，傳教總會又派羅雅谷神甫到山西來作他的補助。

這樣，金尼閣神甫便可騰出時間，於一六二五年四月間做陝西之行。在這裏仍是有兩位士人會向傳教總會呈請派遣一位傳教士到他們那裏去的，這兩位士人就是王徵張繩芳（Paul Chang），這二位都是生於陝西的人。王徵是我們在湯若望底歷史中常常所見到的一個名字。他於一六二一年由陝西赴北京，並且在北京於次年考中了進士，他是這一年考中進士唯一的一位人物，如果我們可以相信傳教會這報告時（二二）在繼續的時間裏他奉勸他的同鄉張繩芳信奉天主教。這位張繩芳就是住在北京會向傳教士們表示過這樣大的好感的好感的禮部尙書底少君。王徵於

一六二四年在北京刑部已經獲有一個高位，並且正要差時，他的母親就死去了，因此就不得不奔回陝西故鄉，盡三年服喪之義務。可是他利用這個長久的等候時期，以促進陝西傳教會之建立。金尼閣神甫在西安府之北五十四基羅米達之三原縣境內王徽家庭內，尋到了宿泊之所，並且正在他後此五六個月的患病期中，就又獲得了他們的服侍與看護。他的病體復原後，就同着這兩位優秀的仕宦到城內去，在這裏他居住在「天官」底一所宅子之中（二二）。

他本來也奉有使命視察景教碑，並且考訂李之藻和徐光啓二位已經所發表的碑文是否與原碑相合。金尼閣恐怕還是第一位見到了這座著名的紀念碑的歐洲人的。仍是在這一年裏，這紀念碑第一次的拉丁譯文，已經羅雅谷譯出寄往歐洲（二三）。可是我們也可以斷定，在這碑文的翻譯工作上，金尼閣也和王豐肅共同襄助了的，因為羅雅谷是住在王豐肅底地方的。

在傳教的工作上，金尼閣反而碰到了強度的阻力。次年中，就是一六二六年，傳教會副總會長陽瑪諾到陝西作視察的遊行。一六二七年夏天金尼閣又被召回杭州，爲的是繼續譯著工作。他離開西安府的時期，至晚是在七月底的（二四）。

他在陝西的後繼人員就是湯若望。湯若望似乎是於金尼閣去後纔到陝西的（二五）。翌年年初，陝西第二位傳教士魯德照（即阿爾瓦羅·塞默多）爲王徵之所伴隨行抵陝西這位（二六）。王徵於爲他母親服喪時期滿後，已赴北京到部就職。但是這時他的父親又死去，所以他就不得不仍行返回陝西再守制三年了。

爲的是使這兩位傳教士可以常川留在陝西，雖然可留的希望非常輕微，王徵就以銀三百兩爲他們在城內購買房屋數所（二七）。這二位教士在這裏所感到特別的苦惱，就是那城內的人民對於他們所起百般誹謗的言詞和迫害的嘗試，所以魯德照口裏竟常說，他覺得南京底牢獄比西安還好受呢（二八）。魯德照於一六二九年被傳教總會之所召回，這樣就只剩湯若望一人在陝西了。他以王徵底幫助會修蓋小教堂一所，爲這座建築，王徵會捐銀五十兩。這個小教堂築成後不久，他用非奉教官吏們底自由捐助，又築成了一座較大的教堂。這座小教堂是奉獻給天主聖母（Mutter Gottes），並且顯然是作爲婦女祈禱之用的。臨近所居住的一位最體面的人物，一直到這時本來都在仇視教會的，這時反而在教堂建築上幫起忙來了，因爲他彷彿工頭一般，監督建築

的工程。在教堂內樹起了基督之聖像，教堂外之房頂上安設鍍金十字架一座（二九）。許多好奇的人們都聚了來，瞻仰與驚奇這座教堂與其內部種種所佈置與陳設的事物。湯若望以最大的和藹招待他們。從前民間對於他們的揣測誹謗竟一轉而趨入這種行動底反面，致使傳教士湯若望無多些時日，就向五十個人付與入教洗禮（三〇）。

湯若望尤其能獲得皇庭官吏之好感。駐紮西安之總督（Vinkeloy），他在北京就認識湯若望，而在那裏會自湯若望手中獲得了一個歐洲紀念品的，命兩位官吏把他的名片和一份豐富的禮物給他送了過來。他曾題四個大字讚美歐洲之科學與傳教士湯若望之學識，命西安府知府以金色塗於木牌之上，製成牌匾一方，在例行的儀式之下送往湯若望住所，以便懸掛。

西安府是由中國赴中央亞細亞有名道路之起點。自史前時期以來，就有異族沿這條世界交通大道，到中國來，而舉行了中國與西方之一種文化交換。佛教與景教之入中國，皆是走這一條道路的。這座城市一直到最近，還以遠征旅行團之目標著名於世。在這裏，由至不同的國界中所來的，穿着他們那各式各色服裝的商人們，會聚一起。任何一位有開啓眼光的歐洲人聽見這裏這熙攘

往來，東西繁盛的貿易交通，一定會感到興趣的。在湯若望又有一層新的原因而不得不確切詳細地研究這交通的情形。

自利瑪竇神甫時代以來，中國傳教會就從事研究由歐洲赴中國一條陸路的問題。海上航行所發生之重大人命喪失（三一），航程所歷時間往往過於久長，更加因郵便路程之不可靠，所發生由羅馬管理傳教會之困難，這都是促人們心中起這個念頭的種種原因。可是當時人們對於亞洲內部的地理情形尚不清楚。在這裏所發生的疑問就是塞列（Sereh）族之國趾，由這塞列族底國裏，古代的人們沿陸路販運了絲綢的，並且那開泰國（Cathay，即契丹 Khitan），這是蒙古大汗（Grosskhan，譯者按，即蒙古語大王之意，）自汗巴利可城（Khanbalik，即大都）出發所統治的，並且曾經馬哥·孛羅（Marco Polo）和中古時代末葉方濟各傳教會士之所述說的，是與地理學家普洵費默屋斯（Polenias）所說的西奈國（Sinat），就是葡萄牙人由海道所達到的那中國還有不同麼？還不是一個地方麼？還能是位置更在北面的麼？在歐洲人們對於這個疑問，是一律加以肯定的，而地理圖上都是把開泰國連同首都汗巴利克的位置劃在中國之北的。就是在印

度，人們也是參與這一種誤謬的見解地。然而利瑪竇神甫却是確切地知道，當時人們之所說的開泰底位置是同中國北部底位置完全相同的。因此在印度的傳教士們就要由印度出發，作一次研究的旅行，以便完全明瞭這種疑問。同時人們也是要為傳教士們尋出一條由陸地到中國來的合適的道路的，並且還要借這一次的旅行，發現人們所揣測居住亞洲中部的基督教徒。

歐亞傳教會會長關門塔神甫 (P. Pimenta) 曾經把這個使命委託亞格拉城傳教會 (Assamission) 所屬修士本篤·格斯 (Benedikt Goes) 辦理。為阿可巴爾 (Akbar) 皇帝之所資助，格斯喬裝波斯商人，於一六〇二年十月二十九日由阿格拉城出發，作此探險之旅行，他一路所走的路程經過迦布羅 (Kabul) 和波謎羅 (Pamir) 按：即帕米爾，到葉爾羌 (Yarkand) 譯者按：即莎車府。在這裏他拆入赴開泰的旅行團所走的舊道，這條路在塔里木河河槽 (Tarimbecken) 北部，穿過新疆 (Ostturkestan)，並且在萬里長城內肅州 (Sichow) 即今之酒泉，達到了第一個中國城市。由此可知，並且已可證明赴開泰的道路就是到中國的道路了。所以當時所說的開泰就是指中國底北部說的，於此乃可確定。可是這一位勇敢的探險旅行者，他可以說是一切時代最偉大

探險家之一的了，於一六〇五年年底到達蕭州時，已經患有沈重之病症，竟於一六〇七年四月十一日去世（三二）。

然而，對於主張開泰即北部中國一說之反對，却仍不能默息。況且格斯所走的這一條路程，未免過長，也過於困難了。或許還可以能發現一條較佳較短之路程。所以繼續的考查仍是有所裨益的。況且自數年以來海路屢屢爲荷蘭人之所阻塞。譬如臥亞城於一六二三年竟被十四隻荷蘭船之所封鎖。後來有幾位自臥亞赴中國之傳教士又會落入荷蘭人之手中，而爲其俘虜（三三）。

湯若望在西安府對於陸路的問題予以十分的注意。他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恐怕是受了中國傳教總會底使命，或許是受了耶穌會總會長底使命的。這個情形是我們可以由他探詢的確切，在他改正地圖錯誤之下，所作關於地方的確切確定，並且由一六二九年他所做的那詳細的報告，諸種情形可推測而知的，關於他這一個報告，現在之所保存的還有兩份簡刪的稿底（三四）。他這報告中，許多的詳細情形，都是以讀者不會親自到過中國爲前題的。在他這報告中，我們也獲得關於中國對於中央亞細亞關係上頭的許多有益的詳細情形。

在北京時湯若望就已經很注意那些回教的人民了，他們以使臣的名銜自西方到北京來，朝拜皇帝。可是在北京，人們是把他們嚴格地隔離的，所以他就不能同他們談話了。在西安府他們反而可以穿着他們那外國服裝自由行動。這時恰切湊巧，於一六二八年有所謂大使團，帶領一大批隨員行至西安，這大使團只是每五年纔到北京去一次的。湯若望令人們把他的拜謁名片，按照中國底禮俗給這大使團領袖米爾尤丁（Mir-i-udīn）送去，並且爲這位米爾尤丁在他的寓所裏，就是在一所廟院中所很和藹地接見招待了。回人米爾尤丁還特別向湯若望答拜。這樣他們彼此的晤談竟有二十餘次之多。他們在談話時，彼此都是操中國語言，而無須翻譯。爲的是可以確切明瞭一切情形，湯若望曾屢次把同一的問題，在其他的的事情中乘機提出，並且也向這大使團裏其他的份子們詳細咨詢。可是他們的言詞都完全是相合的。

米爾尤丁籍隸巴爾喀（Balkh），但是平時都居住在新疆之哈密（Hami）（三五）。當時湯若望所能探出關於米爾尤丁所行走而最有用之北部路程，和這路程上各處之驛站，大小停留地點彼此之距離，以及沿路交換貨物之情形，他都極詳細記載於他的報告中。

據他的報告，這大使團所經的路程，是會橫穿三個王國的，就是土耳其斯坦，又名撒馬兒罕 (Turkestan oder Samarband)，葉爾羌 (Yarkand)，報告中原作夏兒肯 (Hyarken) 和吐魯番 (Turfan)。撒馬兒罕之國王為三國國王中之最強盛者，吐魯番之國王為最微弱者。大使團到葉爾羌因與自麥加 (Mekka) 返回之回教朝聖者，和與附近各地方之商人，互相結合，所以能達到了人數有千名之團體。自布哈爾 (Bokhara)，舊譯：不花刺，到肅州，全路之長度為一百一十九日之行程，這就是一萬零七百一十里，合七百一十四葡國噶嘯 (Meilen)，或波斯國法爾散 (Farsang) (三十六)。

在肅州之前部，大使團穿過一座為中國駐軍所把守之萬里長城嘉峪關口 (Kia-kia-kuan)，譯者按嘉峪關當拼為 Kia-Yu-kuan)。在離着關口好幾天遠的路程上，已經就有接連不斷的碉堡，上頭皆駐有中國警備的軍隊，對於走來的旅行團和過往的蒙古人，登時加以盤查，並行馳報。到了關口之前，對於投關者之姓名與人數，以及他們所攜帶的貨物，所騎乘的牲畜與載重駱駝之數目，俱從新加以詳細盤問，並一一記錄。記錄文件登時就發往肅州。

米爾尤丁作這一次的旅行已經是第七次了，與他這次同行的商隊中，有前部亞洲的土耳其人，有麥加的亞拉伯人，有奉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Armenian），波斯人和撈挨拉提斯人（Gurjistan）；商隊中大多數的人們俱係撒馬兒罕、葉爾羌和哈密等地的人民。但是最奇怪的是其中也有一個匈牙利（Ungar）首都布達佩斯人（Budapest），名亞利山大，他是自小就被土耳其人所俘虜的。對於那到處巡遊的蒙古人，這武裝充實的大使團是無所懼怕的，因為他們商隊中的二百名商人，就能抵抗千名蒙古人的。哈密之西，波斯語是通行的主要語言，哈密之東所通行的就是中國語言，這中國語言是一切的商人都得會說幾句的。商人在這全路上都可以隨時隨地作買賣。可是這商業上的巨大中心就是葉爾羌、吐魯番和哈密，而尤其巨大的則為肅州。每年由西方到這裏來的旅行團總要有兩起，並且在這裏這旅行團纔得解散。許多商人都停留在這裏，和在陝西其他城市中，其中甚至有仍着家鄉原來土裝之西藏人。而要向西方去的旅行團也都是在肅州組織的。由肅州往西歸國去的旅行團，經過萬里長城即不再加以檢查。

在湯若望底報告中，關於輸入的貨品曾列舉：雲斑石，顏色不同而帶有花斑的玉石，棉織物，毛

氈，磁砂，玻璃，切玻璃用之金剛石刀，葡萄乾，佩劍，馬匹。輸出的貨品則爲：絲織物，盜器，麝香，大黃，這是全世界有名的一種植物，還有一種灌木底葉子，就是人們所稱爲「茶」的。湯若望在他的報告中，還描寫了在西方向不甚知曉的茶葉之製法，並且還敘述了茶葉之良好效力。他寫的是：「茶能健胃，促進消化，清爽頭腦，和與人康健之睡眠，更能清潔膀胱，以及防阻肢體痛風。」茶和絲都是經商人們運送到撒馬兒罕的。其他的貨物運到亞勒伯 (Aleppo)，在這裏這些貨物，就被歐洲商人販往歐洲去了。

由西方來的商人們却也是願意在中國其他的部分，尤其是在北京做買賣的。可是這只是在一種其他的名目之下纔能實現的。因此這旅行團中的一部分，就以「西方國王使臣」之資格赴北京，爲的是向中國大皇帝進呈貢品。因爲這是中國底虛榮自大之所要求，是中國視一切其他的民族都爲臣屬的緣故。

吐魯番君主爲這個目的特行選拔國內大商人，加以使臣名義派赴中國朝廷，而爲他們備辦一切所需要的證明文件。「大使團」是每五年准赴北京一次的，其中包括使臣五人。五位使臣中，

第一位就是吐魯番使臣，爲全大使團之領袖，而充這次「大使團」底領袖的就是米爾尤丁，此外的四位使臣，就是土耳其使臣，麥加使臣，撒馬兒罕使臣和哈密使臣。他們所帶領的隨員共二百四十名，其中六十名沿途食宿等費用由中國政府供給。可是他們全體的人員，現在皆須着中國服裝。他們的行程在那修得很好的道路上進行甚速。沿途宿歇皆係在中國國家爲他們所特備的驛站中，而他們每日每人之飲食皆有確切之規定。大使團之外有所謂「小使團」者，是每三年准赴北京一次的，團中僅止有使臣一人，扈從八人，沿途用費亦歸中國政府供給，並且准帶僕人若干。在赴北京之道路上，這大小使臣團皆可隨意略作貿易。但是有收買優先權的，是中國的朝廷。爲西方所帶來的貨品——其中主要的悉屬寶石，馬匹，和土耳其佩劍——中國朝廷以價值六萬九千九百兩之絲織物作報酬，賞賜這次即一六二八年的使臣團。所以就這個情形看，這不過是借一種其他的名義，在北京作了一批大規模的貿易而已。

湯若望還提及兩條穿過中央亞細亞的道路，可是他對於這兩條道路却未更加以注意，而其中一條是居於中部，穿過沙漠，赴西北印度，其他一條居於南部，越過東部西藏，赴孟加拉（Bengal）。

Salan)

可是他對於自布哈爾到亞勒伯之北路的繼續，却加以愈加確切之探詢。他曾問及兩位由亞勒伯來的商人。據這兩位商人底言詞，到亞勒伯有兩條道路，一條越過麥爾夫 (Mer)，馬什達 (Meshed)，大不里士 (Tabris)，和梵 (Van)，一條越過哈馬丹 (Hamadan)，巴格達 (Bagdad)，並且更前則須穿越沙漠。這條路程由肅州到亞勒伯行程共須二百五十五日（三七）。

由湯若望底這報告中，我們還能得到關於許多其他事情的開示，這開示是能使當時的一位歐洲人很感到興趣的。因為湯若望曾描寫了當時中國人們對於世界形勢的觀念，中國人們這觀念以為中國處在世界之中央，環列於中國四周的為海洋和海島，連帶牠們那些蠻夷的民族。向中國來的傳教士們當然用一種較佳的學說教導中國人民，但是中國人民為承認這一種學說却過於傲岸了。中國本國人民對於中國的稱謂是：天下（這是當時所用的主要名稱），中國，中華，中原，禮國和四海。由這些名稱中我們就可以知道中國自視多高了。

湯若望在報告中曾多次特別聲明，在中國之北邊並無所謂開泰的地方。舊日的地圖移置開

泰底位置過於向北，竟至移置到北緯六十度。而所謂汗巴利可城的，也不過就是北京底蒙語名稱而已，應置於北緯四十度之上的，而竟置於五十度之上了。

在西安除了這一種關於貿易道路，貿易交通的說帖之外，還有一部中文著作之產生。因為一本歐洲記載聖徒故事的書冊，偶然落到了王徵手中，他非常喜愛這本書，因此就請湯若望翻譯。湯若望循他的請求，竟也把牠譯出，經王徵加以修飾潤色，遂成爲優美的文言作品（三八）。

湯若望在西安亦並未將科學工作置之腦後。他確定了這座城池在地理圖上的緯度，並且觀測了一六二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的月蝕（三九）。

在那幾年在傳教士之間發生了幾個關於教會與中國文化的問題，曾經他們大家熱烈爭論。當時爭論的最主要問題就是關於上帝中文譯名：天主，上帝，天，或泰初（Terminus），這都是經他們所提出的譯名，這其中天字是他們所很少提及的，而泰初則爲拉丁文上帝德屋司（Deus）之譯音。關於這些譯名底選用，有兩派相對壘的見解，一派爲王豐肅所代表，他以爲上帝二字，就是連中國人所用之天字，也是沒有什麼不妥之處的，一派爲龍華民代表，他是連天主二字都視爲不妥的，他以

爲最好是引用泰初二字。一六二六年傳教會副總會長陽瑪諾，在他的巡視教務旅行上，關於這個問題並未獲有一個一致的答復（四〇），因此人們就希望藉一種公共發表意見的會聚或許可獲得一個一致的見解的。所以一六二七年十二月底，較爲年長的傳教士之中，就有十一名到離上海不遠的嘉定教會研究所內，開會討論這個問題（四一）。在開會討論時，副總會長陽瑪諾親自爲全會主席，這次會議一直開到一六二八年一月間，並且都是極嚴格從實際方面立論的，但是在上帝譯名的主要問題上，仍未能收意見一致的效果。不過關於儀式程度略輕的孔子與祖先崇拜爲不涉乎宗教，這一點上大家的意見却多能趨於一致了（四二）。

這一次的會議湯若望並未曾參與。可是對於在這方面的見解，我們得有充分的知曉。他以前以爲用上帝這個名詞是不合適的，可是現在他爲教會底將來起見，也覺得這個名詞可以在學者之間應用，這是由他的兩次言詞中可以證實的（四三）。關於孔子和祖先之崇拜，他贊成耶穌會傳教士大多數之意見，這大多數的意見是贊成使天主教儘量向寬廣處適合中國人民底生活的，並且確信儀式程度稍輕的孔子與祖先之崇拜，是純粹一種非宗教性質，而並不與天主教教義相

背反（四四）。可是這話只是湯若望很稀少的時候會說過，並且還是乘機，而不是正式說的。他的意見和其他的人們一樣，是要很確切地分別天主教可能容認的中國禮俗和其他不得不拒絕的儀式。在這一點上還有一件事情可資證明，就是在湯若望的晚年，對於因他所興起的大獄，也曾以他貶棄中國敬祖的莊嚴古俗爲借口的。

在這西安府居留的時間中，湯若望於一六二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舉行了他最後的莊嚴的入耶穌會誓願。魯德照神甫秉承耶穌會總會長底命令，爲當時監誓人員，湯若望親手所書寫，並且所簽署入耶穌會之誓願書，和他所舉行的所稱之謂「小誓願書」的，直至今日仍尙保存完好如初（四五）。

可是這時間在中國首都的情形怎樣發展了呢？

一六二七年陰曆八月間，即西曆九月九日至十月八日，天啓皇帝出人意料之外地疾速晏駕，完全因沈溺聲色，放逸無度而犧牲。他的最後的思想是怎樣設法在他死後救他的寵臣魏忠賢。天啓之後，繼續登極的，是明朝末後的皇帝了，這位皇帝與他的統治以崇禎的年號，並且是在這一個

年號之下稱著於世的。歐洲的天文學也是在他的政治之下，纔得在中國達到了尊崇光榮的地步。當時中國天算與國曆之改革，是決不能再拖延的事件。每年所出的曆書，這曆書底卓越價值，我們在下文還要敘及的，都是按照舊日舛錯誤謬的表格所製出的，所以久已不能償逐牠的目的了。只有歐洲的科學，在這裏方能創出變革。歐洲科學底代表在這一點上，恰恰是決不可缺少的。

因此在利瑪竇神甫之時期，就已經自薦願爲中國政府在這方面效力，在他之後龐迪我神甫和熊三拔神甫一律作過這樣的自薦，因爲他們的目的是要藉此可以得到久居北京，官方准許的保障的。這改革中國天算的工作於一六一一年開始了。但是經一六一六年至一八年之教難使工作中途停頓。到了這時對於曆法之修治，却真要認真起來了。

時徐光啓已在禮部充高級官吏。欽天監正隸屬於他的管轄之下，在這一年裏恰巧日蝕又算錯了一次。皇帝下詔，如果再算錯一次時，將以嚴刑懲罰從事於天算的人員。徐光啓利用這個時機，又向朝廷啓奏歐洲科學之可用。同時鄧玉函又令人們把湯若望底兩冊關於日月蝕的論文，用至美麗的白色紙從新印出，分贈各官吏，並進呈朝廷。既而於一六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四六），徐光

啓便奉皇帝詔諭修治曆法。他向朝廷建議，招聘北京兩位傳教士鄧玉函和龍華民爲修治曆法專家。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並且令工部按照徐光啓和傳教士們之指導，製造較佳儀器數件。皇帝更諭令翻譯歐洲關於曆法之書籍，而令傳教士龐迪我和熊三拔照舊支領俸祿，這俸祿是他們二人在驅逐之前，已經享有過的（四七）。

鄧玉函甫把這修治曆法的工作剛開始，滿洲又從新向中國邊地入寇一次，竟使這工作重行遲緩一步。況且一六三〇年五月十三日鄧玉函去世，更給這工作加上了一層重大打擊。鄧玉函之去世令當時的人們覺得是一種難以代償的喪失。彷彿剛到這偉大的學者困苦艱難地要使基督教在中國走上光榮地步時，他竟被自塵世召赴天國去了。因此連不奉教的官吏們也是哀悼他的喪失的，並且都爲他的殯葬贈賻詣唁。在基督教徒們，這殯葬的儀式，這儀式是把基督教的禮俗和中國底禮俗並合一起的，却就成了一種興奮高舉的經驗了。發引時送殯的人們都自傳教士所居住的府邸排列成行，一位手擎十字架的人前行開路，一直步行到城外墓地。送殯的基督教徒皆一手執白臘，一手執念珠。在城外墓地上，傳教士作爲亡魂祈禱的神事，並舉行隆重的宗教殯葬

儀式（四八）。

在一六三〇這一年之中，徐光啓昇任禮部尚書，當在鄧玉函神甫底病勢惡轉時，他已經向朝廷建議，由山西詔羅神甫和由陝西詔湯若望，回京供職於欽天監。皇帝於六月二十九日准許了他的奏請（四九），並且向陝西兩省長官下令，爲二位傳教士備辦一切爲行程之所急需的什物。他們二位於到達北京後，尙須入朝覲見（五〇）。

湯若望別離西安府時，已經表現了出來，他在這裏獲得了甚樣的威望體面。陝西全省和省城內一切官吏都向他祝賀，因他奉詔入京。他們爲他備辦免費行轎一頂，馱載行囊與飲食牲畜若干匹，並且都還向他遠遠地送了一程。因陝西長官預先行文安排的原因，行人沿路所經各地皆爲地方官吏之所迎送，照料，與問安。在這時對於歐洲天算之學識，自然缺少不了稱讚宣揚的言詞了。這些頌贊的言詞中有幾種是經湯若望後來發表了出來的（五一）。可是這次他到北京的時日，却不能詳細考定。由我們的推測，他這次到北京的時日，大概是在一六三〇年秋天的。

由這一切情形中，人們可以瞧出，在中國是又向基督教承認牠存在的特權，並且還甚至是昇

與了他一種光榮體面的地位的。這種情形更表現出來的，是在這一年中有新傳教士五名獲得了入國的允許（五二），在那個時候是一個非常大的數目的。北京傳教士所居留的地方，也又都常常有有學識的中國人來拜訪了（五三）。自是之後，在教會的報告中，都是為湯若望特關巨量的地位的。關於這種情形，我們還獲有一部較大的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他親自向我們作關於他的動作，尤其是關於他的科學方面的動作底報告（五四）。

第六章 明朝末後皇帝統治下之各方面

北京和中國

明末之北京，就大致和外觀上看，與今日之北京並無重大的區別。這座城市設計的主要情形，由上文之敘述中，亦可略知一二。北京原來是由兩座城市併合而成的（一）。

兩座城市中，地面較大，而重要性尤大的，是北城（*Nordstadt*），自從滿清佔據中國之後，稱之為韃子城（*Tatarstadt*），這座城市向東西南北四面展開，差不多形成一個四方形，自北向南和自東到西皆開有一條一條寬廣筆直的大街。北城為城牆所繚繞，牆長二十三啓羅米達零七百二十米達，牆高頭就外皮築堞口一層，城牆內外兩表面皆磚砌，而中實土質。在今日城牆之高度為四十一尺，寬度城下為六十尺，城上為五十尺。在晚明城牆之高度似乎比現在要高出一倍的，因為按

照湯若望底報告，當時之城牆係高五十埃勒（III），譯者按此係德國從前通行之尺度名，約合一米達之三分之二，與英人所用之碼相合。城牆上能容一整軍團人馬操演。皇帝有時亦到城牆上巡遊，巡遊時所乘鑾車，就為十二匹駿馬並排奔馳於城頭之上。據湯若望底述敘，城牆上有塔壘二百六十座，其彼此之距離皆一律相等。所以這城在當時和現在皆是世界最強大之城牆的。城牆之北面，東面與西面皆各有城門兩座，在南面則有城門三座，以與城內相通，每座城門之前更築甕城，甕城之正前面，於城牆高頭築雄偉壯觀，而層數多之箭樓一座。南面城牆中央之門，只是為皇帝出入時方行開啓。南面城牆之西門，即宣武門內（II），就是耶穌會會址之所在，在城之東南角，緊貼城根聳起，天文台一座，台上陳列由元朝所遺留下來的龐大青銅天文儀器數件（III）。今日北城底建立者是明朝最偉大皇帝永樂，他於一四零九年後，將中國首都自南京又遷回到這古老尊嚴的北京。永樂就是今日北城（即內城）底建築者。但是他建築這座北京城時，大體上仍是以元朝蒙古族底汗巴利可（Khanbaliq）城底基礎為根據的。

關於南城可以在這裏略一提及，這南城是自滿人入據北京，統治中國以來，即稱之為漢人城，

或蠻子城的 (Chinesenstadt)，南城雖亦有城牆圍繞，但其高大堅厚之程度却遠遜北城了。南城較北城地面略寬二啓羅米達，但是自北向南之深度，却較北城減少得多了，因此牠的周圍僅只約有二十二啓羅米達零五百米達。

北城一向是北京最體面尊貴的部分。因為北京之宮殿廟宇以及各部衙署都是建設在北城以內的。在這裏常川駐紮重兵，並且官吏、商人和上流市民也都在這裏居住。在明朝時，南城居民稀少，而在滿清時南城亦多為貧民棲流之所。

關於北城，我們可以在這裏再作一番詳細描寫。這北城圈內，尚圍繞一座界限十分顯明的小城池，就是皇城，一作「黃城」。皇城之建築亦以東西南北四方為準繩，牠的周圍約有十啓羅米達。佔據了這皇城大部分的地面的，都是些池沼，林木與埠嶺，在這埠嶺上都養有鹿獐等類之珍貴獸類。皇城內尚包括有一座愈小的城池，就是皇帝所居住的紫禁城，紫禁城為一高二十二尺之磚牆所環繞，城牆外邊靠着城牆，從前係一列長房，駐紮守衛兵士。長房下臨人工所掘挖終年清水不斷之寬廣池濠。紫禁城因自北向南又築有兩道平行磚牆，所以就更形成了一種新的劃分。這新劃

分的局勢，大約在元朝與明朝的時候，還要更清晰的顯着了出來的。因為時期較前的，關於北京城市的敘述，(四)，即如湯若望與衛匡國，都是一律分皇城爲二城的，就是紫禁城和居於最內部核心裏爲丹朱色之牆垣所環圍的御殿城 (Palaststadt)。(五) 這座御殿城包括自南向北行列整齊的一切皇帝晏居的宮室，和供召見用的殿宇。御殿城和紫禁城內之其他地方，在明朝的時候，只許供職於宮中之婦女與太監可以出入，此外就是最高階級的朝臣奉召御前有所議奏時，並且如果遇到國家大慶典，如每年元旦和皇帝壽誕，人民朝拜天子，或遇有外國使臣來覲見「世界大皇帝」時，也都可以能得入的。所有宮中一切其他人員：皇后，宮女，貴人和一部分太監，都是住在御殿城外之紫禁城中，在這紫禁城中還有皇室廟壇，書庫，戲台，病院和膳房。

這三座居於內部之城區，是和元朝的宮殿位置在同一地方上頭的，這是由馬哥·李羅和奧都里西·封·波爾得諾乃 (Odoich von Pordenone) 二人底敘述和舊日中國著作家底記載，都是顯然可以瞧得出來的。而永樂修御殿城似係築於元朝舊宮牆基礎之上的。這個情形在晚明御殿城中最崇峨宏偉之一建築物，即朝拜大殿，絲毫無疑問的。湯若望乘盜匪把這一座大殿破毀

的時機，所作關於這大殿的敘述，是和馬哥·李羅與舊日中國關於大明殿所遺留下的記述，完全相合的，差不多可以能令人們假定，他們所描寫的都是同一的殿閣的。在四方形十埃勒寬，五埃勒高，埋入地中，略超地面之上而做圓形的大理石柱基上，所聳立着的圓柱，有七十二幢。這圓柱都是用許多樹幹並合一起而成，有時箍以鐵圈，外面更以中國漆厚塗一層，漆上更敷金色，柱之直徑竟有關至十埃勒者。這種樹幹都是由四川的森林中運來。殿中地下所鋪設的皆為顏色不同之大理石片。柱頂所馱載的就是鋪有金碧輝煌瓦領之殿頂（六）。

中國人民對於皇帝的觀念，在城池底佈置上，尋到了盡人類思慮所能達得到的偉大表現。在城池底中央，自命為上天之子的皇帝安設他的寶座，而以他的道德的威力統治人類。世界上沒有一個其他的城池可以像北京，在這樣優越的意義之下為一座帝城的。

時時都在警備着衛護這帝城和這帝城裏所居住的崇高主子的貔貅猛士為數五千連同大象五隻。

關於紫禁城內所居住之人數，這人數之多成千上萬，湯若望有詳細的報告（七）。

皇帝僅只有一位身分平等的皇后，兩位副后對於這居於第一位的皇后，是應當行屈膝的敬禮的。侍奉皇帝與皇后之宮女爲數約有兩千。這一切的人衆都是經過妥慎選擇而來的。宮女之選擇皆係在一定的慶祝節日舉行，譬如，在新年與皇帝誕辰，這些民間秀女都是經體面的平民和太監送進宮中。她們一進宮中，便終身囚居宮中，而不得私自出離宮庭了。就是宮中其他嬪妃貴人，那一大批女侍女官亦係不許離開禁城的。衛匡國估計居住禁中的這些女子底數目約有五千（八）。現在的人們對於這種情形却不可不小心，在這點上毫無限制地聯想到所謂東方式的後宮的（orientalischer Harem，譯者按：此字多係指土耳其後宮而言。）明末到中國來的傳教士們對於中國底後宮，却有一種較佳的印象。

宮中妃嬪女官是分爲不同的階級的。對於最高的四層階級，我們在當時之教會報告中獲得詳細敘述。這階級中之第一級包括女官十二名，皆係有身分，有學識之貴女，按照他們的地位說，是同歐洲最高貴族之閨秀相等的。這十二名女官輪班服侍於皇帝之左右。她們的職務是自內臣手中接收奏摺文件，然後跪呈皇帝，並同時恭讀具呈奏摺人之姓名及報告內容。皇帝將文件閱讀後，

仍經這些服務女官之手，發交內臣，由內臣轉交內閣辦理。這十二位女官是在皇帝御前起坐自由，是可以能同皇帝談話博奕消遣的。(九)第二級包括女官四十人。這四十人底職務是管理皇帝之服裝，皇帝要穿什麼衣服，由這些女官告知太監，太監到御衣司取衣，交付這些女官轉進御前。第三級包括女官三十人。她們的職責是管理為皇帝進膳事項，皇帝進膳，所有菜飯皆由她們傳遞，並且在皇帝有大慶讌時，侍立於皇帝左右。最後第四級所包括的就是三位皇后和她們的皇子底女侍。

晚明時佔有重要位置的，是宮中那太監們，這些太監總在萬名之上，差不多都是出身低微貧賤，然而亦是由妥慎選擇，經過兩次試驗，然後方決定調至宮中任用的。這些太監之供職宮中，亦是分為不同的階級的。最高的階級是服侍皇帝和皇后的。其他的階級則為服侍嬪妃女官，供她們與外界往來之奔走的。太監中之大多數則為管理十五殿之事務，而一切禁城中之其他事務，亦是非他們不能辦理的。這一些人們從普通方面說，都是些驕傲蠻橫，極惡無賴的敗類，但其中亦頗不乏例外，地品端行正的善人。

當在晚明的時候，北京居民底數目是不能確實確定的。但是當時的北京是和當時歐洲最大的城市巴黎（Paris），在幅員面積上，並不見有什麼減少，所以從居民一方面說，我們可以斷定北京和巴黎相同。而估計北京至少是有五十萬人的（一〇）。

北京城在當時，堪稱爲世界上最大國家之首都。關於中國全國人民之數目，我們獲有傳教士自中國官方所得來的材料的確切報告。據衛匡國之報告，當時中國二十歲以上，已成丁而須納稅之男子爲數五八九一四二八四名。而當時皇室之一切親族，官吏，士大夫，僧道，太監，以及數近百萬現存之兵丁，都還未包括於這個數目之中。如果我們再把年齡二十以上婦女之數目和二十以下兒童之數目，連帶數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未被囊括於上列各階級之中的人民，加上作一總算時，那我們就可以獲得一個約近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民的數目。這也是羅德斯神甫（P. Rhodes）底估計的（一一）。照這個情形看，中國人民底數目遠超當時全歐人民底數目，甚至據羅德斯底計算還是加倍超越的。這個計算大致或許是對的。因爲在這一點上，可爲顯明實證的，是對於中國各城鄉非常巨大，和居民稠密的普遍印像幾乎難以使人置信。關於這居民底稠密是魯德照和其他

的傳教士們，都報告了的。他們都覺得實在驚奇。

當時調查戶口，計算人民底數目，是怎樣調查怎樣計算的呢？據衛匡國之報告，每家門前懸木牌一方，人口之數目皆書於其上。每十家歸一胥吏監查。另一種的計算方法，是經羅德斯之所報告的。這個另一個方法是說，爲長期保護萬里長城，時時戍守邊地所募集七十萬大軍之餉糈，每一位中國人，連皇帝亦不除外，皆須捐助一塊值合六蘇（Sou，譯者按，此係法國一種輔幣名，百蘇爲一佛郎 Franc）之貨幣。由這樣所捐來的貨幣的總數是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傳教士們一提及中國城市之偉大與繁夥，中國建築物之壯偉與美麗，中國物資與藝術，甚至精神文化位置之崇高，中國龐大民族之天才與天然的道德，無不致其驚歎與欽佩（一一）。

幅員廣闊的中國是以北京爲出發點，以一種單純的，但在他們這方式中，却是達到了完成地步的政治機能加以統制的。爲處理各項事務，解決各項問題，設有六部衙門。六部之中最重要的是吏部，這吏部，我們爲明瞭起見，可以譯作內政部（Ministerium des Innern）。這內政部的底職責，是任命，升調，監察和必要時罷免全國一切官吏。第二是戶部，管理國家財政。第三是禮部，掌管文化

事業，外交事故，國家考試大典，在本書中以下皆譯爲文化部（Kultusministerium），禮部之一屬，可爲欽天監。第四是兵部，掌管全國海陸軍與郵傳事項，第五是刑部，掌管全國一切刑罰與訴訟事務，這在我們歐洲可稱之爲司法部（Justizministerium）的。第六是工部，掌管國家一切工程建築事項（III）。

六部有所奏陳，都是書成意見書（譯者按，即奏疏，奏摺。）進呈御前的，在傳教會底報告中屢屢所提及的申請書（Libelli Supplices）就是這一種意見書的，這一種意見書是低級的官吏，衙門，和民間私人可以向朝中進呈的。在清晨最早的時刻，皇帝同「內院」所包括之四位，或四位以上之閣老，以及參預機務各人員議論各項奏摺，而予以最高之裁決。這些參預機務之人員尋常皆係才具異常優越的國家大臣，或翰林院之學士。這一種選拔出來的學士階級，連閣老大臣亦是應當從屬的。閣老中的主腦是人們可以同舊日歐洲的大宰相（Chancenkaiser）一比的。雖然皇帝是受命於天的統治者，可以自傲自尊地獨裁，但是他亦是不易得以離棄正常統治規程的。獨立的監察官，時時刻刻都在監督着全國一切官吏底行動與職責底奉行，甚至對於皇帝，他們亦是不

留情，加以責難的（一四）。

如果是一付聰明睿智的頭腦和一隻剛強的手腕在駕御這機關時，這換句話來說，就是坐御座上頭的，是一位精明能幹的皇帝，能把最明哲的謀臣，最優良的文武官吏選擇了來，供國家應用，並且處處賞罰嚴明，以法律與公道為政治目標，這一種宗法獨裁政體的統治機關，效能會優良的。因為中國人民對於天子的敬重，簡直是一種宗教式的景仰與崇拜。如果他能扶植國家秩序，保全國家底康寧與太平時，一切的人民都樂意服從他和他的官吏們的，加之，他所支配的軍隊竟有百萬名，都是勇猛的將士，出類拔粹的軍材，況且倉廩府庫又皆充實。反之如果皇帝是一個弱者，那全盤的國事都要出離軌轍了。這時這樣的一種錯亂，就是一個象徵人類行動不能和大自然轍則相合一的朕兆。如果皇帝，他是唯一負責的過失者，再要不知悔改，那上天就要撤回他的天命了。這樣人民就負有推倒皇帝，而另服從一位其他受有天命者底命令的義務了。

一六二七年九月間即位，以崇禎為年號的皇帝，並不是當時中國所需要的一個人物的。他固然有許多才智，德行純潔（一五），但他却沒有力量，把自許久以來已經潛伏朝中，破壞綱紀的惡勢

力以及各種腐敗的狀況，給掃蕩剷除的。國家大權牢固地握在太監底手中，他們成羣結黨地盤踞朝中要津，文武各職皆有他們的黨羽擠佔，暗自操縱朝中宮中一切事體，更且向出價最高的人們出賣官缺，時時皆以飽私囊爲最後目的，而向那與國有功，才德兼備，鄙棄納賄求進的方法的文武官員，皆施以暗害中傷之手段。當時這一班有這樣潛勢力的敗類，對於新皇帝却是懷着仇恨的，因爲他是會勸誡過前代皇帝，他的皇兄天啓，擺脫掉寵宦魏忠賢底惡劣把持的。及至他自己登位後，他就由這些宦豎底家中，抄沒無量的經他們漸次所積聚的財寶，並且又把多年爲害朝中的螻賊魏忠賢驅逐出宮。當在魏忠賢自行縊殺後，他還下令斬去魏忠賢屍體之頭的。可是宮中這一羣敗類竟暗自尋思報復方法。然而皇帝尙不能澈底覺悟，以爲不利用他們是不行的，因爲當時的武官多半怕死，而文官又都貪財的原因（一六）。

這樣明朝雖然有他那巨大強重的自衛自救之方策與設施，然而仍不能不向着盛亡中奔趨。最後使明室崩潰倒場的，是中國當時內地蠶起的盜匪與國外人數並不甚衆多的一個游牧民族。但爲當時這滿洲游牧民族（一七）酋長的各位人物，俱皆頭腦清晰，手腕敏捷，而始終認定目標地

去勇猛進行。誘引不滿意的中國軍官，連帶他們的軍隊投降他們，他們的政策上所用方法之一。這恰恰就會使那些在中國受壓迫，而有才具的人們，甚至他們並無自己的過失，而被剷除於宦途之外，就會動了投奔滿洲的心，在他們那裏，他們是可以能上進的。況且當時滿洲各部落之領袖，所視之為榮譽的，是把各人底私利置於全體底利益之下。民族中最能幹最有才具的人們，都是置之於高官顯位上的，即便他們的年齡仍還幼少，並且那是人們一種自然的義務的，決無願意地服從他們的命令。

滿洲人國家之創立者，偉大的努爾哈赤，於一六二六年九月三十日去世。他有子十五人，其中第八子被選為繼位者，他選用天聰年號，這年號底意思，彷彿他已經就是中國皇帝了。其實他也是真具有中國的教育，他完成了以中國模範為標準的行政系統之建立。他用溫和的手段對待甘願臣服的異族，並且用提升的方法對待中國投降的軍官們，這樣他鞏固他的權威。投降的中國人都被列入滿洲所固有的旗制之中。一六二九年滿洲之騎兵曾在三個地方潛越萬里長城，而出現於北京城門之前。從這時起，他們差不多每年都一隊一隊地騷擾於中國首都四周的郊野。

在國家這種困難之中，徐光啓和李之藻就又想起澳門底葡國人們來了。他們二位底意思是願意使葡國人們按照歐洲的方法訓練中國軍隊，並且教練他們使用大礮。當時所已有的大礮，除去葡國和自一隻觸礁的英國船上所獲得的大礮之外，還有數尊荷蘭所贈送的大礮可供應用。爲增加大礮底數目，還是可以令葡國人們鑄造新礮的。

一六二九年二月十四日中國朝廷對於徐李二位所擬這計劃予以照准，而三月二十四日朝廷又重新加諭一次。澳門市民向朝廷進呈大礮十尊，步槍數隻，五位或六位礮手，帶領人爲岡察賚斯·台可塞拉·可勒亞（Gonzalez Teixeira Correa，舊譯公沙的西勞）陪伴他充當翻譯，一起到中國來的，是日本傳教區陸若漢神甫（P. Johann Rodriguez）這一隊派遣的人平安到達北京。既而陸若漢又以皇帝欽差底使命，復返澳門，以便隨同一較大之部隊趕赴北京。一百六十名葡國兵，二百名軍裝齊整，非葡國籍之澳門軍，爲兩位隊長所帶領，於一六三〇年十月三十一日由內地之水路啓程赴北京。隨同這些軍隊連帶陸若漢越過中國邊界的，還有五位我們在上文已經提及的傳教士。可是舊日的情形馬上又要重行實現了。全部軍隊僅只到達江西南昌。在這裏他們

就得到了返回的命令。這是廣東商人鼓動的效力，因為他們怕他們那大利的貿易獨佔權要受影響的，如果葡國人們到了北京，他們應允願包賠這派遣隊已經用去，並返回的費用，因此就使朝廷易於作了這個可躊躇的決斷了（一八）。

在這期間台可塞拉·可勒亞在北京附近的涿州（Choochow）地方，用他的大砲抗抵滿人，已經收有很大的效果了。後來他同他所帶領的人與遼東總督孫元化（Vizekönig Ignatius Sunge）相值，他是因為他駐紮的省分遼東已經失掉，所以就被調為山東北岸登州府的司令官的。

這位基督教徒，他當初曾為嘉定傳教會捐助會址的，在教會底報告中都是以至榮譽的言詞稱舉他的姓名的（一九），因為他是當時那少數極能幹而又極忠於皇室的中國官員之一的。他之所以能得達到總督地位，完全是他的能幹之所致，因為他僅只是一個舉人，而總督之職，尋常只是出身進士的人們纔能獲封的。因了這個原因，並且又因他是一個基督教徒，所以當時他就受嫉妬的人們之所中傷了。

這位孫總督派遣台可塞拉帶領他的砲隊到直隸海峽入口的皮島（二〇）上驅逐來侵略的

滿洲軍隊。葡人 台可塞拉·可勒亞施行了這個命令，並且又返回登州府。可是在這裏發生了一件不能歸孫總督負責的不幸事件，這事件是使他和台可塞拉竟至喪失了性命的。因為他鄙棄賄賂的方法，未曾向太監納賄送禮，所以他的迫切的籲請，補發軍隊久欠的餉糈，並未被宮中的太監宣暨傳達到各該管處所。因餉糈底扣留，經葡人所訓練，能使用槍礮的軍隊中，有一支隊約三千人，竟而叛變，並且佔據為孫總督與葡國人們所防守的登州府。台可塞拉在這些叛軍的戰鬥中死了。羅漢和數位葡人由城牆上躍入深雪之中，幸得逃出性命。叛軍隨即搶劫了城市。在這時他們只有一條路可走了，就是作反叛。他們要求孫總督為他們的叛變獨立的首領，他們大家都是說他為什麼不可以作皇帝呢？但是孫總督對於他的君主仍是要盡忠的，並且使叛變的軍隊仍行返回服從地步。可是朝廷為他這功勞與忠勇並不加以賞報，反而把他革職，召回北京。當時一切的人們都知道，在北京等着他的是什麼。因此他的軍隊就又叛變，為的是要保護他們的長官。而滿洲亦乘機派人以光榮的位置說他投降。但是孫總督却不為他們所動，而服從皇帝底命令。他同兩位其他奉教的官吏，就是上面所提及的王徵和張燾 (Michael Chang) 均被判處死刑。徐光啓為救這些被判

決者底性命的嘗試，他常時已經是到了最高閣老底位置的，俱都失敗，雖然皇帝本人也是願意赦免了他們的。王徵固然僅受貶黜處治，但是孫元化和張燾俱受斬刑。他們臨死的情形，是完全不負我們對於一位基督教英雄之死的期望的。他們死時的確切時日現在已經不能確定了。但據我們的推測，總在一六三三年之中間（二一）。

與這一種杆法行動相結連的，是歷史家所報告關於湯若望神甫所作的一件英勇慈悲，可為模範的舉動。因為他要向被判決者行施最後的宗教安慰。但他怎樣能得走進那牢獄底內部呢？他喬裝一位煤炭販子，塗黑他的面孔，背上馱煤炭一簍，竟未經人發覺地走入牢獄中，處處叫賣他的貨物。一日半的時間，他在獄中和這二位被判決的教徒們同處（二二）。

在常時，滿洲還不是中國最危險的敵人。對於中國的城池，他們是無可奈何的，因為他們的軍隊和步隊為數過少，難敷應用的原因。可是尤其危險的，是中國底內敵。自從一六二幾年開始，中國到處所起的匪氛，已經搖動了衰弱失舵的國船。如同雨後地上菌茸一般，中國到處盜賊蠶起。自一六三〇年有匪首二人，超越一切其他盜匪地顯露了出來。就是李自成起於西北，在陝西，在河南和

山西，他鞏固了他的統治。張獻忠，他本是先把中央各省燒劫一空的，在一六四〇年，就把西部的四川與貴州置於他的權威之下。這兩個盜匪之中，李自成還是最後爲中國末後的，由自己民族所建設的朝代底掘墓者的。

以上所敘述的是關於晚明政治的狀況。以下我們可以暫先對於湯若望在北京在明朝末後皇帝之下的工作加以敘述。

科學的與技術的工作

曆書之頒佈，在帝制時代的中國是每年政府所作一切事件中，最重要與影響最大的。因爲按照中國人們底觀念，國家的與平民的生活，皆須與大自然之運行相合一，如果不能合一時，國內便要發生災禍與不幸事件了。因有這一層原因，所以在曆書上爲官吏與人民，俱皆將天空之巨大現象——譬如日月與各行星之運行，星宿之會合，太陽之入中國天算家所劃分的獸帶上二十八星宮，和其他類似的情形——預先開列於曆書中，以便全國人民底行動有所遵從。只是一份毫無舛

錯的曆書，縱能達到了這巨大的目的。但是自許久以來，曆書對於大自然運行的表現，已不能忠實，因此便不能使人類底行動與天道與地道相合一了。一份無錯誤的曆書，還有一個使人們歡迎的原因，就是牠可以能使全國一切人民底行爲舉動，都可以一律按照太古以來的文化法式進行。這是儒家學派上的一個理想，而政府却視這一種情形爲全國底安寧與秩序的一種擔保。

爲的是可以能瞭解湯若望底科學工作，在這裏對於中國底天算與曆書略加敘述。可是在這一本偏重傳教史的著作中，把一篇關於中國天算與曆術的科學論文，提出於讀者之前，那自然也不會是我們的任務的。我們只是可以把爲瞭解上所必須的情形，預先寫在這裏。其他關於欽天監，關於牠的建設和他的任務諸種問題，此外關於由曆書上非科學部分所發生的種種困難，俟稍後，再加詳細敘述（二三）。

中國底曆數是一種陰陽合曆的。一年中的十二個月，每一個月皆係以新月開始，並且皆與月之循環時間相適合，而有二十九或三十天。按照着一定的時期，把一個閏月置入一年之中，爲的是可以使一年的曆程再與太陽的循環相適合，而這種閏月在十九年的期間是出現七次的。從天文

上說，一年中的第一個月是應包含冬至節的。可是從人民一方面說，每年的第一個月是經以往各皇帝所任意規定的那一個月的。天算上頭的一二三和十二月，在不同的時代中，被不同的皇帝規定爲民間的正月。這四個天算月份之中，被釐訂爲民間的正月，次數最多的，是其中的第三個月。這個情形是自紀元前二六九七年到紀元前一七六七年，並且除去少數的年歲之外，自紀元前一〇三年一直到現在在中國都未曾變更的。這樣，中國當在湯若望時期，人民年曆底正月底開始，照我們西洋曆數說，應當是在一月二十一日和二月二十日之間的。中國人民底年曆尋常是有三百五十四天或三百五十五天，而閏年則有三百八十三至三百八十五天的。

歷來的年代都是每六十年劃分爲一組的，這種每六十年成組的劃分法是自中國荒古時代，據中國史家底記載，是自黃帝元年，即紀元前二六九七年起，一直循環更替到現在的。每組中之每一年皆有他的固有名號。照樣，各月，各日和各時辰都是自那始初的一個時點起連續而下，並列爲各以六十之數爲限的組別，並且各月，日，和時辰，亦皆以表示各年歲之名號爲名號。閏月被視爲前月之補充，所以就仍以前月之月號爲月號，而在行列中並未佔有特殊位置。然而閏月中之日期與

時辰，却不這樣；牠們仍是如同其他月份裏的日期與時辰一般，被分列成組。不過月與時辰，尋常都是以十二支數爲分組的限定的。

在這一種的分法之外，還有其他劃分時間，和規定歷史時期的方法。最顯著的，就是以皇帝統治之年數爲計算的方法。不過在爲這一種年數計算上的依據的，並不是用了皇帝本人底名字，乃是用皇帝爲他的統治所選的年號的，可是這在歐洲人底作品裏，尋常都用爲皇帝底名字了。皇帝如果在一年裏死去，那他這一年的年號，仍要保存到年底爲止。上述這兩種計算時間的方法的連合，可以能使我們確切確定一個時間，竟致可以確定時辰。

還有幾種特別的情形，可以附記在這裏。中國天算家是把一日分作十二時辰的，自午夜至午夜，並且又分爲長度相等的百刻，所以每一個中國底時辰就囊括我們歐西兩點鐘的時間和中國底八刻零三分之一。太陽黃道分爲三百六十五度零四分之一，所以一日底時間就恰好與黃道底一度相適合了。

對於天文過程作一種科學的見解，在當時的中國人是還提不到話下的。他們對於天空現象

的知識，只是用極簡單的器具唯一地由觀測中所得來的。譬如日至（夏至及冬至）的時刻只是用日晷以爲確定的方法。人們對於太陽、太陰、和各行星之運行，都是由數百年或數千年的經驗中去推斷的。以這些這樣蒐集了來和記載了下來，的觀測爲根據，人們嘗試着預先確定天文上之過程。

因此那便是顯然可知的了，天空的實際現象永遠不能和預告的情形完全相適合，除純粹偶然相合情形之外。有時他們的報告完全不對，所以天空便會突然發現一種日食或月食，而爲欽天監事前之所並未報告者。雖然如此，然而人們仍不能不驚奇的，是中國天算家與治曆家底工作多半仍尙能與實際相去不遠。

可是他們天算上的錯誤，一年一年甚至成百年地積累下來，所以就愈久愈深，愈久愈不可收拾了。因此中國底天算便須時時加以改正，尋常都是在一個新朝代開始的時候，對於舊日觀測的表板和曆書加以檢查修訂，俾可使人生與大自然底過程重行合一，而可以感招上天對於新統治者之寵眷。

在蒙古統治中國時期（即元朝，始自一二八〇年）之開始，因引用亞拉伯之曆法，中國原來曆法乃得以澈底刷新。這種亞拉伯之科學，即在繼元而起之明朝（起於一三六八年），亦仍被尊崇應用。在當時新朝之欽天監裏，至少有二十四位從事曆法之亞拉伯天文學家。一三七〇年回教徒所開辦之學校經官方正式認為欽天監之附屬機關。這些亞拉伯天文學家們除去治曆主要任務之外，他們還教授球面幾何學與代數學。當在元朝倒塌時，成百的亞拉伯文手稿被搜獲，並且其中有許多種俱被譯成漢文。回回曆法是當時最大的一種翻譯工作。一三八五年曾有一種討論曆法理論的論文進呈朝廷，這篇論文被譯出，一四七〇年經過一度之修正，而於一四七七年完成。

這樣，回教徒同中國天算家之共同工作，已經有數百年之久了。當在第一批耶穌會士留居南京的時候，南京北極閣之天文台上還住有回教徒。當滿人在北京登極之時，還有幾位回教天算家住在北京。在我們這一本歷史中是還要屢次提及他們的。

可是他們的無學無識，依然極巨大。他們的計算上所呈現的錯誤，並不下於中國底計算。在過去三百八十一年中對於曆法即未嘗加以修訂。亞拉伯天算家是把周天分為六十度，每度分為六

十分的，並且以這一種分法，他們確定了星宿底軌道，替代陰陽的年曆，他們引用了三百六十五天連帶在一定時期出現的一個閏日的陽曆。但是這一種的刷新，歷時一久，就仍不能支持了。

回回曆法在中國既已這樣失敗，這時可就輪到歐洲的天算家了。他們的任務不是容易的。他們不能用歐洲的曆法簡單地排除中國原有曆法。中國特有的一種時間的計算法（在這上頭，尤其是以六十之數為限的成組分法），以及曆法上一種舊有的組織（尤其是陰曆與陽曆合組的形式），他們是不得不保存的，因為一經變更，人民決計不會接受的。這也是一個使他們未曾放棄了普洵來默勿斯（Ptolemaus）所發明，以地為中心的體系的主要原因。但是他們希望可以漸漸地向中國君王與平民證明葛萊高爾（Grego）所發明，以太陽為中心的曆法的優長。他們把一日分為九十六刻，所以每一中國時辰就只有八刻，替代舊有的八刻零三分之一。太陽軌道他們分為三百六十度，替代中國舊有的三百六十五度零四分之一。他們這樣的作法，為的是可以無須長久的換算，就能把歐洲底書籍與表格翻譯了過來。

他們主要的功勳，就是使歐洲數理天算的科學成爲中國人們底學識。在這種工作中他們總

是嘗試着站立於歐洲學識之高峯上。爲了這個原故，他們令家鄉底人們時常把家鄉的對於科學上重要之一切新刊物，給他們向中國郵寄。他們對於天空現象，譬如日食，月食和行星之運轉，以及對於地球上之現象，譬如潮水之漲落，予與以科學之解釋，自然就可以把中國種種迷信思想之基礎，自剝奪，而使中國之人民，自見其非。他們的科學能使中國算法上謬錯之淵泉得以發現。用歐洲天算表格之幫助，他們就可以製出無謬錯的曆書。常在湯若望時代，人們在中國還是用舊日元朝初年來的儀器。其他的幾種儀器是由歐洲帶了來的，或者是經湯若望在中國之所製造的。大規模的新天文儀器，是到了南懷仁神甫（Verbiest），纔令人們在中國監造的，這些儀器中有幾件於一九〇〇年聯軍入北京時，曾被法國與德國底軍隊當作戰利品携至歐洲。（德國軍隊所携去之部分，根據歐戰後凡爾賽條約 [Versailler Vertrag]，曾經德國政府又交還中國，中國政府把牠們陳列在北京，未被聯軍携走部分之旁，在今日還被各國到這裏來遊歷參觀的人士們之所驚歎讚賞。）

在這天算方面鄧玉函神甫，並且在他之後湯若望和羅雅谷，都是很勤奮地手下工作。在當時

最需要的，是爲中國之共同工作者用中文所寫的一批立於科學高峯上之專門著述。同時爲造就天算專門人材起見，更需設立一種數理天算之學院。這種種工作在禮部尙書徐光啓堅強促進之下進行非常疾速。這位出類拔萃的基督教徒於一六三二年入閣充當閣臣，他是內閣中特別爲皇帝所優遇的一位謀臣，爲當時全國所知曉。皇帝之下他是當時中國底第一人了。

湯若望和羅雅谷在開頭，都是把自己鎖在住室中暗自工作的，爲的是可以避免當地舊有天算家之反對。以往的著作，他們拿來做爲新著作之基礎，或加以修正，或從新翻譯歐洲各種典籍。耶穌會會址之旁，人們建立寬闊房屋一所，作爲教養天算專門人材學院（譯者按：卽當時之曆局）之用。入學院之中國學員自然俱係基督教徒（二四），在傳教士指導之下從事於天算表格與對數表之譯作工作。徐光啓原爲一位一等之學者與文士，在各種譯著上皆與以詞藻之潤色，使之成爲典謨之作（二五），這樣所完成的譯著分作五組進呈皇帝。此項工作開始後經過七年，卽一六三五年，全部叢集始得完成。這部叢集所包括的卷數約一百五十，刊爲三部分，卽輔助科學部分，天算理論與實用部分，天算表格部分（二六）。

但是人們還未到這個地步時，同天文台中國舊有天算家之鬥爭已經開始了。並且當在傳教士們一開始由隱密中走出，自行作觀測時，登時嫉妬心與民族之虛驕心，對於這些在一切事情上都認為所知佳於中國人們的異族，就發動起來了。立在這一黨不滿意的人們底頂峯上的，是以仇視基督教稱着當時的老魏公，他是一位有名的天算家底門徒，這位天算家是曾有志改良中國曆法的。可是徐光啓在世一日，這位老人是任何目的都不能得達的。徐閣老很曉得怎樣對待這些不滿意的人們。他令全國稍微有名之天算家都到北京會聚，並且令他們預先確定即將發生的日月食，和天空其他現象。可是這一種試驗是他們俱皆未曾成功的，因而他們就不得不暫時歇息了。徐光啓也還及早注意到一位繼任的人物。當在他的病勢日漸增加時，他就由山東將伯多祿·李天經 (Dr. Petrus Li T'ien-king) 召至北京，導引他到欽天監之工作中去，並且向皇帝建議，封他為繼任人選。

「中國教會之柱石，」徐光啓於一六三三年十一月八日逝世（二七）。上面所說那位老魏公登時就擠了上來，意欲佔據欽天監之位置。但是皇帝底頭腦却是很清晰的。他令老人經過一次科

學的考驗，可是這考驗他很妙趣地不能及格。所以李天經獲封爲欽天監之監正（二八）。於是耶穌會士仍奉諭完成他們的譯著工作，並且進呈一份新曆書。其實他們也是不久就將一份行星曆書和民間曆書完成了出來。在民間的曆書中他們因宗教的關係不列吉凶日期，可是他們在這上面留有空白位置，以備政府自行填列的（二九）。不過這一種改良的剷除迷信的民間曆書，在這一位皇帝之下是還不能到了採用的地步的。因爲反抗的勢力過於巨大了（三〇）。

選李天經爲欽天監監正之舉，並非十分合式的。他固然是一位良善人物，然而他既無他前任底學識，亦無他的實行底力量。他的目的在和平，所以處處退讓，尤其是如果能與他有利益的。魏公很倔強地繼續他的奮鬥。他說，他曾充當李天經之老師，因此所知道的，當然要比他多。李天經一本素日退讓性質，奏請皇帝爲這位老人另立一所自己的曆局。由這個情形中，朝中便有人推測，李天經對於他的事務不見得十分有把握，並且歐洲底學識終究不是都對了的。因此爲這位老人竟建立了一所天文台，他和他的黨徒們都獲得了國家底俸祿。這一切的自然會增加了他的自覺心理的。

一六三四年二月二日湯若望和羅雅谷向中國朝廷進呈由歐洲所帶來之望遠鏡一架，以黃綢封裹，連帶鍍金鏡架與銅製之附件。兩位內官，一盧姓，一魏姓，經教士向其說明儀器之機構，並授以使用之方法（三一）。是年八月初教會更將製作極精之禮品數件向朝中進呈，即：天體儀一件並赤道與獸帶合製之圈環儀器一件。這兩件禮品體積頗高重大，皆係製作精巧之金屬物。此外還有用兩張巨大的紙葉所製成的半面球形圖一張，這球形是在平面上所畫的帶有網狀綫的天球；最後還有水平日晷一座，這是一直到這時在中國尚未見過的一種日晷製造法，日晷係畫在一塊白色寬五埃勒（line）之大理石面上，而指針則係立於一鍍金，為皇帝紋章之象徵的龍體上。半面球形圖之兩張紙葉係裱糊在珍貴的綢子上，外更以軟木編織細格裱裝全圖，可以按照一本中國書籍之式樣，而加以摺疊；天體上所繪之各星宿皆作金黃色，而紙葉之四邊繪有極精工之邊飾。

(111)

這些精緻的儀器尚未送至朝中之前，皇帝會令兩位內官到曆局先行視察一過。因為人們對於這二位內官無所餽贈，或者也許因為他們不懂天文，所以他們向皇帝的呈報是不順利的。但是

皇帝却認識他的那些人們，所以他終究令人們把這些禮品取至宮中，而陳列於皇城外牆之內。二日之後，他親自將這些儀器視察一次，並且非常滿意。耶穌會教士向朝中建議，把這些儀器陳列於御殿城中，以便皇帝隨時可以親自作天空觀察。他們這建議經朝廷照准，於是這兩位傳教士遂得獲膺未之前聞的榮幸，就是准許他們腳踏禁宮聖地，以便安置那些天文儀器。當時皇帝曾以御宴恩饗二人，這是極人類思力之所及的最大光榮了。所以這樣御殿城中便有了自己的一所天文台，而為太監之所管理。為的是使皇帝底興趣時熾熱，這兩位傳教士為中國朝廷，還製造了許多其他的儀器，譬如象牙製小日晷，望遠鏡，圓規，小號天體儀，星高機等物。湯若望也會畫了兩張地球半圓形圖。

被仇恨的歐洲人底這種種效果，惹動了老魏公又從新作了些事情。他在他的天文台上極勤奮的作起觀測來了。為的是防止蒙蔽的行爲，他們的觀測都是隨時在李天經和禮部一位高級官吏底面前，同二位傳教士們底觀測作一比較，然後又向天空現象上去取徵驗的。可是也有時候傳教士們的測算免不了有幾秒或也許僅止一分之差錯，這是因為儀器不十分準確的原因，自然無

足爲異的。然而這却爲魏公和他的黨徒們之所指爲口實，而拼命施以攻擊，他自己那六十倍或百倍大的錯誤，他可就決不提及了。

一六三七年六月間傳教士又向朝廷呈遞天體儀器一件，儀器直徑長四釐，爲青銅質，材料之價值銀四百兩（三三）。一六三八年一月皇帝用湯若望所進呈的望遠鏡，觀測一次日食和一次月食。當時進呈御覽之各種不同的計算書，只有傳教士所進呈的能與日食月食相吻合（三四）。

一六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才具優異才能的羅雅谷去世，自是之後，天算與技術工作，全部責任悉歸湯若望一人負擔。可是上面所提那位老魏公接着也竟去世。登時便有一位學者出來繼承他的位置。這位學者曾研究或私抄教士們和徐光啓之著作，並且又會令他伶俐的兒子在曆局讀書二年。當在他這位很有希望的郎君畢業出離曆局時，竟盜竊儀器數件而去。可是他的惡運却即刻臨頭。因爲他在路途上被盜匪所劫，因受創傷過重，竟至喪命。他的父親天空觀測的成績並不見得有勝過他的前任老魏公之處，並且甚至他還是被他的同人們之所時常揶揄的。

爲暗行向傳教士等加以損害，他現在又用另一種武器了。他向朝中和太監底頭目呈遞一件

出於一位文人手筆的誣釀奏摺，謂傳教士貶棄孔子與古代偉大帝王堯與湯入地獄（三五）。太監頭目搜索傳教士底宗教著作，但是他却發現，他的控告不實。緊接着出現的月食又證明了歐洲天算底準確，給傳教士們又壯了不少的聲勢。可是當在傳教士們底這位對頭仍還不放棄他的攻擊時，皇帝最後便覺出他的行為實在太過。因此皇帝勅令驅逐他和他的全家出離北京，並且又令人們把他的天文台拆毀。其他略有所學的人們出來代替他們的位置，然而不久也仍歸消滅。有一位戈姓的老先生原在欽天監充當監副的，上疏御前，彈劾欽天監情形惡劣，紊亂無序。他以為朝廷應當或者放棄曆法之修訂，或者將紊亂秩序的湯若望逐出欽天監。可是他所得到的，是皇帝底譴責與懲罰。當在人們把這個消息報告給他的時候，他正在吃他的米飯。他聽到這個消息，猛吃一驚，米飯裏面唯一的一塊小骨又便扎在咽喉裏不能咽下，因而竟致噎死。欽天監裏還有四位官吏，為證湯若望所製儀器不適用，竟至假造湯若望底觀測，可是他們却是這欽天監裏在一個荒年裏獨餓死的四位官吏，雖然他們所支領的俸祿，是和他們的官吏一樣。熱心宗教的湯若望在這些和類似的事件上，時時刻刻都瞧出上天神意之顯示。

和傳教士作對的人們在宮庭中是有一批互相勾結的人物的，這些人物底目的在暗中專門毀滅湯若望底聲譽。上面已經提過，在宮庭中有一座用湯若望和羅雅谷製造的天文儀器所組織，而爲內官所管理的天文台。管理這座天文台的內官有時向朝廷進呈不實的報告，並且將這不實的情形歸咎於歐洲儀器與天算之無用。在這一點上，皇帝底表示，却實在過於輕信了，因此對於湯若望就漸次存起成見來了。一六四一年的一件事實，是可以完全作爲傳教士對頭們的惡劣手段底特徵的。

因爲在這一年裏，皇帝令人們把那一些以前本已搬出殿外去的偶像又搬回殿中。上面所說的宮中天文台底位置，就在陳列這些偶像的大廳底前面。爲的是奉這些偶像入殿陳列，人們就不得不把天文儀器移到旁邊去。可是那些太監們在移置儀器的時候，惡意地或者因爲他們過於拙笨，竟把儀器完全錯誤地又安置了起來。十月十九日曾預言有月食出現（三六）。但是在觀測的時候，發生湯若望的計算與月食有半點鐘之差別。因此皇帝就決斷，湯若望底計算既不對，人們便可以無須再從事於曆法底修改。但是禮部對於歐洲天算，却有一種愈佳的見解，於是對於皇帝底

意旨並未以公佈施行。

這其間繼續發生的最近的日食之日已經將近了（三七）。湯若望對於上面所提那一種錯誤觀察，已有所聞知，並且也識出了其中的原因。因此他堅決請求，人們須招呼他，把儀器安放正當。爲了這個緣故，他便偕同兩位學生到宮殿之前準備安置儀器。可是這時天空有雲霧，太陽爲其遮蔽，儀器之安置幾乎是不可能的。湯若望開始虔誠向天禱告。皇帝又有命令，叫他們在宮門外還再等候。他們一直候到十點鐘，纔被放入。這時太陽仍還在雲霧底遮蒙中。湯若望向太監宣讀一篇對於儀器使用方法的文字，然後就嘗試着用磁針底確定，把儀器安放到位置上頭去。這時太陽恰巧竟由雲霧中升起，於是一切竟毫不費力地被安置妥當。一位管理其他殿閣的內官，曾在跟前把一切的都觀察了，並且把湯若望底話也都聽到了耳內，因此立即向那些僅僅皮毛的太監天文家加以非難。當時湯若望因爲心中也頗有些忿恨，所以就大聲地作了他的批評，可是人們登時就作出一種暗號向他示警，不要大聲說話，因爲在一塊幕帳之後，皇帝在站立着的。當在湯若望去後，那些無知無識，把天文儀器安置錯了的太監天文家，就被他們的主子加以嚴重的應得的譴責申叱。

十一月三日爲日食出現之時。皇帝會同管理其他大殿之太監數人觀測日食，而令原來管理宮中天文台之太監不許近前。湯若望底計算很神奇地與日食完全吻合（三八）。皇帝現在諭令，登時採用新曆法。可是這一步終久是未曾得以達到。因爲其他略知皮毛的天文家又向前擠了過來，並且又做了些新的控告，他們說湯若望是由回教底書籍中獲得了他的知識，他故意以錯誤的學說教授國人，因此他的學生們就毫無所得了，以這樣的和類似的言詞，他們極力誣毀傳教士。雖然他們這一切攻擊的言詞都被駁倒，並且一切的誣毀者都被懲罰，雖然曆局裏的學員們有很大的進步，並且湯若望底門徒日漸增多，然而，一切皆前後一律照舊，而毫無進展。因爲反對的人數過於強大，而爲欽天監監正的李天經是無能爲力的。

由舊天算與新天算論戰時期裏，有一篇湯若望所著關於中國時間計算法的極有裨益的論文遺留下來。這本來是傳教會管理處所提起的問題。因爲教會著作家和羅瑪殉教教徒姓名冊（das Römische Martyrologium）在自世界創造與洪水以來的時間計算上未能一致的緣故。此外基督教計算法和中國計算法之間還有一種很大的差別，因爲中國計算法係以洪水以後的一

個較長時期爲前提的緣故。這一切的都爲傳教士之間種種爭論與中國人方面反對底起因。湯若望底論文，由中國曆法自堯帝直至最近時代所用六十甲子，未嘗中斷的輪替序列中和由中國最古時代觀測之準確中，證明中國時間計算法之可靠。按照這個計算法，堯帝之登位應當在紀元前二三五七年。湯若望會把他這一篇建白的文章於一六三四年九月一日寄呈耶穌會副省區長傅汎濟 (Vizeprovinzial Furtado) 和羅瑪耶穌總會德國助理補索斯 (Assistent Busenus) (三九)。

宋君榮神甫 (Gauti) 對於這個問題底繼續討論有所報告。中國傳教會在以前已經會請求歐洲天算家把他們的意見寄給中國傳教會。譬如鄧玉函神甫就會向大天文學家克普來 (Kepler) 寫過信，但却未嘗得到答覆，因爲克氏于一六三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已去世的緣故。在羅瑪會由許多學者組織委員會，審查湯若望底建白書。一六三七年十二月二十日羅瑪向中國傳教會發下覆文。覆文嚴命傳教士始終堅持同一之時間計算法，不可反覆多事變更。至於湯若望所敘述的中國時間計算法，傳教士可以勿須躊躇地安然引用(四〇)。

耶穌會中國副省區長傅汎濟爲傳教會底利益起見，迫切希望，在北京時時皆有傳教士充當中國天算家。他趁一六四〇年到北京視察的機會，會囑湯若望設法在欽天監，譬如援從前回回曆先例特開歐洲天算部。湯若望在一六四〇年十一月所作之建議書（四一）中關於這個計劃之種種可能一一書出，但却以爲這計劃是不能實現的，其主要阻力全在中國方面之虛驕，因了這虛驕他們對於任何一種革新，都要持以反對態度的。

除天文儀器之外，湯若望還製有許多它種器具，例如關於光學，水力學，和關於音樂種種物件（四二）。至於說他還怎樣修改了一座舊鋼琴，這是我們可以在另一章段中再報告的。然而最令人驚異的，就是他還爲中國政府鑄造了重炮。

在從前，就是在一六三六年，因滿洲又向中國入寇，湯若望和羅雅谷就被防守北京城的司令將官以皇帝底同意之所邀請，視查城牆上之防禦工程，因爲人們確切相信，這些精巧的歐洲人必定懂得一點這樣的工事的。湯若望和羅雅谷允從這邀請，並且給他們出了些好主意（四三）。城牆防禦問題，已經成爲極其嚴重。他們相信用極大的重炮，可以能防守北京城，使之萬無一失。

一六四二年七月皇帝向兵部尚書授與了他的密令。這密令是要他一開始絕不露痕跡地同湯若望談論炮火問題。如果他覺得湯若望是通曉一點這樣的事體的，那麼，他就可以把皇帝諭令造重炮的聖旨登時向他頒下。湯若望談來談去，竟不知不覺地跌入了陷穽裏去。可是等他明白過了兵部尚書底來意時，他就竭盡心力加以抵拒。他說，製造兵器的事情不是他的職業。他說，他所有的，僅是一點書本上的智識，實際上製造炮火的經驗，他是一點也沒有的。可是他這一些拒絕的言詞所達到的地步，僅只是皇帝替代開始所希望的七十至八十磅重炮彈底製造，現在僅以四十磅重的炮彈底製造，即亦滿足。一切所必需的材料俱已置備妥當：鐵，鉛，紅銅，技術人員，並且爲建造炮廠，在皇城內還備有大空場一片。一部分太監奉皇帝命令，學習製造炮彈的技術。可是他們反而對於這工作只是有害無益；因爲工作剛一進行，他們就犯了猜疑忌妒的毛病，因而便生出種種攔撓阻礙。譬如有一次，炮筒內部尚未磨光之前，他們竟將一個炮彈置入其中。於是人們乃不得不向炮筒中切切實實裝入一些火藥，纔又把牠射了出來。皇帝會聽見了這非常巨大的一聲響震，並且很關心地問左右，發生了甚麼樣的災禍。如果技師不在眼前時，這些太監竟敢偷盜成百斤那裏堆積

着的銅鐵等物。當在他們最後都躲開了之後，人們可就非常快活起來了。湯若望和他的工人們晝夜不離地立在火邊。于是他這工作竟得成功。

在這裏我們又獲得了湯若望對於宗教的熱衷的一個例證。因為他知道，中國人在鑄造炮火時一定要祭祀火神，是他所絕不能阻止的，因此他便先他們一步，想了一個代替這天主教所不容許的迷信行為辦法。他令人們在每一尊正在鑄造中的炮筒之前樹立教會祭壇一座，把基督底聖像安放壇上。然後他披起祭祀肩衣和長法衣，戴上教士在作神事時所用祭巾，並且令工人們禮拜真正的上帝，禱求佑助。皇帝曾有諭旨，不許阻撓他作這樣的神事。

湯若望這次所鑄造的大炮，共二十尊。當在離城四十里一個大廣場上實彈試驗射擊時，便又發生了種種障礙出來。替代人們所要求的撥牛拖炮至城外，政府反而撥給了些騾子給他們。按照皇帝底諭令，當時不僅太監，就是連軍官與軍隊亦應一律在旁參觀，但是他們以為大炮會炸裂，所以都遠遠地離開，而不敢近前。（湯若望曾描寫這些如同孩子一般的人民在戰征中的行動怎樣，現在令人們讀到，真要失笑的！）及至首一次發射，炮彈飛出很遠一段路程時，全場非常歡騰，采聲

齊起。可是他們的心裏登時就又生起忌妬來了。既而又十尊大炮並排一齊發射，令兩個騎兵馳至彈落地點施行視察時，太監們却另遣人去視察，可是這些人們在返回時所作的報告竟這樣狂妄，使人們馬上便可看破他們的謊言來。

皇帝對於湯若望這成績極其欣慰。他登時又諭令再鑄造重量不過六十磅之較小炮筒五百尊，以便兵士出征時便利攜帶，並且在退却時可以以肩負回。湯若望聞到這個諭旨時，不覺大聲失笑，並且極恭順地請傳令者向皇帝回奏，說中國兵丁並不是那麼傻的，在敗逃時，這自然是他們很在行的，還要自找麻煩背負這些重礮。但是他却仍遵照皇帝意旨，製造了這一批較小的礮筒。按照他的估計，五萬磅銅鐵和五千磅鉛即已足用。但是太監們却以湯若望底名義，向皇帝要求五十萬磅銅鐵和四十萬磅鉛。皇帝對於湯若望這一切的要求皆予照准，但是他却由湯若望底口裏得知太監們底欺瞞行爲。

湯若望從事槍礮的製造已經到了第二年。這時皇帝心內忽起興趣，也令宦官們表現他們的技術，這是因爲他們常在御前屢次以此誇口的原因。這些宦官內侍們起造他們自己的礮場。湯若

望在這件事情上很和霽地幫助他們。恰在這個時期北京疫病流行。這一批宦官底魁首和他們的黨徒二十五人俱受傳染死去。可是湯若望底人員中連一位死去的也沒有。因為湯若望這位病勢垂危的對頭完全無人照管，湯若望就起了慈悲的心，自作他病中的看護，並且嘗試着勸他改悔入教，但是他這一番好心終久白費，未能得收效果的（四四）。

鑄造大礮的工作尙未完成，皇帝即表示願一聞湯若望對於城牆外部建築最優形勢的見解如何。湯若望擬具了一個計劃，並且製造木模一副進呈皇帝。皇帝命他協同兵部長官到城外相度地勢，確定修築這種防禦工事的地點。湯若望和兵部底意見俱已一致，但是是一位宦官和朝廷建築顧問把這一切的計劃都給破壞。他們對於湯若望底計劃所責難的，是他所擬具的那三角形，因為這三角形與火焰相近，這樣工事便會受到火星底影響，而更要與來侵襲者順利，不見得能與防守者有利的。因此他們以為寧可選用一位樞密顧問官所擬具的四角形，也不可選用他這三角形的。當有一天湯若望在兵部高級官員身旁乘馬由城外返回城中，並且在一座已經築成的護城四角堡壘之前走過時，他就大聲對他同行的人說：「如果我是敵軍，我從這裏三天之內便可把全

城奪取了過來。」湯若望這樣說了他的話，可是後來賊兵犯北京城時，果然於第三天由這個地方向城牆中鑿破三個洞穴，躡至城中，而那位四角堡壘之發明家竟可憐地因他這發明喪失了他的生命（四五）。

在這裏有一個根本問題應行提及。就是湯若望以天主福音之使者可以作這種以屠殺為目的的軍事工作麼？當在他於長久的拒絕之後，終於拜命受詔時，在他的心裏對於這件事情在教會方面之容許，他決定有把握的，甚至他還是視這種工作為一種間接傳教方法。連一切同他一起傳教的弟兄們也都覺得，這沒有什麼不合教規之處。在當時的一切傳教報告中，我們連一句責難的和疑慮的言詞也發現不出。根據他在此項工作上已經一年多，用去了他全部時間上的大部分的理由，我們也可以假定，他曾獲得傳教會各會長之明文贊成的。即我們在今日之下，亦可完全了然原諒他這種教士以外的行動。

湯若望是中國國家底公民，皇帝底臣屬。中國是一個有高度文化的國家，這文化底高度是在非基督教的世界內，自希臘與羅馬以後從未會有其他的國家能得達到的。而當時中國軍事防禦

的工作又係目的在防止盜匪與文化低劣之游牧民族之侵襲。況且皇帝又不是一位不堪當他的地位的人物。如果他的力量過於軟弱，不能鏟除宦官底惡勢力，和改良惡劣腐敗的官僚政治，那這便不足為離棄他，不輔助他的理由。教會向中國皇帝任何一種效力，都會使皇帝對於基督教生感謝的心理的。在這一個人政府之下，傳教的先決條件至為順利，盡人們思力之所及，亦不過如是。人們預先無從得知，滿洲皇族如果入主中國，會與中國國家與百姓輸入新的生力，和會昇與傳教會以更順利的條件。當時在中國的傳教士所處地位，是頗有些與滅亡時代的羅馬帝國奉基督教的領袖相同的，所以他們就不得不拿這些領袖人物對於行將侵入羅馬帝國的日耳曼族的見解，以為批評當時中國情勢的資助了。並且人們也是很有理由的在懼怕，如果湯若望當時拒絕他的援助，那中國皇帝一定會招請荷蘭國的軍事專家的。實際上，自荷蘭方面似乎也真有這種建議已經進呈御前。可是為天主教傳教會底利益起見，人們不能不設法防止荷蘭人在朝中獲得政治勢力。不過湯若望底種種工作俱屬枉然，未能獲得所預想的效果。他雖為皇帝鑄造大礮和建築防禦工事，不為無功，但這仍無所裨益，如果有姦惡的人物立於其後時。為他這長年辛苦的工作，他也並未獲

得人們所充許的報酬和感謝，除去皇帝在內閣會議時屢次稱讚他，並且還把一位因用鄙視言詞傷傷這位洋人的一位高級樞密顧問（*Geheimrat*，譯者按：此即內閣大學士之譯文）革職拿辦（四六）。

湯若望在從事於鑄礮的時間裏，曆局竟遭遇了一個很可痛惜的結局。李天經仍是照舊處在睡夢之中，對於曆局底事情未能周密顧慮。曆局一位老學員，這個學員是龐迪我和熊三拔二位神甫已經教授過的，並且他是負有督勵年級較淺的同學的責任的，乘湯若望不在曆局的時間，僭佔他的位置，並且破壞他的聲望。他甚至散佈謗言，謂湯若望會吞沒為製造礮火所支領之官款。可是他這姦計終未能得售，因為湯若望為慎重小心起見，一切款項開支俱係請工部自行處理，自己並不加以過問。這位可惡的不知恩的誹謗者，後來也竟受到了報應，因為他是喪命於盜匪之手的。當時曾有人向政府建議，在欽天監另開一科，專門研究歐洲學識，以便傳流後世。但是湯若望却寧願暫時停閉曆局，也不肯把他的高深學識付託於「愚妄的人們」的（四七）。況且滿洲夷族萬一入主中國，一定也要結束這曆局的。

關於統轍的工作，政府既未發與報酬，而以前羅雅谷和湯若望爲他們那教授天算與偉大譯著之工作，亦僅獲有極微少之報酬，簡直說不上是報酬的。曆局中之學員爲他們的協助工作，俱皆支領俸祿，並且經政府授以官職或名位，然而對於這兩位傳教士反而毫無所賞賜，毫無所授與，彷彿人們已經把他們遺忘了是的。當在譯著工作完成之後，吏部雖然向教會發給表揚匾牌，以資教會懸掛（四八），然而這酬報未免也過於輕微了。至於說，政府所發給他們的維持生活之例銀數目之微少，幾乎連二人中之一人都不敷用。徐光啓都暗自把不敷用的款項由個人私自加以補充，爲的是使這兩位傳教士至少可以不致受餓，這是徐光啓不令人知的，但是人們終究得以知曉了。就是爲那些進呈的儀器，政府也不過僅只發給與材料之價值相等的款項而已。在這種情勢之下，若望憶及他的亞當的聖名，這是在受洗禮時所得的一位要終身禱佑他的聖人的名字，因此很有趣的影射聖經記載亞當在世時情形，寫在他的自傳和年報中：亞當不得不在他面孔上的熱汗中，賺取他的飲食，用時時新奇的工作。然而這却是他在肉體與靈魂方面俱皆受到剛強鍛鍊的功

夫（四九）。

徐光啓臨死時還深以傳教士底生活費用爲念，諄諄告誡各齋的管理處多加優待（五〇）。但是他的囑告終究是無用的。當在一六三六年湯若望和羅雅谷奉詔視察城牆上之防禦工程時，當時軍官們會乘機向政府呈請，授與傳教士一種職責，俾可支領俸祿。到這時朝廷纔醒悟了他們這一種疏漏的過錯。可是因爲他們不受政府底職責與名義，所以人們就要撥給他們一所房屋連帶田產，俾可作爲他們衣食之資。但是這一件事情仍被拖延了下去，終究未得見之施行（五一）。

一直到羅雅谷死去之後，朝廷方纔努力施以補報。

當在禮部和李天經向朝廷報告羅雅谷去世的消息時，皇帝願念死者對於國家之功勳，勅令戶部撥給教會銀二千兩，令傳教士們購置田產，俾作衣食之資。此外湯若望還得支領月俸銀十二兩（五二）。

在這一個陰曆年裏，皇帝還向耶穌會傳教士們昇與當時中國所能有的最高榮譽，就是皇帝賜與耶穌會牌匾一方，上面有皇帝親自所選擬，並且親筆所書的四個大字，字爲金色所塗，牌匾之

緣邊畫有極工精之龍飾。匾上所題之四字爲「欽保天學」，意思是皇帝褒獎與保護天學。可是這天學二字自然是首先應作天文學解，但是這二字亦可解釋爲天主之學的，換句話來說，就是可以作爲基督教之學解釋的了。這是當時許多中國人和教徒們一般的見解的。禮部一位高級官員於一六三九年一月六日，在例行的儀式之下把這一方牌匾送至耶穌會會所。在送達這一方牌匾的人馬底前部，有四位宣令官高馬踞背，向前開道。禮部底高級官員騎御馬，著紅袍，處在全隊中央。後面便是服裝鮮明，或騎馬或步行的軍隊跟隨護送。全隊鼓號震響的樂聲引動了半北京底人民。李天經，湯若望，龍華民以及欽天監之各官員和曆局之各學員，全皆著制服在耶穌會會所恭謹迎接牌匾，他們把這牌匾安放在大廳的中央，然後照例向御賜的禮物施行叩頭的謝恩禮。繼續着作樂開筵，款待各官員，這時在耶穌會會所門口所聚集騁熱鬧的人們，已經人山人海了，他們對於皇帝向傳教士們所表示的這崇敬都是驚奇不止的。傳教士們在會所大門前面築起彩樓一座，以便安置御賜牌匾，令來往的人衆得以瞻仰。

後來內閣第一位閣臣，他是全國地位最高的一位官吏的，也送牌匾一方，表彰傳教士和他們

的宗教，這一方牌匾在過聖誕節時也是掛在耶穌會所大廳內的。在這一點上，禮部亦是不要落後的。他們所送的牌匾上所題的四個大字是：「功堪義和」，意思是說，兩位天文學家的功勛是與義與和底功勛相埒的，所謂兩個天文學家當然是湯若望和羅雅谷了，而義與和則係中國荒古神話時代底兩位偉大學者的。御賜的這一方牌匾的抄錄，經官方加以實證之後，分給全國各教會，各地地方官員皆到教堂內向牌匾叩頭禮敬，並且恭謹陳列令民衆瞻仰（五三）。

皇帝還有許多次很感謝地願念到耶穌會教士對於國家的勞力。當在他有一次，就是在一六四一年，登城遊覽時，到了離耶穌會會址不遠的地方，他令鑾車停止前進，以便安然向耶穌會會址加以眺望，然後他對於朝中幾位傳教士所作大有俾益於國家的工作，深深加了一番讚歎與褒揚（五四）。

還有一次，就是在明社崩潰之前不多時，湯若望又得到了皇帝底一番崇敬。因為當在曆局停閉時，禮部曾向朝中呈請，爲他多年的勞苦工作，政府須向他加以感謝之表示。這種感謝之表示是出之於兩方牌匾底形式的。一方爲表彰湯若望之忠心與功勳，其他一方則係讚揚基督教。這第二

方牌匾曾經送至澳門，在那裏這一方牌匾在樂聲，教堂之鐘聲與敲響鳴聲之下，被教會所接受，而懸掛於耶穌會教堂之內（五五）。

這樣湯若望便達到了他在這科學工作，儀器工作，甚至他這鑄造工作上最後所懷的目的。他在他這一切工作上所懷的最後目的，就是要借這一切工作為傳教的工作謀便利。這是他在他所寫的自傳中會屢次提及的。因此他也堅決相信，他的那些對頭們所遭受的災禍與懲罰，都是天意之所致。當時傳教士們在北京的工作，是全國底人們皆有所知的，因為政府所出的官報，把關於朝中和朝廷的一切重要事件都報告給全國的原故。因此自十餘年以來，人們在中國處處都讀到了自不同的方面向朝廷所上的奏疏和皇帝所判的朱批，在這些奏疏與朱批中，是曾一再提及教士們對於修訂曆法的貢獻的。皇帝和朝中底臣屬對於這位湯若望和他的同人們，是很覺得感謝的，因為他們是對於皇帝和對於國家，都作了這樣有益的工作。朝廷對於這二位傳教士的隆情厚意，自然也會擴充到其他的傳教士和基督教的全體上頭去。人們現在在中國讀基督教著作的興趣，自然也因而增加了。

照湯若望底意思自然是願意擺脫掉這朝中的供職，專門從事於心愛的傳教工作，這也是他自己會親口之所說過的。但是他也認知了出來，在朝中的供職是與福音底傳佈有大利益的。他雖然在世俗的事件上，喪失了他的大部的時間，但是這從其他一方面看，却是使他的和他的傳教同志們底傳教工作愈加有利，愈加有希望的。

傳教工作

北京傳教區所包括的，不僅是首都城內全部，乃是亦包括周圍廣闊，人烟稠密的全部四郊地帶的，在這一帶裏，譬如在一六三七年竟有十六處基督教分區的。

傳教區區長一直到一六四〇年都是由龍華民所充任，不過教區雖有區長，但其管理權按照耶穌會規則却屬之教士會議（五六）。繼龍華民充任此職務的傳教士是湯若望。自是之後，龍華民每年或長期或短期都要把他的住處移至山東的，在這裏，他於數年之前曾建立了基督教底基礎。尋常在北京是還往有一位其他的傳教士的。羅雅谷去世之後，我們在北京便以次發現瓦爾達神

甫 (P. Valta) 和方德望神甫 (P. Stephan Le Fèvre) 底行踪。瓦爾達在北京所居住的時間是自一六四〇年至四一年，而方德望則係由一六四一年住至四二年的。此外也還有一位修士被分派到這個教區裏來。這位修士就是邱良厚 (Paschal Mendes)，他一直到一六四〇年都是住在北京的，他是一位有高深學識與修養的中西混血的人物，在中國傳教會裏自數十年以來他都佔重要位置，因為他不僅協助教士之譯著工作，就是在勸化士大夫入教和教徒之教導工作上亦悉行參與的。他於一六四〇年七月二十六日病沒。

傳教會副會長也時常住於北京，譬如副會長陽瑪諾會於一六二四年至三六年住於北京，而副會長傅汎濟則係自一六三六年至四一年住於北京的。一六四一年中國北部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五省劃為一大傳教區，置北部傳教副會長 (Vizeprovinzial des Nordens) 一人，總理五省教務。這次的劃分是因為當時中國內部之不安定日漸加劇，而南北之交通亦因之愈久愈困難，等等情形有以促成。經耶穌會總會長所任命充當這個職務的伏若望神甫 (P. Johann Fross) 已經久已逝世。因此教會視察員魯必諾 (Visitator Rubino) 就委任傅汎濟神甫管領斯職 (五七)。

當時中國南部傳教會之副會長自一六四一年起則爲艾儒略神甫 (P. Aletti)

北京之傳教會嘗試着向一切階級裏去傳教。但是耶穌會傳教方法之特點，却在特別注意上流階級。由官吏階級與士大夫階級所來的基督教徒，因他們的榜樣與他們的影響自然都會成了傳教士們底一等輔翼。即便這些體面的中國人不肯正式入教，那已經是與教會很有所得益了，如果他們以和霽的態度對待傳教會。傳教會時時之所注目的，自然是在民族底全部。當時傳教士們最熾熱的志願，是奉勸皇帝入教，或者使他對於教會發生好感，以便爲傳教會打開一座廣闊的大門。傳教會在那一些時期裏都是很樂觀的。湯若望和他的同人們也實在懷有獲得皇帝入教的希望的，因爲這一位皇帝確係具有種種善良性質的原因，他的才智和他德性底堅定從一位中國帝王方面看，很有可觀，很不輕微。他不是已經會多次令人們把偶像由殿中搬出，和甚至命人毀滅寺廟的麼？當時許多的人們都相信，皇帝是曾經徐光啓暗中密授以基督教之教義的（五八）。

由當時情勢上看，湯若望決定是被他的傳教區區長由衆教士中特行選出，付以這個向學者與宮廷傳教的重要使命的，雖然其他的傳教士們——羅雅谷，龍華民，和邱良厚——也乘時從旁

加以協助，反之，他也參與勸化城內與四郊民衆入教的工作。

在有地位與學識的中國人們，傳教會是須要持之以耐性，而由細微處開始的。傳教會一律以巨大的和需招待那一些常來常往的官吏與士大夫們，他們的來意都在與西方學者談論一切可能的有益和無益的些問題。譬如一六三九年六部的六位尙書曾連袂光臨教會，拜訪傳教士。這六位尙書竟至到教堂內向聖像叩首禮拜，這是一直到這時還從不曾有過的。（五九）就在他們這次拜訪的時機裏，有許多的人們竟致受勸入教。其他的人們雖未當時入教，對於教會至少也是懷了景仰和感激的情感，返回他們的家宅或返回他的省籍中去的。

地位較高的奉教者，在救渡靈魂的神事上，傳教會便不得不與以特別辦理。在這一點上，尤其是對於徐光啓不能不如是，對於他，在這種神事方面，湯若望以極大的奮勉與熱心爲之效力。這一位受皇帝特別知遇優待的朝中謀臣，是一位清廉剛正赤心爲國爲民的人物，他的性靈底偉大在中西的人士中，俱皆罕有其儔，在私人與教徒方面悉爲並世的人們之所驚服與景仰（六〇）。他特選湯若望爲他的靈魂指導者（Seelenführer），似小孩子一般遵從他的指示，並且如父兄一般尊

重他。雖然他是較他年長三十餘歲的。他在耶穌會會址之旁租賃住宅一所，特闢一門，以達耶穌會內之教堂，獨身移居其中，以便盡可能之次數和安靜地，受不到人們底攪擾地到教堂內作禱告。在他自己的這宅邸中另設有小教堂一所。在這裏他每日早晨在出去辦公之前，在被釘死於十字架上的耶穌像前禱告半小時。當在他病勢沈重時，特請湯若望到他這宅中居住，以便隨時皆可備辦臨終神事。因為當時並沒有近人在死者之前，所以湯若望便爲他安排了一種基督教喪事的儀式，並且爲運靈柩歸返他的家鄉上海，湯若望也還親予照料的。

可是湯若望應當怎樣作法，纔能獲得對於皇帝的影響呢，並且怎樣儘可能的形勢可以達到使皇帝歸依基督教的最高目的呢？

個人與皇帝對談是不可能的。雖然他在天算與國家防禦軍備的事件上對於宮廷的關係很頻繁。但是湯若望却從不曾面見過明室之末後皇帝。所有他同宮廷的往來事件，都是由宮廷中的人員所傳遞。只是宮中的宮人與太監和朝中位置最高的大官纔能見得到天子底聖容。因此教會對於皇帝的影響只有兩種方法：就是或者因宮中中間人之揄揚，或者藉繕寫或印刷的文字之進

呈。兩種方法皆被湯若望之所充分利用。湯若望在他所寫的自傳中和教會的年報，以及傳教士們之信件，都很詳細的報告這些奉勸世界最大皇帝歸依教會之嘗試。

當時大家最大的希望就是先勸皇帝左右最靠近的婦女入教。這樣就可以在皇帝的四周創造一種宗教氛圍。使皇帝不知不覺呼吸基督教的空氣。就是從本體上看，這些宮中婦女們因她們羣隊裏許多位底崇高社會位置，或因她們終年囚居鍍金柵欄之後的悲愁生活，也是值得傳教士們特別加以悲憫關心的。這個計劃顯然有所成就。並且那也是獨有的一種情勢的，經傳教會在那常年封鎖的宮牆之後所惹起的傳教活動；這發表了出去，簡直是一段優美的為聖教宣力的佳話，能使全歐洲聞之歡欣的。可是連這一些婦女們，也只是因第三者的媒介纔能獲得的。因為她們不能出離宮廷，並且宮外任何人也都不能同她們談話，或甚至能見到她們。只是因可以到城內各處去，並且可以拜訪耶穌會的太監們底周旋串通，湯若望纔能同她們連合了起來。在這一點上尋到一個合適人物，就是第一件所應作的事情了。

在一六三二年，或許是先於此年，已經就有弟兄二人的第一批太監被勸化入教。他們在領洗

時所得的聖名，一爲阿希來勿斯（Achilleus），一爲乃來勿斯（Nereus）。至於誰是向他們付與洗禮的傳教士，這是不可知的了。他們二人會把他們的老母喚至殿中。他們這位老母是由邱良厚修士授以宗教教育，而湯若望給她付與洗禮的。再就是還有一位人所共知的奉教的太監聖名普羅圖斯（Protus），他也爲教會勸募教友，他曾勸他的母親和他的姊妹們都入教，並且又自出款，捐印教會要理問答一書，分送宮中之各婦女，並且在他山東的家鄉裏，他還追隨龍華民作傳教工作，向欲入教者授以要義問答的課程。有人說他在宮中還立有小教堂一所，時常舉行彌撒於其中（六）。

到了最著名的地步的，是奉天主教的太監阿希來勿斯·龐（Achilleus Pan）。可是現在人們已經不能確斷，他和我們上面與乃來勿斯所同舉的那位阿希來勿斯是否一人。（譯者按：據伯希和 Polliot 實爲一人，即龐天壽。見通報三十一卷一八五頁。）明室倒塌之後，他曾充明末最後皇帝永曆之首輔與大元帥，頗爲一出色人物，他並且還會向教皇與歐西各王侯遣派過一次使臣。在今日之下，我們很願意確切知道，這一個人是否確爲湯若望之所勸化。他爲被世人所鄙視的太

監階級爭榮爭譽的不少。

但是這第一批入教的太監之中，却無一位是能在勸宮中婦女入教的工作上可以爲力的，大半都因爲他們在宮中時代受洗，但却都是在宮外負有高級的職務的。

在這樣鄙劣的太監中，尙有一位其他非常優秀人物，竟成了湯若望勸化宮中婦女入教的好助手。此人姓王。他本來是在先皇帝底乳母處充當侍僕的體面位置，可是因爲出身於較優階級，所以他的性情行爲俱皆溫和文雅，在社會上處處禮儀周備端正，因而便受到社會上一般人們底敬重，而他家產中落，竟使他走上充當太監的道途，也還不是他本人底過失之所招致的。勸他入教，也還經過長久的努力，而於一六三五年方得成功。他在受洗時所得的聖名是若瑟 (Joseph)，並且自是之後遂成一位模範的基督教徒。湯若望向他授以勸化宮中婦女入教的使命，他付與他向宮中婦女施行洗禮之權，他令他向她們宣示教義，並且來回轉遞教士與宮中婦女之間的函件（六一）。

一六三七年王若瑟已經可以很嚴重地開始他的工作了。第一位在他手下受洗禮入教的，聖名佳達麗娜 (Katharina)，當基督教徒，是如同她以前未入教時信奉偶像一般地虔誠熱心的。一六

三七年教會之年報中，曾報告宮中已有十八位奉教，而品行異常優嘉的宮中婦女。內廷屬於最高貴階級之十二位宮女中，有三位受洗入教，第一位聖名阿嘉達 (Agatha)，他是皇上因她德性與智慧底優異所最敬重的一位宮女，其次一聖名海萊娜 (Helena)，一聖名依沙白拉 (Isabella)，俱都是非常熱心宗教的宮人。屬於第二階級之宮女中，一直到是年僅只有一位入教，聖名魯濟亞 (LuZIA)，但是她的德行却能超過許多人的。屬於第三階級的宮女中，有四位入教，而屬於第四階級中之宮女，則有八位入教，屬於第三階級四位入教宮女之聖名即：彩濟麗亞 (Cecilia)，齊來耐 (Cyrene)，曲麗雅 (Cyril)，和特克拉 (Thekla)。除此之外，還有兩位已經退休的體面宮女，也還受洗入教，其一聖名阿格乃斯 (Agnes)，她在幼年時因充嫖姆，還會抱過先皇帝於臂腕中的，並且是會屬於第一階級的宮女，而其他一位底聖名則為安多尼亞 (Antonia) (六三)。

在次一年宮中女基督教徒之數目已達二十一位，在一六三九年增加到四十位，而在一六四二年竟增加到五十位 (六四)。

教會中的一次報告，曾稱呼這宮中奉教婦女為北京傳教區之華。這是我們能完全贊同的，雖

然我們無須字字相信當時人們所寫的這熱心的敘述。因為基督教是把一種人生內容與人生目標拿來昇與了這一羣可憐虫們的空虛生涯的。因此他們也都以全副精神信奉着基督教。

他們在宮中都是彼此視為基督聖靈裏的姊妹的，彼此互相提醒彼此的過錯，而時時以修心進德相勉勵。她們用信件向傳教士告訴她們的過失，並且請示教士司鐸們罰她們作補贖（Buße, 補贖）。如同當時許多其他基督教徒一般，她們也作肉體底懺悔苦行。她們由宮中向教會寄出豐饒的施金和自作的教堂內所用聖衣。教士們給她們向宮中寄在神壇前祭過的聖物，譬如念珠，聖徒遺物，胸前所掛聖牌（Agnus-Dei-Tafelchen）（六五）以及其他類此的聖物，此外還向她們作善良的勸告，就是勸告她們應當怎樣行為聰慧，無須人前驚懼，並且怎樣因她們的好榜樣，可以對於皇上發生一種好影響。她們在禁城宮殿中也設立了聖母苦難小教堂一座，在這裏她們共同禱告，並且在這裏每週多次聆王若瑟之教義講演。並且這裏也還是熱心的王若瑟向那些新入教的宮人們付與洗禮的地方。一六四〇年傳教會副會長傅汎濟會任命一位奉教的宮女，為這一團宮中女基督教徒底團長。她們只是對於一件事物表示遺憾，就是她們不能到教堂內望彌撒和領聖體。

(六六)。

關於這些宮中婦女們，人們所報告的那一大批意在使歐洲讀者聞之歎羨敬慕的虔誠事件，可以令我們向那個時代的宮廷生活略窺一斑。只是爲這個原因，我們由這些事件中提出數件，簡略地發表在這裏（六七）。

宮女阿嘉達照地位說是居於首位的宮女，並且也是最聰慧最有德行的，立誓願以童貞終身。如果皇帝到廟堂中舉行祭祀典禮投地叩拜時，她即退身牆隅，避免陪隨皇帝向偶像行跪拜之禮，可是她這作法是冒着喪失皇帝底寵愛與她的生命的危險的。宮女彩濟麗亞在皇帝壽誕之日向皇帝捧獻壽麵，偶一失神，竟將壽麵傾於地上。這不僅僅行動拙劣，甚且亦爲一種惡劣先兆，是將要受沈重懲罰的。因此她急忙在心裏向至聖的真女瑪利亞許願，可是，瞧皇帝不僅未曾向她加以叱責，反而以和霽的容顏向她觀望，並且笑了起來。宮女海萊娜有一次會犯虛驕罪過。一位階級較低之宮女向她加以責難，並且向她呼名說：「海萊娜，我們的神師湯若望司鐸給我送了這條鞭子來，教我懲戒你，因爲你違犯教規和你的虛驕。」海萊娜情願領受了這懲罰，並且澈底改悔了自己的

罪過。此外還有兩位小女孩子也還被人們很推獎地舉示了出來，就是十二歲的蘇德拉 (Sofera) 和十五歲的賽孔達 (Seehda)，蘇德拉是因為她作補贖的熱心，賽孔達是因她會勸誡七位女同伴入教。

皇帝和后妃對於宮中這些奉教的宮女命婦得有很深的印象。他們和睦親愛的精神使全宮的人們都為之驚歎佩服。一六四一年之年報，曾報告宮中有幾位婦女，會公然向皇帝進勸入教。實際上皇帝也果然背離僧道和他們所敬重的那偶像，雖然還有一位皇后仍持續着使皇帝崇拜偶像。其他並不理會偶像的后妃們，却予奉基督教之宮女以維護。皇帝允准宮中各太監自由入教，並且對於宮中各婦女之入教，亦會予以便利。他甚至亦要求各后妃信奉基督教（六八）。

湯若望自然也會乘機會利用其他的中間人，向皇帝施以宗教之影響。在他向皇帝所上的意見書與請願書中，一定也會隨時隨地注入與教會有利的各種言詞。皇帝曾多次令人們由殿中把偶像去掉（六九），這也會是湯若望努力的效果的。至於關於用印刷文字和教會聖像，向皇帝施以基督教影響之一次偉大嘗試，是我們還要詳細敘述於下文的。關於此事，有多種的報告可以供我

們以材料底採摘（七〇）。

崇禎皇帝登極之十三年，即西曆一六四〇年，在皇帝之寶庫中偶然發現按照歐洲初創鋼琴時的鋼琴形式所製造之鋼琴一架（原名：Klavirymbel，為近代鋼琴模型之先範。）這是利瑪竇神甫當初進呈萬曆皇帝的禮品。因此崇禎皇帝便動了願一聆歐洲音樂之念頭。但是這必須得要先把這架樂器加以修理，並且把琴絃調好，然後方能演奏的。自然湯若望是被委任辦理這件事情的人物了。這鋼琴上用金色字體所書寫的讚美天主的詩句：「你們為主子唱一首新歌吧」（Singet dem Herrn ein neues Lied）亦是要他翻譯的。皇帝甚至還願人們給他再造一架類似的樂器。

湯若望受到這個命令便非常欣躍了起來。他要借這個機會以歌聲與樂聲把基督教輸入宮殿之中。鋼琴底演奏是他在幼年時代曾學習過的。這樣他就寫了一篇中文的鋼琴學，並且還附上一篇聖歌歌調之解釋。他由河南省招徐福元修士（Christoph Han）到北京來，以他的協助製造銀質琴絃，並且把琴中各絃俱加以一番調理。第二架鋼琴顯然未經他們造出，因為徐修士到北京

後，不久便死去了。

鋼琴修妥後向宮中送回，却是一個久已所欲尋覓的機會，把兩件含有宗教性質的珍貴禮物呈獻皇帝。這也是湯若望爲什麼要用這樣多的熱忱來修理這架鋼琴的用意了。

讀者可一回憶前文中所敘及之神奇箱櫥，這是當初巴燕大公爵馬克西米良 (Maximilian) 交與中國傳教會代表金尼閣贈送中國皇帝之禮物。我們藉本書之敘述也會得聞，這件物品怎樣順妥地在澳門由船上起卸了下來。這件東西自然仍流落在澳門的，因爲至少我們對於牠此後已經毫無所聞。在當時因中國放逐基督教徒，所以這件禮物便不能向皇帝呈遞了。然而一點却是確定的，就是這件禮品從未會得以按照牠原來的使命向中國朝廷呈遞。因爲這個神奇之櫥很會被中國方面了解爲西夷島族王侯之貢品，而在中國政府之官報上向全國宣佈，這是他們向中國進貢臣服表示。這一種恥辱是教會不願加到巴燕皇族底頭上的，這顯然是這個禮物經教會延遲上呈的理由了，要不然，我們就很難明白這延遲呈遞的原因在那裏了（七一）。可是這箱櫥雖未向中國朝廷呈遞，但其中所包含之各組單獨小禮物確切是尋到了適當的用途。

這珍貴的箱櫥中藏有兩件特別有價值的單獨藝術精品。一件就是一部關於耶穌一生事跡的聖圖。這部書共有一百五十張羊皮紙頁。其中四十五頁所繪的是耶穌一生事跡中之主要者，悉屬色彩鮮明豔麗之特製品。其他頁數所包含的，則為用金字印刷，與畫頁相適合的福音原文。全書係以兩塊玲巧之銀板作封面，銀板上面以浮凸之鑄造法鑄有四位福音著者之聖像。里斯本一位大主教會見到這個神奇之櫥，當時他曾願出一千塊可路撒多斯（Crusados，譯者按，此為十字幣之意，因其上鑄有十字之故，係葡萄牙從前所通行之一種銀幣或金幣名，其銀質者值合德國從前馬克二元三十一分二厘至二元八十一分，約合我國現行法幣四元上下，其金質者值合德國馬克二元二十九分至四元三十分，約合我國現行法幣二元八角至六元上下）購買此櫥。其他一件藝術品，則係由精美五彩之蠟質所很忠實地印鑄三位聖王朝拜耶穌嬰孩的聖像。恰巧這時住在北京的傳教會副會長，也表示情願把這兩件珍貴物品送給中國朝廷。不過教會底禮品是不能讓中國朝廷方面視為臣服貢品的。湯若望請人把福音原文譯成漢文，用金字書寫於那些畫片之後面。

奉命修理的那件歐洲舊式鋼琴，和方纔所說的這兩件藝術珍品，這兩件珍品是特用富蘭德

(Frlandern)地方所製，而以金銀的花紋織成的綢緞所封裹了起來的，竟於一六四〇年九月八日送回宮中（七二）。此外湯若望還附以所作長文一篇，對於這珍貴之禮品加以說明，更於其中詳細敘述基督之生與死，以便皇帝可以瞭然，最後又特別表示了進呈這禮物之誠意。當這一批物件送進宮中時，恰巧碰到了宮中最體面之內臣，就是掌管最高宮殿職務的一位太監，而他並且還是很通音樂的。他非常高興地把這一切物件登時都送至皇帝宴居的室間裏。這些物件在皇帝處所作的印象却是非常深刻巨大的。因為尋常皇帝都是把進呈的物件略一過目，即交管理處收藏，並不再事過問的。然而這次却完全不同了。他特令人們先行取水淨手。他把禮品底封裹去掉之後，就把書打開，坐於書與蠟製藝術品之前，遂即這樣沈心潛氣地靜觀那些一頁一頁的畫像，竟使他三次進膳的呼聲都未曾聽見。最使他喜歡的是三位國王朝拜耶穌的一張聖像。因為他在這張聖像上瞧見了與他身分相同的人物們。他特召皇后前來，並且用手指着耶穌聖嬰說：「這一比較我們舊日的一切聖人，是無邊偉大的。」於是皇后乃不得不跪於地上叩首朝拜。接着皇帝命人們把這些禮品安放在御座之大殿中。皇帝又命其他兩位皇后，內官太監，和全宮中嬪妃命婦宮女，都勇猛

地向前朝拜奉敬。這全宮的朝拜奉敬竟拖延至十日之久。然後他纔命人們把這兩件華麗珍品送至寶庫中收藏。以後他還會時常特到寶庫中瞻仰這聖像，並且也屢次讀了經文與湯若望底呈文。由上面從宮中所傳出的這一切報告中觀之，那還足以爲異麼，如果湯若望和他傳教的同志們，尤其如果歐洲讀到傳教會報告的讀者們，嚴重地希望中國天子歸化基督教，和基督教之信仰在中國最後得以戰勝？

但是這一場光明優美之夢，竟馬上都要化爲烟塵飛散了，而那段宮中傳教之佳話，也竟被一隻殘暴手腕之所擊毀。我們在下文還不得不敘述，這位仁愛的皇帝怎樣被盜賊之所迫脅，而不得不自殺以終結他悲壯的生命。宮中的婦女俱皆逃散，各自返還她們的家庭，在她們的家庭裏，奉教之宮女都爲教會爭光榮，多半都是以童貞終身的。末後所說的這一批宮女中，也有宮女海萊娜，她曾被一位侵至北京的滿洲軍人之所迫逐，因此她竟投身河中，跌傷脛骨，乃得幸免恥辱。從她的口裏，湯若望得知宮中奉教婦女虔誠生涯上之其他散瑣情形。上述兩件珍貴禮品對於皇帝所遺留的印象，就是她向湯若望所述說的。她會說，皇帝觀完了那些畫頁之後，曾在屋中來回行走，並且歎

息着說：「誰能給我解釋這一切的疑問呢？」湯若望對於這位高尚的，固然性格軟弱的君主未曾接受天主的恩惠，並且對於他那樣悲慘的結局所生的深深的遺憾，多年之後，都還在他的心裏戰慄顫動，當在他自己所寫的自傳中敘述到這個地步時（七三），他深加惋惜，那層層的朝儀，簡直使皇帝成了一個囚犯，所以縱然在幽閉着的宮牆之外，能有一位火熱地在希望走入宮中，向他解疑釋惑的人，也是枉然的。

湯若望作他這一切重要特殊任務之餘，剩下的時間全都用在基督教底團體上頭了。

靠近南城西邊城門之下的救世主教堂（St. Seraphin）僅只爲男教徒禱告之所。中國底風俗是不容許男女混雜在同一室內的。因此爲婦女們便在城內不同的地方設立聖堂，在這些堂裏每月舉行一次或數次之神事。一六三七年像這樣的被人所舉示的小教堂，竟有十四處之多。後來（七四）人們把一所較大的庭堂改建爲一所聖母苦難教堂，在這裏所舉行的神事較多於他處，並且那些要受洗入教的婦女們，也都在這裏獲得教義課程與受洗典禮。家境富裕的婦女們都是垂簾乘轎，趕赴教堂之神事；而家境較貧的婦女們天尙未明即步行到教堂中，等候禱告了。婦女們到

教堂內作告解神工 (Poenit) 時，解罪之神甫與告罪之婦女間，懸掛厚氈彼此隔絕。(七五) 一六三九年教會年報，關於湯若望底報告，曾說他除去科學工作與在教會內接見來訪談者之外，也在許多小教堂內作彌撒，講道，和爲教友們作告解神工。這一切的事情他決計作不了的，如果他的身體不這樣康健，並且如果他不是能這樣完全操中國底語言時(七六)。使教會中各種階級的教友彼此視如弟兄，這是教會作靈魂救度神工上的一個主要方法。衛匡國 (Martini) 曾報告，中國基督教徒特別重視作補贖領聖體的神事 (Bussakrament)。他們去帽俯首跪在教堂中，自認自攻，彷彿罪犯跪在裁判官底案前一般。(七七) 由這種報告中我們可以推知，教友們也是如同傳教士一般，在教堂中作神事時，尋常是按照國內的習俗頭上帶着帽子的。依據這習俗人們在尊長大人之前——在這裏當然是在天主與基督之前了——頭上應當戴帽子。

湯若望和其他的傳教士們一般，也到北京以外的各傳教區中去。一六三八年之年報，曾報告湯若望到河間府去作這樣一次的傳教旅行，河間在北京之南，相距一百五十啓羅米達。在那裏一位告老家居，而資產富有的奉教太監，曾創立傳教區一所。湯若望在那裏已經是能在一大羣教友

之前講道，並且又會付與五十名學習要理問答的人們以洗禮（七八）。

正當湯若望不在北京的時間，就是羅雅谷去世的時間。首都和山西省，這是他在世時的工作區域，兩個地方底教友們都同聲一致地哀悼他。至於說朝廷怎樣紀念和敬重了死者，這是我們在上面已有所報告的。在這一件事情上，我們還連帶得以略稍知悉當時基督教殯葬儀式底情形怎樣。羅雅谷原係于一六三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去世，可是他的殯葬却因一種特別原因竟被拖延多日。所謂特別原因，是因為北京傳教區區長龍華民，他在教會切合中國文化的問題上所代表的意見，本來較大多數的傳教士特為峻嚴的，對於基督教禮俗與中國國俗相混合的一種殯葬儀式不願加以首肯，然而據一般的見解，以為死者亦為非基督教徒之所深深敬重，他們不能不以他們的禮俗前來致祭，殯葬儀式不如此辦，又勢有所不能，因此他只好把這事體擱置不理。於是人們乃不得不候湯若望自河間返回，再行決定了。這殯葬儀式終以湯若望自河間返回後的安排部署，得於五月五日舉行。自教堂門口起，一大批送殯的人們列隊追隨棺後，一直步送到墓地。在送殯的行列中，人們瞧見欽天監監正李天經，曆局之學員，宦官太監，各部官員，以及士大夫，教友，教外各級人民。

各教友皆一手持念珠，口內宣誦經文。其他一隻手，則持燃燒香料之火炬，或蠟燭。龍華民神甫身披祭衣，在臺地救世主小教堂內作追思亡魂神事，並且又向來賓講演。可是送殯的人中是不許婦女參加的。爲她們追悼死者，龍華民在繼續的二日內特又在城中作神事（七九）。

在崇禎底統治之下，湯若望除他許多數理天算的譯著外，還發表多種宗教內容的譯著。宗教內容譯著中有兩種，上文已經提及：一種即係他在西安時稿底已妥的聖徒略傳集，一種即係隨同巴燕大公爵兩件珍貴禮品向皇帝所呈進的進呈書像。此外還有三種著作應行在這裏提及，即：主制羣徵（*Über die Göttliche Vorsehung*）二卷，真福訓詮（*Über die acht Seligkeiten*）八卷，主教緣起（*Über den 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八卷（八〇）。

至于關於北京教區內所有教友之數目，我們却未曾得有詳細之報告。傳教會年報僅只報告每年所付與洗禮之次數，但已死的兒童和教友們底兒童所受洗禮，是否亦包括於這個數目內，是年報中之所未曾加以說明的。據年報中的報告，一六三五年北京城內與城外受洗禮者之數目爲四百名，一六三七年爲六百名，一六三八年爲八百七十五名，一六三九年爲五百名，一六四〇年爲

三百五十名，一六四二年爲二百五十四名。末後這幾年數目底減退，是因滿人屢次來犯，地面不靜之所致的了。可是這新入教的人們之中有許多都是屬於高級官吏階級的。不過關於這些入教的高級官吏底數目，亦是獲得不了一種清晰的統計的。

基督教這時在中國全國亦一如在北京一般，已經到了蒸蒸日上，興盛發展的地步，而到處皆能受到人們底重視與崇高之景仰。這個情形由那些年頭裏雖皆有種種重大困難阻礙，然而所付與洗禮的次數，仍能每年獲得那樣一大批的實況裏，就可以看得出來了。不過所謂種種重大困難阻礙，當然是指當時愈久愈擴大的內亂和傳教會教士數目薄弱，未能滿佈全國的情形說的了。一六三〇年之初，全中國傳教會共有司鐸二十一名，修士五名，到了將近在這裏所觀察的這個時期底末尾不過略有增加，而爲司鐸二十四名與修士三名，不過這些司鐸與修士皆爲耶穌會之所派遣。即各地傳教區之數目亦並未有若何強度的增加。在這個時期之開始，中國十五省中之八省共有傳教區十一所，在這個時期之末，共有傳教區十七所，散佈在十二省分中。經耶穌會傳教士所付與的洗禮次數，在一六三四年爲二千八百七十次，一六三七年爲四千次，一六三八年爲三千五百

零四次，一六三九年爲五千四百八十次，一六四一年爲五千四百次，一六四三年爲四千八百二十四次。經多明我會 (Dominikaner) 與方濟各會 (Franziskaner) 自一六三三年以下所付與的洗禮次數，並未包含在這些統計之中。至於生存的基督教徒在任何一個時期底總數，連一種約略的統計，亦是未能得以獲得的 (八一)。

這些新入教的人們之中，多有爲士大夫與高級官吏者。他們在社會中都公然承認他們的新信仰。人們簡直不敢相信人們底限力的，如果人們閱讀到下列的散瑣情事時。

一六四二年奉教將官魯嘉·秦 (Lukas Ts'in) 奉命督軍向廣西剿匪。他軍營中所展開的旗幟都帶有十字的聖像 (八二)。

這位將官底姪子，依格納爵·秦 (Ignatius Ts'in) 於一六四三年曾充皇室小艦隊之統領，統轄帆船五百隻，每年由南省沿運河向北京運送貢米。他把他的全部艦隊都置於十字聖號底保護之下。當時畢方濟神甫 (P. Sambiasi) 在統領艦上作彌撒祭禮之後，中央帶有紅十字之黃色龍旂在船前甲板之桅竿上卽行升起。然後五百隻三桅船俱皆得到經這位傳教士所祝福之十字

旗。在他們這次的航程上，他們碰到爲奉教的太監乃來屋斯所號令的艦隊，在他們這艦隊底統領船上亦然有一面帶紅十字的黃旗飄蕩空中（八三）。

傳教會底順利發展大半都應歸功於羅雅谷與湯若望兩位天算家底威望，和在朝中富有影響力的位置，羅雅谷去世後，就應完全歸功於湯若望一人了。這是耶穌會傳教士在繼續的時間裏屢經提及，並屢經明確推許的。在這裏，我們特由自一六三〇年至一六四四年的這個時期這種推許的言詞中，摘錄數條，附錄於下，以見一斑。

一六三八年十月一日傳教會副會長傅汎濟 (Franz Furtsch) 向耶穌會總會長穆爾斯·維得理施 (Matthias Vitelleschi) 所寫的呈報中，有一段說：「……湯若望神甫於他尋常傳教工作之外，和羅雅谷神甫這樣勤奮地共同從事於中國曆法改良之工作，是堪當鈞座以函件特別加以推許與鼓勵的。傳教會今日順利的情勢，在一切教會所作藉以自固的工作中，決係尤其應行歸功於他這一種工作的。並且因爲皇帝甚願北京曆局之繼續存在，所以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鈞座須時常向中國遣派懂數理天算的傳教士，以便教會得以時時維持這種工作，藉收中國朝野見重之

效果」(八四)。

傅汎濟關於這一點的意見在一六四一年二月二日向耶穌會總會長所寫的一封信中愈加明顯地說出：「湯若望神甫，他現充北京教區區長，在天主與社會之前，已建立偉大功勳，因他數理的譯著，並且因他所寫關於直接勸化教外人民歸依聖教的問題的書籍，再還因他勸化宮中婦女入教，以及乘向皇帝呈遞禮品的機會，所寫的關於吾人信仰之清晰明顯的長文。他的工作和他在北京代表教會底事務的勤奮熱心使我們在這一個大國內所作一切事情，纔有實現的可能。是很優美與很有良好效果的，如果鈞座對於他有滿意之表示，並且特別具函稱許他的勞績」(八五)。

皇帝特賜湯若望的牌匾送澳門後，已經較比一切語言都要清晰地表示了出來，人們在北京是多樣重視他的工作的。

一六三六年，一六三九年和一六四二年，三本每三年彙聚一齊的記錄中，都反映着耶穌會高級會長對於湯若望宣力與工作底普遍滿意。他所得到的考語全都是好的，甚至在愈後愈增加的

程度中竟是最優良的了（八六）。

自一千六百三十幾年以下，也有多明我會與方濟各會之傳教士自菲律賓（Philippinen）羣島轉赴中國。在一開始的些年數中，他們只是在福建，和鄰省傳教。兩位方濟各教士在北京會親自與湯若望會晤。這三位對於這一件事實，皆各作有報告（八七）。

一六三七年八月十四日有方濟各會傳教士卡斯帕爾·得·阿倫達（Gaspar de Alenda），爲省傳教區之委員，和富朗慈·得·拉·瑪德來·得·祇奧斯（Franz de la Madrede de Dios），攜帶福建基督教徒三位，出現於北京城門之前。他們立即令人向耶穌會報告他們的到達。耶穌會派湯若望前去與他們接洽。湯若望把他們安置在城外利瑪竇墓旁之空屋中。可是他們到北京來，並未奉有皇帝詔諭，這是犯中國國法，而與一件輕微性的大不敬的罪名相等的。這兩位傳教士對於中國底語言或中國底情勢都無所深知；因爲阿倫達是於一年之前纔由馬尼刺（Manila）轉入中國，而其他一位之入中國亦不過是在一六三四年十一月間。由當時教會中關於這件事情的種種報告中推斷，他們是不知道，傳教士們底行動在「天子底首都」中，和處在對於異族，尤其對於

菲律賓島上之西班牙人，特別猜疑的人民底中央是應當多樣小心慎重的。他們到北京來的目的，原爲向一位福建士大夫所著，而在北京所發表的一種仇視基督教的書籍作抗駁的講演，並且還要一本當初使徒坦坦直率的傳教精神，在北京於在大皇帝之前，公然佈道與宣傳新信仰。耶穌會士所採取的這一種謹慎態度，是他們所不能瞭解的。最易惹禍而不慎重的，是他在湯若望和甚至在一位中國僕人底面前，竟敢說出西班牙人有佔據中國之可能。這樣湯若望便不得不憂懼，必會發生最不良的效果的，如果他們竟然施行他們這原來的計劃時。因此他就設法勸他們仍暗自急速返還福建。可是這時官廳已得有這批異國人暗自到北京的報告。下級胥吏竟把隨同他們到北京來的三位中國教徒加以逮捕，而施以鎖繫。至兩位方濟各會傳教士所受的待遇怎樣，教會各方面報告中的言詞頗不一致。總之，他們未曾受到虐待，這是事實的。湯若望盡他能力之所及，爲之營救，爲之辦理一切，他甚至也出錢買通官廳，勿上報，不使部中與朝廷有所聞知。如果沒有湯若望這一番盡力營救，三位中國教徒就要受到斬首的刑罰的，因爲他們未得有政府許可私自送外國人至北京的緣故。結果他們五人都又被解回福建，不過三位中國教徒沿途俱帶刑具而兩位方濟各

傳教士在路途上，亦不過僅略受俘虜待遇而已，這件事情這樣結局，實在不能說不是湯若望底一番偉大功勞的。

數月後，即在一六三七年十一月八日湯若望向住在澳門的羅德斯神甫寫信，並且於信中提到了這兩位方濟各會傳教士。不過信中的言詞多涉譏訕，令人讀之殊覺難堪。譏嘲訕笑的興趣，却是湯若望自來性格上的一個缺點的。然而人們如果一思及羅德斯是湯若望當初求學時代的同學時，那對於他們私人之間的一封信件，這樣的嘲笑言詞自然就沒有什麼可反對的了。

就是後來連方濟各會與多明我會底傳教士也將要不得不很感謝地承認，他們有許多事情都是多虧了湯若望的。我們於下文也將會得知，幾位親自曾經認識他的人們怎樣批評他，當在他們在他那有點嚴峻冷酷的外皮之下，發現了他的一副火熱好心腸時。

第七章 明朝國基之根本動搖與皇室之顛覆

一六三六年滿族建國，號曰大清，（一）同時改元爲崇德；這兩種舉動，都是他們信爲已近侵佔中國目標的朕兆了。

縱然當時的中國朝廷過於昏弱無力，僅只滿人亦決不會成功把巨大的中國佔據了。因爲他們的礮隊與步隊過少，與中國相較所差過遠，所以他們也就決不會想起作攻打北京的計劃。況且他們這一種素爲中國人民所鄙視的游牧民族，卽在那些奸佞不忠的內官太監，亦是不會給他們把城門敞開的。可是當時駐紮邊地，對於中國這個虎視眈眈的強敵，負有警備責任，而爲總司令的總督，却未免是一個過於無用的人了。他固然會向朝中呈請，遣派湯若望到他軍營中，仿照北京前例爲全軍製造當時新穎的礮火，並備軍事方面之諮問。湯若望也果然受召前往，但是在那裏人們却不向他撥款，湯若望無從工作——當時這位總督「顯然相信，人們無須錢財，僅用法術可把槍

敵直接咒了出來的」(譯者按此係著者引用湯若望之言詞)——因此過了些時，湯若望就不得不仍行返回北京(二)。這位總司令官在軍事中，雖然竟是這麼一個甚麼都不懂的孩子，然而在對滿洲作戰的陣線上，却有當時中國最能幹的將軍吳三桂前進的滿兵是經他又給擊退了的。滿人經他這一擊，遂有願與中國訂立和約的表示。

這樣，邊亂雖得暫時平息，然而對於內亂賊首李自成，國家顯係無能為力，當時政府已經不能調集大軍，向他予以大規模之痛剿了。因此政府就不得不任從各地地方長官向他堵截迎擊。至於說在作戰時，中國人往往運用甚離奇的方法，這在一六四二年河南省城開封之役已可看出。因為開封底城池極其堅固，自半年以來李自成即已盤踞城外，圍困開封，一位朝廷的將官想要把李自成底軍隊，一舉而悉行殲滅，所以他竟把河漕高出開封地勢之上的黃河南岸土隄掘開，用河水向城之四郊淹灌賊軍。他本來以為開封城牆可以能擋得住奔來的水波，城內不致受害的，但是結果怎樣呢？李自成軍隊底大部分俱得自行救出，但是城內居民底過半數，俱死於九月十日的洪濤中，而城內之費樂德神甫(P. Rodrich de Figueiredo)亦在淹斃人數之中。(三)

連對於李自成底軍事行動，人們亦會要求湯若望前往予以協助。先是山西總督馳書北京，向他和向政府請求救援，然後就是那位操總司令之權的崇高閣老，他亦會向湯若望和向朝中馳書求援，並請政府派湯若望赴山西的。湯若望很認識這些人們，所以他竟托故拒絕。但是皇帝底諭令他却不得不遵從，所以他就又到山西去了一次。但是對於這位閣老却無法辦了，他坐在一座防禦鞏固的城市中，度他的歡欣快樂的生活。(四)

李自成底目的至是已昭若日月，盡人皆知了，當他於一六四四年僭上皇帝尊號，而予他的朝廷以天順國號時，他下令全軍向北京加速馳進。官軍到處向他投降。現在人們不能再向皇帝隱瞞這已經隱瞞了許久的危險了。湯若望願獻良策，怎樣可以極易守護北京城池；但是宮中那羣太監，並不向皇帝呈報他的意見。內閣會開緊急軍事會議，請皇上暫向中國南部遷避。可是皇帝拒絕他們這一種主見。他以為皇帝是應死於國土與社稷之神壇前的。(五)。這位不幸的皇帝在他的困難之中竟作了他一生最糊塗的一步。就是他把防守北京城的緊急軍事交付太監管理。因此七萬護城精兵悉歸三千名太監之所統轄。這樣一來，這卑劣的太監可得了時間與機會，向皇帝施展報復

了，因為他從前曾敢嘗試毀滅他們在宮中與在朝中的勢力。湯若望清楚楚楚地說，他們「在他們那卑劣無恥的憤恨之中」誓毀皇帝。他們用上千的方式朦騙他，竟敢私自藏匿宮中財寶器皿，並且掘埋為軍隊所規定之食糧。最後他們竟給賊兵偷開了城門。

下面的事實曾經湯若望所明確敘述，一切的都經他由最近處所目擊目睹。其中未經湯若望所敘及的瑣屑情事悉係摘補自他種史料。(六)

一六四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李賊出現於北京西面之三座城門前。在南城之西門前，就是在彰儀門前，他紮下了他的營帳。因為城牆上幾乎每一礮眼皆置有一尊大礮。他怕這都是湯若望所鑄的大礮，心內疑懼，所以纔把他的營帳紮在彰儀門外，這是他後來親口所承認的。但是那些太監們却助他出了這一層困難。因為當在他逼至北京城下的次日，防守彰儀門的太監曹化淳已經給他把城門敞開了。皇帝一聽見這出賣他的奸惡內應行動，登時全行披起皇帝鎧甲，乘戰馬攜帶護從人員數名，意欲穿過耶穌會址旁的城門，奔至南城，以便組織抗敵軍力。可是太監們堵塞他的去路，令他不得通過。然後他在馬上馳過耶穌會會所，奔赴北城之東門，他的意思或許是要由北城作逃

脫的嘗試的。可是那裏城牆上的太監反而向他發火射擊。因此這位被太監所賣的皇帝仍不得不返回宮中。

可是在宮中這時却開始了那非常震撼人類的悲慘行動了，湯若望以至深的哀痛與悲歎敘述這一場壯烈事實（七）。因為皇帝返宮後，即行促第一位皇后自經。他又命他的三位太子即刻出宮，覓地隱藏。他的十五歲的公主，他要用劍親手殺死，可是因為他的公主躲閃他的劈擊，所以僅失手腕，旋即亦逃出宮去。然後皇帝又由宮中奔出，走入處於皇宮後方北部之煤山，登至煤山山峰，這是他舊日會視察湯若望所鑄火礮的地方。在這裏，他由衣帶中取出寫字筆，並且向他衣衫底緣邊上，擦說是用他自己的血寫下了下面的言詞：「天佑將來李姓皇帝！我以至誠懇求：勿壓迫我人民，勿引用我謀臣。」然後他就將他的腿腳上的靴甲解除，把頭上的冠冕去掉，在一個亭子中的橫樑上自行吊死。

湯若望滿腔悲憫與哀悼寫在他的自傳中：「竟這樣恥辱這一代君王崩殂，他或許是世界上最偉大君王的，而在性格底優良上，決無可疑，他不落於任何人之後。然而殞落時，竟這樣悽慘孤獨，

爲一切的人之所撒棄，年齡僅三十六，爲他愚昧可歎的行動之所犧牲。他的崩殂，因之也使有二百七十六年歷史之大明帝國，與約近八萬人口之大明皇族，悉行淪亡。雖然皇帝使我傷痛地未曾聽從我的主見，當在我向他把幸福之路指出時，然而他却仍能獲得我們的悲憫同情，因爲他不僅使基督教，這基督教是在他祖父底時代傳入中國，而輸入朝中的，得以在中國存在，甚且還會加以褒揚與促進，爲他的人民底最大福樂起見。假使他不是這樣很早過於凶慘地去世，那他爲教會爲人民所作的成績，必還要增加的。」

我們現在在這裏對於這可悲可憫，實在可以堪當較佳命運的皇室之族人，再加以敘述，這也是湯若望在他自傳中的稍後地方（八）曾報告過的。此外還有須注意的一點，就是數星期後，滿人進關，竟將明室之江山奪入手中。

當時明宮皇帝之正后，也立刻順承皇帝之旨意，逕行自經。后妃中之一人曾被俘虜，而未經人識出。她後來落入一滿人家中充當女奴。及至她不能再忍受奴婢底苦痛時，她就向人們揭示她的身分。這樣她就被隨同先皇帝們其他幾位后妃，安置在欽天監旁的一所大府邸中，而經滿洲政府

與以尊榮的待遇與供養。崇禎之長子年齡十八歲，於逃出宮後，衣簞人之衣，執役於一滿人家中。當在他亦不能忍受那種惡劣待遇時，於數星期後，他就逃至一位認識他的太監家中，但是這位太監登時又推遣了他。讓他去投奔他的胞妹，他這胞妹是在他外祖父底家中尋到了棲身之所的。及這位外祖父瞧見這兄妹二人，怎樣在一起抱頭哭泣時，竟用一根棍子把他的外孫當作一個不認識的人，逐出家門之外。因此這位皇子就不得不洩漏他的身世了。這樣人們就把他置入獄中一些時期。可是滿人甚至允許他，封他爲王，並且與以封土。但是他却始終向他們表示輕視鄙夷。既而他便同四十名親族與官員被斬於市。據傳說，後來在南京另一位皇子被他自己的一位謀取帝位的親族之所殺害。至於宮中那些婦女們——爲特向她們加以紀念，在這裏亦略一提及——有許多的俱落入賊兵手中。其餘的一些則逃奔她們的親族。但是後來大部分都又爲滿人所追回。至於說宮中許多女基督教徒俱得逃脫，已在本書他處會略事報告的。

現在我們再返回敘述闖賊佔據北京後北京底恐怖時日。南城被太監出賣之次日，即四月二十五日，李賊大羣，數近三十萬——這個數目至少是曾經湯若望舉示過的——侵入北城，據湯若

望在其他地方的說明，悉係由城牆三個破口而入，或者也是因爲人們又給他們把城門敞開了。李賊立即奔入宮殿中，意欲將皇帝捕獲。可是當在他未能搜獲皇帝時，他就允許給與能洩漏皇帝在何處的人們一筆很高的報酬。因爲當時還沒有一個人知道，皇帝是已經死了的。他的屍體是一個月以後纔經侵入北京的滿人之所發現。他的屍體被滿人很光榮的殯葬於明陵，而一切中國底官吏無論願與不願俱不得不爲死者哭泣服喪。這樣被中國人民所鄙視爲「無理性之禽獸」的滿洲人，對於皇帝底名位所表示的敬意，較之中國人却高尚的多了，深厚的多了（九）。

李賊底匪軍一進城時即行闖入民宅，逢人斫殺，直至匪首由城門上與城牆上大聲呼禁告諭，大屠殺方得停止。

耶穌會址因貼近西城南門，所以便是首先被棄置於侵入匪敵底淫威之中的。所有的傳教士中僅湯若望一人留於會所之中。其他的兩位傳教士——湯若望底意思大概是指中國北部傳教會副總會長傅汎濟和已上年紀的龍華民地說的了——俱已乘時離開這危險地帶。北京傳教會會長龍華民亦曾勸湯若望同行逃避。但是他却寧願死守他的教友，亦不肯他往（一〇）。

湯若望命會所中僕人都到教堂中去，並且在這裏聽候天命底安排。可是他們並未受到攪擾。及至人們聽到了賊頭喊叫停止屠殺的聲音時，人們就把會所底門敞開了。這些新人物之中有不少的走進會內，並且很稀奇地到處瞧望着，可是他們並不是要白進來的，然而他們也不過僅止是拿走了一條絨氈子，並且連這一條絨氈子，也是經人們允許後，纔拿走的。次日會所門口忽然掛有牌示一方，上書勿擾湯若望的命令。雖然人們很努力查訪，但是終究不能確定這牌示是什麼人所掛的。強盜們——這是湯若望對於盜魁李自成底軍隊的稱呼——連以客入底資格也不敢到會所內居住的。可是此外北京的居民對於他們的生命還很長久沒有把握。凡衣服穿得略好一點的，就要被逮捕，並且一經逮捕，便要受酷刑拷打，爲的是要向他迫索錢財。這樣簡直無人行街了。

三天之後，有下級官吏三人出現於湯若望底住所。他們說，他們是奉二王爺底命令來領他到他那裏去的。湯若望怕是要有最惡劣的事實發生。因爲這些赫胥們在當時這些時日，多半都好賣他們的上司，他們把他們上司底財寶所埋藏的地方，向闖賊報告，但是官吏中之第三人却走了過來，確確切切地說，他們來引他並無惡意，實在是一種光榮的召請。當在湯若望走至宮殿前時，一羣

這樣揭發告密，天良喪盡的人們，拍手歡迎，並且大聲喊叫着說：「這裏大法師來了！」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他也被人揭發爲藏有大財寶的人的。但是當時情形的發展却極順利，並不似人們所想像的那麼惡劣。在第一個室間內湯若望瞧見許多高級官員，正在受刑拷問。他們很哀痛悲憫地向他瞧了一眼，意在表示同樣命運也在等待着他了。「但是慈悲的上帝却使逆賊對他改變心腸。」他一見湯若望來到，登時就把屋內正在獻技之女優女伶驅至屋外，向湯若望張臂迎接，並且很和霽地把他引至室內。然後他就以茶酒款待他，並且留他晚餐。但是湯若望請求，準他於夜前返回教堂，以免夜間不得不同壞人宿於教會之外。當在那些告密的人們瞧見他受恭敬，就氣憤了起來，並且用牙咬住他們的手指，這是一個人在中國氣憤極頂時，所常有的一種現象。自是日起竟無一個攪擾的人敢登湯若望之門了，除掉被他當作賓客所邀請的幾個賊匪頭目（一一）。

在這一個恐怖時期裡，湯若望尤其所操心的，是奉教的婦女。各教友底家中，他都一一親臨，施以迫切勸告，不令女教友自殺，像那些不奉教的婦女屢屢之所作的一般。可是一切的女基督教徒俱未遭受恥辱。在耶穌會臨近的一所宅第中，有女教友四十四位，其中有不少很年輕的。湯若望每

次聽到馬蹄響聲出現於該方面時，他就立即禱告上帝保護那一羣婦女們。當在有一次賊兵數名欲侵入那座宅第中時，他們就瞧見門旁立有兩位手執帶有結節的木棒的青年二人，揚手作欲打擊之狀。可是另一次，幾位賊兵竟然侵入宅第中，女教友們都逃至宅內瑪利亞小教堂中躲避，並且跪於地上禱告。侵進來的幾位賊兵搜索及於一切室間。只是這座小教堂却脫漏了他們的眼目，他們很驚奇，這麼大一座宅第中，竟尋不到一位婦女。及至幾位盜兵要駐紮在這座宅子裡時，他們就瞧見門口掛有牌示：此宅已被佔據，禁止閒人入內！

可是暫時盜魁之登極仍未能實現。欽天監之官吏固然登時亦把新皇帝之名姓登入，已經完成並已分發各省的次年黃曆之中。而正式登極之日當然亦被他們所擇定。闖賊接受黃曆，但却願延期舉行登極大典。關於這延期的原因，當時却有種種離奇的傳言。人們說他每次要登御座時，他就感到頭痛與四肢沉重，而不得不自寶座上滑至地下。猴子似的，他蹲踞在大殿底地下。「爲這樣一位土皇帝，這樣的一個地下寶座纔是合適的。」這是湯若望對於他所作的毒讖的言詞。不過所謂頭疼之說，却難相信。他八成是要先鞏固他的統治權，以便一登大寶，即可不致不得不恥辱地再

行降下。

因爲在雄踞海岸與萬里長城末端之間，而爲自北京向東去之出兵大道的山海關，尙駐紮有官軍總兵吳三桂，他所統帶的大軍，悉係精銳善戰之兵將。當在他聞到北京陷落的消息時，他就自位置在萬里長城那邊的寧遠，向首都近處進軍，但在山海關，他却止兵不前，嚴陣以待。他爲什麼不乘時奔救北京與皇室？他爲什麼後來竟以滿洲之臣屬追遜明室末後偏安的皇帝，至死爲止？這種原因都是我們所不能知道的，這一個人底心理，我們無從推究，然而他的軍事的能幹却是毫無可疑的。至於說確定他對於君王的行動底動因，不是忠義，不是愛國心，這一點似乎很是實情。八成支配着他的性靈的主要成分，是貪求尊榮的心理，其次也就是不見得高尚的個人動機。（一二）

李賊所懼怕的對頭就是這位吳三桂，他必須先克服了這位對頭，然後纔能登極的。因此他就留充分軍隊於北京，以便繼續搜掠。他本人却帶二十萬自己的軍隊和投降的官兵向東出發。

吳三桂覺得自己的兵力單弱，因此他就向滿洲求救，滿人本來久已就願罷兵與中國修好，他們只求交還經能幹的吳總兵給他們所奪去的遼東，並准許滿人自由與中國通商，他們便可發兵，

協助剿平逆賊軍事。因此滿人與吳三桂之間即行成立條約，而滿人亦即立行招集軍隊。李賊於其他人質之中，亦曾將吳三桂之親父携至軍中，據說李賊令人們在陣前向他加以酷刑，以便逼迫爲兒子的吳三桂投降。滿人底戰鬥力短時間內即已招集充足，遂於五月底在山海關之前部佈陣，作一重大衝殺。滿人之騎兵竟將闖賊之騎兵陣擊破衝散，而直追至北京城下。其他滿兵大隊與吳軍聯合，衝擊闖賊之步隊，擊殺竟至十萬之衆。

匪頭李自成首先逃回北京。他登時奔入大殿，穿戴皇帝冠服，忽遽之中，列仗登極，受百官朝拜。但是他却也又立即自寶座上退下。他過於膽怯，不敢死守這非常堅固的城池，同在這一日裡，他還帶領他的主要步隊逃奔陝西。他留後隊三千人於城中，下令焚燒洗劫宮殿與全城。因爲這一部分軍隊覺得軍力過於薄弱，所以他們又向闖王請求增援。但是李賊所繼續增派的三千援軍却被滿兵在城門前悉行殲滅擊殺。滿人追逐逃匪僅數日之久，然後他們因軍力不足，懼後防單弱，所以就又奔回北京，而在城外駐守四日。

可是闖賊所遺留之三千匪兵，竟在城內窺留約一星期之久。城內流氓匪徒亦竟與之結合，其

勢益張。家境略佳之住戶俱皆逃避一空。許多的人們，尤其婦女，悉行自殺。三千強盜奉李賊的命令，本來是要特行洗劫宮中底財寶的。他們每一人於退出北京時，馬上須馱有值五百兩銀（一三）之物品或錢財。這是他們完全照令施行了的。然而，他們所馱走的數目仍還不及宮中財寶百分之二十五，其餘公家底庫藏幾乎都尙未動。除此之外，他們於漸次逃脫時，還拖走其他珍貴物品。這是在他們之前那些主力部隊已經作過了。人們後來在由北京一直到畿輔邊界的道路上，這是有十日行程遠的道路的，處處都瞧見被逃賊所拋棄的綢緞與珍貴的衣衫，數目之巨，簡直蓋滿道路，然而在西安府闖賊的僞朝中，仍還發現由北京搶去的巨量財寶。

正在他們大搜劫的進行中，李賊的另一個命令，也竟見諸施行，就是焚燒宮殿與全城。他們依次首先焚燒宮中大殿，繼續焚燒各城門，連帶建築奇麗，而層層疊疊的城樓，再就是貴人高官之府邸與市民之住宅。他們還用了些火藥以增加他們這破壞工作之威勢。宮中朝拜大殿，就是前面已經描寫過的那座壯麗建築物，倒塌時的響聲，湯若望會確切地在他住室內耳聞。

正在這一恐怖星期時間內，湯若望對於他的基督教友們，血誠赤熱地盡他的守護之責。在他

的腦中，不懼怕不縮的精神和善察形勢的聰明力，互相爲表裏，更佐以對於天主安排的信仰力。有幾位留於後防的盜賊，基督教徒和士大夫，嘗試着勸他當在全城尙未成了一片火焰之前逃走。但是他仍決斷留在城中，並且當在人們很體面地，然而却是很猛烈地要把他引走時，他就加以反對了。因爲他是不肯和強盜與叛徒有所交涉的。

當他的一位僕人由街上返回時，就有三個賊兵一齊擠了進來。他很和霽地請他們走開，他們也竟聽了他的話，而果然走開。另一次有幾位賊兵把前廳底牆壁鑿破，他向他們申斥說：「唉！誰侵入生人底宅內，誰就不是軍人，就是一個強盜。你們還要在我這裏給我留這個紀念麼？」因此他們就趕快轉身，又從他們來時的路溜了。教會周圍的一切房屋，都被火所燃燒。爲使火焰遠離教會底屋舍，他特將在祭壇上祝聖過的聖牌聖像投至房上。所有的僕役除二人外俱已逃逸。湯若望把一切屋門俱皆封鎖，然後就同這兩位僕人到教堂內，向天主祈禱，靜俟天主之安排。

耶穌會會所附近有幾位因火焰不能上街的人們，從一個小旁門走入耶穌會會所中，其中有一人咽喉中矢，還有一人一隻臂腕被擊碎。湯若望令他們進入會所，並且把受傷者的傷口裹纏起

來。他怕四周的鄰居們有施行自殺的，因此他就特向那些尙未焚毀的房屋中，特作一次巡視，在一所房屋之中，他瞧見全家男子與婦女悉行懸吊於屋樑之上。有兩人，他還能施以救助，並且把他們收留在他的館舍裡。

燒殺的賊兵由城牆上察見，惟獨傳教會尙未焚燒，因此他們就向傳教會內燃放火球，並向其他的匪兵傳呼，燃燒「天主底教堂。」從街上扔入教會內之火把，竟有七次。可是這些火把皆自行息滅，雖然院內熱度很高，這是因為城門焚燒熱風吹過來的原因，而其熱度之高，簡直使人不能在屋內忍受。燃燒着的與燒焦的木塊到處向下飛落。院中樹木花葉悉行脫落，焦枯於溫熱的空氣之中。會所大門口樹枝一捆，內裹乾草，被人所點着，但是突然一陣風吹來，將這引火的柴捆早吹至五十步以外，飛入一偶像廟宇中，因之竟將廟宇焚毀。

在一所鄰接的宅子中，湯若望曾賃有房間，房間之中有兩間專爲儲藏印刷天算書籍木版之用。一間側室獨獨焚毀，彷彿用刀子把他切下的一般。火焰已撲至那乾枯木版上，但是一字並未焚毀。湯若望在這一件事情上，隱隱見出上天底一種警示。因為他心裡早已就決斷以後要放棄歷書

與天算的工作，專心致志從事於傳教事務的。可是現在一聽見這一種神奇的事跡，他竟又改變了他的宗旨。

在耶穌會會所後面有一所一半有人居住的房屋。這所房屋底一部分是他早就願購買了過來的。恰切他要購買的這一部分竟未被火所焚燒。在次日夜間恰巧到處俱已人散，各各歸眠。這時突有一聲非常可怕的響震搖動屋瓦。因為旁邊城牆上所存火藥，經火所燃，突然爆炸的原故。房上房下，院中街巷，俱爲飛礮飛土所落滿。如果這爆炸早發生半點鐘，那麼街巷上便有許多人會受傷或被炸死的。

教會中的僕役漸次俱已返回。會所房屋殘破之處，這時亦嘗試着修補。然而有一天城內匪徒突然出現於會所之前，外邊的大門已經被他們用鐵鑿所鑿開。侵入的人們已經立在二門之前，其他的匪徒攀登房頂，用長槍和木棍向下攻打。這時湯若望騎士家世好勇樂戰的血統又在他的心中燃燒了起來。他手執倭刀一把，氣勢凶凶地立於二門之後。及至攀登房頂的匪徒瞧見了他這位有這樣大鬍鬚的勇敢人——「我這鬍鬚已經就足夠嚇退他們的了」，這是湯若望憤恨的談話。

言詞——他們竟致喪胆，不敢再行攻打。他們向湯若望請求原諒，並且說他們是來搜捕強盜的，可是因爲屋內既沒有強盜，他們就要告辭了。這一幫匪徒底領袖爲弟兄二人，數月前他們曾來借錢，但是湯若望分文亦未曾給與的。（二四）

當在滿兵向賊軍略事追逐，卽行返回，而於北京城外駐紮四天之後，他們的頭目，卽此時尙在滿洲居住的幼齡滿主底叔父，探聽北京城內人民底意向，並且問它們是否願投降。這時北京城內的人民當然都只有一個志願，就是立卽擺脫燒殺的匪軍。這樣這位狡猾的滿人，竟敢以他姪子底名義佔據了空虛的中國皇位。六月七日他由城外進入半已焚毀之帝都。城內的人民在例常的形式中，口內喊着萬歲，萬歲，萬萬歲，以歡迎他們的新主子。至於說事情竟會這樣發展，竟會使滿人這樣便宜，這樣無衝突地獲得了中國底統治權，這自然是無人會想得到的。

可是北京底居民僅能有一夜晚的時間，回思已受的恐怖與痛苦，和夢想將來的幸福時日的，因爲第二天天一亮，就又有惡運臨頭了，滿人底新政府發下命令，三天之內北城漢人住戶須一律遷出。南城有的是空餘地方，北城應爲滿人保留。

連湯若望亦是應當遵令遷出北城的。但是他很敏捷地決斷與行動。他登時就令人們給他寫妥一張呈遞政府的稟帖。稟帖大意說他是一位歐洲人，自多年以來即在城中居住。又說他是一位宣揚天主之道的教士，有教堂一所，此外尚有許多聖書神像，和全部為盡他的職務所需要的設備。這一切的物件在三天之內是決不能完全搬出的。況且他還保存有為印刷改良曆法書籍所用的刻板一大批。這些刻板一經搬移，必致損傷破毀。因為他是一位由遠道而來，人地生疏的外邦人，如同滿人一般，所以他請求容許他仍住北城。

湯若望身著中國平民服裝，手持稟帖親自到宮殿底大廳中去，在這裏是新組織的內閣會議的地方。他在那裏瞧見一大羣手執類似稟帖的市民跪地呈遞，湯若望也向那人堆中一齊跪下。可是其他的人們都被衛兵用皮鞭與棍子逐出，獨對於他，他們却並未加以驅逐。甚至閣議中那些地位崇高的先生們，竟有一位姓范的（一五），反而令他走至前邊，接過他的稟帖，閱讀之後，就向他作關於教堂和他的天算工作的問訊。然後他就放他出來，並且命他次日早晨再來聽候批覆。

兩位士人登時被派赴湯若望住所，以便實地查看，是否與他稟帖中的言詞相符。這二位士人

底回報非常順利。因此當湯若望次日又到閣議前時，士人中的一人就由衣袋中取出公文一件，向他宣讀，宣讀後又把公文交付湯若望收存，公文內容是准許湯若望仍住北城，並且皇帝向下令一切滿人不許向他攪擾。皇帝這最高諭令，數日後，還要向他的房前另行貼示的。在湯若望帶着這件公文，回到他的住所時，他發現屋內已經滿室滿人，正在從事家庭佈置，他們一聽見湯若望返回，登時就要下手把他再逐出。可是他們一聽見湯若望底公文，就不得不至急地又都搬走了。連教會在墓地上的房舍田園，這是已竟經他們奪走了的，和城內教士們底其他房產，均都更得幸免，這都是多虧各官廳底特別照管，而於各該處所俱皆貼佈告示的緣故了。及至後來清丈地畝局（*Vermessungsbureau*）得以聞知，因錯誤將教會之地畝估去一塊時，官方就把一塊加倍大的地畝向教會賠補。教會在繞首都四周的產業這時竟增加了四倍上去。這樣湯若望在恐怖時日，在城內的勇敢停留堅持，竟獲得了燦爛優異的勝利。在危急的時期他救了北京底傳教會，不但未使牠得以滅亡，反而更鞏固了牠的存在。（一六）

耶穌會址在恐怖時日的數週間，所受的物質損失，因湯若望決斷果敢地維護，所以並不甚大。

一六四四年六月十五日他向朝廷報告，教堂和瑪利亞小教堂，約近三千卷的歐洲書籍，以及爲印刷中國書籍所用之刻板，一律得以救出，而未受有絲毫損傷（一七）。受有損傷的，則爲天算儀器，因此湯若望在七月二十五日又向政府呈請，准其複製新儀器（一八）。然而這却是欽天監所受的損失，而與教會無干了。

湯若望在這滿洲新統治者之下繼續的經歷，俟稍後再行敘述。我們對於北京和中國全國底政治進展，暫先作一觀察。

十月十九日滿洲幼齡皇帝由韃子城南部之中央城門，在重大的慶典之下進入北京。陰曆十月一日，即西曆十月三十日，滿人定北京爲滿清之首都與帝都。

皇帝是於一六四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去世的滿帝崇德之第九子，係於是年十月八日經親王會議選定之承繼大統者（一九）。他的名字爲福臨。他的年號爲順治，即順天而治的意思。他生於一六三八年三月十五日，這時他到中國作皇帝纔剛七歲。兩位一等親王，一爲鄭親王濟爾哈朗，一爲睿親王多爾袞，在選定皇帝時即已被封爲攝政者。在繼續的時間裡，我們只是常聞這第二

位攝政親王底名字，他是這幼齡皇帝所稱之爲阿瑪王（Amang）的，阿瑪王即「父王」之意。在教會底報告中，他只是在這個名字之下爲人所知。他是順治十四位伯叔中第二位最年幼的，然而却是最聰明與最果敢的，因此皇帝本應歸他作，然而他却不肯自爲，竟把這帝位讓出。在這一點上，我們就又獲得了一個實證，滿人爲國家底利益怎樣肯犧牲個人底私利。多爾袞是滿清帝國實際上底創立者。這時滿廷所有尙須急需進行的工作，即征服中國各省，多爾袞都與吳三桂相結合，竟將這工作上的主要部分，一直作到了底。不過這還是他死後，又經過數十年之久纔得徹底成功，把國內一切敵人毫無遺地悉行消滅征服。

反叛皇帝李自成既而也竟惡運臨頭，而獲得他應得的凶殘下場。因爲他曾下令，把吳三桂全家斬首，所以吳三桂以不共戴天之仇死恨追擊他這位對頭。山海關戰勝之後，吳被多爾袞封爲平西王。他現在獲得以西安府爲省城的陝西省爲封土。李自成因受他的和滿人底追擊，竟越河南而逃往湖北，他於一六四五年，顯然未經人所識出，而被農民擊斃。

滿人現在最有力之敵人，却是明朝殘餘的黨派了。假使這黨派能擁護僅只一位能幹的明室

之族人時，那他們就會把這侵進來的滿人，再摒之國外的。但是人們毫無主意，時而推戴這位，時而推戴那位的明王，而滿人這時却在一致的堅決的指揮之下，節節向南進展。至於敘述明室各有權嗣位者之命運如何，這却不是本書底任務了（二〇）。明室最末後年號永曆之偏安皇帝，是在傳教史中很著名的。他的后妃們和他的太子都是基督教徒。皇后赫烈納（Helena）和第一位大臣兼軍事總指揮亞基樓·龐天壽（Achilleus Pan）曾向教廷和歐洲教民馳書求援。假使永曆僅只有中人材幹，那末明室江山底恢復，即可在他手下成功的。滿人方面情勢很長久的時間極不順利。兩位福建海盜首領，就是當時以基督教徒揚名海上與歐洲的鄭芝龍和他的兒子鄭成功，這鄭成功是被葡人所稱之爲國姓爺（Coxinga）的，以明室之同盟和以獨力謀承皇位者之資格，頗與滿人作出不少麻煩。這二人底名字在本書下面還有多次的提及，我們對於他們的事跡暫時擱開，不更加敘述。吳三桂以真正的狂怒追逐明朝最末後之皇帝，並且當在這位皇帝逃至緬甸時，他竟要求緬甸把他交出。吳三桂並於一六六二年下令絞殺這位不幸的君主，和奉教而聖名公斯當定（Konstantin）的太子，然而根據其他的記載，永曆則係自殺而死（二一）。這位皇帝底奉教后妃們

都被送至北京，以俘虜而被囚禁於教會近處的一所住宅中。湯若望是不許訪問她們的。然而可以用一位中間人，向她們施以安慰。

滿清之第三位敵人，即張獻忠，很迅速地被克服。我們尤其也可以說，他是把他自己解決了的。但是我們對於他，却應與以更多的注意，較比他實際上之所堪當的程度，以便能得以瞭解，湯若望生涯中後來之糾紛。

在明朝末後皇帝之下，在中國中部數省大肆劫掠騷動，並且到處和官軍作戰之後，這位賊首於一六四四年之開始，竄入四川省中，這四川省是他完全都征服了的。四川省城成都，他定為他政府底所在地。

成都自數年以來，已經是一個傳教總站了。這個傳教總站的創立者是利類思神甫 (P. Ludovig Buglio)，他是於一六四〇年五月一日到這個僻遠地方來傳教的。第一位傳教士 (1111) 一六四二年安文思神甫 (P. Gabriel de Magalhães) 繼續到成都傳教，這時僧道迫害幸而已成過去，並且教會業已極有希望逐漸發展。可是賊魁竟突然竄入省中。人們傳說他非常令人可怕地

凶狠殘暴。所以這裏這兩位教士底逃避，自然是很合理的了。這兩位傳教士逃至一位交誼深厚的高級官吏別墅中，暫且棲身，別墅距城有兩日的路程。

一六四四年九月五日張獻忠入成都，僭號大西國皇帝，並且完全以北京之朝儀爲模範。因爲他也確係有些作國王的才智，所以他也竟會曉得賺騙與牢籠各官吏。成都城內的這兩位傳教士當時本欲逃往南京，但是一切道路俱被李自成與張獻忠二賊底軍隊之所截塞。所以他們就不得不更向山中逃避了。

張賊底一位官員，就是他的禮部尙書，令他的主子注意山中這兩位歐洲人。張獻忠差人攜帶禮品，到山中尋找他們二人，同時他還允許，於他的統治權在成都鞏固後，還要給他們修蓋大教堂一所。他們二人開始時托故加以拒絕，但是並無效果。這樣他們就投入了虎穴中去。因爲他們並不是很深知他的殘暴的心性，所以他們這一步的決斷，我們不可以深罪他們的。張獻忠予他們以「天學國師」(二三)的尊銜，這差不多就是國家天算學士之意，還給他們朝衣朝服，並且每月俸銀十兩。他們雖然加以拒絕，但是終究不得不屈服。在他們作錯了這第一步，雖然尙屬情有可原的舉動

之後，他們竟是把他們自己交付與這位暴君之手了。一開頭他們受到他很尊崇的待遇。張賊對於他們也寬洪大方。在朝中議會時，上千與宴的官員之中，他們獲得他們直接位於閣老之次的地位。因為他們原來的教會已經被焚毀，張賊便把城中央一處住所撥給他們居住。他們從事於天文儀器之製造，已經有八個月之久；他們所製造的儀器中，有天體儀一，地球儀一，其體量之大，二人不能合抱。賊帝張獻忠爲他們這工作，以他自己所具有的那種口才和言詞底力量，向他們加以崇高的褒獎，並且予以豐富的賞賜，竟使他們得以向貧民散捨許多卹金。

可是這個人却漸次把他禽獸一般的野性，俱都一一顯露了出來。對於這兩位教士，他總還能力持鎮定，除掉幾次暴怒的表示之外，譬如有一次，他們未能將羅雅谷與湯若望底書籍及早呈進。至於說，中國方面對於張獻忠凶惡殘暴之記載，簡直令人不能相信（二四）；可是由這些記載中，我們得以識知，他所散佈的恐怖是多樣大了。卽此二位傳教士在他們的報告中對於他的敘述，我們覺得或許有些言詞過甚之處的。但是除掉這種言詞過甚之處，我們對於這二位當時目擊者之報告，總可視爲信史，張獻忠是世間最大醜惡人物之一，他的出現簡直是潰裂地球，使地球失去其神

聖性的（二五）。四川省城中僧道二千名，經他下令一律屠殺。就是在其他的地方也僅有少數僧道得以脫逃。據其他的記載，這位凶暴的人物所虐殺的士人竟達三萬餘名。一六四五年年底曾有打了一個敗仗的一支軍隊，他令全軍放下兵器，然後就下令屠殺全軍；據說，這被屠殺的全軍底數目竟達十四萬名。然而他身邊的侍衛，他却給以豐厚俸資，並且以假仁假義的勾當結他們的歡心，所以他們完全聽從他們的使命。一六四五年年底成都城內之居民，曾被他驅至城外，而悉行加以殺戮。有人說，這次所殺的人數為六十萬。河中沖流的血量多於水量，並且因那堆集成山的屍體，連船隻都不能開行了。許多的基督教徒和二位教士底僕人俱得以逃出這次大慘殺。張賊最愛施行剝皮與分裂肢體之慘酷刑罰。在他這大凶殺時，兩位傳教士仍無所畏懼的施行他們宗教的神事職務。

一六四六年張獻忠僭中國皇帝尊號，並且全軍出發，作征服全國之計劃，他首先的目的地便是陝西。他於大軍出發時，下令焚燒他的首成都。他又下令全軍須斬殺他們的妻兒家小，據說這也是他們都照辦了的，當在他自己先行作了此事，以資表率之後。據馮秉正神甫（Maille）之報

告，婦女無故遭此殺戮者爲數四十萬，其中有三百名爲張賊後宮婦女（二六）。在他們進軍途程上，兩位傳教士須宿歇於他的近處，並且每日要斬殺百人。他的千名以上的官員結集僅餘二十五人。傳教士當時請求放他們返回澳門。可是他們奉教的僕人竟被認爲是他們這一種計劃的煽動者，而遭殺戮；僕人中有六人受自首到腳剝皮之刑。現在連教士們亦不得不放棄他們的希望了。甚至斬殺他們的命令也已頒下。這時安文思却以天主之怒向他們恐嚇。這竟得以救了他們的性命。可是這位暴君還又向他們下了一次死刑的判決，因爲他猜疑，他們在製造天體儀時，故意弄出一種錯誤來，使他的國運不亨通。

一六四七年一月三日由前哨報來消息，有四位或五位敵騎走近營地。這是滿軍底探兵了。張賊武裝尚未披掛完畢，卽行上馬攜帶護從數人，向來者奔迎。來人中有一人向他突發一矢，直貫他的心臟。這樣這魔王竟陡然解決。

張賊底大軍登時俱皆逃散。傳教士亦向山中逃亡。可是他們終被滿兵追及，更兼身上受傷，而被送入滿營。他們的情勢頗爲危殆，因爲他們身披朝服，爲凶暴魔王之高級官吏。實際上滿兵亦是

要登時把他們的腦袋斬下的。一人已一手抓着了傳教士安文思底頭髮，其他一隻手已竟揮刃，意欲下擊。在這一瞬間一位軍官走了過來，喝令停刑。因為這位俘虜底鬚髮使他活躍地想起他在北京所認識的另一位生有這樣長鬚的人。他發問說：「你認識湯若望麼？」安文思聲音戰慄着回答：「是的，認識，他是我的老哥哥的。」這樣他們便得救了。他們把他們引至總司令前，這總司令是皇帝底皇兄，（譯者按：即肅親王 豪格，參照本書二四九頁。）他亦然是很認識湯若望的。他們現在在滿營中，反很和霽對待他們了。安文思在他向湯若望寫的一封信感謝的信中，竟突發下列的言詞：「哦，天神福佑的黃曆，我們的性命是多虧了你而纔得營救的。」（二七）

滿兵在西安府僅駐紮有兩月之久，當地城中與附近的基督教徒都來拜訪與安慰這兩位教士。他們欲返還成都的志願，却未能得以滿償。因為他們現在是軍事俘虜，而他們對這一點竟無所覺。一六四八年他們隨同滿軍自西安出發，而於二月二十二日到達北京。

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底歷史自是時起便與湯若望底歷史密切結合起來了。

第八章 滿廷攝政時期

在文化與政治方面滿人完全遷就中國固有的優越體統，但是他們所採取的方式，是不致危及他們的主權的。這佔據中國土者向被征服的中國人民，只要求改着滿洲服裝，尤其須改變頭上之髮飾，即頭前部毛髮薙光，後部拖長辮。順從這薙髮令的漢人，滿人即認其為有同等權利。我們現在對於湯若望不得不認定，他的腦後也是有着一條辮子懸垂了。因為當時給他所畫的一些影像上，他都是穿着辮子服裝，並且頭上戴着那頂特殊的滿人官帽。滿人對於不抵抗而投降的漢人城市，俱不施以劫掠。可是那些反抗作戰的城市，被他們重重施以懲治。

滿人是一種武裝民族，所有人民皆能作戰。他們是把有戰鬥力的人民編為八旗的，八旗各以一種顏色為標幟。在較大城市之中，所有戰士，皆特闢有其駐防營地，並且一經號召，即可登時出發。滿洲旗幟之下，尚隸屬有蒙人八旗與漢人八旗（二）。朝中各較高之官缺皆係以二人掌管，即一滿

人和一漢人。滿人自然不能不略佔優勢，而主要工作，則皆歸漢人擔任了。

因此閣臣會議的樞密機關即當時之內院，就不得不大加擴充了。據畢嘉（Gralia）和聶仲遷（Grealon）二人底敘述（二），這內院是由七位滿洲閣老和七位漢人閣老，此外還由數位聰哲老練的官員和翰林院學士數位之所組成，翰林與練達官吏底任務，尤其是檢查奏摺和管理筆墨事項，畢聶二人之敘述，固然僅限於一六六〇年開始之情況，但是這個時期以前以後並無多大變動的。

舊日行政組織上，現在又增加了一種新的組織，這種組織是我們在歐洲可以稱之為御前大會議（Der Grosse Kronrat）的，而當時在中國則稱之為大朝（Ta-chao）。這種大會議之召集純粹在完全稀少的情形中，以便解決國家非常重大事件。參與這個會議的人員們為皇室近支王公，王公是分為四等的，此外即其他滿洲頭目，內院之各位大臣和六部尚書，有時也有其他崇敬之人物。

新皇室自然亦引用漢人視皇帝為上天之子的觀念。這樣，數十年之後，漢人對於這外來之土

地侵略者已經幾乎不視爲異族了。

滿人入北京之最初六年間，攝政王多爾袞爲中國實際上之統治者。但是順治皇帝之名義，却嚴格地扶持。一切表章奏疏均直接向皇帝呈遞。批答表章奏疏與頒發諭令皆以皇帝之名義行之。

在上文我們已經知道，湯若望怎樣得以成功，救護北城之耶穌會會址。在學術底促進上，新朝廷亦是不要落於明朝之後的。按照儒教的觀念，如果新朝底政治能和諧，而與大自然底律則相吻合時，則新朝即可立於鞏固堅定之基礎上。假使這一種和諧合一的情形，能毫無錯誤地得爲一切將來時期開展，那這統治權便不會失去了。因此滿洲朝廷亦是要爲他們的目的，以利用西方來的這位科學知識優越的學者的。並且因爲這些滿洲新人物，雖然仍繼續中國底傳統，但却不要爲傳統底奴隸，所以他們就能把一種在先朝決不能辦得到的位置昇與湯若望。

湯若望那一次趨朝，獲得安然佔領傳教房屋之允准後，約數星期，欽天監中國官吏便向前擠了來，向攝政王呈進按照新情勢已改製的曆書。攝政王問：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曆書，他們回答：是流行的中國黃曆。這時他們就又得到了很不寵幸的答言：「這種舛錯百出的曆書，這上面的報告預測，

既不能上合天象，亦不能下應地事，是要不得的。一位名湯若望的歐洲人曾製有較佳曆書，這一種曆書是應當行用的。你們從速把這個人喚來。」這樣這黨子天算人員就走了出來，但是他們却並未施行他的命令。

次日早晨內院使差官到湯若望底住所，引他到御殿城，並且當着聚集在那裏的欽天監官員，被很光榮地導入內院。可是一直到這時，湯若望還不知道召請他的原因的。內院大臣向湯若望詢問治曆工作的狀況，湯若望回答，差不多一切全已就緒，就在這七月裡他還能把次年，就是一六四五年的曆書完成起來。可是因為其他治曆人員們特別推荐他們的曆書，所以湯若望就請求內院關於這個問題延至次日再行決斷。乘這一點時間，湯若望就急忙把他的對頭們所製的曆書加以檢查，而確定其中七大錯誤。他的對頭們在次日不得不具結劃押，承認他們的錯誤，內院在具結的文件上加蓋關防，交付湯若望。這其他的一幫人們神情非常沮喪，因為他們怕要喪失他們欽天監裡的位置。他們繼續在湯若望底曆書上吹毛求疵地作的挑剔，和他們自己的請求，俱歸無效。一六四五年，即順治二年之曆書終歸湯若望制作，並且於付印之前呈政府加以鑒定。湯若望於八月十

日向政府送呈六張地圖和三件儀器——渾天儀，鍍銀太陽象限儀，和望遠鏡——附帶論這三件儀器施用法之文件一之後，又於一六四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呈遞已完成的民間曆書之範本一冊。八月二十三日皇帝降諭旨，讚揚湯若望為全國各大城市所作天算之神奇的準確，但是亦曾指摘缺點數條。因為瀋陽應稱盛京，並且還指摘字行過於窄密，其字體過小。(三)

湯若望新天算所獲得的還有一個其他為全國所知曉的勝利，就是一六四四年九月一日日食之預測。

七月二十五日湯若望進呈他的以圖表所說明的測算(四)。中國與回回二學派方面亦皆有同樣舉動。湯若望把全國各大城市在這一日所見的日食時刻，全部計算了出來。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全國對於一次將臨的日食，預先所得到的確測。朝廷自然是不肯遺漏，把這件事實特別表彰了出來，並且還以其他推崇的評語，加於湯若望底測算之上，此外政府還特將湯若望底測算和其他兩種測算，向各部衙門與國民衆一併公佈。湯若望又向政府請示，在日食之日應以何處為測驗之所。八月三十日湯若望奉到批示，兩位閣臣即馮大人與李大人，將以皇帝之諭旨，赴觀象台觀察

日食。屆時連湯若望和他的門徒亦應一律赴觀象台指導一切。(五)大多數的官員按照舊例，皆得不到禮部，跪於地上，「以便禱助太陽戰勝仇敵的惡魔。」即內院對於這滿清統治下之第一次日食亦皆作觀察。這實在是一個偉大的時刻的。(六)

在觀象台上，湯若望底弟子向三位大臣作所需要的解釋。湯若望這些弟子中的一位用望遠鏡將日食底過程完全畫於紙上。回回科之測算，錯誤一小時，然而中國方面關於太陽所食之平面，竟有一半之錯誤。僅湯若望之歐洲測算法，一切俱皆準確，而無絲毫錯誤。二位樞密大人無不驚歎佩服。他們二人中的一人竟登時執筆，把所觀察的結果記述了出來。同在這一日裡，他們還把一切所見的情形，都向皇帝奏復(七)。次日馮大人送呈他的正式的報告。他對於歐洲之科學予以至崇高，在中國所能思及的讚揚，在他這讚揚裡他曾引用孟子裡的古典語句：「在每一種關係中皆盡美盡善。」九月七日皇帝詔諭，以同樣的言詞加以讚揚(八)。最後於九月十一日湯若望亦自作報告向朝中呈遞，措詞十分謹嚴謙恭。(九)

由各省分之中亦是有與湯若望底測算至順利的報告到達北京。在這一種印象之下，皇帝便

命令一切天算學者向湯若望從學。皇帝也委托他以限制天算學者與天算見習人員底數目的任務。湯若望底對頭們這時都爲他們收入豐富的位置憂懼，所以反而竟向他跪地求恩了。一直到這時欽天監正式執役月支政府俸銀之員生爲八十名，此外尚有百名以上之備補人員，他們僅由管理機關月支糧米，而無俸銀。可是這些人數之中頗有不少尸位素餐，而一無所能者，湯若望把他們漸次都予以淘汰，然而因他性格的仁厚，仍還保留官額七十名，以及與此數相等之備補人員（二〇）。在繼續的時間裡，這個數目仍尚經過幾次略多略少的變動。

在這一六四四年將近年底，皇帝還作了最後的一步決斷。就是他詔封湯若望爲欽天監監正。這詔封是應由禮部發表的。然而禮部却把這詔諭擱置了起來，未曾予以立即奉行，因爲一則欽天監底人員們懼怕湯若望嚴厲無私，一則禮部深恐隸屬於他們之下的監正行動過於獨立，不受他們的節制。及至湯若望向皇帝呈報來年，即一六四五年，二月十日月食之測算時（一一），皇帝始發現湯若望名姓上並無欽天監監正之銜號。禮部受到皇帝底嚴斥，並獲得命令，速將任命湯若望爲欽天監監正的詔詔發表，不許再行延誤。皇帝又下特旨，准許新監正在欽天監內，作適合目的之變

勳與整理（二）。

現在湯若望纔得聞知皇帝對於他的這優異待遇。可是他以他的全力抗辭疏拒，因為他的整個志願都在直接傳教的工作上，而現在這個職務，他一接受，便是把自己束縛在一種世俗的事務上了。他援引他充當教士時所發下的誓願，這誓願是不准他接受公家職責與官銜的。雖然這一種禁誡幾乎與他眼前這情勢無關，或至少可得教會方面特別予以解除的，然而無論如何，他仍要拒絕，因為一充當欽天監監正，就不得不把他的品級也從外面服裝上章號上都一一頂帶了出來。他向朝廷遞一情詞迫切的辭謝奏疏，以他充當傳教士的誓願和他力有所不逮的情形為理由，請皇帝收回成命。這一種堅辭的奏疏在繼續的時間裡，他曾向皇帝連上七次。但是俱皆枉然，皇帝一概不予俞允。甚至皇帝對於他的抗辭還表示不滿。從友好方面有人向他暗示，以為這種行動是滿人之所不能容忍的。連傳教會會長傅汎濟亦向他加以勸進。因為他怕人們對於湯若望底辭謝，將要誤解為對於舊朝的忠心表示，因此他就多次向湯若望函示，須要接受這個官職，連帶這官職上一切義務與銜號，無須再多事拒絕（一三）。

湯若望服從傳教會長傅汎濟底命令。但是他仍還向朝廷奏明幾種困難之點。因為欽天監正之職務，是需要在一定的時日，有時甚至在早晨最早的時刻，就得隨同各王公大臣上朝覲見，並且為辦理欽天監各事務起見，還須宿歇於觀象台旁之辦公室中。這是與他傳教職務有防礙，而不能並行不悖的，因為他是傳教士，每日早晨皆須作彌撒神事，況且一日之內皆有一定時刻須作祈禱日課，個人底行動很不能自由。因此皇帝特頒詔免除湯若望朝役之勞，而准許他在私人住宅中辦理欽天監事務，並藉中間人向朝廷傳達他的意見。此外還有一個困難問題須待解決，就是薪俸問題。中國官吏月俸之支給，半為銀兩，半為白米，皆係於每月初，經戶部發給各官吏。湯若望不願領受一種這樣的俸祿，這自然是出於他良心的顧慮的，因為他總覺得，為他的這工作是不能要求中國國家底報酬的。這個困難問題的解決，却就很簡單，而又很光榮了，皇帝下令，每日由宮中為湯若望備食二次，完全以上賓之禮待遇他（一四）。

所以照這樣看，湯若望竟是背反着他自己底意志，而成了一位中國朝廷上的官吏了。他的品級並不很高。中國官吏底品級分為九等，每等皆含有正從二種分別，湯若望底品級屬於五等中之

正品（一五）。以前他本來是以數理天算的著作家，數理天算的教授和技術的專門家，供職於中國底朝廷上的，此外他還以私家學者底資格，從事於曆書之製造，而他的這方面的工作亦並未完全爲中國朝廷方面之所採用，可是他現在却是這全盤天算事務的正式導率人員了。不過，名義上他雖爲欽天監監正，然而他還是沒有行政上裁奪之權的，這一種權限爲直轄欽天監的機關，卽禮部之所保留，禮部根據監正之提議，任用懲罰，或革除欽天監之人員。至關於欽天監之組織，監正底職務以及困難的曆書問題，就是從教會方面說，湯若望是否可以製出那一種乍一見似覺含有迷信成分的不無可議的曆書的問題，俟稍後在本書再另章詳細敘述。

我們可以預先猜想而知的，當然是中國本國欽天監人員，現在以他們的全力對於湯若望這位歐洲人和他的科學又開始的攻擊了。如同在明末他們所提起的那屢次的，不值識者一笑的，孩子一般的指責彈劾，他們現在又從新提起了，他們說他不把正當的學識教授他的學生們，以便可以責斥他們，他們又說，人們沒有法子可以使他滿意，因爲他自前者以來，對於他們都懷有意見。很惡劣的，是禮部中一位長官，竟偏袒這些反對的人員，誣譏他傲慢無禮，且有受納賄賂情事。他又硬

說，湯若望並未奉有充當欽天監監正的命令，在禮部底文卷中，並沒有這一件公文。全盤的案件竟致鬧到內閣會議（一六）裡去。當在審理這個案件時，湯若望立在空院中陽光之下，竟致遭頭疾，三日未曾得痊愈。幸而審理這案件的主席，是從前會幫助過他救出耶穌會的范（Gib）大人。經過長久的搜尋之後，任命湯若望爲欽天監監正的文件，在禮部底文庫中，終究得以搜出。因而湯若望得以完全證明無罪。范大人把這事件底始末完全奏明朝廷，朝廷敕令所有此次一切攻訐彈劾的人員，悉行跪於內閣前，自行承認其過失。禮部全體高貴大員參事以及其他一位長官，都親到湯若望住宅中慰問賠罪。這麼一來，欽天監所有一切搗亂份子，竟一舉而俱被革除，遺缺多半都以基督教徒補充。在這件事情上，湯若望又瞧出，是上天神意之安排了。這攻訐人員中有一位全家皆染遭時疫悉行死去。可是他們都是基督教徒。湯若望不念舊惡特到他家中，爲他們備辦臨終神事。可是他也被這時疫所傳染，然而不久即又痊愈。禮部那位仇視他的長官，曾因探望他的家鄉返回山東，竟被他莊田上的農民所擊殺，而他的那些兒子之中有一位剛考中進士，就被充軍韃靼。

湯若望在欽天監裡獲得他的屬員們的親信。他維護他們不受朝中的影響，他不拘禮節，令他

們隨時都可以入見，並且還把舊日新任人員須把第一年薪俸交付監正作爲報酬的陋習，俱皆革除。因爲在朝中一切高級位置上，滿洲官員底勢力都是優越於漢人的，所以在欽天監的滿洲人們，依然是表出過度的傲慢不馴的情形，所以竟使全監中發生了不滿與紊亂的情事。湯若望把全盤情事報告給禮部，但是禮部亦是不願過問這樣的事情，生怕燒着自己手指，因此就又把這事件轉請朝廷處治，而暗中希望朝廷必將袒護滿人以反對歐人。可是朝廷却完全立於湯若望一方面，判決過失者受肉體之刑罰，並向禮部罰鍰，因爲禮部把這樣無用的人員給予了湯若望（二七）。

滿人對於天算科學懷有極崇高之敬意。因此他們就視這一種科學之代表學者湯若望爲一優越傑出之人物。他們相信，因爲他能這樣熟知天空現象，所以他也必定確切能知塵世上一切事體的。他們對於天算學和天算學之代表學者之重視推崇，是還帶上面已經提過的迷信基礎色彩的。他們以爲在他們政治底開始，曆法既能得以澈底改良，那他們的國家便會永久存在了（二八）。這樣人們便可曉然，滿人中地位至高之人物，爲什麼要認識湯若望，要同他結以友誼的來往了。因此他就得以澈底認識了滿人之性格，並且很驚奇他們受教育之能力和武勇的戰鬥能力。一

開頭他就明白，這一些人們將來必要戰勝明室的。我們得以聽之耳內的，尤其是一位簡直毫無顧慮的嚴俊有德的親王，他曾多次拜訪湯若望，向湯若望述說他的民族以往時代的傳說與歷史（一九）。這個人就是代善，爲努爾哈赤之長子，所以便是當時皇帝底大伯，爲各親王中之首位親王。努爾哈赤死後，他情願讓位給他一位幼弟。當在連他這一位幼弟，就是崇德皇帝也死去之後，他又和他的八位兒子退避不爭王位。皇室和國家的安寧，是他視爲高出一切的重要的。比及他的兒子之中有一位怨恨不服，因爲在大絕的承繼上把他漏脫，所以作父親的代善竟親自舉發他這位兒子底大逆不道，並親臨刑庭以法官底資格贊成判處他這位兒子底死刑。如同加洵（Case，譯者按：此係羅馬古代一位鐵面無私的嚴峻人物）一般，他決不動容地當場瞧着，人們怎樣用大錘子裂殺他的兒子。他的一位冒失的，袒護他這位兄弟的女兒，他令人們把一個金環，懸掛她的鼻端。湯若望曾多次親眼瞧見了帶着這個鼻飾的郡主（二〇）。

在那些年間裡，高麗國王也同湯若望結友誼。他一直到滿人佔據北京後，都是以俘虜的身分處於滿廷的，這時竟被滿人釋放，而也來到了中國首都。他有幾次親自向湯若望作一友誼之拜訪，

並且也獲得了湯若望底崇拜。他帶到北京來的人物中有高麗天算家，意欲令他們在北京繼續求天算學識，在這一方面湯若望盡力幫助了他們。五內感銘的高麗國王，以種種禮物贈送他的這位朋友，以爲報酬之資。

湯若望把他手下所有一切宗教與科學內容的中文書籍，都呈遞給這一位在中國文學上，亦受有相當教育的國王，此外還贈送給他一架天球儀和一幅基督聖像。高麗王親手寫了一封致謝的函件，這函件經湯若望完全譯入了歐洲文字。這封信中會說，基督聖像是他給湯若望再送了回來的，因爲基督教在高麗無人知曉，怕容易發生向這聖像，作出錯誤褻瀆的崇拜的危險。這不過僅是一種謙虛的言詞，並非真要把這聖像退了回來的，因爲當湯若望果真要把這聖像取回時，他們却很願收留這幅聖像了。湯若望又向這位國王的一位已經領洗的太監，授基督教底教義課程的細目。國王也很願攜帶一位傳教士回高麗去。這當然是使基督信仰傳入高麗的唯一的一個機會了；因爲人們怕高麗國馬上就要施行海禁，外人就難得入境了。湯若望枉然地費了一陣子力氣，要獲得一位到高麗去的傳教士，因爲傳教會會長未經得有駐澳門的教務視查員底同意，決不

肯專擅行動的。可是高麗國王既而動身返國，他眼中含淚向湯若望作別。及至數年後，一位方濟各會和一位耶穌會的傳教士，請求入高麗的准許時，竟被拒絕，高麗已經對外封鎖，施行海禁，一直到最近的時代方得開禁的（二二）。

攝政時期將近結局，湯若望保護滿清之國朝免除一種重大之內部搖動。阿瑪王（Amurba）掌握政權忠實睿哲已有多年。對於他深覺感銘的皇帝，令人們給他立一體積龐大的大理石紀功碑一座，碑重四萬磅，碑下龜座重七萬磅，湯若望以他所新製的機器，把這兩塊巨大的石頭，毫不費力的運至樹立地點，並且樹立起來（二三）。但是這富貴的狀況，竟改變了這位能幹的攝政者底心腸。或許連建立這一座紀功碑的計劃，也是出於他自己的頭腦的。他這時竟要圖謀國家最高權位，大有自爲皇帝的心思了。皇帝底皇兄肅親王豪格，剛自征平暴賊張獻忠之戰役凱旋而歸，深爲攝政王之所嫉視，竟致促他至於滅亡。因爲他甚至要把他監禁了起來。這位青年的滿人因對於此事之憤懣竟至自殺。至於說阿瑪王於肅親王自殺後，霸佔了這一位姪子底妻妾的舉動，却是爲全國之所憤慨非難的一件事情了（二四）。他自行建築美麗宮殿一座，服皇帝之服裝，自稱爲「皇父與

國父」(Vater des Kaisers und des Vaterlandes)，並且以自己底名義下詔諭。冲齡的皇帝已經開始爲自己的生命憂懼操心起來了(二四)。

攝政王相信他的這種貪求虛榮的計劃，最好的實現方法，就是如果他建造一座新的，只是爲朝廷與朝臣所規定的城堡，而把皇帝當作一個俘囚遷移其中，尤其因爲他覺得，皇帝雖幼弱，然而他所透出的智略，已超越人們在他這年齡裡所能期待的程度了。爲建築這一種新城闕，國庫中一切錢財俱被搜掘，而更行添徵新賦新稅，匠人與工人成千成萬被強制從事服役。這時爲滿洲的統治却是一個極危險的時期了。然而爲明室在當時的情形却係非常順利的。因爲這時山西底總司令官背叛滿清，宣言歸順明廷。

至於說山西怎樣會到了反正地步，在這裏可以作一簡短報告(二五)。因爲滿廷欲愈加密切攏絡蒙古人，所以青年的皇帝是應當娶一位蒙古王公之女兒作后妃的。爲此順治皇帝底一位叔父，卽八王阿濟格(Ajige)，於一六四九年協帶一大批人員赴蒙古行聘。他們走到大同城內時，這大同城向來是以婦女美麗著名的，他的這批隨員們就作出種種重大狂暴行動。他們搶劫民間婦

女，甚至其中有一位正是在吉日迎娶過門的時期被搶劫的。這樣一種未之前聞的罪惡，是人們認為不能不予以懲治報復的。當地軍隊的總司令官，同這位八王素常有仇隙，竟完全站在了叛變的人民底一方面。甚至蒙古人亦是表同情於叛變的人民底方面的。因有這一種情形，更加上因施行新賦稅所招惹民間底怨恨，就很容易發生北京和其他省分底人民將羣起而叛變的危險了。

可是竟沒有一個人敢向攝政王勸阻他這一種愚狂行動的，湯若望竟敢決斷，向這一位權威崇高的人物進勸，使他改變意向。他當然不能公開地向攝政王陳說，人民對於他這計劃怎樣思想，因此他就不得不藉他的職權範圍，以為進言的地步了。在他的一本奏疏中，他指陳因天象與各地方不順利的情形，應即停止新城闕之建築工事。（二六）一開頭攝政王甚覺憤怒，因為滿朝中惟獨他這一個人來反對他。但是有人却使他注意，湯若望這奏疏並未逾越他的權限，這是他完全盡職責的言詞。如果人們不相信他的言詞時，那麼他將來決不要再進言了。因此攝政王就很躊躇了起來。翌日早晨，他特召湯若望面見，向他細詢，並深以他的這種行動為然。於是建築工事方得停止，而一切工人登時俱被釋放。就在這一日內，工部還自京外弄來工人七百名，俱皆鐵鎖所繫。他們現在

很自由地自湯若望底房前走過，並且俱皆五內感銘跪倒於地，叩頭稱謝。一位與湯若望厚交的閣老，湯若望在他的自傳中會說，「他的胸前也有一部長鬚飄颻，這是中國人們所少有的一種情形的。」公然在大街上作了一次感謝湯若望底演說。

攝政王現在默察當時情勢，而作勢有所不能不作的事件了。就是他帶領一切滿軍與漢軍向山西出發，征服當地反正人民。湯若望選擇作戰能用的大礮，並製造礮架，以供軍用。這是一件很能呼醒軍官之間的興奮狂熱的事件。阿瑪王此行竟得成功，又把蒙古人拉到他的那邊來，而將山西反正的人民平服（二七）。然後他又親入蒙古，對爲皇帝選定之皇后，迎接至北京。

到了這時，攝政王在世時日已經有限了。因爲他返回北京後不久，即一六五〇年年底竟而死去，八成是因打獵時跌傷致死的（二八）。他的一位皇兄嘗試着替代他的位置，繼續攝政，但附和人數過少，因而便被逮捕，在他殿宇底火災中喪失性命（二九）。順治這時還未完全滿十三歲，竟於一六五一年二月一日臨朝，親攬統治大權。

正在這個時期，湯若望完成了建築術上一件偉大工事，對於這件工事，當時的人們都非常驚

奇稱道的（三〇）。

湯若望仗恃他在朝中的威望，竟敢冒險在天子首都內一條繁盛大街上，並重要城門之旁，建造公衆教堂一座。一直到這時，教會內教民祈禱都是在一座外面瞧不出來任何特徵的聖堂內舉行，這在當時中國全國都是一樣的情形。現在却要蓋一座真正的，如同歐洲教堂一般的教堂了。當時所有的空場與建築材料，亦足敷用，因為漢人已經都一律遷出北城，而北城更因經闖賊焚燒，又無漢人居住，無人管理，所以大部分都還是些廢墟荒地。湯若望向朝廷請求禁城與曆局之間的一塊空地，以爲起造教堂地基，在這裏本來是有三座房屋的，其中的一座便是我們在上面曾提及被火所焚毀的那座廟院，他更以廉價購買到處所亂堆積着的建築材料。他並不事前向該管之禮部請求准許，因爲他知道，禮部一經他請求，決定會給他提起種種阻難的，竟於一六五〇年春季開始工事。這個教堂底建築圖樣，當然是他自己之所繪畫。並且監工的工頭也是他自己充當的。皇帝和他在親王之中與朝中偉大人物之中的友朋，捐助款項給他。可是基督教徒們連分文錢財都未曾捐助的，這是他有一次向他的朋友穆尼各（Smogunlecki）乘機所抱怨的言詞（三一）；但是

他這言詞，我們自然不可太認真地相信。

這座教堂是按照當時歐洲所盛行的纖縵瑰奇建築式樣（Barockstil）所修蓋的，全部地基作十字形。長度八十尺，寬度四十五尺（三二）。教堂內都藉立柱之行列，把教堂之頂格闢為三部，各部皆發圈，作窟窿形，有若三隻下覆之船身。其中間頂格之末端作圓閣狀，高出全部教堂，圓閣上更繪種種聖像。中部頂格兩邊之頂格為一塊一塊方板所張蓋。教堂正面門額上，用拉丁文大字母簡書救世主名字 IHU 三字，四周更以神光彩飾。教堂高出昆連房屋之上三十餘埃勒，很遠處即能望見。

教堂內築祭壇五座。正中大祭壇上供奉救世主大聖像，周圍為天使與曲膝跪地上之宗徒所圍繞，救世主一手托地球，一手伸出作降福狀。正壇左面即光榮的方面，設聖母瑪利亞祭壇，壇上供奉聖母瑪利亞大教堂（Maria Maggiore）內所供奉施乃（Sohne）所製聖母慈悲大聖像之複本（三三）。右面祭壇上供奉彌協爾（St. Michael）大天使和其他天使。立柱之間設依格納爵和方濟各·沙勿略祭壇（Ignatius und Franz-Xaver-Altar）。各祭壇前方皆以欄杆圍繞。

教堂內部之地上，密以精細四方石塊鋪墊成各種花樣，其上更鋪設地毯。

教堂內牆上裝飾，既美觀而又有益。因為在牆上一律皆掛鍍金方牌，上面或繪或寫教義中之主要部分，譬如基督和聖母之一生事跡，天使之歷史，天主之戒條，真福八端，慈悲善行，等等情形。

這座大教堂之旁，又建立一座小教堂，專供婦女會聚學習教義之用。

教堂前空院一所，作正方形，寬長各百尺，上鋪石板，使教堂直接與大街相連接。如果由大街方面，向教堂內走來，便先走上一個段層的台階，穿過一座由磚石所築成的發圈的大門，達到空場上，由空場中間可以步入一個闊有三座門的白色大理石凱旋坊，而最後便走到教堂前所修蓋的上部有天棚遮蓋的遊廊，在這遊廊等候作神事的信徒們，可以自由立坐，暫避風雨與太陽。從這裏可以由三座門內，進入聖堂之內部。

教堂前部這種種點綴，是在後繼的年數裡纔逐漸添築的，譬如大理石凱旋坊是於一六五二年建築的，而臨街發圈的大門建築時期還要在後。大理石牌坊朝着教堂的一方面上，湯若望令匠人雕刻種種象徵的圖像，在這圖像之中，有一幅是雕刻到天國去的道路的圖像。許多的紀念牌碑

和題銘，在繼續的時間裡，樹立在教堂底這全院中，或雕刻在碑坊上。即教堂內部之裝飾亦是後來纔得以完成的。但是在一六五〇年全堂之建築從大致上說已算完竣，一篇湯若望所作的拉丁與漢文底建堂碑記，被刻在大門額上一塊大理石上，中文底原文儘量忠實地翻譯應如下文（譯者按：原文見黃伯祿正教奉褒。）

「自昔西漢時，有宗徒聖多默者，初入中國傳

天主正教。次則唐貞觀以後，有大秦國西士數人，入中國傳教。又次明嘉靖時，聖方濟各入中國傳教，至萬曆時西士利瑪竇等，先後接踵入中國傳教，譯有經典，著有書籍，傳衍至今。荷蒙

清朝特用西法，定造時憲新歷，頒行歷務，告竣。謹於

都城宣武門內（三四）虔建

天主新堂，昭明正教。時

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五十年爲

大清順治七年歲次庚寅（三五）

修政歷法湯若望記（三六）

較近的傳教學者或許能認為運用歐西建築式樣與歐西繪畫裝飾於中國內地，是與就會適合中國文化狀況的宗旨不合的，因此應視之為缺點了。爲使這一些人們得到滿意，我們已得有確證，這座教堂之建築是亦充分地適合了中國建築式樣的。因爲劉松齡神甫 (P. von Hallerstein) 於一七四三年十一月一日曾於一封寄歐洲的信件中寫下下列言詞：「湯若望神甫按照中國底式樣建築了一座玲瓏偉大而便利的教堂。徐日昇 (Thomas Pereyra) 和閔明我 (Grimaldi) 二位傳教士給予了這座教堂以歐洲底形式」(三七)。然而至於說，這所謂「中國式樣」所給予湯若望所建立的這座教堂的是什麼，這是我們所不知道的了。不過我們也無須假定徐日昇和閔明我，是不得不把這座教堂，加以大規模的改建，纔能給予了牠一個歐洲的形式的。這兩位傳教士在這座教堂底兩邊，也按照着歐洲底模範建築了兩座高塔。在一座高塔中，安置大風琴一架，在其它一座高塔中，安設一架時鐘，並懸掛大小不等叩鐘數個，所擊出之鐘樂爲一中國之樂調(三八)。教堂與教堂之前院又添繪了許多聖像與銘語。

在教堂建築藝術中，這一種歐洲文化成分，決定不會惹起任何一個中國人底厭惡仇視的人。

們在這上頭，尤其認為是中國藝術上的一種擴增。一直到後來，人們對於這種羅可可（Roकोko，即綺麗瑰奇之意）建築式樣仍還感到興奮與趣味。因此我們便可假定，一切中國人們皆係誠實地瞻仰與驚奇湯若望所蓋的這一座教堂，這一座國內表現歐西建築藝術的首創的建築物，而心理上並不引起其它附帶作用。這一種特殊建築體裁，也竟能把基督教上完全的特殊情形，弄到了一種顯着的表現地步。

至于關於這座建築物對於環境的印象怎樣，有一位方濟各會傳教士栗安堂（P. Antonio de Santa Maria）於十年之後，曾記有下列言詞：「這座建築物使北京一切居民都驚奇不止，他們都是成羣結隊，潮水似地湧了來，專為瞻仰這座教堂」（三九）。就連耶穌會傳教士們，潘國光（Brancaidi）（四〇）和南懷仁（Verheest）二人俱不自制他們關於這座教堂的讚美言詞。南懷仁甚至說，連羅瑪亦無須以這座教堂為羞恥，而可以安然把牠列入牠那些至絢爛華麗的建築物中去（四一）。

湯若望在新朝廷之下，於短時期之內竟也成了一位全國皆知的名人了。全中國各處無不知

他對於改良曆法底功勞。他在親王與體面人物之中的友朋們。如果以總督或總兵底身分。出京赴各省履任時。都是五內感銘地紀念着他。湯若望有如此勢力。是根據他的欽天監。監正官銜。他的勢力是偉大的。謹提出湯若望三字。人就服從起來。

山西絳州之教堂被毀。傳教士們。其中有傅汎濟。不得不逃避。因湯若望底交涉。朝廷竟於一六四六年向當地總督下令。賠償全部損失。並為購置一所新的更好的房屋。傅汎濟在他於一六四七年一月寫給湯若望的一封信中會說：「我們大家。就是你的各耶穌會會士們。都是很安全地憩息於你的蔭影之下」(四二)。

我們由上文已經知道。僅只湯若望底名姓。亦足可救了利類思神甫 (Bretio) 與安文思神甫 (Magalhães) 底性命。及至滿洲軍隊緊接着進佔西安府時。滿軍中之軍官多有拜訪該處教會內之教士的。仇視的人們會在城內。到處暗自黏貼誣釀揭帖。意在挑撥滿人仇視教會。但滿軍總司令官因顧念他的朋友湯若望。竟傳令總督出示保護基督教。這些誣釀教會的人們經官府逮捕。押送教士前跪地求恕(四三)。

一六五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傳教士潘國光由上海寄呈耶穌會總會長加拉法 (Carsten) 的一封信中曾說：「除了天主福祐之多，就是人們向傳教士湯若望神甫所表示的好感了，他使我們大家到處蒙惠受賜，在旅途上，在城市中，以及在與官員的來往中」(四四)。並且他還報告了一個實地上的例證出來。因為江南省淮安縣教堂在傳教士畢方濟 (Sambiasi) 一六四九年一月去世時，竟被軍隊所佔據，湯若望向總督寫了一封請託的信件，總督登時便令軍隊退出，把教堂交回傳教士。

一六五〇年傳教會副會長陽瑪諾在一封信裡會寫：「我們簡直是有上百個湯若望的，簡直是到處都有一個的，因為雖然隔離的路程遙遠，然而他仍能很有效地幫助我們，我們只用說一聲，我們和他是同志，是弟兄，那麼連一個低聲說一句反對我們的話的人們都沒有了。」他報告一件他親身所經歷的事情，當在他所居住的那延平 (Yehning) 城內，教堂中一切僕人俱須登記於賦役冊籍中時，他竟因援據他的同志湯若望，而得使他的僕人免除差徭賦役(四五)。

在中國，尤其有一人是從心內銘感湯若望的，就是滿洲底這位沖齡皇帝，因為他是使這位沖

湯若望傳

齡皇帝，得以保存他的皇位，甚至或許是救了他的性命的。

#24
361240

36124



湯若望傳

第二冊

魏特著
楊丙辰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湯 若 望 傳

第 二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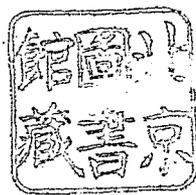
魏 特 著
楊 丙 辰 譯

商務印書館
發行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第九章 「尙父」和他的皇帝學子

一六五一年二月一日順治實際臨朝親政之始，也便是湯若望生涯中最重要時期之開始了。他在這一年正值五十九歲。按照我們的見解，這已經是一個人底末年高齡了。然而在當時傳教士們——他們都是強健的——却並不見得是這樣的。湯若望這時已經到了他工作底極點。他不僅只管理欽天監一監底事務，這事務把他一個人底精神時間完全佔了去的。他尤其覺得他最當先的是傳教士，不能把傳教職務棄置一邊。再加上因社交所加到他身上來的種種俗情俗務，更使他忙上加忙了，譬如許多高貴人物底接見招待，這些人物們都是要把西方這位學識高深的人列入他們友朋底行列中的，所以便頻來投刺通謁，然而這却劫奪了他的時間了。他的這些友好人物之中最尊貴的一位，要算沖齡皇帝了。在這一點上，當然不能吝惜時間的。最後使湯若望尙有不能不耗喪心神的，就是在那些年中爲曆法和爲他的好名聲所不得不作的些鬥爭。



在湯若望這位傳教士和順治皇帝之間的友誼關係，這關係我們在這裏特首先加以注意提示的，却是在中國歷史上一種絕無僅有的特殊情形，甚至人們在歷史中要尋到一種類似的情形，也還是很費事，而不易尋得的哩。

當順治皇帝臨朝親政時，尚未完全滿十三歲，所以還完全是一個稚童；他一直到駕崩時，都還沒有超出青春年齡。吾人試思，他僅是荒原裡的一位會長底苗裔，一個剛有受到文化機會的氏族底統治者。他固然有許多優良性質資稟，絕無可疑地聰明英俊，甚至可以說是夙慧的，早熟的。他的天性固然仁厚寬宏，很能聽受他人底忠告，然而也更容易受惡勢力底影響。對於正義與公道的感覺，他天生具有一批巨量（一）。我們更應特別高尙視之的，是他有一天，曾在明朝末後皇帝之墓前，跪地禮敬，而下令於這位不幸的皇帝之墓前，樹立墓碑一座（二）。

但是順治底性格上，也有許多缺點，這在他這幼稚年齡裡，當然不足為怪的。他在運動上，竟能把一切國家大事與義務都忘掉。遊獵是他一種非常大的嗜好。在馬正飛馳的時刻，他能以箭射中任何一種禽獸。如果規勸的人不在他身旁時，他是毫無顧慮地這樣度日的。他心內會忽然想起一

種狂妄計劃，而以一種青年人們底固執心腸，堅決施行，如果沒有一位警告的人，乘時剛強地加以諫止時。一件小小的事情已經足夠激起他的暴怒來，竟致使他的舉動如同一位發瘋發狂的人一般了。最後他還是迷信的，和一切滿洲人一個樣，而肉感肉慾的性癖尤其特別發達。

吾人向這位童子皇帝底位置裡試一設想吧。他是世間最大國家權威無限的一位主子。全國最高官吏在他的眼前，俱皆塵埃拜伏，神天一般敬畏。

一個有這樣權威，這樣性格的青年，自然能會作出極令人可怕的禍害的。因為誰是敢來向這位火烈急暴的青年加以諫正的人呢？他略一暗示，就足夠把進諫者底性命毀滅了。當時朝中惟獨湯若望有這胆量和威望，他不避一切，敢向皇帝指示皇帝所應走的道路。

順治慣以「瑪法」(Ma-fa)二字稱呼湯若望。這兩個滿洲字在德文應譯作：Paterfürder (Vater) (譯者按在中文可譯作「尊父」，「貴叟」，或「師父」，「尊長」，「長老」，「師尊」，或「尚父」等字樣)，包括一位作兒子的，對於他的父親，一位作學生的，對於他的師傅的一切親愛敬畏。被這樣稱呼為父為師的湯若望，有時是很嚴厲的，但是幼齡的主君却並不見怪，而仍為二位

願聽命受教的學子。

一

順治以取消死去的攝政王底末後佈置與命令開始他的統治大權。人們對於多爾袞大規模弔祭之後，竟把屍首焚燬，而將遺灰揚散於各方向之風地中，以爲他所嘗試着要作的叛逆篡奪之懲罰（三）。順治御前頭幾次所開的各王公大臣的會議中（四），有一次他很感激地提及湯若望神甫，因爲他是使他注意到他的皇叔底專權跋扈，而並且曾預言他的皇叔底早死的。

湯若望利用這個順利的機會，向皇帝上兩封奏疏，促皇帝作兩種重要裁決。第一封奏疏是關於御殿城之重建，與內外城牆之修補。他的目的是要藉這兩批浩大工程，給那些在物價騰貴與飢饉影響之下的窮苦百姓供給些工作與工資的。他的這個提議，登時便邀得皇帝底嘉納施行。他的第二封奏疏是彈劾喇嘛僧徒過於強大的勢力的。在這一點上，這鬪爭却就困難的多了。滿人當時的宗教，是他們原來所信奉的薩滿教（Samanism）和他們所採取自周圍居住的蒙人信奉

的喇嘛教底一種混合宗教。皇帝身後是他的母后，母后因爲是蒙古人，從小信奉喇嘛教，所以對於喇嘛僧徒自來就懷有溺惑心理。國家這一種弊害，已經傳佈的很廣遠了。喇嘛底頭目竟令人們以肩抬昇，列國王儀仗以穿行城市。湯若望在他的奏疏中曾言，爲一位皇帝怎樣不合，來向民族這一種下賤的，未曾受過教育的成分表示親信。皇帝既不應當給他們修廟，亦不應給他們建塔，更不應相信他們用他們那微小的魔旂，能驅逐鬼怪與祛除災病。因爲喇嘛會以危詞聳動皇帝，謂皇帝如不表示服從，必將於是年八月駕崩，因此湯若望就反向皇帝預言，皇帝底統治久長與吉祥。皇帝聽從湯若望底這些見解，並且將湯若望底奏疏批呈他的母后閱覽。朝中一切當權的偉大人物，對於湯若望底這彈劾舉動，都表示感銘的謝意，因爲他們都是明知而不敢明言的。因此喇嘛廟宇之建築，這建築是已經消耗了大筆款項的，竟驟然中止。喇嘛僧徒暫時喪失了他們那宰治一切的勢力，因爲連禮部和內閣，也都是反對他們的（五）。

這是於一六五一年陰曆三月，陽曆四月至五月間，見之實行的一件事情。這件事實行之後不久，皇帝幾乎率領全部貴胄和朝臣，赴滿洲行獵。僅只親王數位與皇太后留守京都。可是在這期間

在北京却發生了一幕極優雅可慕的間插情事出來。

因爲有一天在湯若望底館舍中忽然有三位滿洲婦女蒞臨。她們聲言，她們是湯若望所認識的一位親王底眷屬。她們府邸中的郡主染患重病。郡主底母親不相信醫士，她願一聞湯若望底見解。按郡主病症底朕兆推斷，她的病症是不見得嚴重的。湯若望把一面聖牌交給了她們。他說，如果病者把這聖物掛在胸前，那她在四天之內便可病體痊愈。五天之後，這三位婦女們又都返回，拿出一大批錢財，和金線繡花的絲織物，作爲報酬湯若望之資。因爲郡主果然是在四天之內恢復了康健。數日之後，她們又送了些錢來，但是湯若望並不接受，因此她們就把所送來的錢捐助教會。又過數日，一蒙婦攜帶一使女，到湯若望底地方來，獻給他一宗更大的款項，作爲購買蜜蠟和其他作神事物品之用。這位蒙婦爲人很誠實，並且向湯若望，他是這時已經犯了猜思的，把真實的情形揭穿。她說，她的女主人，就是皇帝底母親，那位患病而又被湯若望治好了的郡主，就是皇帝底未婚妻（六）。大婚禮將要在九月間舉行，在這期間皇帝底未婚妻經皇太后照管育養。她又說，這位皇太后將來要以父執敬禮湯若望，並且要作他一切之所命令的。她願意湯若望以女兒看待她。湯若望

先表示了適當的謝意，並且就藉蒙婦傳達一個勸告給她，就是她可以不要再保證那些僧徒們了，因為她是皇太后與國母，以她的榜樣爲全國人民表率，態度不可不慎重，而對於那些僧徒們，凡是有理性學識的人，無不加以諷笑的。皇太后使人向湯若望傳達她的答復，她不能陡然擺脫掉了那些僧徒們，這是要漸次施行的，並且以後決不容許他們再行干與國家政事了。自是之後皇太后對於湯若望，便懷善意，無論那些喇嘛們多麼毒狠地再去誣釀他（七）。

這「父」與「女」在繼續的時間裡，彼此競以禮敬相崇尚。在皇帝舉行大婚典禮之日，就是在九月二十七日，湯若望不得不在宮廷之中，隨同羣王羣臣作整日之慶祝，這在他這一位六十歲的老人，竟能以終日支持，就頗不可等閒視之的了。大婚典禮之翌日，皇太后很和霽地使人問候他身體安否。一個星期之後，湯若望親趨宮廷，慶賀他這「義女」新近所獲上的尊號。因為他本來是奉旨免除一切朝役之勞的，所以他這次趨朝的祝賀，就被太后很感謝地，認爲是一種特別禮敬注意的表示了。皇太后特由臂腕上脫下金鐲兩隻，遣一宮女送賜湯若望，作爲他祝賀的報答。差來的宮女不容湯若望按照朝儀跪領皇太后底賞賜，因爲這是於義父對義女的身分有所不合的。在

這一時刻中，恰巧有湯若望底一位僕役走進屋內，向湯若望說要爲莊田買一頭耕牛的事情。宮女悄悄，毫不露神色地，把這件事情聽到了耳內。數日之後，她又到湯若望底宅舍中來，在她的身後帶來兩頭健壯耕牛，這是皇太后陛下賞賜給他的，並且還問他的安好。皇太后頗以爲異，爲什麼她的義父還在她的義女前，把這樣一件小的事情隱瞞不提。湯若望把兩面聖牌交宮女帶回，作爲返進敬禮，一面聖牌進呈皇后，一面聖牌進呈皇太后。這兩面聖牌是她們應當於外衣之下繫於頸項之上的，這在湯若望底原意不過要避免人們底注意。可是皇太后陛下却把這聖牌帶在外衣之上，因此她心中頗覺疑惑難安，這自然是湯若望很容易給解除的了。當在湯若望要在教堂前，建立一座大理石牌坊時，皇太后未經湯若望之請求，竟自動地捐助巨款，爲的也要在天主底神台前，建立功績，這是她親口所說的話。同時她使人送來許多蜜蠟，請湯若望爲她禱告，因爲她自十日以來即已患病，可是在她這請求湯若望禱告之次日，她竟得以霍然病愈（八）。

湯若望達到一切他所要作的事體。僧徒們底崇高女保護者，現在也離棄了他們，不再保護他們了。

這所敘述的，還僅只是些閒情逸致的瑣屑情事，在宮廷中，在城外皇帝打獵的苑囿中（乙），和在湯若望底館舍中所辦理的主要事務裡，瑪法（湯若望的尊號）和他的皇帝學子都是主要的主動腳色。他們的操心，他們的目的，都全在國家與人民底安寧，然而尤其關於皇帝底靈魂和基督教自由傳佈的問題。

二

那是非常有趣味的，如果我們讀到「皇帝學子」用何等親信對待他的父兄一般的愛護者湯若望，他怎樣敬重了他，並且怎樣嘗試着向他作他所喜歡的事體。第一次引這位傳教士覲見皇帝的，便是上面已經提及的那位很和藹的大學士范大人。

即在攝政時期，湯若望已獲有特權，在他關於天空與地面上之特殊過程的呈報中，加以自己之見解。此後他又獲有種種新優待的特許。一直到這時，朝中成例，凡屬各部院與欽天監之奏呈文件，都是在殿門口交與內官之手的。在次日一早，這些奏呈的事件便爲皇帝在閣議上之所論議裁

奪。欽天監監正關於十分重要的大自然現象，可以隨時按照尋常方式向朝廷奏呈他的報告。可是現在湯若望又獲得皇帝底特許，把他所作一切奏摺，在任何一個時間裡，無論皇帝是在什麼地方，譬如或在宴居的宮室裡，或在他的母后處，或在御花園中，或在遊獵的苑囿中，都可以親自呈交皇帝之手。當一六五一年十月初，他因皇帝賜號，親自趨朝謝恩時，皇帝竟向他諭免三跪九叩之禮。皇帝這一種特別優遇，除湯若望外，僅只為兩位大學士和四位部臣之所得享有（一〇）。使皇帝與人民隔離的中國舊朝儀之規定，在滿人入關之初，並未十分嚴格施行。而這朝儀之規定對於湯若望之在滿廷竟是完全免除了的。

皇帝所表示的這種親信，並不是盲目地贈送給他這一位客卿的。皇帝本來是一位教外的人，對於教士這種無家室的獨身生活，殊覺費解，難以置信。因此他就要把這一點完全查訪明白。他大概對於那些惡劣基督教徒們當時給湯若望所散佈的誣蔑誹謗言詞，也是有所聞知的。因此他一開頭時在白晝任何一個時刻裡，有時甚至在深夜，遣派三個或三個以上的體面內臣，並且每次都是另派人，很少兩次派同一的人們，到湯若望底住宅中，藉詞諮詢，然而實際上却是在暗自查究他

的私室行動的。如果他們夜間蒞臨時，他們一直到十一點，總是發現湯若望坐在書桌前，或讀或寫，而僕役等則在旁邊的室間內，鼾聲大作地酣睡。湯若望不得不親自給他們把門做開。這些黑夜來客在湯若望底住宅中，連一次也不會發現有什麼絲毫可指摘處。皇帝對於湯若望這毫無可非難的貞潔生涯得以確切訪明後，他纔選他為他的師友，為他的親信的顧問，並且盡可能的範圍滿償湯若望底志願（一一）。

這個情形底利益，竟給湯若望達到欽天監監務底日常管理裡去，和甚至展佈到重要性較減的事務上。如果直轄欽天監的禮部，把他的公文批上了一個「閱」字，換句話來說，就是置入文卷中之後，那麼他的出路就算是擺在眼前了，因為他就可以直接促請皇帝滿償他的志願了，而皇帝有時也竟撇開行文的手續，直接予以照准。關於湯若望工作的情形怎樣，明末和清初攝政時期欽天監之種種呈報，一經翻閱，便可得其真像，而尤其在順治皇帝之下，由這些文件中，我們對於這位監正多方面之工作，更可獲得一詳細之認識。因為政府是對於大小一切事件，都要得到詳細報知的。即便監中最細小的佈置設施，也是需要他們事先贊同的。

湯若望時常嘗試着改革欽天監之設施。他所最重視的，是監中人員之忠實奉職與優異工作，而所最疾恨的，便是任何一種繁文褥禮，機械套例。他對於全監人員之安全，亦是如同一位老父一般地操心照管。爲下級監員請求增加薪俸的上行公文，是我們在欽天監的卷牘中所能時常發現的。

一六五二年七月八日湯若望爲他欽天監底員生，請求膏火酬報。次年四月間他又作同樣的要求。六日之後，他又向禮部請求，給與監中人員加倍增高他們的薪俸。替代當時全部餉銀二百零八兩八錢四，湯若望要求增至四百一十七兩六錢八。由禮部之復文中，我們可以瞧出，當時監中每位職員月支餉米銀兩爲四斛四白米（一二），十五兩茶葉，五兩鹽；在銀兩方面，他們大家共總所支的數目爲十六兩四錢。

一六五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欽天監之奏報：五十四名員生已考試及格，他們家境貧寒，而食糧浩繁，爲此請求朝廷特予體恤，給與膏火資助。上諭照准（一三）。

一六五五年之奏報：觀象台上之四位觀測人員因工作過於繁重，竟至操勞過度。因此湯若望

建議，再行添置人員十六名，以便減輕各人員之工作，而免再有操勞過度之現象出現。禮部只允准添置人員八名，每名月領俸米六斗。可是因爲俸祿這樣低微，所以竟無一人應招充任此職。湯若望堅持他的建議，以爲非新添十六名觀測人員不可，並且除俸米之外，還要求每月每名給與俸銀一兩。禮部將此事之責任推謝於戶部。戶部允准湯若望底要求，而將俸米增加至七斗。不過到湯若望最後達到這個目的時，還是在這兩個國家機關之間，又費了許多的時間和來往爭執的文件。（一四）。

在這一個時機裡，禮部又因湯若望之請求，允准冬夜給與觀察人員羊皮大衣，以禦夜寒。他還多次要求，給與監中人員禦寒冬衣，他也要求發給煤炭，以便添置暖房爐火。譬如一六五九年二月間，湯若望呈禮部公事內會說，因冬日酷寒，室內無火，竟致工作人員四肢寒顫，擊齒成聲。因此湯若望請求，發給工作人員棉衣與煤火，尤其爲冬夜之工作。

一六五八年三月十六日湯若望向部中訴苦，以爲監中兩位監副，每月僅支俸銀三兩，其他主要人員，已不過月支俸銀二兩，而下級人員所得薪俸，實係一種飢饉薪俸，決不足以維持飽暖的。

一六五七年十月二日他要求添置木匠四名，門衛一名，信差一名，傳令勤務二名。到了次年他又表示深覺人員不敷應用之遺憾。因為當時監中現任人員僅只六十一名，而其中尚有六人係屬專為滿人作翻譯之用的。

湯若望對於全監人員，慈父一般地照管，我們可以再引一六五八年的一件事實為證。監中一位清苦人員，黃道隆（Huang Tao-lung），奉命赴琉球羣島工作。一種飢饉的俸祿經部中給他規定了。因湯若望之斡旋，他這俸祿又被增加。但是這人却因路途上種種缺乏，竟致死去，在他離陸航海之前，他的兒子是監中一位寒苦至極的天文生，無錢為他的父親作一堪當的殯葬儀式。湯若望竟違反着禮部底反抗，給他弄來一筆皇帝底恤款（一五）。

一六五六年一月十九日湯若望關於更香（一六）之製造有所警告：明末為製造更香是另關有製造處的。現在的更香質料惡劣，而香粒亦復大小不能一律，況且濕度又不相同。因此拿這作時間之計量，便是不可能的了。四年之後，湯若望對於這種資質惡劣的更香底怨詞，重復出現（一七）。一六五九年六月十八日湯若望令部中注意，他的辦公室間底惡劣建築狀況。處處俱已修繕。

一新，唯獨他的欽天監，並無人加以過問。關於這件事情又是弄到工部裡去解決的。工部議決修繕，修繕費銀六百兩（一八）。

我們現在尙收存有關於當時欽天監所用紙張的文件。一六六〇年三月十一日欽天監所用的紙張的帳目報部。監正指責部中所買紙張潮濕，質料遠遜堅厚的高麗紙。戶部對於湯若望這指責公文，批以「閱悉」二字。如有有統計樂趣者，那他便可以把常時欽天監底用費，根據這種種文件可以確切地計算了出來的。

監中大部分的報告與奏疏，自然都是關於較此重要的事件的，例如曆書問題，或大自然界中之非常現象，或教會與傳教士底問題。關於這一項問題是我們要在其他的篇章中另加敘述的，最後還有一些關於湯若望和皇帝個人的事件。在這樣一些上呈下行的一大組公文函札上，湯若望毫無興趣之可言。因此他雖然確切知道，他這一種官方的工作，是對於中國傳教會有至大的利益的，但他心裡時時總要動擺脫掉這個地位的欲望的，以便可以直接從事於傳教工作。然而對於他的一切的請求，皇帝所批示的答復都是不准。

最重要的奏疏悉屬關於皇帝個人的，這位皇帝這樣充滿了信仰與敬愛向他的這位「父師」仰視着。尤其是這一種個人的關係，令人這樣可欺服地感動我們。

在他們那時常會聚的時機裡，聰明的，求知若渴的皇帝學子，要求湯若望對於一切可能事件的解答，譬如日食與月食之學理，彗星或流星等問題，再就是物理的問題，和關於這一位或那一位官員的問題，或行政的問題，或欽天監下級生員有無進步的問題。湯若望尋常是按照東方習俗，交盤雙腿坐於皇帝旁邊的一個坐墊上的，因為把腿伸出，是人們視為失禮不敬的。有時因坐地時間過久，他的兩腿竟至麻木失覺，然後皇帝就親助他起立，支扶着他，一直等到喚進來的僕人攙扶他走到門口。在門口皇帝還在去者身後，良久站立目送。即便在國家大典朝會時，皇帝坐於寶座上，湯若望亦是不得不走上丹墀，直接坐於寶座之前的坐墊上的。甚至他曾多次被召入皇帝寢殿，常在皇帝晚間已躺在牀上，將要安息時，他命他的瑪法坐於他的牀底旁邊，湯若望便屈身向牀上和青年的皇帝談話（一九）。

有一次正值冬日，皇帝召湯若望攜帶一僕人至遊獵苑囿，爲的是要知道那一種爲人所極珍

視的琥珀油 (Bernsteinöl) (110) 是怎樣採製法。僕人一方面在工作着，皇帝和湯若望則翻閱書籍，以研究其製法。這樣他們差不多工作了兩天。皇帝還令人們把他的藥匣送來。他親手一包一包的秤出三百包，可以作三百粒用的藥量，交給內臣，一一地包入紙包，連帶藥方給與了湯若望。這三百丸藥粒價值三百都卡金幣 (Dukaten)，而難得的皇帝親手製造的價值，還完全除外。在嚴寒的冬夜，皇帝召湯若望到殿中時，都是令人們把他自己所用的貂皮褥子 (21)，給湯若望舖在地下爲坐墊。宮中樂隊奏樂，助皇帝與湯若望消磨長夜。皇帝很和藹地同這位謙恭端正的教會公僕，作竟夕之談。然而皇帝一得知，次日爲一基督教之祭日時，他就令他的客人們早歸，而且派人護送他們出宮直至家中的。

這位帝王有時也當着朝中官級最高的人物之前，把一種鞭韃敬客飲料，就是一種茶和牛乳的攪合物，用金杯盛着，自己先嘗飲一口之後，遞給他的這位敬仰的師友，請其飲喝。這是朝中對於國賓所能思及的最高禮敬了。爲使湯若望娛樂，他曾有一次令他的滿洲衛士們表演戰鬥，兩方面各列五百人，互相衝殺，作假擬征戰 (22)。

有一次朝中新築大殿舉行落成典禮之日，各王公大臣連湯若望，俱皆入朝參與典禮。自早晨最早時刻一直到下午四點鐘，皇帝留他的瑪法在宮中，並且很誠懇地把他心腹中的話告訴了他。當在開宴席的時候，他令湯若望同他享用一樣的酒食。可是這一日恰值教中齋戒，所以湯若望並不舉箸，飲食毫不入口。皇帝得知了這個原因，登時就令人由皇太后底寢宮中，取來魚與牛乳食品，給湯若望充飢。筵席之後，他又親自賞賜湯若望兩把他親手所繪畫，而按有皇帝御印的扇子，作為禮敬他的師友的表徵。一位高級官吏說，這兩把扇子是他覺得比二千兩銀子還貴重的多的（二三）。爲的是要瞭解皇帝這一切優異的待遇的價值，我們應當明白，這是自一位「天子」，就是自「世界最大的君主」之所頒下的。這種情形，我們幾乎不能設想得到。

如果湯若望在宮中，被皇帝留至夜深時，那麼他回家時，皇帝便命四位或六位青年貴胄，護送他到家。皇帝命他們小心，不要使他的乘馬驚怯，而將老人摔至地下。他們也是一樣清晨一早，引護他到皇帝遊獵的苑囿中去的，如果皇帝願意在那裏見他的瑪法時（二四）。

一種一直到當時，在中國歷史上未之前聞的尊敬，就是皇帝有時僅只爲數位侍童所扈從，有

時竟帶領一大批，爲數竟達六百名之屬駕騎兵，親臨湯若望住宅，訪問湯若望，屢從兵馬一方面在大街上圍護守候，一方面皇帝獨自同湯若望坐在室內，或穿房越屋，在宅內到處走動，或令湯若望進飲食，自己隨便取用。一六五六和一六五七兩年之間，皇帝竟有二十四次，臨訪湯若望於館舍之中，作較長之晤談。皇帝親臨民宅，這是非常稀少的事件，況且在這兩年之中，除臨訪湯若望之外，他僅有一次出宮拜訪一位皇叔於其府邸之中。他在湯若望館舍中的行動，完全和一位朋友到了他的朋友底家裡一般。有時他來時是先到教堂中去的，有時他並不令人通知，一直走入湯若望底住室中。他在湯若望底室間內，都是滿洲習俗，或坐於湯若望底牀鋪上，或坐於寫字桌前已經用過四十年而被用殘舊了的一張椅子上，或竟至坐在爲學生和低級人等所設備的椅凳上。在中國底習俗，凡屬皇帝臨幸一個地方，所坐用過的坐具，是要用一塊金黃色的布封蓋了起來，而無人便敢再向上頭坐了，甚至有些人們瞧見了室內有這樣被封蒙着的一個坐位時，就要跪地行禮的。湯若望曾有一次，使皇帝注意，室內坐具俱已封存，而無所餘剩了。但是皇帝答說：「那麼，瑪法，你也是這麼迷信的麼？你還管這些禮節麼？你要向什麼地方坐，就儘管坐下好了。」皇帝瞧見湯若望臥牀旁邊

置放着的一張禱告時所用的高長跪凳，他繼續着探問瑪法一日工作的程序，探問他的生活方式，探問他睡眠若干時，和他宗教上的日課。舍內一切暗陬角落，他都一一的搜尋到。在花園中他自樹上摘取果實——種種行動，無異一切其他少年（二五）。

有一次，皇帝在室內坐得過久了，他便說：「瑪法，我已經在這裏數點鐘了，你還沒有給我拿點什麼吃喝進來的。」湯若望請皇上原諒，並且說，因為他未曾得有皇上旨意，不敢胡亂進呈飲食。這樣皇帝便說，他至少願喝一口葡萄酒，酒是皇帝素常很少享用的。湯若望把陝西傳教會所製的紅酒給皇帝倒了一杯。皇帝略少一嘗，便把這杯酒遞給隨來的些顯貴人物們喝了。湯若望繼續着又把歐洲的酒，這是他於一六五六年自荷蘭公使處所獲得的贈品，給皇帝倒了一杯。皇帝喝了一口，但是登時又把這一口酒吐了出來，當他聽說這酒是由歐洲來的時，湯若望又給他倒一第三杯酒，這酒是由湯若望望屋前所種的葡萄之所釀成的。這二杯酒，皇帝完全飲乾。當在到了十月，葡萄成熟時，皇帝又臨幸湯若望望底住宅，同他所帶來的些貴顯人物們，摘取了那些葡萄吃。在這裏還可以要再一提的，就是皇帝為博瑪法之笑樂，曾令十八隻馴象，在教堂前，通達全北京的一條長街上，作賽

跑的遊戲，在象賽跑時，皇帝特別留心，深恐這些龐大動物偶一不慎把他的這位老友踏死於奔馳的笨重象蹄之下（二六）。

在一六五七年陰曆正月之最末日，就是西曆三月十四日，爲皇帝壽誕之前晚，（二七）皇帝會在湯若望室間中坐談甚久。這時在園中鐵匠們正在打鐵，皇帝決斷底說：「來，瑪法，我們現在要聽打鐵的聲音了。」工人們奉皇帝命令，繼續以鐵錘鎚擊那爐中燒紅了的鐵。錘擊之下，火星飛迸四射。皇帝不自覺地向後退避，他的一隻腳踏到了一塊蒙蓋着一個地溝的席子上面去。他竟一脚把這塊席子踏破，但同時却向旁面躲閃，竟致歪倒地上。這爲一個滿人在他壽誕之日的前晚，是要視爲一個不吉祥的預兆的。因此當場的一切人們俱皆錯愕驚恐。所以湯若望就向皇帝跪地請求，不要把這一點偶生的不幸，視爲一個惡劣的預兆。可是皇帝微笑着說：「這是人人都能發生的事體，無須在意。」

次日皇帝壽誕，湯若望和一切皇族貴戚文武官員以及王公貝勒都一律趨朝拜賀。可是皇帝並不管其餘的祝壽者，他宣佈他的意旨，要在瑪法家內過他的壽誕。他要這樣剷除了先一日在瑪

法館舍中因偶一不慎所作的那惡劣印象。湯若望急速奔回舍中，匆忙地令人們準備十三桌極頂豐富，羅列各種珍珠與果實的筵席，爲皇帝在大廳中獨設一筵，其餘的筵席擺設在前廳中，爲各王公大臣享用。可是這十二桌筵席，奉皇上底命令竟又移擺於大街之上。皇帝由湯若望底手中親自接受祝壽的酒杯，把杯中的酒飲乾。一切的人們都是大吃大喝非常歡樂（二八）。

政府公報時時都向全國報告，皇上怎樣敬重他的歐洲師友。這也是由京師赴各省上任的官吏們之所到處傳說的。這樣瑪法底姓名，便傳遍了全國，而爲一位聲望最隆重的人物。

在這裏我們還再報告一件最後的瑣事。有一天——就是在一六五三年或一六五四年裡的一日——皇帝坐在教會花園中一顆篠懸木之下，這顆篠懸木在北京城內是唯一的一顆，或即便不是唯一的一顆，也是最大的一顆的，皇帝在這顆樹下坐着，瞧望一架水力機器。這時湯若望舍中僕人底五歲小男孩，穿着一身滿洲服裝，走了過來，很規矩地按照朝中禮式，給崇高的客人跪地行禮。皇帝甚爲喜悅，問他的父親是誰，並且允許他，在內廷供奉的一個機關裡一有缺出立即令他補充（二九）。關於這位僕人和在這裏敘述的這位殷勤玲巧的小男孩，我們在稍後還有許多可說的。

話的。

三

這樣，中國幼齡皇帝十年的久長，把他一位似子似徒的親信敬仰，貢獻給他的瑪法。湯若望彷彿皇帝底一位慈父一般的規正者，策謀者和師友，報答了皇帝底親信知遇。

對於這位性情熱烈急燥的童子，他是不得不小心應付的。凡是能使皇帝覺得可羞恥的事情，他都是秘密地在四隻眼睛之下向他進言。凡是關於國家的事情，他也是呈報於內閣的。

在他所作的各公事奏摺中，他都是要乘機填註上些向皇上進勸的，至不同的一些言詞。譬如說：皇上對於臣屬應持慎重嚴默態度，不當把時間消磨於嬉戲俳優的身上，又譬如說：皇上應當節制凶野的騎馳，對於火器應當慎重小心，尤其是對於歐洲的槍礮，因為皇上對於這種兵器夙無訓練，所以就極易發生意外，致受誤傷，況且在這些事情上，更能給朝中那些姦惡人物造機會，藉此加害於皇帝了。皇帝對於湯若望底這一切諫正，都一一地聽從。有一天皇帝問，為什麼大多數的官

吏都這麼苟且怠忽他們的職守，湯若望就回答說：「他們都是以陛下底行動爲榜樣的！」少年的皇帝一聽了湯若望這句話，面孔上登時便發起紅來了，然而却深深地領受了他的警策的諫正（NO）。

在一六五五年皇帝因城中時疫流行，在他城外的遊獵苑園中，作較長的駐蹕時，他曾有一次在半夜裡，使人宣召湯若望到苑園中去。四名騎兵和三位貴胄侍童，奉命引導湯若望前往。早晨一早他們就達到了皇帝駐蹕之所，湯若望登時便被皇帝召至御前，請他把他對於皇上個人和他的政府，所視爲不合的情形，都向皇上奏明，絲毫不許隱瞞。瑪法把這件事情記錄了下來，眼中含了感激的淚珠。在其他的言詞之中，他也勸誡皇上，不要把一切的事務，都委任給內官太監們去辦理，他又勸皇上須要寬厚慈愛，如同一位慈父一般，對待他的全國臣民（三一）。

湯若望一開頭起所最努力奮勉的，就是在他這位被保護者在道德方面的改悛。當在順治在他結婚之前，曾作了一件無道的事情，湯若望向他呈遞一封諫書，並且又在四隻眼睛之下，向他親口說了些規正的言詞。可是皇帝在敬聆他讀諫書時，竟羞怒了起來。因此湯若望就走開了，可是他

又登時被呼回，皇帝向他說，願改過自新，並且將來仍願聆諫受勸。即在皇帝結婚後，人們仍聽得到他的在道德方面的過失。因此瑪法又親自向皇帝讀他所上的諫書。皇帝一開始頗強言護短。然後皇帝面色慚赤，退入於內室中去。繼而他又走了出來，以平靜的聲音，向湯若望問說：「瑪法，那一種罪過是較大的，是吝嗇或是淫樂呢？」若望回答說：「是淫樂，尤其在地位高的人們，因為這是一種惡劣的榜樣，所引起的禍害，更要多，更要大的。況且這兩種罪惡中，淫樂也是更危險的。但是這兩種的罪惡都是一樣堪當永久的天殃的。」皇帝略一思量之後，就點頭默認，並且請求瑪法常來向他進諫，他令人們妥善款待他，並且在他走開時，又向他表示極大的情意（三二）。

可是皇帝底這改悔，終久是不能持久的。他也未曾得以弄成功，把他的皇帝學子，完全由喇嘛僧徒底包圍迷惑中，解救了出來。順治皇帝剛開始親政，他就開始了對於這些僧徒底攻擊，不過他所收的效果，却盡是暫時的性質。他曾詳細記述，他一年多之後怎樣去從事反抗喇嘛教首領之工作。

被人所敬之爲活佛的西藏達賴喇嘛，於一六五二年向皇帝馳報，願詣京覲見。他於入京的行

途上，要帶領三千喇嘛，和三萬蒙古人爲護衛。皇帝打算要親臨邊地，這是離北京有兩月路程的一個地點，以便迎候達賴喇嘛法駕。關於此事湯若望特上一很長的諫書，並且又親自向皇帝面奏。他諫皇帝不要自失尊嚴引招這一種恥辱，因爲這是歷史上的污點，人們永遠不會忘掉的。他的這諫言很有力量，竟發生了效果。因此皇帝就改派了一位親王，出京遠迎這位大喇嘛，及至他到北京城外時，皇帝派皇叔出城迎接於城下。皇帝於大喇嘛抵京之日，已赴御園遊獵，在那裏皇帝坐於大殿寶座上，令大喇嘛入見。皇帝向這位入京覲見的法王，所表示的崇敬，僅只是皇帝自寶座上立起，把手遞給他作親敬之表示，並且向右面親王行列中，指給他一個坐位。這位「神佛」底許多心願，譬如願皇上當他的一位喇嘛弟子，都未曾得以償遂。因爲湯若望曾向皇上陳述，這在一位這樣大的天國君主，是不合身分的，皇帝與喇嘛應當各行其是，各盡其職。原住北京之大喇嘛，封有王爵之銜號的，這時返而被放逐到遼東極遠的邊界上去了。因此過了數日之後，西藏大喇嘛也竟起駕返國（三三）。

在北京住持的喇嘛之中，似乎是隱藏有些謀叛的人物的，就是從前闖王李自成底一些餘孽

餘匪，由這一圈的人物之中，有向皇帝進言應赴遼東祭祖者。湯若望在多次的謁見裡，令皇上注意這樣一種遠行的種種危險。因為這樣那剛剛有點制服的王公貝勒們，必將要再起紛紊擾亂。而北京的一般人民們亦必將伏耳底言，皇上懷疑他的統治權，而要藉此逃回滿洲去了。瑪法底這些諫言又收了效果（三四）。所以那黨子喇嘛們暫時都被摒絕。只是在順治在位的末後數年間，這黨子人們纔又得把皇帝澈底包圍了起來。

在湯若望所寫的生活回憶錄（*Lebenserinnerungen*）中，他還報告了些其他的事例，這些事例都是可以向我們證明，他向皇帝的諫正有順利的效果為單個的人民，為首都，或為全體的民族。不過在這些事例上，他少有把確切的時日舉示了出來的。在普通一般人民底窮困中和個人底困難中，他時時刻刻都是情願援助的。

西藏大喇嘛入京謁見之後，自戰場上有些不吉利的消息傳達北京。此外又有一種流行性天然痘症和一些飢饉災難，頗為人民所苦。湯若望在這些災厄之中，瞧出上天因人們過於敬重喇嘛的一種示罰，並且向皇帝進言，應發國帑廣施賑恤，以便補贖已作成之過錯。這樣向首都的貧民

所佈施出去的恤銀竟達四十萬兩。在次年陰曆六月與七月間，因連日淫雨，竟致北京城內與郊外積水泛濫，湮沒貧民廬舍不少，因而竟成水災。因湯若望之進言，政府撥銀八十萬兩，散佈於北京城內被水災所害之人民，並更撥銀二十四萬兩賑濟郊外之貧民（三五）。

政府曾經查明，在北京城內有許多商人，並不是真正的商人，實際上却是些有大規模組織的盜匪。許多這樣的商人們，被逮捕而判處死刑，他們的財產全被判決收沒國庫，可是大部分都流入官吏私囊之中。不過被逮捕監禁起來的人們之中，也有些冤枉的商人們，又有一些受着胥吏們底訛詐勒索。湯若望在這一點上，深發義俠心腸，而施以救護。他還更向朝廷建議，作一普通特赦，以免無辜人民遭受拖累，而那些罪情重大的真正罪犯却不在此例，而仍施以嚴懲。這樣許多受冤枉的人們，方纔得以自由。而關於那些忠於職守的官吏們，他也催促朝廷施以提升或賞報。順治皇帝特把關於此事親手簽批與封印了的上諭，先差人送給瑪法，請他按照自己的意見加以更改和增補，然後再把這件文件，按照歐洲的方式封印了起來送回。這上諭頒佈以後，全國爲之驚騰，讚頌皇上底深恩厚澤（三六）。

當在皇帝正在他所愛好的遊獵園中居住的時日，有一天他心內忽然發生樂趣，要在長城之北邊組織一最大規模，如同出征打杖一般的一場遊獵。這個消息一透出去，一般的人們，尤其是貧民，都發出了悲怨之聲，因為他們當時都在受着一種物價騰貴的壓迫，而現在再上一層皇差的勒逼，那就更要不堪設想，必致多人喪命的了。因此湯若望就出城，親自覲見皇上，直接地並不繞彎子地，把他的諫言向皇上說了出來，皇上聽從他的諫言，遊獵之舉方行作罷。替代這一種行動，皇帝反向那些清貧的官吏和兵丁，發下一批賞賜。另一次湯若望在獵苑中覲見皇上的時機裡，他聽說有五位悉屬漢人的部中高級官吏，被判決發往滿洲之極邊充軍。這為這幾位老先生們是比死罪還要利害的。湯若望登時就去向皇上前替他們求恩，他的這請求果然又發生效力。還在內閣置放着的命令，又被收回，而他們五人底刑罰竟被赦免（三七）。

一六五三年湯若望曾救了二百餘名滿洲貴族底性命，在這二百餘名滿人之中，有四位是宗室王公。在這裏我們可以略少知道一點，這滿洲的遊獵小民族，怎樣能得成功征服了巨大的中國。他們軍隊裡的制度是完全希臘斯巴達（Sparta）底精神的。他們有一條舊日的軍律，即凡屬一

位親王死於戰場，那一切高級的軍官都要被斬首的，如果他們不能證明他們是奉那位親王底命令未參與戰爭的。在這一年裡有一位過於貪求榮譽的親王，在南邊帶領軍隊作戰，可是他竟帶了一小队奔馳三日，而人馬俱疲的馬隊很狂勇地奔入人數過於優越的敵軍陣中，因而竟致陣亡。他的主力的部隊於事後方得趕到。他們把敵軍打退，使他們重受損失，他們又把陣亡親王底屍首尋回。可是雖然這場勝戰非常榮耀，雖然那位虛榮心過勝的親王之死，全軍二百名以上之軍官並無絲毫之過失，按照這一條律則，仍不能不受死刑之判決。朝中並無一人敢爲這二百餘名軍官，向朝廷懇恩求命，唯獨湯若望一個人能作此事，可以營救他們。因爲他從前曾諫皇帝，不要選擇這位狂勇冒失的親王爲大元帥的。那麼現在他可以仍根據這一點，把過失完全推在那位親王身上，而向皇帝上一封求恩的摺奏了。湯若望此舉也竟使皇帝心上的塊石頭去掉。因爲皇帝本心亦願以寬大處理此事，但他還是一位滿洲後進，而不敢搖動滿營這多年以來的舊軍律。現在他既有湯若望底奏疏爲根據，即可以放心大胆地施恩澤，赦免他們了。這二百餘名軍官們雖邀恩赦，得以保存性命，但仍一律俱皆降級（三八）。

在湯若望這樣規正與影響幼主的這優美行動中，他於一六五九年竟得成功，他最出色的一着。滿人一直到這時之最危險，而尙未能得以克服的敵人，就是海盜魁首鄭成功。（在教會底報告中都是以國姓爺（Coxinga）的名字稱呼他的）（三九）他因為滿人把他的父親囚禁在北京，所以就誓死與滿人爲敵，而已經是把沿海各島嶼和揚子江口左右兩面之沿海邊岸，都已佔據了的，竟於一六五九年督率一蓋滿揚子江面之巨大艦隊，和一大批軍隊，沿江聲勢浩蕩地直向南京侵來，沿江各城市俱已被他所佔據，而於是年中竟把南京圍困了起來，這南京的城市是魯日滿（Regenont）在他的報告中相信應稱之爲「世界最大城市」的。當時在南京城內所駐紮之六千人馬中，僅只有五百名滿洲戰士，而他們對於漢人軍隊，又是懷着猜疑態度的一批派赴南京的援軍，竟被鄭成功之軍隊悉行殲滅。南京形勢岌岌可危，陷落似已是早晚間事了。

當在這個噩耗傳至北京，胆怯的人們已經爲首都底安全驚懼了起來。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鎮靜的態度，而頗欲作逃回滿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向他加以叱責。他說，他怎樣可以把他的祖先們以他們的勇敢所得來的江山，竟這麼卑怯地放棄了呢。他一聽皇太后底這話，這時反而竟發起了

狂暴的忿怒了。他拔出他的寶劍，並且宣言爲他決不變更的意志，要親自去出征，或勝或死。爲堅固他的這言詞，他竟用劍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塊。照這樣他要對待一切人們的，只要他們對於他這御駕親征的計劃說出一個不字來時。皇太后枉然地嘗試着，用言詞來平復皇帝底這暴燥。她扯身退去，而另遣派皇帝以前的奶母，到皇帝前勸誡皇帝，因爲奶母是被滿人敬之如自己生身母親一般的。這位勇敢的奶母很和霽地，向他進勸。可是這更增加了他的怒氣。他恐嚇着也要把她劈成碎塊的，因此她就吃了一驚地跑開了。各城門旁已經貼出了官方的佈告，曉諭人民，皇上要親自出征。登時全城內似起了極大的激動與恐慌，不僅僅在老百姓方面，因爲他們不得不隨同出征，就是在體面的人們，也是一樣的在激動恐慌。因爲皇上在疆場上一旦遇到不幸，這可是因他的性格的暴烈，極有可能的，那麼滿人底統治，就又要受危險了。

在這時就只有一個人纔可以帮忙，就是湯若望。各親王和各貴顯，各部臣和許多朝中的官吏，列爲一長隊到湯若望底住館舍中，迫切地請求他援助。他良久拒絕不允。最後他竟讓步，順從他們的請求，因滿清一搖動，教會亦必隨之受影響，因此他就決斷，「要爲公共的安寧，爲耶穌會底榮譽

和教會底前途，把他的性命拿來作孤注一擲。」他同蘇納神甫 (Diestel) 和白乃心神甫 (Grueber) 暗自作一次會議，這兩位傳教士是於數日前，就是一六五九年八月二日，剛到北京。然後他就又親自作了一封奏疏。到次日一早，他們三人都先作了彌撒神事，並且禱告湯若望底舉動成功。然後湯若望就向他的兩位流着眼淚的同志作別。

在宮殿底門檻上，有一位同湯若望交好的內官向他報告說，皇上已經有點安靜了。湯若望走至皇帝前，就跪於地上，把他的奏疏呈遞了上去，並且很深誠地懇求，不要使國家到了破壞地步。他寧願粉身碎骨，也不願不忠於他的職守，有所見而不言。登時皇帝底情調就轉變了過來。皇帝請湯若望立起。現在他知道，瑪法底見解是好的。所以登時各城門上就又貼出了一張新的曉諭人民的佈告，就是曉諭人民，皇上之出征已作罷論。可是皇帝之出征雖作罷論，而對於那位海盜魁首怎樣辦呢？湯若望獻策，遣派新軍，而以重餉給與各兵丁。這一枝軍隊竟把海盜魁首，又驅回他的那些海島上去。因此湯若望便被稱為國家底救星。許多顯貴與體面人物，在繼續的時間裡都到他的館舍裡來，並且伏地叩頭，向他和他的同志禮敬（四〇）。

在此事之後的一年中，所發生的一件事情，又可以向我們揭示湯若望底諫言，怎樣發生了效力，雖然他在這裏所發生的這一件事故底結局上，決定要很表示遺憾的。

湯若望曾向皇帝陳述被官吏所壓迫的貧苦小民底怨恨。這一種情形馬上就要被剷除了。因為數日後，皇帝到城外打獵。他完全一人去追逐一隻野獸。在追逐時，他竟走到了一個村子中，瞧見一位面容愁苦的老人，正在那裏劈木柴，皇帝向他問及他的狀況。這位老人以為他眼前所瞧見的，是一位尋常的兵丁，所以竟向他訴說他的冤屈起來。他說，他的狀況非常惡劣。地方上那位貪婪的官吏，把他所有的財產都給劫奪了去。現在他雖然年老力衰，然而仍被逼來作這一種奴隸工作，以便藉買木柴，得以苟延殘喘，而不致飢餓以死。皇帝令那位老人騎在他所騎來的那匹騾子身上，並且同他一起奔赴那位官吏底住宅。那位官吏使他的太太出來應付他們。她不知眼前的人就是皇帝，所以就向他吐罵，令他滾開，並且還拿一條棍子出來恐嚇他。在這時皇帝底侍衛就趕了過來。而這官司現在可就簡短地解決了。皇帝命他的衛士把那位官吏和他的家人，登時都立地斬首示懲。這位官吏底全部財產，皇帝都賞賜了老人，並且還封他為全村之長。此事過後不久，全國的人們對

於皇帝嚴明公道的行動，都是盛稱盛道的（四一）。

自許久以來，國內一般輿論皆謂，如果要使一件事情就規順序時，那便是湯若望底事情了。一切的人們都知道，他並不是貪賄賂，求自己的利益的。曾有數次，人們把大宗款項作敬禮贈送給他，然而他都堅決拒絕了。可是這些事情竟被傳揚了出去，爲人人所知。人民對於他的感激與敬畏，也是很普遍的，如果他走入宮中殿中時，那麼殿門宮門口的一切執事人員等，都要一律立起，向他致敬。最後皇帝簡直僅只要受他一人底諫正，而並不欲聽受他人的諫言了。當在有一次內廷總管在他的稟帖中，向皇帝有所諫正時，因爲這也是他權限內的事情的，皇帝就怒呼說：「我已經有了一位諫正的人了。我解除內廷總管底這一種職責。一切其他的官員們都只是藉言路，以求虛榮的。只有湯若望底行動纔是出於純粹潔白的目的。如果我讀到了他的奏疏稟帖，我就被感動得幾乎要下淚了。」順治由湯若望所上的三百餘封奏疏與稟帖中，選擇了一批出來，特特收藏於皇帝個人文書庫的另一格中，並且在出宮遊獵時，多半都攜帶身邊，以便隨時閱讀。至於說，他時常閱讀了湯若望底這些奏疏與稟帖，這是由一種情形中可以能證明的，就是因爲皇帝對於湯若望底請求，有

時竟隔年隔月纔予以照准。甚至有幾件他所請求的事體，是皇帝在他將死之前的短時期裡，還交付攝政者予以照辦的（四二）。

湯若望對於皇帝底影響，似乎是在順治對於他的文武官吏所下的聖訓中，也可以能尋出證明的踪跡的。因為滿洲歷代皇帝都有一種慣例，就是製定一種極激昂熱烈勸善懲惡的文章，頒發全國文武各官員，以及各色人民等，時時誦習，以便進德修業，而遏亂源惡念。像這樣的歷代皇帝底聖訓，我們到現在已積存有二百餘小冊了。這二百餘冊中，順治皇帝底聖訓六冊所包含的思想，根據一位研究家底判斷而言，並不少非中國底成分，而是基督教底成分。因此人們就推測，有幾種必係湯若望之所授意，或甚至是他之所著作的（四三）。

如果我們把自一六五一年到一六六〇年的十年時間，加以回顧反觀時，那我們就頗願斷定爲這時間裡中國實際上的攝政者的，簡直就是湯若望了。「他是中國歷史上所有最有力的部臣中之一，雖然實際上並無部臣底銜號」，這是一位耶穌教傳教士兼歷史家的居次拉夫（Gieseler）（四四）對於湯若望的評語。他的政治的勢力是爲全國造福的。對於青年的君主精誠地嚮慕，和對

於中國百姓的愛護，是迫促他要把肉慾盛旺，性情熱烈的青年皇帝教育爲一位道德方面崇高巍
峨的人物，兩種動因（只是可惜他這目的所達到的限度是有限的），並且因這兩種動因，他纔
要把他全盤的精神能力，拿來用在了全國人民底安寧上的（在這一點上，他却是收了巨大的效
果。）

然而湯若望在他這種種的行動上，是還暗暗地懷有一個更高尙的目標於心目中的。傳教會，
無論何時，都是他所視爲最關心最重要的事務，一切其他的事情，都爲這一件事情起見，纔去作的。
他向人民表示好處，爲的是可以獲民心而使其更願信奉基督教。他以種種行動與策謀向皇帝表
示忠誠，使皇帝不得不佩服他感激他，因而他便也可爲他傳教的同人和教會獲得莫大的利益。如
果皇帝真能擺脫了那些喇嘛，並且真能克制了他的情慾，那麼人們對於他或許能有更偉大的舉
動可希望，就是能使他受勸化，歸依天主教。湯若望竭盡心力，要把人間這至高至可寶貴的道理，使
他所愛護的這位青年皇帝得以領略稟受，而爲天主福音在中國打開一條廣闊的道路。

四

湯若望曾被他當時傳教的同人們所指責，以為他向皇帝一方面的傳教努力不足。「爲什麼他不勸他奉教呢？」這是人們時常要發的一個疑問。因此他就很詳細地陳述，他想把皇帝拖入基督教中來的努力。他所使用的方法，在他所寫的回憶錄中，是很顯明可見的。在這裏他陳示，他怎樣努力着以天然宗教與道德爲基礎，而將基督教底道理建於其上，以不知不覺地引皇帝入教。

湯若望在他的回憶錄中，首先敘述他這方法上所預定的幾條普通原則，本着這原則他隨時隨地看行事。實地上他在要勸化皇上奉教的嘗試上，常常都是以天主教底十誠爲引線。可是他一撞到了一種，按照人類底力量說，是不可掃除的阻力，而使他的嘗試失敗時，那麼他至少還仍要引皇帝底行動入於正軌，入於自然宗教之軌道上。如果他瞧着他的嘗試有一點希望，即便是最輕微的一點希望，那麼他就要以自然宗教與道德爲基礎，一步一步向前逼進，而使皇帝明瞭基督教爲末後的真正宗教。他相信在這一位皇帝，是可以能使人們懷有充足入教的希望的（四五）。

湯若望在他的回憶錄中，於這一段之後，還很詳細敘述了數次向皇帝所作的較長的講授時間，我們讀了他這敘述，我們就可以感覺到，他對於這位青年皇帝底靈魂是多樣關心熱烈地要予以救度的，所以他這一段敘述的文字，也就轉入了一種非常壯嚴崇高的聲調裡了。

有一天皇帝特召他這一位父兄一般的師友，到遊獵苑中，作較長之逗遛，爲的是可以能得安靜地同他談話。當在湯若望到了獵苑中時，皇帝正在打獵，這樣他便得了機會，向那裏的執事人員等探問關於皇帝和關於宮庭中的一切事體了，人們請求他總要時常規諫皇帝，改正他的行動。皇帝遊獵歸來，進晚膳後，湯若望便走入皇帝便室中，皇帝已經在那裏候着的。

他們的言談登時便落到了星宿和行星非常交會之吉凶上頭來了。湯若望由衣帶中掏出了一封關於此事的報告，他在他的報告中，向來是慣把非常的自然現象，解釋爲上天底警誡與警告的。在這一點上，他是代表他那事事仰賴上天的時代的信仰的。連這位當然也是這個情形了。皇帝親自讀了他這報告，用手招湯若望到身前來，以便湯若望低聲向他耳內講說，並且把困難給他解釋開。皇帝聽了他的話之後，良久地潛入默思中。然後他忽然開口打破了那靜默的空氣。

他說：「如果天上星宿底軌道可以能預先測算時，那麼那當然是顯然的了，他們的道路是必須要這樣行走的，所以那預言的災禍，自然也是不可轉移的了，因此也就沒有克制這災禍的方法了。」湯若望請皇上少耐，聽他作一路長的解釋。湯若望繼續着對於那個問題就是對於無論自然律則多麼鐵板不易，但是上帝仍能根據他的全能全知，自原始以來，怎樣用自由的意志，鋪排了這律則底效力，以便向人類，尤其是向世界上那人王人主們默示訓誡的問題作了一番大講演。他說，在這裏，上帝所以要親自示警示訓的原因，是因老百姓們不敢向皇帝示警示訓。因此上帝尤其是應當歸君主帝王們之所奉祀崇敬。

皇帝接着問：「誰是這位上帝呢？」湯若望向他宣講真正上帝之性質，這位上帝是基督教徒們所稱為天主的，他又把基督教徒所敬之天主的真神，拿來和佛教所敬的佛，其他神怪，以及中國哲學中所說的物質的天，作一對比。皇帝又繼續着說：「爲什麼我應當比其他的帝王們更要加重敬畏星宿底警戒呢？」湯若望回答他說：「因爲他是世界上最大的帝王，況且又是自命爲「天子」的，而實際上他也是真正統治着世界最大的民族的。因此天主也特別關心眷顧他。」皇帝說：

「只要我改悔我的過錯，那就足夠可以轉移天災天禍了麼？」湯若望說：「是的，能這樣，那就要無所懼怕了，按照着一句歐洲底諺語：哲人統治天上的星宿。」所以皇帝接着就說：「教導我吧！瑪法，我可以怎樣解脫我的過失。」於是湯若望便乘機向皇帝進勸，在嚴厲的國法底伸施中，要存一番深仁寬厚，對於老百姓，要懷一番如父如母的愛護，對於國中大小官吏，要懷着一番寬仁厚道；他又說，皇帝無須去奉祀那一大批假鬼假神，應當專一信奉上天之真主，應當至誠愛那位真主，並且對於皇帝左右，以及全國人民底行動，均應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為準繩。若望繼續着又把天主教底十誡，向他詳細解說。他在解說時，對於帝王底義務責任，就特別注意，皇帝十分親切注意地傾耳敬聽，並不打斷他的言詞。然後他打聽，基督教徒之數目與價值。跟着皇帝就問：「上帝底律則是否也要帝王們和其他人們一樣地遵守奉行呢？」湯若望回答：「皇帝比其他的人還得要更該遵守的，因為皇帝是要給他人作榜樣的緣故。」皇帝又向下問說：「天主教底十誡，是否他也該遵守奉行，因為他還不是一個教徒。」湯若望對於這個問題的答復，當然是肯定的。皇帝又補問一句說：「我從那裏會到遵守奉行這一種誠律的力量呢？」湯若望回答說：「只要天主恩寵，我們

就沒有難作的事情了，可是這恩寵是我們得向天主禱求的。」皇帝說：「我也是這樣想。我覺得我能履行這誠條。」

皇帝登時就又把話機轉移到明朝末後皇帝底身上來，他說，明朝末後皇帝底性格是怎樣的，爲什麼他喪失了他的國家。湯若望認知出來皇帝發這一問時，那高傲的聲勢，所以他就回答說：「那位皇帝底知識道德，和對於百姓的愛護，都是很優異的，但是他却因過度的自信與固執己見，而竟作了不少的錯事。因此文武官員都不肯向他盡忠効力，竟至喪身失國，雖然他也是以天主教律爲然，如果能有人把這個道理宣傳於他時，他決定不會不嘉納拜受的。」

在湯若望這次向皇帝所作的這說教時機裡，還有幾位貴顯的人物與內臣，都在旁邊陪侍恭聆，他們也向旁的人們傳說了湯若望所說的這些話。皇帝本人決定也會多次，對於他這次的訓導，加以熟思吟味的，因爲他後來還向湯若望提出困難之點數條，加以質問（四六）。

繼於這次之後，湯若望在同年中，還向皇帝作第二次宗教講授。皇帝召湯若望入宮，他要在四隻眼睛之下同瑪法談敘。皇帝馬上就把他們的話頭，由所談及的尋常事物，轉到天主的問題上頭

來。

皇帝問：「歐洲人怎樣稱呼這位上帝呢？」湯若望回答說：「上帝底名稱在歐洲因民族與語言之不同，所以也是不同的。有一些民族是按照他的仁慈稱呼他的，譬如在我的祖國就是這樣，其他的民族或按照他的聖哲，或按照他的權能，或一種其他的性質以稱呼他。」皇帝向下問：「在國內的官吏中是否也有奉教的人員？」湯若望回答說：「是，有不少的教徒的，但是那些其他的非官吏的教徒數目却是更多，而更熱心奉教。」然後順治就又談論起前任的皇帝來了，而他自湯若望口中所得到的答復便是，崇禎對於天主底誠律，也曾很表示過崇敬的。「這可是他作得對了的。」皇帝這樣說。教中的十誠，湯若望這時又乘機向皇帝解釋一番。當他講到第六誠（譯者按：基督教十誠中第六誠為勿行邪淫）的時候，皇帝便問：「爲什麼教中禁男子多娶妻妾？」湯若望回答：這是可以使兒童能得較佳之教育，並且還可以使家庭內和睦，況且這還是上神之真意。在歐洲一夫一妻尋常所有的孩童，是比這裏一夫十妾所得的孩童還要多呢。皇帝問：「這個誠條爲帝王們也有效力麼？」回答：「比爲其他的人們還要有加重的效力的，爲樹立好榜樣起見。」皇帝繼續問，在

滿人中是否也有教徒。湯若望回答，滿人因劫掠生活的習慣和其他的惡習，對於基督教還未曾到成熟地步。皇帝其他的詢問，是關於教徒殯葬底儀式，婚姻底制度，童貞底德性，以及旱災流行時禱告祈雨的情形。由這一些談話中，湯若望可以推知皇帝對於他所聽到耳內的宗教真理，是會常常加以尋思的。

當在湯若望在其他一個與皇帝談話的時機裡，於晚間夜深人靜時，又開始講天主底道理時，皇帝就召一位書記來，以便記錄湯若望所說的一切話。湯若望向皇帝表示這是無須的；關於這些道理，他自己和其他傳教士們都寫有著作。皇帝登時便差人們在狂風怒號的黑夜裡去取這些書籍來。他就把自己鎖在一間便室內，徹夜讀了這些書籍，當在天亮之前，他就又返回到湯若望處，手裡拿着那藉向明朝皇帝進呈的巴燕國大公爵馬克西米良底禮品的時機，所著的基督生活的概略。根據着這一本耶穌生活的概略，和所附入的聖跡圖。湯若望解釋了使徒之信仰。當他說到救世主受難的歷史時，皇帝便把書放下，而跪拜於地上。湯若望跪於皇帝底身邊，以至迫切誠懇的聲勢，向他這位肅靜傾聽的學子，解釋基督教底神秘。這裏，湯若望曾自行承認說：「我會屢次把這同一

的事實，講給了中國底士大夫們聽。他們在他們那生來的一份自負自傲的態度中，都是視我們的救世主爲我們所受的苦難，爲愚妄的行動的，或者只是不注意地聽我的講述，或者甚至加以訕笑。但是這位偉大的君主聽了這話，却以至謙虛卑下的心情拜倒於地，以這樣的感動敬聆我的言詞，簡直很難使我制馭我的眼淚了」(四七)。

還有其他許多的事例，都可以向我們證明，皇帝對於湯若望底訓誡與鼓勵是多樣容易感受的。

如果他在臨幸湯若望底館舍要先到教堂內去時，他總是在大街上離前院大門十步遠的地方，就下鑾轎，步行進內。到第一座門樓時，他不走正門。到大理石的凱旋坊，他也不穿過正門。就是到教堂門口，他也是由一個側門，纔走入教堂裡去的。這都是皇帝對於天主虔誠敬畏的表示了(四八)。

皇帝有一天，在湯若望室內，盤桓較長的時間時，他瞧見祈禱桌邊，掛着一串念珠，因此他就願意叫湯若望給他解釋這念珠底用途。湯若望令一個兒童進來，跪在禱告桌前，把一串念珠底全部經文，都念誦了出來，這是很使皇帝瞧着有意義的。然後皇帝轉身到教堂裡去。他在教堂內，在兩邊

陪祀祭壇上所供奉的聖像之下，依格納爵（Ignatius）和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底名字，並且都深深記入他的記性中。以後他時常良久地瞻仰聖·依格納爵底影像，他說，這一張聖像很能激起他的誠敬信心。在這一時的時機裡，他也注意到牆上所掛的那一些方牌，基督教底主要道理都在這些方牌上記載着的。當在他讀到了使徒之信仰時，他就在深深的感動中發問，爲什麼救世主這麼晚到世間來，並且爲什麼他爲他的僕從要受這樣多的苦難。然後他又把他的銘語都閱讀了一遍，而深致其反省懷念，他返回湯若望底室中時，就又熟視女聖人勿洛尼（Veronica）汗巾上所印之耶穌面孔之聖像（譯者按，勿洛尼爲與耶穌並世之一位女士，當在耶穌背負十字架赴刑場時，勿洛尼曾以汗巾拭耶穌面孔上之血汗，及將汗巾取下時，便見上面印有耶穌面孔之痕跡，因而隨爲後世教徒之所供奉珍視。）這張聖像使他心內深深震感。他令人們把這張聖像送至宮中，並且會四次令中國藝術家予以臨摹。可是他們這臨摹的工作是很失敗的。湯若望請求皇帝，把那張原畫留存宮中。可是皇帝又把這張聖像送了回來，因爲他覺得，他還未具有充分的準備，以便尊嚴地奉祀這張聖像。

在其他一次時機裡，在皇帝自教堂底這一面過那一面，走至教堂中間正壇上所奉祀的基督聖像前時，他並不顧身後追隨的內官太監們，而竟作俯首捶胸的教徒悔罪的舉動。在聖體瞻禮日（Fronleichnamfest，譯者按：此爲天主教祭祀耶穌聖體之一節日名），皇帝特到教堂內禮敬了最神聖的耶穌聖體（四九）。

在三王來朝的瞻禮日（Fest der Heiligen Dreikönige，譯者按：此亦爲天主教之一節日名，所謂三王，卽於耶穌誕生後第十二日自東方特來朝拜耶穌之三位國王而言），皇帝曾有一次良久地，立於湯若望在過耶穌聖誕節所特仿製的耶穌降生時所用的那馬槽之前，深深被那裡面所摹塑的人物之中，還缺少着三位國王。可是這現在已經足夠有了代替的人物了，湯若望說，因爲世界最大的國王，現在來朝拜下凡的天主的。皇帝返回若望底住室中之後，他的眼光就又落到了在騰告高桌旁所懸掛着的，洗禮的聖人約翰正在荒野裡作祈禱時之像。約翰也是湯若望底宗教名，特行保護他的聖人的。皇帝請湯若望把這張聖像贈送給他。

當青年皇帝有一次趁機會搜探教堂內儲藏聖衣聖器的室間時，他願意知道這祭衣底應用。

因此湯若望就不得不把那些祭衣穿起，作彌撒給他瞧。後來湯若望又當着許多貴顯的人物之前，又作了這同樣的事體，這次却是皇帝親自給那些貴顯的人物們作解釋的。

有一天晚上，湯若望奉召入宮。皇帝已經躺在御牀上，但尙未就寢，而正在翻閱基督教書籍。他正翻閱到了一本附有圖像的聖徒故事。一直到深夜，湯若望不得不給他講說了聖徒們底苦難與聖跡。

皇帝向湯若望索取為教授新教徒所用之各種經典。他開始讀十字聖號經——關於十字的學說，他由從前的講授裡本來已經早有所知的——而現在也竟要親自像教徒們一般，向自己的額部上口上和胸前畫十字聖號。但是他的護從之中却有一人，轉移他的注意力，竟使他未克完成此舉。熱心宗教的湯若望在這一點上，瞧出惡魔底干涉阻撓。但是「如昇天主願意的話，那麼皇帝自然會背返着切齒痛恨的魔王底阻撓，而歸依基督了。這是我們希望慈悲的天主允許我們的，為揚他的至聖的名字，或為勸化國內許多其他的人們，這些人們一定追隨着皇帝底榜樣，都要專心一致地奉祀天地萬物之真主的。」這樣，湯若望便結束了他向順治皇帝勸化信奉天主教的嘗試。

底敘述（五〇）。

湯若望在順治皇帝方面，決定是盡了他傳教義務的。皇帝自他的方面所受到的宗教講授，是已經足夠的了。警告與迫切的勸言，他所得到的也足够程度了。「既未在皇帝之前，亦未在一位其他的任何人物之前，我曾於任何一個時期裡以傳佈福音爲羞恥的。所有一切機會，凡屬我可以利用的，我俱已利用了。」這樣湯若望曾有一次，向那些挑剔責難他的人們呼着說。按照他的意見，他覺得皇帝是有相信教的心理的。但是他却不是全心相信。他不能遵守教會內那一切誠條。肉感的樂趣是他所不能克制的（五一）。但是瑪法仍不放棄他的希望，而以爲他的言詞將來必要有一日會發生效果，另一位傳教士或許能使這勸化的工作得以成功的（五二）。

他所希望能作這件工作的傳教士，尤其是方德望神甫（P. Stephan Le Fèvre）。因爲在當時有一句流行的古代預言說，皇帝是要被一位聖人所勸化的。而當時方德望神甫是已經被人們所視之爲聖人的了。湯若望很願意他到北京來，作他傳教的伴侶，以便使他傳教的工作得以達到頂點。在他於一六五七年六月五日給魯德照所寫的一封信中，他曾很清晰地在這個意見裡，把他

的話說了出來。本來在一六五一年已經就有過派遣方德望赴北京的一番言詞。那個時候關於這個問題，也曾顧慮到，可是方德望終究未被遣派。而湯若望底希望已竟終於未得償遂。

五

因有這一層原因，所以瑪法底一切辛勤努力上最優美的報酬，即皇帝入教，便是他所未能得以弋獲的了。可是其他的賞報與表章，却是心內感激他的皇帝之所很寬洪大量地恩賜了的。

在他被派爲欽天監正之後，他所得到的俸祿，是比各部尚書所得的俸祿，還要超越三分之二的。如果他要不會拒絕了，那他這俸祿還會更加高的。「其他的人們都是爲他們薪俸底增加而奮鬥的，然而我這奮鬥，却爲拒絕這薪俸」，這是他可以能自相誇耀的。在這一種正式的入款之上，還有皇帝時時零星所賞賜的衣服，綢緞，和錢財，全部實已大有可觀了。他每次向皇帝所呈進的書籍與儀器，都能獲得豐富酬報。當他被皇帝所促迫，還再多要求一些恩澤之時，他就表示了他願意要一塊位置在利瑪竇神甫墓邊的墓地的志願。皇帝於一六五四年特頒詔，把一塊頗不小，而極珍

貴的田產，賜與了他作墓地，這一塊地原來是屬於一位親王的，親王把這塊地讓出後，皇帝另賜地一塊以作補償。北京底傳教會經過皇帝的這一切寵遇與賞賜之後，已是至少可以維持四位傳教士底生活了，況且還是除湯若望之外，因為他有他豐富的，足以自給的俸祿（五三）。

在皇上所賜給的葬地上，湯若望建立聖母小教堂一所。在這所小教堂前面，他於一六六〇年八月樹立石碑一座，上面刻有他所撰的漢文與滿文之碑記如下：

「今

皇帝在位之十有一年，順治甲午，臣若望蒙

恩軫念，犬馬齒衰，

賜地一區，以作他日窆所，所以昭

異眷也。竊維九萬里孤踪，結知

英主，旣榮其生，復哀其死，魚水相驩，得若將終其身，而又預爲之計，久遠如此。

湯若望傳

寵施優渥，出於格外，豈人力也哉。古聖賢於遇合之際，率歸之天，今予之得遇主上，用西法以定運，進修士以演教，道之將行，日升月恆，殆未可量。又不特一身之感

恩稱知遇而已。謂非

天主上帝（五四）默作合於其間，可乎。用是斯夕，輸誠仰圖報答，計莫如崇祀。乃於

賜地之中央構榭，內供

聖母抱

天主耶穌，名聖母堂，以資焚祝。自是歲時趨謁，行彌撒禮，誦祈普庇無斁。而奉教友輩，有造門瞻叩申虔者，其務議所從來，伏禱

上祐曰，致吾

君於堯舜，綿

國祚於無疆。斯爲實獲我心者矣。

順治十七年歲次庚子孟秋穀旦

敕賜通玄教師通政使司通政司加二品又加一級掌欽天監印務湯若望譔」(五五)

比皇帝這一些物質賞賜，價值還要大的多的，是皇帝向湯若望所賜的尊號，和爲讚頌傳教士，讚頌天算科學和基督教，所頒發的數次偉大的褒揚諭旨。這諭旨曾向全國公佈，並且爲未來的人民記錄了下來。

像在歐洲一樣，爲國爲民立有殊勳的人們，俱皆經國家予以極密顧問官 (Geheimrat) 之銜，以示崇敬，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中，這官銜多半都是一空銜號，並沒有實缺的，在中國底朝廷上，類似的情形也是有很大一批的。在這裏，皇帝爲報酬一位官員底功勳起見，多半也加賜朝中高位的銜號。這樣，譬如各省之高級官吏，尋常都獲有一更高的朝中品級。譬如說一位巡撫，他是一省中最高的官吏，按他實際上的品級說，只是二級正品的官員。這爲一位在外省有這樣偉大權威的人，似乎有些過於輕微了。這樣他尋常便還有一個更高的加封的榮銜。凡經這樣榮銜所表彰的官員們，都完全施用他們這榮銜上的章號，而與各該銜號之實缺官員一律平等。不過在公事方面，他們

的責任却就不能相同了。在中國也是有些純粹空的，並無職缺的尊號的。

湯若望實際的官銜，始終僅只是「欽天監監正」。他這欽天監監正之職，僅只是五級正品的官員。這個官銜爲一位皇帝底顧問和爲皇帝所特別優遇的師友，自然是不够崇高的。這樣他僅榮譽虛銜一方面，就很疾速地昇到了很高的地位。

譬如一六四六年七八月之間，就是在攝政王攝政時代，他已榮膺加封太常寺少卿的銜號，就是掌管皇帝祭祀事項的副長官，而其官級則爲第四級正品（五六）。

一六五一年九月十五日之一日內，湯若望竟獲得三個加封的銜號，即通議大夫，太僕寺卿，太常寺卿。因末後所說的這太常寺卿之銜號，湯若望竟成了一位第三級正品的官員了（五七）。

一種純粹榮譽的尊號，並非由朝中官職官位之所移贈者，湯若望於一六五三年四月二日爲皇帝之所賜與，即通玄教師（五八）。至於說，這個賜號怎樣得以成立的，湯若望在他自己所寫的生活回憶錄中，曾有所敘述（五九）。他說，在一六五三年之開始，他曾乘一時機之便，到宮殿旁的御馬廄中去。這時皇帝偶然從這裏路過。皇帝同他作了一次較長的談敘之後，他就多次催促湯若望，

向他作一次陳請。可是湯若望竟回絕皇帝，無所請求。所以皇帝便升轎要離開這個地方了，但他馬上就又令轎子停止，使兩個內臣向湯若望傳旨，瑪法總得要向皇帝請求一點恩澤的！這樣湯若望就決斷，懇求皇帝敕賜一關於欽天監之詔諭，免得他二十餘年的工作竟致喪失，並求皇上恩准欽天監管理之權常留傳教士之手中。一開頭他本想求皇帝認可基督教的。但是他又想這必定會使基督教的一切仇敵們，又都要鑽了出來，加以攻擊阻撓，而使舊日那誹謗誤會又要重演了。如果欽天監監正之職，能常歸傳教士管理，已經足可爲教之光榮，而在國內足可爲傳教士們，處處闢自由的道路了。皇帝賜這尊號時，所降的諭旨，八成爲皇帝親口所授，而爲內閣所製定的，在自由的意思的譯文中，是已經屢次發表過的了，我們在這裏可以把牠再力求切合原文翻譯一遍，列之於下：

（原文見黃伯祿正教奉褒）

「皇帝勅諭太常寺卿，管欽天監監正事湯若望」

朕惟國家肇造鴻業，以授時定歷爲急務。義和而後，如漢洛下閎，張衡，唐李淳風，僧一行諸人，

於歷法代有損益，獨於日月朔望，交會分秒之數，錯悞尚多，以致氣候刻應不驗。至於有元郭守敬，號爲精密，然經緯之度，尙未能符合天行，其後晷度亦遂積差矣。爾湯若望，來自西洋，涉海十萬里，明末居京師，精於象緯，閎通歷法，其時大學士徐光啟，特薦於朝，令修歷局中。一時專家治歷，如魏文奎等，推測之法，實不及爾。但以遠人之故，多忌成功，歷十餘年，終不見用。朕承

天眷，定鼎之初，爰諮爾姓名，爲朕修大清時憲歷，迄於有成，可謂勤矣。爾又能潔身持行，盡心迺事，董率羣官，可謂忠矣。比之古洛下閎諸人，不旣優乎。今特錫爾嘉名，爲通玄教師，餘守秩如故，俾知天生聖賢，佐佑定歷，補數千年之闕略，成一代之鴻書，非偶然也。爾其益懋厥修，以服厥官，傳之史冊，豈不美哉，故諭。

順治十年三月初四日〔六〇〕

這一篇皇皇褒揚的聖諭，悉用滿文和漢文繕寫在方四周雕刻有精工的二龍戲珠邊緣的木匾上，並且懸掛於北京耶穌會之大客廳內（六一）。「通玄教師」的字樣，本來是指天算說的，但

是也被許多基督教徒，以及自然也被許多教外的人們，理解爲基督教的。

四年之後，即一千六百五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皇帝下命於教堂前立碑一座，並刻碑文一篇，在這碑文中，湯若望仍被在這同一賜號之引用下所褒揚，而同時傳教會與基督教，亦均被加以崇敬。碑文如下：

「自漢以還，迄於元末，修改者七十餘次，創法者十有三家。至於明代，雖改元授時歷爲大統之名，而積分之術，實仍其舊。洎乎晚季，分至漸乖，朝野之言，僉云宜改，而西洋學者，雅善推步。於時湯若望航海而來，理數兼暢，被薦召試，設局授餐，奈衆議紛紜，終莫能用。歲在甲申，朕仰承

天眷，誕受多方，適當正位凝命之時，首舉治歷明時之典。仲秋月朔，日有食之，特遣大臣，督率所司，登臺測驗，其時刻分秒起復方位，獨與若望豫奏者，悉相符合。及乙酉孟春之望，再驗月食，亦纖毫無爽，豈非天生斯人，以待朕創制立法之用哉。朕特任以司天，造成新歷，勅名時憲，頒行遠邇。若望素習泰西之教，不婚不宦，祇承朕命，勉受卿秩，洊歷三品，仍賜以通玄教師之名，任事有年，益勤厥職，

都城宣武門內向有祠宇，素祀其教中所奉之神，近復取錫寶所儲，而更新之。朕巡幸南苑，偶經斯地，見神之儀貌，如其國人堂牖器飾，如其國制，問其几上之書，則曰：此天主教之說也。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講求者，精一執中之理。至於玄笈貝文，所稱道德楞嚴諸書，雖嘗涉獵，而旨趣茫然。況西洋之書，天主之教，朕素未覽閱，焉能知其說哉（六二）。但若望入中國，已數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獨潔，始終不渝，孜孜之誠，良有可尚，人臣懷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因賜額名曰：通玄佳境（六三），而爲之記。」

這篇碑記之後，還繼續書有二十句四言的銘，表現上面全部碑文之內容。二十句之末後四句，原文如下：

「事神盡虔。

事君盡職。

凡爾疇人。

永斯幹式。」

還同在這一六五七年一年裡，即在十至十一月間，皇帝還又授湯若望一新榮銜，通政使司通政使。這就是殿中辦理接受與驗鑒由各省呈上來之奏摺的辦公處。官階是第三級正品（六四）。

最後在一六五八年二月二日湯若望又被皇上授與光祿大夫之封號。這僅只是純粹的一個虛銜，並無實職的。可是這樣湯若望便成了第一級正品的官員了（六五）。只是閣老與最體面的皇室親貴，因他們地位之崇高，纔得列於第一級官員之行列中的。自是之後，他所穿戴的銜號，便是官帽頂上一顆紅寶石作帽頂，朝服上以展開雙翅之仙鶴作繡徽（六六）。

按照古代習俗，湯若望望底祖先亦是應當參與他的榮銜的，因為他的品級與封號，都是有追溯的效力，要延展到他們的。此為崇敬與報恩心理之所要求。

這樣在一六五一年他被封為第三級官員的時候，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經皇帝之詔諭，封以

同等品級。這種現在在歐洲並不少見的中國皇帝底詔封上，是很有趣味的，如果我們把各詔封制定日期彼此加以比較。頒封湯若望的詔書，是順治八年八月初一，即西曆一六五一年九月十五日。頒封湯若望父母的詔書，尚遲十日。中國人所固有的以十數劃分每月日時成組的分法，在這上頭是可以應得出來了；祖父母是更尊重的，所以詔書之頒發，自然要先於父母了。

當在湯若望於這一六五八年被封為一品大員時，湯若望底前三代也是應當如同他一樣要受到封典的。皇帝關於這封典所頒發的制書是於一六六一年之所繕成的，而於康熙元年，即一六六二年，加蓋玉璽發下的。

在這些詔封上，湯若望之父與祖皆書湯若望中文姓之湯字。而其曾祖父之名字約翰，則書為琮珞 (Tu-lu)，即寶石之意；祖父之名字約翰，則書為玉函 (Yu-han)，此則為歐洲名字約翰之極切近的譯音了。湯若望父親底名字，則書為利國 (Li-kuo)，即有利於國之意。湯若望之母與祖母等則皆賦以尊貴之中國姓字，而在這一點上，中國人之精細的禮義心，俱都表現了出來。因為湯若望母親之姓，則書為謝氏，祖母書為郎氏，而曾祖母，她是獲得最多的崇敬的，則特書為中國皇室之

姓趙氏（六七）。

我們在這裏特把皇帝頒發湯若望會祖之馳封文件，力切原文的譯附於下。我們在那篇譯文上，也可以獲得關於中國台閣文體之不可模擬性的一段例證。

「我們誠惶誠恐奉到奉天承運統治全國大皇帝陛下諭旨一道曰：

如果真道正學得以宏揚光大，朝廷必將昌明隆盛。如果流水不忘其泉源（這換句話來說，就是如果人們處處不忘本，感恩知恩）時，那人類就可以享到百世千世的幸福了，因為一所新建築物，是建築在古人所創立的基礎上的。那麼，那也是理之所當然的了，把後來的榮耀遠遠的向後延展了回去。

你湯孫珞，爲湯若望之會祖，湯若望受皇帝之眷顧，賜以「通玄教師」之尊號，並賜以「通政使司通政使」之銜號，賞帶正二品加一級之頂帶。掌管印信於欽天監之職務。你一生所積的陰騭，在你的後人身上生出了至豐富的果實，這是一條很神秘的，怎樣可以獲得榮譽的道路，這

是那些小人物們之所不識不知的。陰騭底源頭是遼遠的，而一種垂世不朽的功業，只是經過久長的積疊準備，方能得以成功的。

因此我們特把光祿大夫以及通政使司通政使之銜號，馳封與你，並賞賜你正二品加一級之頂帶。我們以皇帝仁惠的濬允，把這件公文發交與你。

你真可謂幸運了！在你的第四代的後輩中，因皇帝寵眷的新表示，增益了你的榮譽。因你後人中一人底德性，你從此將要永久受到皇帝之恩澤。」

這樣滿清第一代皇帝敬重了他如師如父的良友。自皇帝方面說，他向湯若望所表示的這種崇敬却非太過的。這與湯若望在朝中所占地位與身分相適合。他是國內影響與威望最大的一個人物。一六六一年，南懷仁 (Verbiest) 曾寫下列關於湯若望的文字：「湯若望因他對於皇帝的影響，所以能力之大竟超過任何一位總督巡撫，或任何一位更加體面的親王貝勒，而傳教士湯若望之名字在中國之稱著熟聞，是較比任何一位歐西著名人物底姓名之在歐西，都還要優異的。」

(六八)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僅只能獲得約略與湯若望近似的勢力威望的其它例子，也是我們在中國的歷史中之所搜尋不出的(六九)。然而我們也可以斷定，湯若望以他對於皇上和對於國家所盡的赤誠忠心的職責，會充分報答了皇上所畀與他的這親信與敬仰。

順治和瑪法之間的個人關係非常深厚親切。「尙父」真正愛護他的潑動輕躁，易爲色慾所燃燒的幼子，並且嘗試着要把他造成了一位優良的人物和一位基督教徒。可是這兩點都未得與他成功，是他極引以爲憾，而深致其悲傷的。他對於青年幼主令人殊覺不值的死亡的哀痛是人們現在還可以由他所寫的生活回憶錄中讀得出來的。

六

一六五八年皇帝遭遇一酷烈打擊。第三位皇后所生之子，原定爲皇位繼承者的，於產生後不久，即行薨世。關於這位皇子殯葬的情形，在以後繼續數年的歷史中，是我們還不得不屢屢提及的。欽天監內所設之一科，應行按照舊規則，規定殯葬正確地點與吉利之時刻。這一件事情是這一科

裡辦理了的，並且還向朝中上有一份呈報。可是這次殯葬儀式是歸滿籍之禮部尚書恩格德（Engel）之所辦理，他竟敢私自更改殯葬時刻，並且假造欽天監之呈報。於是這位太子，便被在一個不順利的時刻裡安葬。這樣便與天運不合了。因此災殃竟要向皇室降臨。這位太子母后底不久崩殞，就是頭一次所發生不吉利之事件。此外還有其他兩件死亡事件繼續發生，這兩次事件是我們馬上就要敘述的，並且最後甚至皇帝晏駕也都歸咎於這次殯葬底舛錯。湯若望為保護他手下的屬員起見，對於這位大臣底擅改與捏造具摺奏明朝廷。這位大臣因他所犯的這重大罪惡自然要被判處死刑。湯若望為他向皇帝求恩，所以他竟得免除死刑，僅只革職充軍。這位大臣不但不向湯若望表示感恩，反而向湯若望銜了一種極端的仇恨（七〇）。

順治自這個時期起，愈久愈陷入太監之影響中。這一種下賤人民，當在朝代更替的時期，俱都被驅逐出宮，成千成百地到處漂泊，然而這時却漸漸又被一批一批收入宮中，照舊供職。這樣被收入宮中而又從新紮根築巢的太監們，竟有數千名之多。這一些人們使那些喇嘛僧徒，復行恢復他們舊日的權勢。還要惡劣的，是他們誘引性慾本來就很強烈的皇帝，過一種放縱淫逸生活（七一）。

順治皇帝對於一位滿籍軍人之夫人，起了一種火熱愛戀，當這一位軍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時，他竟被對於他這申斥有所聞知的「天子」，親手打了一個極怪異的耳摑。這位軍人於是乃因怨憤致死，或許竟是自殺而死。皇帝遂即將這位軍人底未亡人收入宮中，封爲貴妃。這位貴妃於一六六〇年產生一子，是皇帝要規定他爲將來的皇太子的，但是數星期之後，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於其後不久亦然薨逝。皇帝陡爲哀痛所攻，竟致尋死覓活，不顧一切。人們不得不晝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殺。太監與宮中女官一共三十名，悉行賜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全國均須服喪，官吏一月，百姓三日。爲殯葬的事務，曾耗費極巨量的國帑。兩座裝飾得輝煌的宮殿，專供自遠地僻壤所召來的僧徒作館舍。按照滿洲習俗，皇妃底屍體連同棺槨，並那兩座宮殿，連同其中珍貴陳設，俱都被焚燒（七二）。

此後皇帝便把自己完全委託於僧徒之手。他親手把他的頭髮削去，如果沒有他的理性深厚的母后和湯若望加以阻止時，他一定會充當了僧徒的。但是他仍還由杭州召了些最有名的僧徒來。那些僧徒們勸誡他，完全信奉偶像，並且把國家底入款，浪費於廟宇底建築上。

湯若望儘他能力之所及，使這被眩惑的人再恢復他的理性。他向皇帝呈遞一本嚴重諫正的奏疏。皇帝並不向他見怪。他說，瑪法這諫正是對的。一六六〇年七月二十八日皇帝使人持旨到湯若望館舍中，宣召湯若望，諭旨如下：「你的教律已經傳佈到了極廣遠的地方。因你的努力，天算之科學已經昌明。這樣，若望，你爲國家宣力。皇帝之心，焉能不非常愉悅呢！你，湯若望，知道人們應當怎樣治理國家。因此你立即到我這裏來，以便議論國家大事。若望，你要常常紀念我的言詞於心中。」

(七三)

湯若望必定是直接應召入宮，覲見了皇帝的。但是這位青年無些時日竟又成了僧徒手中的一個傀儡。瑪法竟被視爲討厭不便的諫正者，而被推至一邊。僧黨甚至獲得允許，以皇帝底名義發表一種反對基督教之文件。但是這却未曾得以實行。因爲皇帝出人意料之外地疾速晏駕。

如同一切滿洲人們一般，順治對於痘症有一種極大的恐懼，因爲這在成人差不多也總是要傷命的。在宮中特爲奉祀痘神娘娘，是另設有廟壇的。或許是因他對於這種病症的恐懼，而竟使他真正傳染上了這種病症。

在這個消息傳出宮外之後，湯若望立即親赴宮中，流着眼淚，請求容許他覲見萬歲。人們把這件事情稟報給臥病的皇上。皇上答復，湯若望底忠誠很使他感動；如果他覺得身體好一些時，他一定要召瑪法進宮的。湯若望又令內臣轉奏，皇帝陛下靈魂底永久福樂，現在是到很危急，而令他不得不着急豫心的地步。他至少願意請皇上，把他親自所帶來的文件閱讀一遍。文件上說的是人類死後的情形與天國的永生。皇帝深深地感歎，當他讀了這文件時。他說他也知道，湯若望是真愛護關心他的。但是因為他許多的罪惡，他覺得他是沒有見上帝的資格了。如果他要再恢復康健時，他一定要信奉湯若望底宗教。可是現在他的病症是不容許他作這件事情的（七四）。

一位繼位的皇子尚未詔封。皇太后立促皇帝作這一件事體。皇帝想到了一位從兄弟，但是皇太后和親王們底見解，都是願意皇帝由皇子中選擇一位繼位者。皇帝使人問湯若望底意見。湯若望完全立於皇太后底一方面，而認被皇太后所選擇的一位太子為最合適的繼位者。這樣皇帝最後受到湯若望底勸促，捨去一位年齡較長的皇子，而封一位庶出的，還不到七歲的皇子為帝位之承繼者。當時為促成這一個決斷所提出的理由，是因為這位年齡較幼的太子，在髫齡時已經出過

天花，不會再受到這種病症的傷害的，而那位年齡較長的皇子，尙未曾出過天花，時時都得小心着這種可恐怖的病症（七五）。這位這樣被選擇的皇帝，後來在康熙年號之下，竟成了中國最大君王（七六）。這是湯若望最後一次爲皇帝所劃的一個良策，而於國家前途有莫大之福利。同時在「輔政大臣」的名義之下，四位體面的滿人被封爲攝政者。他們的名姓即：索尼（Soni），蘇克薩哈（Suksaha），遏必隆（Ebitung）和鰲拜（Aobai）（七九）。

順治病，倒三日之後，於一六六一年二月五日到六日之夜間駕崩，享壽還未滿二十三歲（七八）。新皇帝登極，文武百官俱都到一大殿中，在一偶像前，作向新皇帝矢忠之宣誓，湯若望和其他官員一樣，也是應當作這種宣誓的。他當着那一切官員之前，大聲認承基督教之眞信仰，然後以天主之名義，施行宣誓典禮。這給新皇帝之太皇太后與皇太后，作出一個這樣深的印象，竟致使他們請求這位傳教士，爲康熙禱告，並令教中教友爲新皇帝禱告（七九）。

四位攝政大臣以一種非常優良的舉動，開始他們的政務。因爲宮殿中之五千名太監，竟有四千名登時被革職，驅逐出宮。宮中僅留千名執下等役務。此外還新訂律條，任何太監不許擔任國家

公務。就是連那一批子僧侶們，亦不得不引退。他們所作的那一些誣陷陷害的文件，俱都被焚毀。舊皇之後宮，亦被解散（八〇）。

湯若望於短時期內，向這四位攝政大臣，作職務上之拜謁。雖然這四人中有一位——就是蘇克薩哈——是最惡劣種類的基督教仇視者，但是他們仍還以巨大的和藹接見他，令他坐於旁邊，向他敬茶，並且請他以後仍爲皇帝之顧問。湯若望現在又獲得「皇帝之師」（*Lehrer des Kaisers*）之尊號（譯者按：此或即我國舊日朝中太師之譯文）（八一）。湯若望還屢次被這四位攝政者之所顯揚表彰。

爲這一種褒揚上的一個原因的，譬如說：就是湯若望所作的一種一等技術的發現。因爲數年前，在北京城外各地，會偶然發現五口俱皆有二百餘年歷史，和巨大分量之鑄鐘。在攝政開始前之短時期，這五口鑄鐘中之最美麗與最巨大的兩口，須要懸掛到一座一百五十歐洲挨命高之鐘樓上去。湯若望爲懸掛這口鐘，特行構造一種特殊的起重機器。這五口鐘中最美麗者，內外鑄有銘文一萬字，此外還有種種其他彩飾，其重量據說有十二萬中國斤，這口鐘竟被湯若望所製造的機器

毫不費力在衆人底驚奇之下，被引舉至高處。可是四個月之後，這座鐘樓竟被焚燬，而大鐘隨之受損。兩年之後，就是在一六六三年，這座鐘樓又被修復，於是湯若望現在又把其他略有遮色，但却比前口鐘還要巨大的鐘，弄到了高頭去，懸掛了起來。按照南懷仁底言詞，這些鐘都是比德國艾府城（Elph），經世人所視為最大的鐘，還要加大的，因為這口鐘底重量僅止有兩萬五千四百德國磅（八二）。死去的皇帝底母親，即這時的太皇太后對於政府有巨大的勢力，對於湯若望，她所稱爲「義父」（Vater）的，仍時時懷有善意好感，她仍舊很豐富地賞賜湯若望，並具爲一種特別寵惠的表示，就是她常把她自己所作的御宴上的食物，使人分賜湯若望。這樣在湯若望在朝中的地位一直到一六六四年，並無所變動。

第十章 傳教士與中國基督教之總機關

湯若望神甫以欽天監正和皇帝顧問之資格，間接所作傳教工作，是有很高價值的。因為這一種供職朝中之舉，是他和一切傳教士，都覺得爲一種不可缺少的傳教手段，所以他竟把他的全力完全貢獻到這種工作上頭來。然而嚴格意義之下的傳教工作，却時時刻刻是他心目中最喜愛的任務。

湯若望以傳教士底地位對於皇帝個人的情形，我們在上文已有所敘述。同時他還在北京之傳教區中，爲信仰之宣傳予以努力，並更利用他的體面位置，促進全國傳教之事項。

湯若望是北京耶穌會會長，並且是韃子城西南城門下救世主教堂（Erismenkirche）內之傳教士。在教務上他很稀少的時候有輔佐的人員，此項人員是可以減輕他的工作底一部分的。

與他同在這一所教堂內居住的時間最久的，是龍華民（Nikolaus Longobardi）。這一位意

大利國西西里 (Sizilien) 島上的平民，生於一五五九年，一五九七年到中國，在這裏，他差不多從開始時期起，即已親身經歷並親身籌劃了傳教會之發展，他是一位人們所罕見的傳教士——身體魁梧高大而有膂力，顯頗爲一部極長極濃密之鬚鬣所繚繞，飄滿胸前，望之岸然，然而同時却又爲一非常靄然可親之現象，實際上他也真正被一般人們之所尊敬與親愛。——在最後的時間，他由濟南府終於又移居北京。但是這位已經到了九十歲的老人，是幾乎不能被視爲有十分實力的工作人員了，雖然傳教會之考語冊中，一直到他的末日，仍在稱讚他的健康鏗鏘。人們念及他邁年高齡，特令他在北京過一些安靜末日，他在北京又住了五年，滿了九十五歲，纔於一六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去世(一)。這樣北京便又成了一次大規模的宗教殯葬儀式的目擊之地了。皇帝賜治喪銀，價值合三百都卡 (Dukaten)，並且令人把這位他所很敬仰的人物底影像畫了下來，畫像穿着白色祭衣，坐於教壇上作講道之姿勢(二)。

一直到一六五一年傳汎濟神甫 (P. Franz Furlado)，因爲充任北方傳教會會長之職，所以便屢次居留首都北京。然後他又以日本與中國傳教會視察員 (Visitor) 之資格，移居澳門，

在這裏他於一六五三年去世。

許多其他傳教士，在北京作較短時期之逗遛，或充當輔助教士，或僅止客居，以便爲其他工作準備。一六五一年之前，我們曾多次在北京發現索德超神甫 (P. d'Almeida) 之踪跡。汪汝望神甫 (P. Johann Valat) 自一六五一年至一六五三年爲湯若望之助手，一六五三年他轉赴濟南傳教；一六五六年我們又發現他到北京。穆尼各神甫 (P. Johann Nikolaus Smogulecki) 於一六五三年因爲數學知識優異，特奉詔自南京赴北京，然而他却遞補了龍華民所遺留的傳教士之缺，不過連他也是不會在這裏久居的。自一六五九年以後，我們在中國首都還曾發現許許多多很著名的傳教士，即蘇納 (Bernhard Diestel)，白乃心 (Johann Grueber)，吳爾鐸 (Albert Dorville)，和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等人。這些傳教士中之頭三位，原被特選担任其他任務的，僅止在北京停留短時期。至於南懷仁，是於一六六〇年，由陝西奉詔赴京，規定爲天算之繼任人員的。他到北京後，竟成了湯若望底忠友，並在他末後數年的難期中，爲他一個營救辯護的人。

有兩位傳教士，即利類思（Ludwig Buglio）和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自一六四八年時常居住北京，但却在城之東部，他們在那裏創立一新基督教區，既而也竟獨立教堂一所。建立這座教堂的特殊情況，和他們二人對於湯若望的關係，統於另章詳述。

此外也還有一位方濟各會之傳教士（Franziskaner）時常來訪湯若望，而在教堂內協助了神事。這位傳教士就是栗安當（P. Antonio Caballero de Santa Maria），為中國新方濟各傳教會之創立者。一六四九年八月初間，他第二次到中國，而於福建省之海岸着陸。他現在是宗座代牧區區長（Apostolischer Präfekt）並且是和其餘方濟各傳教會無關係的。這一位喜歡工作，好動不好靜，而富有冒險心的人物，自行決斷，要到高麗去創建傳教會。一六五〇年七月底，他始入北京。他希望，可以同到北京進貢而返國之高麗使臣團結合一起。但是他到北京時，這高麗使臣團已經起程返國。他也曾聽說，沒有皇帝底允許，是決不能入高麗國的。這樣當然是得湯若望幫忙的了。傳教士栗安當蒙湯若望巨大的和鶴所接待，並且又曾留他在耶穌會所內居住了幾天。湯若望向他說明，他到高麗建立傳教會的計劃，因當時高麗有亂事的原因，是不能施行的，因此他就向他

提議，暫到濟南府去主持教務，因為那裏恰巧是沒有一位傳教士的。栗安當神甫在湯若望寓所一間高頭的房間內，於一張基督聖像前，也感到了一種神示的內心要求，竟自接受了湯若望的提議，而於十月底行至濟南。湯若望曾給他寫了一封呈交一位素有交誼的官員的薦信。這位官員和他的官吏們，幫助這位方濟各會傳教士，解決了建立傳教會的種種困難。一年之後，他在包納紋圖拉·依拔乃慈神甫（P. Bona Ventura Ibañez）之身上獲得一個傳教伴侶，連這一位傳教士也曾屢次到北京來，拜訪了湯若望（三）。栗安當神甫於一六五二年春天，還又自北京出發作了一次赴高麗的嘗試（四）。

關於湯若望在教會內所作救渡靈魂的工作，我們由栗安當神甫和耶穌會士之報告中，可以在到處獲得些瑣碎記錄，這些瑣碎記錄足可使我們製出一全部的概覽來。可惜我們對於教區內教徒之數目，所獲得的可靠計算是很少的。他們在那時候對於教會統計並不甚理會。他們不過有時，把每年所付洗禮的次數作一攏統報告而已。因此，奉基督教的父母底兒童們底洗禮和將死的外教兒童們底洗禮，是否也包括在這個總數中，那也是瞧不出來的。教堂內每過一個節日，信徒底

數目差不多都要增六七個或更多的新人物。一六五一年湯若望在北京所付洗禮的人數，在教會底年報中所報告的爲一百一十九（五）。兩年後，在北京受洗入教的爲五百名，在四郊受洗入教的總在千名以上，這個數目中自然也包括了利類思和安文思所新勸化的（六）。在湯若望傳教區中於明朝末後皇帝和清初第一任皇帝政府之下，一直到一六五八年，受洗歸化的成人總數爲五千名（七）。至於說湯若望傳教區內男女老少，基督教徒之數目究有多高，這是他自己也知道不清楚的。一六六三年之教會名冊中，所記湯若望北京傳教區，教徒之數目約一萬三千人。此外京師以外傳教區之教徒，都未在此數之內。僅河間府基督教徒之數目竟還有兩千人（八）。

教堂內教徒人等來來往往，生活極爲繁忙。清晨最早的時刻，信徒們都到教堂中來，跪於前院中，等候教堂的門敞開。一整天任何一個時間裏，人們在教堂內都能發現基督教徒與外教的人們。在教堂裏的重要節日，信徒們都由教堂臨近的地方，潮水一般的奔聚教堂之內，作祭祀的神事。

當時在教會中爲男子們是有三種教會底組織的，爲婦女們亦有這三種相同的組織，但却另自分立，而不與男子們相混攪，即：救靈會（Bruderschaft für die Armen Seelen），慈善救助會

(Bruderschaft für karitative Hilffleistungen) 和教友喪事會 (Bruderschaft für die Feiern der Begräbnisse)。這喪事會是這三種組織中的最重要的，這是要對付外教人們指責基督教徒不以死者爲念的原因了。這三種會每月聚會五次，男子們在大教堂中，婦女們在與大教堂毗連的瑪利亞小教堂中。男女二性之分立，是他們始終堅持遵守的，雖然滿人中婦女之封鎖，並非那麼嚴重要求的。

在星期日與教堂底其他節日，都歸湯若望講道作神事，他也還兼爲各會開會時的主席。他更獨自一人在教會的節日內，付與教友聖體，如果並沒有偶然的一位幫助的人員在教堂內時，並且還須作教堂以外的神事。此外他還和一位中國士人，替換着向教徒授以教義問答功課。爲指導信徒和非基督教徒，教堂內時時刻刻都有兩位教義問答導師供應用的。

在每日作彌撒 (Messe) 時，都要有兩位或四位湯若望屬下奉教官吏，穿着祭衣幫助他。在較大節日人數還要加多。教堂內的禮節都是以非常確切遵守了的；一切禮節俱以高尚莊嚴舉行，還是人們在這一禮節之邦的民族，可以意料的。湯若望對於這些禮節也很注意，而對於教堂之裝

節亦並非不在行，這是一切傳教會底報告中所盛稱盛道的（九）。

教堂內自復活節前一星期到復活節正日，所應舉行的儀式，湯若望都很虔誠熱心舉行。聖安當神甫對於湯若望所舉行的這一種宗教儀式，獲有很深刻的印象。在教堂內關於耶穌受難始末之主要節目，俱皆以圖像陳列表彰。堂內大祭壇上聳立着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塑像。復活節前最末之星期日，傳教會之會所內舉行遊行之儀式，復活節前之星期四，為紀念耶穌為其弟子洗足的聖史，信徒們整天整夜虔誠熱烈地在教堂中朝拜至神聖的聖像。復活節前耶穌被釘死之苦難日早晨，湯若望宣誦耶穌受難歷史。在宣誦時，他竟被感動得流了許多眼淚，簡直有時使他連話都說不出來。信徒們都是把帽子摘去，二人一組向聖十字架前伏地禮拜（一〇）。

這一些宗教節日之外，非常莊嚴鋪排舉行的，就是聖體瞻禮日（Fronleichnamfest）了。在這一節日裏，北京之人民又得瞻仰一幕教會內人們，在奉教官吏手執火焰熊熊的火炬的參加之下，圍繞着教堂所作的公開巡遊的熱鬧。柏應理神甫（P. Couplet）在澳門曾聽說參加這一次公開遊行的官吏，竟有八百名之多（一一）。人們由這一點可以看出中國的傳教士，對於宗教的

遊行，是多樣興奮講說的。

湯若望以充分的熱心從事於教友靈魂救渡的事務。在這樣的事務上，這位事務繁忙的人決不吝惜時間。他每次都感到極大的快樂，如果他能得到收效果時。僅關於一件單獨的事故，他也能寫一封極長的信，報告給他的朋友潘國光神甫（P. Bianchi）在這一點上，這位傳教士底深邃感覺的心情，俱都顯示了出來。

有位滿州親王——湯若望稱呼他爲圖耳胡貝勒（Turhu Poylo）（111）——由一六四四年在教會之近隣領得了府邸。還在這一年裏，湯若望奉召赴這位親王底府邸，爲他的難產將死的妃子祈禱禳災。湯若望把聖依格納爵底一件遺物，給她掛在脖項上，她竟居然很順適地產生了一男嬰。這位親王，他本來是常不在家中的，對於他這位虛弱多病的孩子殊少顧慮。這個男孩漸次長大，當在他一開明悟時，他對於湯若望心內就起了一種至深的親愛，這親愛是湯若望也以親愛報答了的。他長到六歲時，得了一種極危險的病症。湯若望暗暗地給他領了洗，並且還以他的約翰聖名給這小孩子命名。繼而這小孩生命底危險竟被克服，但是他的病根仍未得以盡除。在繼續

的時間裏，這位男童都是在他的教父底寓所和教會內，度他的時間的大部分的。他的感恩心非常令人可感動。每日早晨教堂中神事後，他輒堅意執行向湯若望表示園內通行的敬禮，就是他三次，有時竟致是九次，如同向皇帝行大禮一般，伏身跪下，以額部觸地作叩首禮。他每次赴教堂都從家中攜帶美味食品，並且在門前很盡忠地守衛，如果湯若望于午飯後退入私室作午睡時，這個男孩因為非常勤奮好學，所以不久便把教會底課程，都學習得很好了。他是一位最勤奮進教室禮拜的人。因他身上那許多種病症，他情願飲最苦的藥物，因為這是他的「恩父」所願意他作的。在他末後一次的病勢發作中，他的親屬們又把他接回他的父王底府邸中，在那裏湯若望曾屢次來探望他。這位男孩在一六五一年他的宗教命名日去世，剛剛七歲；湯若望來時他恰好吐出他最後的一口氣息。人們不允許他把這位孩子埋葬了。死者按照滿洲習俗舉行火葬。湯若望搜集焚化的餘燼，把他埋葬於教堂內之地中。他還寫了一首拉丁文的哀詩，刻在木板之上（二三）。數日之後，他相信在夢中瞧見了這位滿身光明的男童，並且相信聽見他口裏說了這幾句話：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捨棄了我。但是上帝却收留了我（見聖詩二十六節十句）還有其他一次，他瞧見他在許多同伴

的圈環裏，並且聽見了他說這樣的話：爲什麼恩父你還憂愁呢？湯若望確切地說，他並不是一位僞善者，這兩次的言詞都是他清清楚楚聽到了耳內的。

湯若望述說了這件事，是因爲潘國光曾向他諮詢向滿人祖國去傳教的希望的。湯若望還補充說，他還向親王們底其他三位兒子們和一大批漢人底兒子們付與洗禮。他說他同這些孩子們將來必要有一日，可以作永久的歡樂會聚的。在那些領過洗的成年的人們，這樣的一次會聚却是未必有的。而在那些成年的滿人，他却是絲毫效果也不會有的，即便是在那些品性較佳的滿人，這奉教的事情也是不行的。因爲滿人都過於沈溺，劫掠，燒殺，與淫樂的生活的原因。在西韃靼，因爲他們生來具有宗教的信仰，性格又較坦白，並且亦不那麼驕傲，所以傳教的希望或許較優。況且在東韃靼地方，滿人俱已入關，留於該處之滿人所剩無幾。僅在舊日的首都瀋陽尙可建立一傳教會，因爲自該處許多傳教士可以轉赴高麗（二四）。

菲律賓（Philippinen）也還有一位傳教士，就是德籍傳教士瓦爾特·桑恩伯（P. Walter Sonnenberg），亦名依格納爵·得·芒特（Ignatius de Monte），自一六五〇年起即與湯若望

連絡，爲的是可以到韃靼地方，或到高麗去，或至少亦可到中國來。自一六四三年起，當他被派遣到菲律賓時，卽已屢次爲中國傳教會出力，並且自耶穌會三位歷任總會長，也都獲得了原則上的允許。在菲律賓羣島上，他借爲漢人和混血統的人們作救渡靈魂的職務，以學習了中國語言與文字，可是湯若望並不能給他作出許多的希望來。因此這位很勤奮的人，也就真正終於留居菲律賓羣島上了（一五）。

連那位心思高尚的波蘭人穆尼各（Shogneck），他是湯若望最忠實朋友之一，也感到內心的迫促，要到滿人底祖國，去開創一個傳教會。他於一六五三年向皇帝所上的奏疏，蒙皇帝很好意地批答說：「關東一帶，地廣人稀，食宿諸多不便，無庸前往。中國內地各省，隨意往來可也。」至於說這一種崇高的朝廷寵遇，爲湯若望之所促成，這是決無疑問的了。這一紙可以視爲到處自由遊行的護照的上諭，曾在邸報上向全國的人民公佈。穆尼各在他還在世的那末後有限的數年中，對於皇帝這恩許，竟充分地應用了。他最末後的工作區域是海南島（Hainan）（一六）。

這樣，滿人之祖國暫時並未被傳教會之所涉及，而高麗也還很長久地仍爲一封鎖之國。

可是在中國傳教會幸因湯若望之威望與影響，已經達到了一個發達的高峯。這時傳教會在中國已經享到了充分的自由。傳教士俱都爲人民之所崇高景仰，而基督教徒亦可公然承認他們的信仰。

傳教士畢嘉 (Gabiani) 對於這個時代會寫下列的言詞：「我們傳教士之中任何一位，俱都被駐在各鞏固地點，各大城市，和各省分之文武官員之所崇高尊敬，因爲他是生活在一位被皇帝這樣所崇敬的傳教同人蔭影之下，並且因爲他這位同人是享有西來學者與道德崇高的人物之盛名的。這給與了他們在民間的巨大勢力，這樣他們便可以在善良份子底贊承之下，自由宣傳天主底律則，而使那虛驕的平民得以就範，更使那各黨派各黨魁底仇視的陰謀不能得逞，此外並能促進與保護新歸化的教徒，而處處可以公然地和光華燦爛地舉行宗教底神事」(二七)。畢嘉並且在他所寫的追悼湯若望的文章中又會說：「耶穌會和其他修會之每一位傳教士，只用說自己是湯若望底同人或親屬，那麼他就可以獲得，自由入國的允許，可以獲得高官顯宦以及各級官吏與人民底禮敬與重視，並且還可以要求自由傳教的允許，爲他的權利」(二八)。

穆尼各會寫：「湯若望手中操有皇帝種種寵遇之佐券……我們一切傳教士們都是在他名姓底蔭影之下，宣講宗教底福音的」(一九)。南懷仁於一六六一年向耶穌會總會長尼可爾(Nichel)作報告時會說，中國底人民相習以「偉大湯若望之宗教」(Religion des Grossen Schall譯者按，此或許當時我國老百姓所稱之爲湯老爺之教之譯文)稱呼基督教(二〇)。他又說：「除天主之外，湯若望就是一切基督信仰者之基礎避難救苦所」(二一)。

如同以前已經有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得以自生命之危急中救出性命，並且其他教士得以脫出巨大厄難，純粹因爲他們是湯若望底同人同志的原因，這樣我們在繼續的時間裏，也會碰到些類似的事件的。

一六五一年十二月間廣東省城二次被滿人所佔據，而全城不得不忍受滿人一種極殘暴可怕的懲罰處治了。當時在廣東省城的傳教士爲魯德照，城破之日，他相信，他是作了他這一生最末後一次的彌撒了；他令人們把教堂內的蠟燭全都點了起來，並且穿着祭衣，安然等待他的命運之臨頭。滿人奔入教堂之中。一位軍官抓着傳教士，希望可以逼索一大筆贖金；因了這一個原因，所

以雖然有人向他高呼，宰了他吧，然而他仍暫令他活着。五日之後，一位基督教徒得以聞知，這位傳教士所處的這危險。他向總司令報告，他們所俘虜的這位教士是湯若望底一位弟兄。登時魯德照便獲得了自由，和轉赴澳門之允許 (二二)。

李方西神甫 (P. Johann Franz de Ferraris) 以濟南府教徒之捐款，建築教堂連帶住宅各一所於濟南。一六五三年他忽然有一天被官方傳至衙門中，加以審訊，因為有人控告他傳佈鄙劣無恥之邪說。人們要向他施以笞刑，他已竟伸出了四肢，伏地準備受刑。這時忽然有一人喊叫說：「住了，這是湯若望底一位弟兄！」那位問官登時便吃了一驚，即刻停刑，他請求恕罪，並且令一隊衛兵護送這位神甫回家 (二二)。

一六五六年聶仲遷 (Grazdon) 到澳門。因為他是一位優等的數學家，所以人們派他赴廣東總督處，調停澳門與廣東間之爭端，可是這位官員竟令人們把聶仲遷和他伴隨的人李方西用刑具鎖了起來，意欲藉詞弄出一筆巨額贖款來的。湯若望對於此事得到了消息，登時自皇帝處弄出釋放二位俘虜之召旨 (二四)。

因湯若望底周旋，凡由歐洲來的傳教士們，都可以毫不費力地獲得入國之准許。這樣有一次竟有十四位傳教士，同時獲得了入國之牌照，這十四位傳教士是分組於一六五八年七月間到達澳門的（二五）。以數學家之資格，被召赴北京朝中供職之傳教士，爲蘇納（Digel）和白乃心（Gruber），經政府派隊護送至北京，沿途費用皆由公家供給。一六六〇年教務視察員翟西滿（Simon da Cunha）赴北京，爲的是要向朝中請求普通旅行之准許證。連這一件事情，也是經朝廷毫未躊躇予以照准了的（二六）。有一次皇帝會表示了一個志願，就是他願意在北京，有二十位耶穌會會士常川住紮。湯若望向皇帝表示遺憾說，這是不能實現的，因爲在全國所有的耶穌會士，也不過僅止這個數目，並超越不了多少的（二七）。

一六六〇年南懷仁因湯若望之奏請，奉召由陝西赴北京。在他穿行三省的道路上，他處處都被迎送，竟如官吏，並且在三十四座城市內，都是被安置在招待官員的館舍內宿歇的。在他的行李上都書有「學識淵博之南懷仁博士奉召入京」的字樣。他行抵首都之日爲六月九日（二八）。

湯若望由他的入款中，撥巨大的數目供他傳教的同人們的應用。一六四九年，當在人們責難

他，對他那許多錢財不善運用時，他已經就向副傳教區之評議部報告關於他自一六四〇年到一六四九年，十年間入款用項之確切帳目。在這十年的期間中，他所撥給各傳教士的銀兩，共爲一千一百六十七兩（二九）。其後在這一方面，對於他並沒有再發生什麼責難的言詞了，由這個情形中，我們可以推斷，人們對他是滿意的了。

連方濟各會與多明我會之傳教士，湯若望也是予以幫助的，這兩會底傳教士都很感激地承認他的幫助，並且都很崇高地敬仰着他。大致上我們可以由他們的報告中看出，當時這三個修會之傳教士間，都是有至優美的和睦情形。

根據畢嘉底報告，湯若望爲多明我會之傳教士所弄得的入國准，許竟達九名之多（三〇）。

濟南方濟各會之傳教士，湯若望多年間都是自動地未經邀請地予以施金以及作神事用的什物之援助，並且還給他們寫了些鼓勵的信件。他還會救了一位被誤告爲間諜的方濟各會傳教士底性命。傳教士栗安當很明白他的援助的價值，並且對於他充滿了感謝的心情。他所寫的些信件中，差不多每一封都要有關於湯若望所作可讚揚的事件，以作報告的。每年他或他的伴侶依拔

乃慈 (Thaier) 來北京一次，目的則在於復活節前一星期內，幫助湯若望作種種神事。「湯若望司鐸常常幫助了我們。」這是他於一六六〇年一月四日向菲律賓羣島方濟各會傳教省區長所寄的言詞；他請求這位省區長，也自他的一方面向湯若望函謝，並且也可以寄贈湯若望兩身白布祭衣，以便他大祭日穿用，因為在北京實在缺少精品白布的（三二）。同樣的是傳教士依拔乃慈稱讚傳教士湯若望，和他那富有效果而為全體傳教會的努力的言詞（三三）。我們更很驚奇地得知，甚至傳教士模拉來斯 (P. Joh. Bapt. Morales O.P.) 亦稱讚湯若望為教會所立之功績，而予以承認。(三三)

這是在一個時代裏的情形的，在這一時代裏基督教徒們，能得公然承認他們的信仰了。為這個時代的見證的，就是栗安當神甫。是很有趣味的，由這位方濟各會會士底口內聽到基督教徒們當時怎樣把十字聖架，作為光榮之章號頂帶了出去。他曾說：「為舉行殯葬儀式，一大批男女兩性的信徒們會合一起。繡有十字聖號的幡旗，教徒們高高舉着，排成行列，一邊走着，一邊口內唱着聖詩，穿越城市，伴送死者直至墓地。這可謂天主律則底一種，默然宣揚了——我們神聖的信仰，今

日在中國，已經能得這樣公然宣揚了，竟致處處都可以在基督教徒通達大街或市場的宅第底門上整年的黏貼以輝光所繚繞的耶穌與瑪利亞聖名的紙畫，而對於那外教人們的一切門扇上，在「門神」(三四)，就是在維羅宅第神紙名義之下，所繪畫的那一切的鬼魔，予以精神方面的毀滅了。許多奉教的婦女們，頭上所帶的珍貴飾物，往往是用銀質或金質或其他質料所製作的十字，並且無論男女基督教徒們，俱都毫無所懼怕地項懸念珠 (Kosenkrantz) 穿行街市與鄉村。」

在這裏栗安當神甫宣泄了一種見解，這種見解是對於耶穌會會士向外教的人們宣講十字聖道時所用的那一份謹慎小心，具有充分的瞭解力的。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雙目是向着西方注視的，栗安當神甫這樣思想，他以為這應當解釋為向傳教士們所作的一種應當在歐洲背負十字的要求。在復活後升天的基督，雙目是向東方注視的。這在他的意思之間是應當解釋為東方的外教徒與回教徒，都是些雇傭，應當以對於光榮的希望誘引的。因此那便是與上天底神意相合的了。在歐洲，主要的應以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向人民相示。在中國則主要的應以光榮的救世主，向人民相示的。前者以家中子孫底身分，奉召奮鬥，所以他們的光彩光榮便始終隱蔽，而無須

表彰；然而這後一批的人們，却以雇傭的身分，奉召勤王，而人們是得要把報酬給他們置之眼前的。

(三九)

這樣傳教會在這些年數裏，因為有湯若望在朝中爲教會說話，爲教會保護，便能獲得了很有可觀的成效。南懷仁估計，每年奉勸入教的新教徒底數目，總在萬名之上（三六）。畢嘉底計算更覺精確。按照他的計算，在一六五一至一六六四之十四年間，全中國領洗入教者之數目，至少有十萬零四千九百八十名，而衛匡國爲這十四年以前，自一五八一至一六五〇年之七十年的長久時間裏，所估計領洗入教的數目，約有十五萬名。（三七）在這兩種計算中，似乎都是成年人受洗禮的次數的估計。畢嘉寫他這本著作時，正住在廣東，很有機會，由一流的源頭作他各方面的調查。可惜我們自他的筆下並未獲得對於在一定的時期中生長的基督教徒底數目的報告。關於這一點，教務視察員得·嘎瑪神甫（P. De Gama）所造的表冊，可以給我們一種詳報。爲一六六三年他估計中國傳教副省區（Vizeprovinz）基督教徒之數目，爲十一萬四千名（三八）。這個數目內尚未包括中國南部，日本傳教省區之耶穌會，多明我會與方濟各會各傳教分區中之基督教徒。

在這最後的時期裏，高級官吏與最高級之士人受勸入教者，較比以前的年數頗見減少。這個原因，畢嘉以爲係屬因士人階級已到墮落地步，而新時期之官吏俱皆貪贓賂賄，沈溺酒色淫蕩生活之故。然他却也曾提及舉人與秀才兩種較低之士人階級中，竟也有基督教徒四百名（三九）。

一六六一年中國十五省區中，僅止雲南與貴州並無傳教士，然而在這兩個地方，却是也有熱心努力的基督教徒的。在這末後數年間，以徐光啓之孫女，卓越優異之康娣達·許夫人（*Candida*）和奉教官吏們之資助，得以建立教堂與傳教會邸址多所。這樣所建立的新教堂爲數有六；除康娣達·許夫人外，還有虔誠奉教的尤斯妲·趙，她是一位出身天璜貴冑的皇女，和外教的官吏們也都還捐有大宗款項（四〇）。

一六六四年傳教會副省區長劉迪我（*Jakob Le Faure*）還能向羅瑪報告：「滿人准許，以如同在歐洲一般的自由在中國傳佈福音」（四一）。

湯若望在數件與中國傳教會有重大關係的事件上極有成效的干與，是堪當詳細地在這裏一敘述的。其事件卽下文所列之三項。

一六五六年之荷蘭使臣團

自這一個世紀開始以來，荷蘭人民卽以他們這一種民族所固有的那柔韌能力，施展他們要擴充他們的統治權到一切東方海洋上和海邊上去的計劃。葡萄牙國底沒落已成顯然的事實，而被當時的傳教士們用極可感動的言詞之所悲歎。一六五〇年荷蘭對於葡萄牙，已很清晰地佔有優勢。一六四一年爲赴遠東之關鍵的麻刺甲 (Malacca) 島已歸荷人之所有。荷國在遠東只剩有澳門半島和在的摩爾 (Timor) 島上數處價值減輕的根據地而已。自從一六三九年至四〇年日本最後完全排除葡人以來，荷人卽將日本海外貿易之專權握入手中。他們現在也要圖謀中國貿易之專權了。在歐洲維斯特法倫和約 (Westfälischer Friede) 締結之後，他們的手又開了起來了。因爲葡國人之在澳門，對於廣東之形勢極爲順利，且爲中國當時唯一之公開海港，所以荷蘭

人們就起了最好奪取澳門的野心。但是這個地方於一六二二年擊退荷蘭侵襲之後，已作有充足之防禦工事，一時頗難奪取到手。因此荷蘭就只剩有同中國訂條約，以保證商務上之特權的一條出路了。駐荷屬巴達維亞（Batavia）之總督約翰·馬崔依克爾（Johann Matziker）極慎重而持以毅力地辦理這件事體。一六五三年至五四年之第一次嘗試竟遭失敗。兩年之後，他們又派盛大之使節赴北京，這次為他們的使臣的是皮特爾·望·高耶爾（Pieter van Goyer）和雅各·望·愷采爾（Jakob van Keyser）。要說是他們這一批使臣，仍未能夠得以達到他們的目的，那這大半是應歸湯若望負責的，因為他曾暗中曾加以阻礙作梗的。（四二）

湯若望的這一種態度，人們乍一看去，似不可理解。荷蘭人們與他是有同種族之誼的。他通曉荷蘭人們底語言。他在可崙城求學的時代，有許多荷蘭人作他的同學。人們由他的報告中可以看出，他是很喜悅在海外又獲逢到家鄉的人們的。他嘗試着使他們在北京的居留得以安適，並且還打聽他在荷城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居住的老友。因此荷蘭人們就相信，在他的身上是尋到了一位為他們的事情推轂代言的人物了。可是湯若望實際上還負有其他的責任，而這些責任

是更加沈重地落入了秤盤之中的。

他和一切其他耶穌會傳教士一般，對於葡萄牙國深覺感激，並且負有援助的義務，因為這一個國家對於東方傳教會是有偉大的功績的。況且荷人此舉，對於東方天主教前途之利害，又有極大關係的，所以他就不能不排除私人情感，而一本他的正大義務去行動了。

信奉加爾文 (Calvin) 派耶穌教之荷蘭人，自來在湯若望底腦中都留有至惡劣的印象。在他所寫的大抗辯書中，曾引聖經中的一句拉丁文：「你的神殿被打毀了並且被褻瀆了。」這句拉丁文的全句被他發現為一句含有一個年數的預言 (Chironogram)。這個年數為一五六六年 (四三)。而這一年恰巧便是加爾文派耶穌教徒，在荷蘭國普徧毀滅天主教之一切聖像，和他們所作其他罪惡的年頭。按照湯若望虔誠的信念，荷蘭人這一種殘暴行為，是已經天主教在聖經中所預言的了。所以在他很高的年齡裏，當在他下手寫他的抗辯書時，那以前時代加爾文派耶穌教徒所作的凶殘罪惡，也還很活躍地，一如當初人們在他年青時，向他述說的那種情形一般，存留於他的記憶力之中。海外殖民地的歷史又供給他一批證明加爾文派耶穌教徒凶殘不容忍的新證據，因

爲在東方，凡有荷蘭人移居的地方，他們必定設法嘗試毀滅天主教之傳教會。

這樣我們便可瞭然，湯若望居心是願荷蘭使團失敗的。無論如何，澳門總得給葡人保留，因爲這是葡國與傳教會在遠東之根據地，兼且爲入中國之門戶。設若荷蘭人一旦獲得通商之特權，那麼葡國之勢力，甚至澳門之商埠，自必完全毀滅。如是則中國之傳教會，亦必將同歸於盡，是人人所能預先見到的了（四四）。

荷蘭使臣爲施行他們的計劃，於未到北京前，已先以豐富之禮物，買通廣東之總督與巡按。這兩位高級中國官吏潤飾了一六五五年七月二十日荷蘭巴達維亞總督上中國朝廷之國書（四五），因爲這封國書之文詞本來是缺乏例行的禮敬稱謂的。並予他們以赴北京的准許。一六五六年三月十七日荷蘭使團携帶護從人員十四名，并豐饒禮物，由廣東啓程北上。他們的行程是沿內地水路，乘船前進的，這條水路僅只在廣東與江西之邊界上，被一道山嶺所截斷。是年七月十七日他們入北京。

他們未到北京以前，利類思（Buglio）和安文思神甫（Magalhães）已經同湯若望和汪

儒望 (Valat) 商談了防阻的辦法。荷使抵北京後，毫不惱悻地向與他們的事件有關各該衙門之大小官吏，大餽其禮物。在官吏方面，傳教士們的警告，對於這些餽遺却就失效無力了。因此在各部院衙門裏，對於荷蘭人的情調却是和霽迎合的了。

然而湯若望却是皇帝底師友，最後的裁奪則在皇帝。是年二月十三日關於這即將光臨的大使團，湯若望已經同皇帝談論到了。湯若望很驕得對於這個問題一開頭就抓着了適合之聲調，因為他向皇上說，荷蘭稱呼他們的海島為一王國，是很不合理的。他們背叛了他們合法的國王，自是之後，他們行踪無定地漂泊於海洋之上……現在固然不能使這些使臣不到北京，因為他們已自廣東得有入國之准許。可是……無須同他們訂商約的。因為他們無論在什麼地方居住，他們都要建築礮壘，擴充他們的國威，而騷擾鄰近的民族。

這些使臣入京後數日，湯若望奉禮部之招，赴部參與暫先檢查荷蘭貢品之舉動。正午十二時荷人蒞臨部中，他們以歐洲之禮儀，脫帽向湯若望致敬。他們說，他們在廣東和交趾支那，都已聞到他的大名。使團事務主任約翰·紐和夫 (Johann Nieuhof) 之呈報公文中，稱呼湯若望為亞當

·沙理格爾 (Adam Schallger) 並且描寫他爲一位「年齡很老，胸飄長鬚的人物，照滿洲習俗，薙髮垂辮，而着滿洲服裝」(四六)。

荷蘭使臣所進呈之禮物，分爲四組，一組進呈皇上，一組進呈皇太后，一組進呈皇后，一組爲使臣個人進呈皇帝之禮物。頭三組之禮物是以貢品之名義進呈朝廷的。可是關於進呈皇太后與皇后之禮品，在他們所呈的國書上，却并未提及。荷蘭人對於此事作解釋說，他們在船上，發現所携來的物品，比他們所料想的還要加多，因此他們決斷，也向皇太后與皇后進呈一批禮物。可是這話是不對的。這顯然是廣東中國官吏方面，給他們出主意，這樣分配了這禮物的，但是却忘記了照這分配法，更改他們所原携的國書。荷蘭人們下手打開他們的箱子和他們的布匹的捆包。在每一件禮物上，他們都被問詢，這禮物是從那裏來的。他們每次都給與了正確的答復(四七)。結果一切的禮物都是由印度來的；除掉百疋白麻布是由荷蘭國來的。他們又被問詢，關於荷蘭國底各種情形，關於荷蘭底政體，這是他們很難令人能得明白的，此外他們又被詢問，他們是否爲奧拉尼親王 (Pann von Oranien) 之親屬，并且他們是由那一條道路到中國來的。這一切的言詞都被確切記錄了出

來。由這種種情形中，我們可以覺出，他們在廣東的代辦是怎樣幫助了他們這大使團的。這些大使在湯若望身上懷有極大的希望，並且在告別時對於他特別表示敬意。

湯若望據自己所聞所見這種種情形，寫了一篇很祕密的意見書。他在這篇意見書中說，這些使臣都是歐洲人。他們並沒有一位國王，僅只在戰時有一位太子，他們現在的太子，現在纔剛六歲，他們這次到中國來，是奉他們印度領土長官底命令。因為他們這些禮品中，僅止有少數是荷蘭來源的。在歐洲他們是我的鄰人，因此我纔能通曉他們的語言。

湯若望曾將這本意見書呈皇上御覽。假若在檢查這些禮物時，湯若望未在跟前，那皇帝自滿籍禮部尚書底口裏所得的報告，必將要為荷人順利的多了的，因為他對於荷人所表示的態度很親善的（四八）。

翌日便為正式向皇帝進呈這種種物品的日期。接受了這些物品的機關是內閣。當時內閣首席即「大宰相」（Reichskanzler）（譯者按：此恐係內閣大學士之譯文）盤腿坐於一略高之枱凳上，他右面有兩位體面滿人，左面上座為湯若望所坐，以便當場充當翻譯。內閣首席首先向進來

的使臣們致敬。然後就是湯若望「以德文，這是他還會完全講說的，很謙和很敬謹地，向他們致歡迎之詞。」「大宰相」每由箱匣中取出一件物品時，湯若望「每次輒深深地真誠地發出一聲驚奇之歎聲」（四九）。一切的物品皆經旁邊的人予以確切的記錄。

這一幕莊重的舉動之後，朝中必係繼續着開了御宴，饗待來賓的，這是曾經荷使團事務主任紐和予以敘述的。他說那些崇高的內閣大臣們，都「如同一羣粗野的農夫一般，」下手爭吃那些燒烤的豬肉。可是爲這些使臣們，却是另備肴饌的，人們還把些果實與甜點心，給他們端了上來。湯若望向他們述說，四個月前莫斯科使臣（*Moskowitzsche Gesandte*，譯者按：莫斯科爲以前俄國之稱謂）也到北京，但是他們却并未獲得朝見。御宴完畢後，這些使臣們返回賓館，湯若望還伴送他們一段路程。他是坐在一頂四人肩舁的轎中的，還有許多先生們乘馬在後追隨着（五〇）。

在此事之次日，即七月三十日，有人來召湯若望赴朝。在這裏人們先將皇帝爲他所選定的禮物，交付與他，就是兩箱子的玻璃瓶所盛之玫瑰水（*Rosenwasser*）和十二瓶西班牙阿里康特城所產之葡萄酒（*Alicantewein*）連帶其他西班牙之名貴牌葡萄酒。然後皇帝就把他召至御前，

命他坐下，並且命他詳細說明這些禮物。湯若望向皇帝奏稱：「這一切東西，差不多都是在印度，或在其他之邦國內買了來，或搶劫了來的。他們彷彿是把陛下當作一個商號裏的老闆一般地對待的。」可是皇帝插言說：這還都是些基督教徒呀。湯若望回奏：只是照名義上說，他們還是基督教徒，其實他們早已就不是基督教徒了。他們對於天主和他們的國王，都是叛徒。廣東底官員能證明，荷人於天啓二年是想要把荷有向陛下納貢義務的澳門城強佔了去的。那時我恰巧居留在這個城市裏，並且參與了這次抵拒荷人的戰事。兩年以前，他們要在他們國王底名義之下，以使臣的資格攜帶貢品來北京，但是却未得有入國的允許，因為他們並沒有國書。現在他們竟口稱，他們是有國書的。可是他們爲這一封國書，須赴荷蘭一行，但赴荷蘭與自荷蘭返回，須時三十二個月，此外爲由廣州赴北京之雙重道路，更須時八個月。這共需時四十個月。而這能是在兩年之間，所辦得到的麼！僅這一種不實的情形，已經足可令人對於他們拒絕相信的了。

湯若望更向皇帝直陳一種危險，就是荷蘭人一在中國得有根據地，必將作軍事行動。他們現在於沿途上，已經窺測了一切，任何一個地方一經朝廷指給他們爲居留地，他們必先作軍事防禦。

工事。這是他們視爲比通商還要重要的一着。皇帝又問，莫斯科使臣也是這樣的人們麼？湯若望回奏，不，那些是忠信的善良的人們。

最後這兩位荷蘭人，雖然有那一切反對他們的理由，並且雖然他們的國書有毛病，然而仍被承認爲使臣。這可見因他們那大宗餽遺，終究得以弄妥了很大一批合作的人們了。這樣接着便同荷蘭人作了多天關於商約之商談，與荷蘭人合作的人們，都費盡心力也要把湯若望拖了過來。八月六日人們把一份商約草案，交他審閱，他覺得這份草案，對於荷蘭人過於優待了。所以他便自己又向皇帝進呈一份奏疏。他的意思，皇帝可以向荷蘭人頒賞，以表示皇帝之恩澤，然而與一國既訂條約而又令他們的使臣按照固定時期赴京來朝，那是却與國家的慣例不合的。

在這裏，湯若望對於這件事情的敘述，便中斷了，因爲安文思急須起程赴澳門，以便在澳門亦可作口頭上之報告。據安文思在澳門向下的述說，荷蘭人底事體前途很順利。一個歐洲的國家肯向中國自動低頭承認「納貢」，並且呈進一批這樣有價值的貢品，終究是投合媚悅了中國自大虛驕的心理的。國內一極有勢力的黨派，代表他們的事情，就是廣東的總督與巡撫，滿籍之禮部尙

書和許多其他的大人物們，連內閣之首席，此人就是廣東老總督之門塔。但是上天之神意，却在醒覺監視着的。這是安文思說得十分對的話了。因為這神意亦會安排，竟使荷蘭人們忘了呈進以下四種「貢禮」。這四種貢禮決定會獲得皇帝特別的歡心的。就是一架小的，但是製得非常精工的青銅礮，一架歐洲鋼琴初發明時之舊式鋼琴，連帶一位非常出色的荷蘭彈琴名手，再就是一位荷蘭之喇叭手和數位軍事教練官與機器師（五一）。

最後皇上因禮部之題奏，降旨裁奪，准荷人每八年遣使入京納貢一次。藉這個機會荷人可略作貨品之交易。

在全部事務結束之前，荷蘭使臣尚須赴朝中陛見，向皇帝玉璽行叩首跪拜大禮。（俄國使臣就因為不願行這叩首朝拜大禮，所以他們就不得不在任何事體未得辦成以前而離開北京。）正式朝拜的日期所規定的原為八月二十五日；但是因為皇上最年幼的御弟薨逝，這朝見的日期又延遲至十月二日。紐和夫（五二）和聶仲遷（五三）二人都曾敘述了這些正式朝拜的舉動。皇帝坐於寶座上，僅有一刻鐘之時間。在許多的禮節之下，使臣等被引至御前，他們都跪地叩首，以禮敬那

崇高的陛下。可是他們并瞧不見這崇高的皇帝，因為有兩條作裝飾用的龍像，遮蓋了皇帝身體的原因。并且他們也聽不到皇帝底一句話，因為天子總是默息無言的。十月十四日他們得到了皇帝所賞賜給他們的禮物，而這些禮物又是他們不得不跪地以接受的。十月十六日皇帝之詔諭向他們頒發了下來。兩點鐘以後，他們便不得不動身離開北京，這是根據儀節的規定以行動的。

由這所敘述的情形觀之，荷蘭使臣此行是失敗了的。他們竟被中國方面以恭而敬之的禮式置之門外的。荷人此舉所耗費之款項，全部竟達荷幣九萬八千八百三十一古爾盾銀圓 (Gulden, 譯者按：一古爾盾約合現行法幣二圓餘) 零五施士白耳 (Stiver, 譯者按：此係荷蘭從前之輔幣名，等於中國之角洋) 和八分，數目之巨頗有可觀了 (五四)。這些殊覺上當的使臣們，把一切的過失都推到了耶穌會會士底身上。我們不知道，在這一點上他們的眼目中，首先所注射到的是否為湯若望。決無可疑地他也是令他們對他很覺失望的。他們所犯的過錯是由他那禮貌周到，與海外碰見同鄉的真誠歡樂裏所作的推斷過於輕率不思量了。

按照我們的見解，湯若望底舉動應當始終恭而有禮，但在實際上與荷蘭人舉行談判時，應持

以冷淡嚴峻之態度，以免惹起荷人片面不實的過分希望。

我們還可以在這裏附帶提出一疑問，就是此次荷使如果沒有耶穌會會士從中作梗，是否能得價願收效。聶仲選對於這個問題，絕對地加以否認（五五）。他這見解或許是有理由的。可是無論怎樣，我們能確切斷定的，是中國決不肯以葡萄牙在中國之地位給與荷人，雖然中國在荷蘭這貴重「納貢」底印象之下，能暫時許與了他們一點特權。因為葡國對於中國是沒有危險性的。然而荷蘭却極強盛在亞洲，在中國底至近處。他們在臺灣已經佔有鞏固地盤，軍事防禦至為充足。中國素來對於他四周隣地任何一種強大的異族國威，都是懷着猜疑不安的心理的。中國底政策也是要求背轉荷蘭，亦一如他使菲律賓島上的西班牙人，不得臨近中國一般。

澳門是應當特別感謝湯若望的。因為此事過後數年，他又為這座城市作了一件重要的事務。這件事務就是下面所列的第二個項目。

謀救澳門之毀滅

澳門與廣東間之爭執與交涉，是永無終止之一日的，因為在這座城市內，所居住的不安分的中國份子過於多了，而這一些分子又統歸一位自廣東所派駐的官吏之所管轄，澳門政府對之無可奈何的原因。對於一六五八年當地所起的一種殊覺嚴重的叛變，當時恰處於該處之傳教士爾鐸（Durville）曾作有報告（五六）。一六六二年簡直地要有一勢將毀滅一切的打擊，危及澳門。

因為中國政府最後要同海盜們作清算了。鄭成功（葡人呼之為國姓爺）仍為海洋上與沿海邊岸為人所恐怖之人物。一六六一年年底，他甚至竟能將台灣自荷蘭人手中奪出，因此他的權威就過於膨漲起來。為的是能得克制了他，並且簡直連根帶蒂地掃蕩海洋上的一切海盜，政府竟於一六六二年決斷，用一根本肅清辦法，使沿海海上之商務與海盜之搶劫，簡直無從得以實現。就是皇帝下諭規定，沿海居民俱須自海邊向內地遷移三十里，任何海上之航行與貿易，皆在嚴禁之例。凡違令私自航行者，一經逮捕，即判處死刑。中國底人民已遵從諭令，遷出澳門。但是在當時的行政長官仍視為不足。所以連荷蘭人們亦應放棄一切貿易之行動，毀滅澳門要塞，退入中國內地。如果

照這樣辦，簡直就是澳門城市底滅亡了。

在他們這生死關頭裏，澳門便派遣劉迪我神甫 (P. Jo Faria) 赴北京一行 (五七) 爲營救這座城市，他的努力竟歷一年之久。湯若望當時在朝中，還是很被人所禮敬重視的，被邀請予以援助。他竟然得以弄到一紙皇帝底諭旨。根據這道諭旨，澳門之居民仍可居留澳門，僅止舟船之航行照舊禁絕。但是這座城市依然照舊地不得向廣東交納重稅，以便得以安然坐享這半優待之利益。一直到一六六七年湯若望逝世後，在薩爾當亞 (Saldanha) 率領的使臣團纔又謀得較爲順適之條款。加之這時海盜之脊柱已斷，因爲一六六二年六月間，鄭成功逝世。其子并無其父與其祖父之智能才力，於是中國政府乃得擴張統治權到台灣島上。這時中國亦能特別恩惠，許與荷人數種商務上之特權了。

白乃心 (Grueber) 與吳爾鐸 (Dorville) 二人之亞洲腹部探險旅行

在這裏，我們還可以對於一六六一年自北京出發，意在發現東西交通之一確切陸地路線，而

作的橫斷亞洲之偉大探險旅行，予以記錄。因為舉行這旅行的兩位勇敢探險家，是自湯若望處得，到了許多促進的。

爲東西之交通開闢一條陸路，這顯然是當時的重大要求。舊日海上的種種不良狀況，仍絲毫未見減輕地繼續存在，如海路上重大人命之喪失，過於長久的旅途時日，和郵件運輸之不可靠，仍與前此無異。更加上自這一世紀之中葉以來，海路交通又添上了一層荷人之阻害，這荷人既爲荷人，而亦爲天主教傳教會之仇敵。

葡船如欲到澳門，必須自臥亞 (Goa) 起繞遠道，越過東印度各海島，方可得達。有一次，即一六五七年至五八年，臥亞一整年爲一荷蘭艦隊之所封鎖（五八）。葡船一經落入荷人之手中，則搭船爲乘客之傳教士，往往不得不在巴達維亞 (Batavia) 逗留極長的時間，以等待他們的釋放。一六五六年及一六五七年，經教會代表卜彌格 (Boyt) 和衛匡國 (Martini) 所率領派赴東方之大批傳教士，自葡國啓程後，經過許多迷途與驚險，人數大見減少地，始得行抵中國（五九）。

到了這時，依次順序之郵件運輸是決提不到話下的了。當時郵件之大多數俱皆喪失。如果一

葡國之船隻發現荷蘭船隻追逐牠時，那麼船長就要令人們把郵包投出船外，而率領他的人們嘗試着向陸地上逃亡的。如果郵包爲荷蘭人所得，那他們便要把這郵包投入海中的。最可靠的還是馬尼刺至亞美利加 (Manila-America) 的航線，這是當時人們所稱之爲「西班牙路線」 (der Spanische Weg) 的。但是這因爲西班牙與葡萄牙二國之間，緊張的情勢仍繼續存在，在葡國方面頗不能不有所疑慮。因此在當時凡係重要信件，俱皆同時繕寫三份或三份以上，交付不同的船隻，或由不同的道路郵寄，雖然如此，往往仍會一份也達不到他們的目的地。在中國之傳教會，如果向羅馬教廷有所請示，往往竟致四年或六年之後，方能得到一個批答 (六〇)。有時人們在歐洲簡直不知道，誰在中國爲傳教會之會長。教士之升調，有時由私人信件中所透露的消息，反而能達到了中國，可是雖經繕寫成三份的正式公文，竟沈澱海底，或在世間上迷途漂泊。荷人底目的并非這樣惡狠對待傳教士個人的，他們有時竟能受到了荷人頗不惡劣的待遇。因爲他們之所注重的，專門在破毀葡國底航業。

由這種困難情形中，人們發現了一條小小的出路，就是派遣荷蘭傳教士赴遠東傳教。恰切

在這數十年裏，我們見到一批爲數頗不輕微，出身西班牙屬與獨立部分之荷蘭國籍的傳教士，在印度支那與中國傳教（六一）。然而那亦自是很顯然的，荷蘭終久是不能供給多數傳教士的。不過比利時的人們有時却亦能享到荷人極和靄的待遇（六二）。許多比人都搭乘荷船，自阿姆斯特丹赴里斯本（六三）。比人由遠東交付荷船郵件，經巴達維亞與荷蘭第三者之手，轉寄家鄉，或轉寄羅馬。即其他國籍之傳教士們，爲寄送郵件，有時亦選擇這一種郵路。一位常時很著名的，這樣轉移信件的人，就是在阿姆斯特丹經營印刷業的布勞（Blaeu），此人有時亦以賓客招待耶穌會士，并且出版許多精本耶穌會著作家所寫之著作。不過這一種信件底郵傳，是不能成爲固定的辦法的。

上述之一切困難俱可迎刃而解，如果能有一條陸路得以開通時。耶穌會總會長高斯文·尼克爾（Goswin Nickel）自一六五二年至一六六四年，十餘年間會極熱烈從事於這個問題的解決。他現在特行委任德國底傳教士蘇納（Bernhard Diestel）和白乃心（Johann Gruber）二人來辦理此事。二人中蘇納是已經由陸路，會作過印度之往返旅行的。在一六五六年二月十八

日的一件訓示中，他給與他們二人以確切的指示（六四）。二人中蘇納爲嚮導。他們二人先赴波斯之伊斯巴亨（Isbahan），嘗試着以歐洲王侯之禮物，獲得波斯王之友誼，兼且學習波斯與阿拉伯之語言文字於該處，並確切探訪赴中國之各條道路。如果他們覺得人們向他們所作的報告是很順適的，那麼他們就應當選擇那一條道路，與一大旅行團相結合，而向東行走。北路因爲是較短路線的原因，所以應儘先選試。旅行底目的是開通到中國的陸路，和一條短捷的傳遞郵件驛線之發現，再就是在調查那些區域裏基督教之傳佈。並且沿路所經過之大小各城市，均須精密確定其地理上之位置，并研究旅行之狀況，與各民族之特質，而作此種研究時亦更須注意，此處彼處之傳教總站。因爲撒馬兒罕（Samarhand）離中國邊地第一座城市肅州，止有七十至八十邁勒（Meilen），一邁勒約合中國十五里）之路程，所以人們尤其應當確切研究這一條路線。沿這一條道路，或許八至九個月之時間，即可將郵件運至歐洲。他們二人在路途上，絕對無須匆遽的，以便能得盡量探訪確切消息。如果在撒馬兒罕，或在其他地方，可以建立傳教會時，那他們就可以向伊斯巴亨請求援助。這兩位行將長征的人們，於一六五六年二月五日曾得旅行護照三張，一爲赴波斯，一爲赴中

國（六五）和一爲赴印度之用；因爲如果陸路被封鎖，那他們就可以走穿越臥亞之尋常道路了。

我們在今日之下，關於蘇納與白乃心二人當日所作之旅行，尙獲有極確切之史料。他們二人行程之開始，係自美西納（Messina）赴士麥納城（Smyrna），這座城市是他們於一六五六年五月八日所達到的，然後又橫裏豎裏穿越了基督教之聖地（das Heilige Land），并於十二月十六日行至伊斯巴亨城（六六）。因爲當時波斯與撒馬兒罕國王之間發生戰事，所以由陸地再向前行走，便是不可能的了。因此他們就穿越俄爾木斯（Ormuz）島乘船轉赴印度，而於一六五七年四月於印度蘇拉特（Surat）城着陸。在此城內他們竟滯留至十月之久。赴臥亞之航行是不可能的，因爲臥亞爲荷蘭人之所封鎖的原因。這樣，他們便於一六五八年三月携同兩位意大利與兩位葡萄牙傳教士，乘英船直赴澳門。這位很和藹親善的英國船長，竟免除他們的船票費，分文不取，載他們赴澳門（六七）。據我們所知，德國教士中乘用英船者，這還是第一批，以後這種情形是屢屢實現了的，而英人方面之迎合優待，總是被教士們之所稱揚的。二位旅客到達澳門之時日，係一六五八年七月間。

他們所冀開通一條陸路的使命，仍尙繼續存在，他們現在不得不嘗試着，由相反的方向中來進行他們的使命了（六八）。這樣，他們二人在南方居住一年之後，於一六五九年夏天被派赴北京。湯若望爲他們毫不費力地謀得入首都之准許，這首都是他們於八月二日達到的（六九）。皇帝自許久以來，就願意獲得一位歐洲的畫師。白乃心便是應這個名義，奉召入宮的。蘇納却奉命入欽天監作助理人員；但是不久他又移居濟南爲傳教士。在那個時期裏白乃心會奉教務視查員之命令，以彩色繪畫了湯若望之肖像。這張畫像是使那位原發畫像命令的人很喜歡的，因此他就把這一張畫帶到了澳門去（七〇）。

湯若望這時的任務，便是爲這兩位德國人準備遠征，和向皇帝懇求種種允許證件。順治給與了他們一封薦信，以便路途上隨身攜帶。可是這一次的遠征（七一），因蘇納於一六六〇年九月十三日卒於濟南府（七二），竟致又行延遲。湯若望特選吳爾鐸（Albert Dorrville）補充他的位置。在這等候時期中，白乃心因爲也能寫得一筆好字，所以就爲湯若望作了些繕寫事務。在他所繕寫的文件之中，還有一份湯若望所著的生活回憶錄（Lebenserinnerungen）。不過這份回憶錄因爲

啓程的日期迫近的原因，并未得以鈔寫到底。

白乃心和吳爾鐸係於一六六一年四月十三日自北京啓程的。他們的行囊裏豐饒饒地裝有一大批要向羅馬呈遞的文件。因爲人們是視穿越中部亞洲的陸路爲最短最可靠，這一點是在耶穌會總會長尼克爾之訓示中，已有所言及的了。他們也携帶有經傳教會副省區長，經湯若望和經中國北部傳教會總會長金彌格 (Michael Trigault) 之所出的旅行證書。這一切的證書都是經白乃心整潔端正地所繕寫了，并且又都經各位出證書者加以簽字蓋章的 (七三)。

詳細敘述這二位勇敢探險家穿越亞洲中部的行程，並非本書底任務。况且他們這行程又是已歷經人們之所敘述過的了 (七四)。他們所選擇的路線偏於南部，出發的地點是甘肅西寧府，到拉薩的時日爲一六六一年十月八日，到加德滿都 (Kathmandu) 的時日係一六六二年一月間，到亞格拉 (Agra) 的時日係在是年三月間。在這裏吳爾鐸於四月八日病故。補充他的位置的是亞格拉傳教會之司鐸亨利·羅特 (Heinrich Roth)。他們越過印度斯 (Indus) 口之達大 (Tatar) 城，由陸路赴俄爾木斯，穿行美索不達米亞 (Mesopotamien)，走到士麥納 (Smyrna) 城，乘船

赴美西納 (Messina) (七五)。一六六四年二月二十日白乃心與羅特到達羅瑪 (七六)。

在羅瑪，這兩位勇敢的世界探險家，和他們所攜帶一路隨行的兩位士著，俱都受到人們重大的歡迎。兩位士著中，一位是中國人，宗教名馬泰屋斯 (Mathias)。其他一位是印度人，宗教名若瑟 (Joseph)，年齡已八十五歲。這個歲數至少是在原來記錄中所曾經指出的。根據他們的報告，阿塔納西尤斯·啓協爾 (Athanasius Kircher) 寫出了他的著名的著作中國。兩位探險家向耶穌會總會呈遞他們關於重要的傳教事務和他們的行程的報告書(七七)。因白乃心爲湯若望的辯護，那經久未決，頗爲衆人所知的中國曆書問題，竟得以最後解決。白乃心推薦經他所發現的道路，爲歐洲與中國之間最優良之連絡線。在尼泊爾 (Nepal) 與西寧是人們可以建立傳教區站的。然而在羅瑪，人們却另有意見。一六六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羅瑪教廷中所開之總評議會決議所提及的陸路是不可選用的，除非海道被封鎖時；但是兩位探險家仍可由來時所行之同一路途，返回他們的傳教區域(七八)。

這時更又有一種新的計劃浮現了出來。就是不能取道俄國以赴中國。德皇列奧坡爾德

(Kaiser Leopold) 曾於一六六四年九月間屢召那二位探險家作長久之諮詢，將此事攬入手中，竟向庫爾蘭國 (Kurland) 公爵與莫斯科國 (Moskau) 大公爵爲他們寫薦信。不過白乃心與羅特這次僅止行至庫爾蘭，卽行中止；因爲當時俄國與波蘭之戰事，阻礙前進。這樣他們就又穿行中部歐洲，而於一六六五年十月間走入君士坦丁堡城 (Konstantinopel)，以便由此重作貫穿亞洲之長征。可是這個計劃終究未得見之實行，因爲白乃心病倒此地，而追行之中國人竟致死去，僅止羅特一人，同他隨行的那位老印度人，得以返回他原來的傳教區。至於白乃心，我們後來發現他在匈牙利 (Ungarn) 充當從軍教士。白乃心與羅特，這是我們很有理由，可以列入近代最勇敢與最有成績的探險家行列之中的二位偉大人物（七九）。

第十一章 湯若望之性格——他爲他的美譽令聞之奮鬪

當在順治朝，湯若望和他的數位傳教同人之間，發生了一種多年的鬥爭，不過這一場鬥爭多半在教會內部暗自醞釀，並未張揚至教外而已。這鬥爭的問題是關於他的令聞美譽，和關於他欽天監的職務與曆書的。由這場鬥爭中得以徹底證明，他是完全無過失的，而他的聲望名譽並未受到絲毫損傷。鬥爭上的兩個問題，尋常都是在那一大批直到如今仍還存在的文件中同時相提並論。我們在這裏再特行把牠們分開，各另加以檢查與評議。我們先敘述關於湯若望之性格的爭論於下。

這怎樣是可能的呢，正值那些既有這樣多地耶穌會的會士，更有方濟各會士和多明我會士，真誠地稱讚湯若望爲虔敬的修會會士，北京之熱心傳教士，全中國傳教會之保護者的同一年間裏，竟會有耶穌會之其他傳教士，甚至也有一批這樣稱讚他，和爲他的援救深覺感激他的教士們

也竟向他這樣激烈地施以攻擊呢？湯若望底性格可以給與我們一把開啓這一種殊難瞭解的矛盾的鑰匙。即便沒有這一層理由，那本來也是很有趣味的，愈加精密地來認識這一位非常人物性格上的真相。

與湯若望並世的許多人們，對於湯若望底性格都有所評騭。我們瞧見他同順治皇帝，同歐洲的傳教士，和同中國人們的來往，我們瞧見他處工作與處危險的情形，因此我們便可能由他的舉動態度中，略稍推斷他的性格。然而如果我們十分詳細閱讀他的信札和他的著作，尤其他的那兩種較大的親筆著作，就是他所寫的生活回憶錄的原本，和他爲他自己所寫的辯護書，那麼這一個人物最深的心曲心理，就可呈現於我們的眼前了。

湯若望——就他所處的時代說——是具有當時全部的，宇宙一般廣泛的學識的。他所寫的直至今日真價尙待認識的辯護書證明他是一位有玄冥哲思頭腦的人物。但是他的特長却仍在實際知識方面。一直到他的很高的年齡裏，他都呈示，他是很博通教義學（Dogmatics），教會法律學與國家法律學，聖經學，教會史與世界史上的種種問題。他屢屢引用上述各該著作中，甚至往往

也引用希臘與拉丁文學家著作中之名句於他所寫的種種文章中。因為當時的人們對於確切引用名句，和對於名句來源之舉示，俱都未能具有瞭解心，所以現在再確切地證明他所引用的名言哲語底出處，那總是很困難的，並且往往是不可可能的（二）。他所引用的古人底名言哲語，大概都是他用他那很神奇的記憶力，他這記憶力經他許多同伴們都加以稱讚，並且也經他一直到崇高年齡裏仍能健旺地保存，由他青年讀書時期底回憶裏所汲取了來的。但是僅止這一點似乎還不足用。我們不能不假定，他後此也時時加以研究閱讀之功，以便保持自己的學識於高峯，而不致思想落伍。由本書底敘述中，我們有一個時機，會得知，他習慣每夜讀書至十一時。他有一所（就當時的時代，和就中國的情形說，）頗有可觀的書庫。多爾袞攝政時期，他在他向朝中所呈遞的一本奏疏中，曾表示了他的快慰，因為闖賊們未曾把他的一所含有三千本歐洲圖書之書庫劫掠。他的這所書庫直至今日，仍尚大半保存，其中含有各方面學識的著作，這種著作都是一位學者和神甫在歐洲定要置備的（三）。在這裏可附帶一提的，就是在中國其他傳教區中，也必定有豐富的書庫；因為若不然，那些傳教士們在為關於曆書的久長爭議中，便不能由一切神學部分中，搜集那樣多可供

參考用的書籍來了。

在湯若望底書庫中，爲他專長的數學與天文學所置備的書籍，自然是很充足的。在這裏他所有的，就大致上說，是他那個時代的全部知識。我們自其他教士底報告記錄中確切知道，湯若望決無可疑地也令人們由歐洲向中國，給他郵寄學術上最重要的新刊物。

充足的知識在他復能與一種實際上的技能相結合。本書在前文已經相示，他爲技術家與藝術家，因爲他曾鑄造火礮，設計要塞圖樣，構造起重機器，並且還按照歐洲文藝復興後期之建築式樣，建築了一座很爲羅馬爭光的教堂（Barockkirche），他又製造天文儀器，修改開始時期之原形鋼琴，最後據一種報告，還製造了一條雙桅帆船，以便皇帝在禁城北海內捕魚與遊船之用（三）。在他的著作中也還有一篇論到礦物的文章。

因了他的忠實記憶力，他還是一位偉大的語言學家，據南懷仁和畢嘉之言詞，他很精通中國文學與日常民間的語言，而其精通的程度，竟使他能真正算一位中國人與學者。這言詞未免說得有些過火了，他決不能和中國學者相埒的，因爲中國底學者從兒童時代起，即專門從事於文學之

研究，而他竟是於二十七歲時方開始嚴重地研究中文，況且他又有這樣多其他職務應行辦理，未能得以專門研究的原因，據我們之所知，實際上在他編輯他的一切作品時，都會利用了中國職業學者底襄助的。老一批的傳教士中，竟無一人是可以同較佳的中國文士一比的，就是連利類思 (Belgio)，馬若瑟 (Prenare)，宋君榮 (Gaubil) 和巴多明 (Parennin) 也是不能的。然而無論如何，湯若望在漢文的造詣上至少亦是達到了當時情形之可能的程度，這却是無可疑的。

拉丁文是他和他那個時代一切學者一般，時時都視爲一種有生命的文字。意大利文，他決定也十分熟習；而西班牙文，則爲我們不能不假定，它具有相當的認識程度。荷蘭文，是他所能容易瞭解的。葡萄牙文是傳教士之間來往所用的公共語言，因此湯若望便完全精通這一種文字。湯若望因爲自己是經葡萄牙國所創立和爲葡萄牙皇族仍尙豐富資助的傳教會裏的一份子，所以他和一切德國傳教士，比國傳教士與意大利傳教士一樣，都對葡萄牙表示許多同情。這一些傳教士們都誠懇地承認，葡萄牙對於東方傳教會之偉大功績。這種對於葡萄牙感激心理，與對於羅馬宗教宣傳部和宗座代表之服從之間所發生的義務上的衝突，這是後來會給傳教士們發生不少困難之點的，在湯

若望反而竟得免除。他只有一次在他所寫呈他耶穌會總會長的一封信裏，因第一批宗座代表之蒞臨，曾略少表示一點憂慮（四）。

在這裏，我們還要再問一句的就是：湯若望對於他的祖國底語言也用心了麼？這是我們所未曾得知的。總之，就連他對於他那在三十年戰爭（Der Dreissigjährige Krieg）中深受蹂躪的家鄉和對於他家庭的關係怎樣，都是一個我們所不能答復的問題。可是有幾次，他曾傲然地明明宣言他是德國人，而在說這句話的時候，更影射日耳曼（Germanus）一字底另一解釋，就是：「真」。「誠實正直」的意思（五）。並且當荷蘭使團在北京時，他還用優美的模範德文，在他們的跟前作了一篇致敬之詞的。我們在本書裏馬上還會得知，他在他末後一場災病中，這災病是使他的舌頭麻痺不仁的，同那位比國之富來門人（Famlandee）南懷仁常以德文彼此表達意思的。偶而流入他的著作中去的，也還有對於他的家鄉可崙城，或德國，德國底風俗，諺語和農民愛用的套語的回憶。他並沒有把德國大學入學時新生應受的那一種惡作劇的洗禮的習俗忘掉（六），並且還記得學校中，按照修辭學上所說的那一種八段作文法（Ottos）的作文練習，在這種練習上，是要

把一句話或一件事實按照預列的八段法式，加以衍釋申說的（七）。此外他有一次還會向中國皇帝解釋，德國人對於天主的稱呼（Got，譯音：果特）係由「好」「善良」（gut，譯音：古特）形容字之所分生而出。他又會相信，他們居留臥亞（Goth）時所見的彗星，是瑞典軍隊侵入德國和瑞典王古斯達·亞得夫（Gustav Adolf）陣亡之預兆（八）。可是於這一些瑣碎的消息，暗示和回憶之外，能令人們認識出來湯若望是一個德國人的事物，也不過僅只是他的一個名字，和他中年以後，這換句話來說，就是他到中國來之後，所透露的這一點或那一點性格上的情形而已。在湯若望所遺留的那很豐富的著作裏，連一封德文信，甚至連唯一的一行德文，或寄給在德國住的一個人的一封信都沒有。這或許是他出於要完全為傳教使命而生活的高尙動因，對於家庭和對於祖國的一切橋樑俱都斷絕而使然的原因。他並且有一次在他的生活回憶錄中，寫下了下面的一句話：「我在滿人之間，覺得如同在家，如同在德國人與同鄉之間一樣」（九）。但是那或許也是可能的，一種不順適的運命，把一切關於這方面的踪跡都給毀滅了。由那一個時代裏尋常只是那一種馬上置入文書庫裏去的信件方能得以保存下來，因為在這文書庫裏，這些信件很稀少令人見到，並

且由這個原因便可被保護，而不致損毀。可是在私人信件方面，人們却就少所關顧操心了。況且用中國紙所寫的信件，如果未經妥慎收存於一文書庫之中，那牠們歷時一久，便要自行碎毀。雖然有這種種情形，湯若望對於家鄉的關係，終爲一未解之謎。

在湯若望底天性中，勤奮活躍的成分以及好動作的樂趣，與一種非常堅強的精力結合一團。他的性格爽直火烈，這是在傳教會人名冊中對於他所加的考語，在較後的時期中易激易怒的成分愈行加重。他作偉大計劃，而持之以鋼鐵一般的毅力，但仍能很靈敏地審慎熟慮（二〇）。湯若望具有一種非常巨大的工作能力。他從不會令他自己休止安靜。他曾說，因爲他的宗教名是亞當，所以他也不得不照着聖經上所說的，在他面孔上的熱汗中吃他的麪包。工作維持了他身體的健康。「差不多七十歲了，然而我乃絲毫覺不出老來，」這是他在一個時機裏所說的話（二一）。

在本書之上文中，我們已經領教他是一位有胆有識的勇敢人物了，就是正值闖賊闖入北京的恐怖時期，當時他竟敢獨留北京，堅持到底，以救護傳教會出於滅毀。在他沙爾族舊日樂戰好勇的興趣降臨到他的頭上來的時刻裏，他竟能作出一種猶惡怒瞋的張目，竟使中國人們不敢追視。

坦白直率，如同一個「日耳曼人」之所當然的一般，他決不會隱抑他的見解，即便他這見解是人們不樂意聽的。最後他的天性裏，生來還具有不小數量的可憐城市民之幽默趣才。

如同我們在有堅強性格的人物上往往所能見到的一般，我們在湯若望也發現一份很深遠的情緒和一付慈軟的心腸。他對於貧苦之人的同情，是爲人們之所勝稱勝道的。上文所敘述的滿籍男童約翰被勸化入教的事實，顯示了他的一付赤子一般的心腸。在一六四四年闖賊闖入北京的恐怖時日裏，他對於當時城中窮途絕望的人們，和那些時時都有受污辱危險的婦女們的同情心，竟使他赴湯蹈火，任何危險不懼怕地去救護他們。明朝末後皇帝和滿清第一位皇帝之命運遭遇，深深印入他的心曲，使他感到無窮的悲哀。同一切受魔難考驗的人們同感着，同情着，持着良善的態度，不向任何人銜怨恨，處處以德報怨，這樣德國萊因邦（Rheinland）這一位赤子在異邦異鄉持身處世。他自少到老一生始終保存了他那份深摯的熱心宗教的心情。這種情形在這一位數學家與技術家，在這一位位置高，而意志堅強的人物底身上，更使我們不得不加倍欽仰敬重了。

栗安當神甫（P. Antonio de Santa Maria）對於湯若望性格上這宗情形，獲有極深遽的印象。

南懷仁對於他的這位大師，曾寫出了下列的評語：「他有一份十分柔輒的心情，遇事輒能被感激得流淚哀傷。他對於受苦受難的救世主，和對於教中殉教聖人之英勇行爲，每一講演，輒流涕歔歔，難以成聲……如果到耶穌受難日（Karfreitag），他在教堂中宣誦救世主之悲歎時，他幾乎是全部時間都在哭泣着的」（111）。

宗教與傳教士的責任，時時都是湯若望所視爲最當先，最重要的。即便遇到至急迫的事務，他也是非作完一天的彌撒，諷誦了祈禱日課之後，不肯走開。有時他因迫切火急的事務奉召入宮，一位使者連續一位使者來傳他；但是他仍依然要作完他的宗教課程，纔起身隨使者投奔宮中去。他時時刻刻都明瞭，他的使命是傳教士。他的全部基督教徒們，無論位置之高低與家境之貧富，都是他全部操心憂慮之所繫。讀者試一回思前文，他曾怎樣喬裝煤販子，以便偷入獄中，安慰被判處死刑之基督教徒，便可知此言之不虛了。

他兜攬其他的任務，只是因爲這任務是與宗教有所俾益的原因。只是有這一個理由，他纔向皇帝貢獻這樣多的時間，並且他接受欽天監監正之職務，也還是經過一番長久的抗辭，而未能獲

得皇帝底允許的。況且此後他又曾屢次疏請皇帝，解除他這職務。就普通情形上說，他在他這官方職責底償遂上，也還予以限制，而對於純粹研究科學的動作也還是拋棄了的，以便爲救濟教徒靈魂的宗教職務，盡量勻出餘賸的時間來。雖然如此，然而南懷仁仍尙報告湯若望總還覺得懈怠宗教職務，時時感到良心的不安（一三）。這是一個可以證明他對於傳教使命多麼嚴格思想的信徵了。

因爲他視數理天算的工作爲一種傳教的手段，所以他便把他數理天算上的對頭，都認爲是基督教底仇人。並且那也是他視爲上天神意底顯示的，如果他的那些對頭們底攻擊，未能得逞地失敗，或者如果他的那些對頭們，出人意料之外地喪失了性命。如同當時一切虔誠基督教徒一般，他處處所瞧見的，都覺得是天主主宰底顯跡。天空的非常過程，他都視爲天主向世人所作的勸告與警戒。這樣我們也無須驚奇的，是他和其他的好天主教徒一般，也用祝聖過的物件如聖徽章與聖牌等物，以保護肉體與靈魂不受種種的危險。

這是湯若望根據他真正的天性說的情形。一切凡是認識他爲時已久的人們，也都這樣批評

他。這樣他在他的信札中與著作中，顯示了他自己。

可是湯若望也是有他的缺點的。

在一個根本生疏，絕無所識所知的異邦裏，傳教士之職務對於傳教士之性格，自來都是要加上一層重荷的。這尤其在過去幾世紀裏是這樣。可惜傳教學（*Missionswissenschaft*）還絕未曾把教士生活的這一方面，置入他們的觀察範圍內，作為一種研究的對象。傳教士遠處異域，孤零零地置身於習俗文化完全不同，或甚至習俗文化低劣的民族之間，而對於這些人們，又未能建立內裏個人心性上的關係，那麼這樣這傳佈信仰之使徒，處處所依所恃的，便完全是他自己的一份見解思想了。很稀少的次數他能獲得一位傳教同年底遠道過問臨訪。往往甚至經年累月，他纔能由家鄉裏，再得到一點存活的消息。因此有許多傳教士，就墜入悶鬱悲愁之思想中，甚至漸次釀成一些乖僻誤謬的見解，始終執迷不悟，對於傳教同人，更妄造不公評語，而更向歐洲他的上司們，寫些言詞悲哀憤激的彈劾控訴信件。假使人們能把這一種情形酌量一下時，那麼人們對於傳教史上所發生的許多可嫌可厭的事故，就要另作一種判斷了，而由羅瑪文書庫內所堆積的那些教士們

底彈劾信件中，便不能作出過急輕率的推斷了。這樣人們替代糾劾責難，反而要原諒寬恕，而對於那許多給他們的上司們作出些爲難事件的傳教士們，反而要憐憫他們，視他們爲他們職務底犧牲品了。

在這一種意義之下，湯若望底性格却幾乎是絕未受到污染損傷的。他並沒有鑿空閒思的時問，他好動，時刻無閒地樂於事業。他瞭解滿人，而滿人亦能瞭解他。他那萊因河畔（Rheinisch）家鄉式的幽默趣才，保祐他出了許多愁苦的時刻。

然而孤立的生活，對於一個人底性格，是還能有其他的不良的影響的。因爲一個人如果能每日與同寅同僚接交往來，那麼個人性格上的鋒芒齟齬，便可乘時琢磨而去，不致滋蔓爲禍，然而在孤立的一個人底身上，却就要不知覺地暗自滋生蔓延，竟至最後令人可厭棄地顯露了出來，這時雖欲琢去，然而已幾乎是不可能的了。在傳教士中自來都是有些乖僻古怪的人物的。連在這一點上，我們亦是更應原諒，而不可責難的。湯若望底性格便恰切在這一方面不良狀況之下受有污染損傷。況且這一種情形在他還有加重的趨勢，就是因爲他在朝中，位置崇高，而不阿附權奸。由這一

種情勢中，爲這一位性格倔強的人，便發生種種的危險了。

至於說湯若望性格上未經琢去，後此顯着了出來的稜厲鋒芒（一四），我們可以舉示幾點於下。

在湯若望晚年，我們發現他有頑強固執己見的傾向，而不容人們有所干涉異議，否則必至激怒痛恨（一五）。這是因爲他多半俱係獨自一人處於北京之傳教會內，自己爲自己之上司向來不受任何人干涉，漸次養成獨斷獨行之性癖的原因。所以他就很難降心服從了，如果有一位位置更高的傳教會上司來到北京時，他那健康妙趣的才思，有時甚至變成了毒譏刻薄的反語，和使人難堪的誑証。對於中國軍人底卑怯怕死，和那太監們底穢德惡行，他曾以多樣辣毒的言詞描寫譏嘲過他們！他這訕笑譏嘲的興趣，即在他的傳教同志與傳教會上司的身上，亦是不稍加斂跡的。這却並不是無危險性的，因爲譏嘲訕笑是受過教育的人們，所最難堪最不能忍受的。許多的粗野的言詞，這是人們不可逐字去解釋的，有人報告，曾出之於他的口裏。可是這些言詞竟被數位絕對難以瞭解德國人性格的葡籍教士，竟逐字地去加以瞭解。坦白直率地說出個人底意見，這固然是好的；

但是在這一點上，人們處於人羣之間，亦是不得不予自己以節制限度的，然而這却是湯若望之所不會時時顧慮，而未能得以常常辦到的。

湯若望底館舍因湯若望威望崇高的地位，所以一天到晚總是充滿了各式各样的拜訪者。這些拜訪者乍來乍去，時時刻刻絡繹不絕。天一明一直到深夜，任何一個時刻裏，都能有一位皇帝使者火速地來召他入宮。所以在這種情勢之下，教堂內的日程和修道院底日常規律，就決不能提到話下了。他的館舍并不是一所如同人們在羅瑪，在古晉巴拉（Coimbra）或在澳門所習慣的那樣的傳教會。所以乍一到北京的傳教士們，一瞧見湯若望底這宗情形，自然是不能不往往對於他們這位名聲浩大的同志，暗自在心中作他們自己的意見了。

湯若望是一位多忙多動的人。因此他就很高興，在他的那些僕人中，能尋到一位受半途教育，並且很精明能幹，而通達世故的人，以供他驅使，而這一箇中國人也是曉得怎樣同地位至高的大人先生們來往的。他的姓名是潘盡孝。他也是基督教徒。湯若望完全信任他。因為湯若望底性情是率直的，所以他也常常把他對於他人（連傳教會上司亦在內）的思想，都一一也向他這位僕人

說出。然而這却是如同酒底效力一般，給這位僕人上頭上腦起來了。在來拜訪的客人之前，他竟也過分顯形露色，漸次學得凶橫胆大，在他的外面效顰他的主人，也效顰他那粗野的言詞，一如在僕人之中，所不少見的那一種心理一般。湯若望在他那和悅的脾氣之中，竟未曾留意到他這位大助手大管家的一切毛病。順治皇帝因湯若望之懇求，於一六五四年曾賞賜與他這位僕人一個軍人職銜。可是對於這位僕人，怨言甚多，一般人們都罵他爲一無恥小人。並且因了這位僕人，湯若望在體面中國人底方面，得罪了不少的人，竟致成爲仇敵。

這位僕人底一個小男孩，我們在前文已曾敘及，他因他的規矩有禮的舉動，在湯若望底館舍中，曾引動皇帝底注意的。可是皇帝這時屢屢催促瑪法，過繼一子，以便到他年老時，可以照管他，並且可以使他天下得知的名姓，不致在後世湮沒無聞。因爲按照中國人們底見解，一位高官底親族，亦是應當在他的榮銜上有份的，因此在三品的官員，皇帝就要加封他前兩代和恩蔭他後兩代的，在一品的官員，就要封蔭各三代了。湯若望底祖先是順治皇帝加封了的。然而他却因遵守教規矢志貞修，終身不娶，所以便無從有後人了，可是這一個困難仍可因過繼的辦法，得以脫除。湯若望體

念皇上這一番美意，爲使皇帝心內愉悅，竟把他僕人的這位小男孩，過繼了過來，歸他撫養，不過這過繼的時日却不能確切考定了。又因爲湯若望與這位小男孩之間的年齡區別，過相懸殊，所以湯若望就把他認爲過繼的義孫。他獲得湯若望底湯姓，自是以後，遂名自己爲湯士宏。可是這小孩的，爲湯若望執役的父親，竟往往被人們誤稱爲湯若望過繼之子了。這個錯誤，因有上述的一層原因，因自可曉然了。其實他決非湯若望過繼之子的，因爲他以後，也時時刻刻仍以他的舊姓潘，出現於社會的。就是在這一個小孩子底過繼上，也還是引用了中國三種過繼法上的那一種最不完全的「寄養」過繼法的，這一種過繼法不過僅是一種「慈善行動」而已；被過繼者在法律上並無承繼施行過繼者之遺產的權利（一六）。

關於湯若望過繼這個男孩的這一場事實，這是當時一般人們，都有所知所聞的。皇上，中國的士大夫，甚至湯若望自己，連他的傳教同人們和其他傳教會底傳教士們，也都曾提及過這件事情。遐邇咸聞，哄動一時的，是順治十八年九月，就是一六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之後的一月中，經幼主康熙皇帝所下的詔諭（一七），爲使人們瞭解這道詔諭底裁奪，我們須在下面略加幾句解釋。

的言詞。爲專門造就高級官吏之優秀子弟，在北京是另設有國子監。入監的條件，就是入學者必須是秀才。因皇帝底特恩，有時也有三品以上的官員獲得特准遣送一子入監。這樣入監的各該青年，無須經過考試即可提升爲秀才（一八）。在康熙御極之初，已向臣下特賜此種恩典。湯若望之義孫因爲過繼之種種輕微，所以並未包括於此等特邀皇上特恩之學子中。因此爲他，皇帝必須得降一特旨，然後方准入監。可是由這一種必須得降特旨，然後方准入監的情況之中，亦可證明這件過繼的事實了。除此之外，這過繼事實，是在皇帝底特旨中，敘述得清清楚楚地。皇帝特旨底內容如下：

『湯若望係外國之人，効力年久，原無妻室。不必拘例，其過繼之孫湯士宏，著入監肄業。欽此。』

（一九）

這對於湯若望是一個很高的榮典，我們直到如今還存有當時有名的兩位士人，特爲此向他致賀的文件。

一件致賀的文件是少傅胡世安之所撰述，在這篇文章中他特爲指出湯若望是歷史中第一位榮膺皇上這一種殊恩的。他陳述湯若望底過繼之舉，特影射詩經中的一首詩，這一首詩是說士

蜂養育桑蟲的傳說的（據說，七日之中，竟能將這種桑蟲變為土蜂。）（譯者按：此節所引，即詩經小宛篇中，「螟蛉有子，蜾蠃負之」之詞句及其註文。）由這一種影射，湯若望這過繼的行動，便被象徵地表示了出來（二〇）。

其他的一位撰賀文的士人爲宮保王崇簡。在他致湯若望的賀文中曾說，皇帝向他格外推恩，爲造就他所過繼的與撫養的孫男（二一）。

畢嘉和南懷仁在他們給湯若望所寫的追悼文中，都是明明白白地提到了過繼之子或過繼之孫的，同樣的是多明我會士維托理奧·利奇（Vittorio Ricci）在一六六六年所寫的兩封信（二二）中之敘述。在一六六四年和一六六五年大攻訐的案件中，湯若望這位僕人仍以原來潘姓之姓氏，在過繼之子之名義下，被列於被告人之中。由上述這種種的，就當時各方面的情形所發生的言詞中，更可發生出來一點事實，就是無一人，亦並無一位傳教士，曾在這種過繼的行動中瞧出了一點什麼真可指責的情形來。這是與中國民族底觀念完全相合的一件事體。湯若望底幾位傳教同人，向湯若望指責了一切可能的過失，可是至於說這一種過繼的行動，在道德方面是不能

容許，的確沒有一個人曾主張過。

在中國日常的言語上，真正的後裔與過繼的後裔，都是一樣稱呼，並不特行作出一種什麼區別來。再者按照中國哲學上的見解，被過繼者漸次亦可變成施行過繼者底真正後嗣的，如同詩經上所說那桑蟲變土蜂的事例一般。這樣這過繼事件的真像，於數十年之後，竟完全被人們之所遺忘不知了。湯若望當時自己或一個其他的人，並未曾覺悟，這是他在他那和藹的脾氣中，竟作了一件大不智的事件出來的。他在在世之日和他去世的頭一二十年間，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一點。可是半世紀之後，偶一不慎的行動上的效果，便要漸次開展了。

在這一件事故上，即在其他的事故上，人們也總是獲有印象，總覺得湯若望雖然處處盡力嘗試着，切合中國之習俗風尚，然而這個民族平日生活上的一條慣例，他却完全未曾注意遵守。體面的中國人無論如何，都是要顧及他的面子的，這換句話來說，他所視為第一條義務的，就是外面總要現出來自己是一位品行端正，無可指責的人物。至於說他實際上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是他少所顧慮的，只要沒有人知道他的缺德缺點，或甚至罪惡過失，那便是他的勝利了。這可真正是

民族上的一個缺點了；因為這樣，僅重而不重實際的風尚，竟會使人們喪失了對於真正道德的心思的。這樣替代了社會上這一種真正的道德的，便是那一種外面正確，處處掩飾的行動，和那易使人虛偽的卑恭尊敬的禮節禮貌了。

遵從這樣的一條規則，在湯若望這個澈底正直的人，自然是決不會想了起來的。但是處在這一種素乏信任，猜疑成性的民族裏，因自己地位之崇高，和因有這樣多充滿了嫉妬心的對頭們，却應處處愈加小心，愈加矜持，以避免任何一種不規律之嫌疑。因為素常時時刻刻總是有許多窺伺他的人，在暗中偷着注視於他。他是宗教與政治各方面生活底中心，每日要接見許多賓客，他還有向女教堂內和城內許多其他小教堂內之女教友們作神事，予以靈魂救護之責任；他同他館舍內之僕人和他的小男孩，又都是處在一種很親信的態度中的。如果他要十分小心，和極端地謙抑矜持，那這就要給些懷有惡意的人們充分貢獻些向他造謠中傷的機會了。中國底人們在那以世間最純潔無惡的一副面孔去誹謗他們所要毀滅一個人物的作僞本領裏，都是些泰斗能手哩。

誰若心中不存成見地同湯若望交往，不久就可認識出來他的價值的。一個這樣不存成見的

人，譬如說，就是栗安當神甫，他對於他只是有稱讚佩服的言詞可說的。羅瑪各上司因湯若望對於教會的功績，和嚴格守教規的德行，時時皆係敬重他的；同樣對待他的是中國傳教會之各上司，只除一人之外。傳教會副省區長之下，經教廷正式所聘定之教務顧問為潘國光 (Brancati)，穆尼各 (Smogniecki)，與賈宜睦 (Gravina) 三位傳教士，而未後所說的這賈宜睦同時還是身兼糾正之職 (Admonitor)，如遇教會副省區長措置有所失，當時還應根據職責，把他勸告糾正的。此三人對湯若望自來信任，從未會有所迷惑；由這一件事情之中，便可看出，為傳教會上司所選擇之顧問，却是儘可能的力量以選擇了最慎重與最聰哲的人們來了。可是其他的傳教士們，一遇到誹謗的人們出來誹謗時，便要上當，而竟相信他們所說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詞了。像這樣上當，中誹謗之毒的第一批人物們，就是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他們二人自一六四八年之初葉，即常川居留北京的。他們這上了誹謗言詞之當的見解，竟向旁人傳揚了出去，於是竟致到了一種很可惋惜的分裂地步，這分裂竟拖延了五年之久，而仍尙未能完全剷除，一直到十年之後，教難復起，完全的和睦態度方得恢復 (二三)。

可是那究竟是怎樣來的呢？利類思與安文思兩位傳教士，竟會這樣完全誤解那位救了他們二人性命的傳教士湯若望呢？他們二人自從一到北京之日起，對於他，心中便就存了芥蒂的，因為他們把他對於他們二人的退縮態度解釋錯了，而真以為他是不肯營救他們的。

湯若望對於他自從聽說他們二人被滿軍所俘虜之日起，自己所持的態度行動怎樣，都作有確切報告（二四）。他首先所苦的，就是不知道他們二人在殘暴凶狠的偽帝張獻忠之朝中所佔的位置怎樣。他一得到了關於他們的遭遇的第一個消息時，他便準備上一份懇求皇帝釋放他們的奏疏。北方傳教副省區區長傅汎濟，勸止湯若望勿作此事，因為這兩位被俘虜的教士，希望到北京後，再設法請求釋放，並且是要直接向最高司令官請求釋放的，免得這一位總司令官覺得教士們瞧不起他。可是他們自然是不會知道，這位總司令官，就是青年皇帝底一位皇兄，素來為攝政王之所嫌惡疾恨的，湯若望聽從傅汎濟的勸阻，中止向皇帝上他那份已經備妥的奏疏，然而却準備一切為收留這兩位被俘虜的教士的事體。他們二人是於一六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或二十三日穿過教會旁之城門，進入北京的。安文思登時就要到湯若望底館舍裏去，但是却被護送的軍隊所阻止。

因爲這些軍隊獲有上峯命令，要把他們二人送至禮部發落。湯若望一得到這個消息，便趕緊奔到總司令官底府邸中。在那裏，他第一次纔得知道，兩位教士在暴賊張獻忠朝中的位置，而在那裏，他常時便被嚴重地警告，不要去同二位俘虜談話，免得把自己也弄到誣受反叛嫌疑的地步。這件事體，在湯若望現在完全瞭然的了。顯然的，利類思和安文思是被視作戰爭俘虜了。這樣他們以叛賊之高級官吏之身分，根據當時成文法律，便要判處死刑的。在北京，甚至風言風語地傳說，他們二人是暴賊所作的那些凶殘事體上的精神促成者，並且是在叛軍中充當了高級參謀的。湯若望以爲他們這惡劣事態的責任，是應當歸他們二人自己和傅汎濟去負的。在陝西，當在這事決斷之權還在那位很有好感的總司令官底掌握中時，關於他們的釋放是很容易弄得的。他們最大的過失，是肯在一位叛賊底朝中掌管職務。這是他們寧可死，而亦不可作的事。潘國光與穆尼各對於這件事情的判斷，是如同湯若望一般的。他們二人證明，湯若望在他對於二位俘虜所應盡的責任上並無遺憾（二五）。

利類思和安文思二人向教會方面自行抗辯。他們說，暴賊所授與他們二人的銜位，不過僅是

一種純粹的榮譽虛銜；這虛銜決不能說是朝中正式官職的（二六）。他們二人竟向湯若望施以攻擊，他們的意思以為，湯若望不是也接受了一個崇高的職位的麼？況且這職位還不是在一個中國皇帝之下的職位，乃是在一位暴發的蠻夷之下的位置的，而張獻忠無論如何却總還是一位中國人，而在當時中國那大紊亂的狀況之下，似是最強而有力的黨派。對於這些攻擊的言詞，湯若望也當然可以答復說，滿人之入中國，係為保護中國而來，並且還是經北京居民之所一度招呼，請其佔據空虛之皇位的。這答復並無若何困難，但事實上却並不是這麼簡單的。當在明室之皇位尙未空出時，滿人已經久已敷衍戰事於中國了，並且竟自行妄自上皇帝尊號，所以對於當時明朝之世界大君，竟是一位真正的叛徒，況且北京底居民亦並沒有單獨召立一個新朝代的權利。所以為二位俘虜之教士辯護的傳教士金彌格（Michael Trigault）竟向湯若望引用一句成語說：「坐在玻璃室內的人不可以石塊擲他人的。」

這樣很長久的時間，兩方面一來一往地互相駁辯與筆戰。由上述這種種情形看，我們現在的人們底批評，便不得不如下了：至於說，他們二人因情勢底逼迫，不得已而依附於一位變成了一個

野獸一般暴虐，而在爲爭奪權威的奮鬥中竟致失敗的一位主君，這却是他們二人惡劣命運所負的責任，超過他們的過失所應負的責任的。這樣他們現在便不得不自行忍受其效果了。

至於說，他們二人是戰事俘虜，這一切的人們都完全瞭然，只除掉他們二人自己和傳教士傅汎濟，他是於一六四九年四月二日以北方傳教會長之資格，來至北京，而完全佔在了他們二人一方面的。他們曾三次向朝中上書，請求准許他們二人，移入教會內居住，竟都被拒絕批駁。當湯若望在禮部之官員處，爲二位俘虜要說話時，他竟接到一個警告。在繼續的數年裏，皇帝曾下過六次普通赦令，僅止殺害父母的凶手和叛逆的罪犯除外，不在赦免之內，可是這赦令竟未得引用於這二位教士底身上，由此就可顯然得知，他們是以叛逆的人物，在囚居中了。一開頭時，他們還可以到湯若望底館舍中去，並且還可以作彌撒；其後竟禁止他們，不許前往了。傅汎濟常去拜訪他們，後來經政府也竟加以警告阻止。當在他並不理這一點，而仍去拜訪他們二人時，他遂被因這一個理由，和其他人們向他所指責的過失，把他放逐出京去了（二七）。

雖然有這種種情勢，但是利類思和安文思，仍皆未受到苦痛，仍爲政府之所和諱對待。他們是

被安置在禮部之賓館中，而以國家上賓之禮款待與供給宿膳的（二八）。這件事情底這樣處置，其原因足可顯然而知。人們只是爲顧及湯若望，並且大概也因爲在最高峯並不把他們視作叛逆，所以他們纔能得到這樣多的優待。但是却不能使他們在首都裏完全自由行動，因爲丁值國內處處戰事蜂起的一個時期裏，政府不得不顧慮到高級軍官團底情勢情調的。

從湯若望一方面說，這反而成了一個最好的辦法了，因爲他既被友朋輩之所勸告，而最後又經禮部與政府之所明文命令，須遠離二位俘虜，外面不可承認二人爲他的傳教同志（二九）。他特選擇了這條道路，完全爲顧慮傳教會之安全，然而暗中却仍在爲他們二人而活動。至於說他無重大理由，而竟肯在危難中棄置像受有這二位傳教士所受的那可驚怖的苦難的傳教同人於不顧，這因他的性格底和藹仁厚絕對不會發生的。但是他或許是並未醒覺，應行怎樣去向他們二人把他的立場安靜地與和藹地指陳了出來的。

可是向二位俘虜，人們所能作的，僅只有一件事體，就是人們須要勸告他們，暫時應略受個人自由上的輕微限制，耐心靜候時機，一覺人們底腦筋有所平服時，便可捉住任何一個能促政府願

意擺脫這件討厭的案子的機會，加緊地向政府交涉，自然便可不費力地達到目的了。

這個計劃却是他們二人不會作了的。他們開始發出些悲哀激動的怒訴言詞（三〇）。按照他們二人底意見，他們二人是自由的。只是湯若望阻礙他們，不令他們遷至他的館舍中，不令他們完全自由行動。他們這見解更經傅汎濟和一小組我們馬上就要領教的基督教徒們之所慫恿加勢。於是他們的腦中便堅決認定：湯若望一日在北京，他們一日便沒有希望得到釋放。但是要把他丟掉之後，誰又可以填補他的位置呢？他們所想到的一個補替的人物，就是衛匡國神甫（P. Martini）。其後利類思和安文思竟致自行向朝中，推薦他們自己充任數學與天算之職務。這樣朝中便動了猜疑的心思，人們覺得，他們二人底目的是要排擠湯若望。三日之後，他們又提到傳教會之教堂與產業，應當歸屬於他們二人，因為他們是利瑪竇底遺產繼承者。這更加重了中國官吏方面底猜疑了。人們兩次向他們獻策，並且給與他們以可能，讓他們返回澳門，以便這樣毫不惹人注意地消失於北京。可是他們並不照這話辦理。這更使中國官吏方面，對於他們二人和他們的黨徒憤恨了。因此傅汎濟與衛匡國之遭驅逐，自是可以曉然的了。確切無疑的，是湯若望並未作有什麼保

護這兩位遭驅逐的教士的事體，甚至把他們弄走，也還是他深以為然的，並且在他那時被惹怒的情勢之中，八成還是促這一個舉動底成立的。因此利類思和安文思底拘禁，現在就加重起來了。一六五〇年五月間，他們竟被發交於一位滿軍首領充當奴隸。雖然攝政王多爾袞逝世後，他下的一切命令俱被取消，但是這兩位傳教士仍舊是為奴的。不過人們對於他們的待遇在這後此的時期裏仍很寬厚而有所顧慮，主要的原因就完全因為他們是湯若望底傳教同人了。只是除去略少的上邊已經敘及的限制之外，他們是在城內自由活動，隨意招待賓客，並且作傳教的工作，而漸次亦可建立一個新基督教區。

這以上所敘述的，就是個人方面與政治方面的背景了，在這背景上竟演出了上面這一幕可惋惜的戲劇。

湯若望和這兩位戰事俘虜之間的緊張情勢，已經人們覺察出來，而這在他們二人到北京後的頭幾日裏，已經是露出了痕跡的。對於六十五歲之老傳教士湯若望，便起了一大陣至鄙污的誹謗誣毀的言詞。在湯若望底大傳教區裏，也有些黑心無天良的教徒們。在他那激烈的性情中，他或

許不免有過於嚴厲處治他們的地方。可是現在來向這位老人施以報復，是他們覺得是一個順利的機會了。他們作出一種最純潔無惡的面孔，向二位俘虜述說，湯若望底館舍中所發生什樣的惡劣事體。他們說他那位無恥的僕人，說湯若望口中所說出的些古怪可注意的言詞，說湯若望對於他的上司們的舉動與批評。這兩位俘虜不查這些教徒們言詞底真偽，竟覺得恍然大悟，以為因這個緣故，所以他纔不收留他們於他的館舍中的，免得他們爲他的這些事件底見證了，他們更使一位澳門籍的青年混血統的人蔡接鐸（Antonio Fernandez）到湯若望的館舍去偵查一下。這人原來是他們由四川帶到北京來，以便他後來入耶穌會，充當傳教士的。我們完全可以瞭然，湯若望對於他們這一種舉動要多樣特別氣憤的了。利類思和安文思竟把他們這由臆斷所得的「發現」報告給他們的上司和其他耶穌會會士們。這個消息竟致侵入菲律賓羣島。他們更向北京傳教區內之教友們談論此事。連傅汎濟現在也想起來了。湯若望口裏各不同的言詞，和他對於服從上的過失，譬如他竟怎樣阻礙了同他，就是同一位地位更高的會長的信札的來往。上了年紀的龍華民和數位其他傳教士們，現在亦開始在他們這位會友底身上，迷惑起來了，並且相信人們對於他所

提出的一切言詞了。

我們不要向安文思和利類思底身上，再投一塊石頭。他們二人兩年的時間曾經時時刻刻生活於一種殘暴死亡的威嚇之下，所以他們性靈上的和諧均衡，早已就破壞了。然而傅汎濟却是堪當嚴重指責的。其他的人們可遺憾地隨聲附合了那些誹謗的言詞，是因為有這樣多所稱之為見證的出來反對湯若望，並且因為他們是不瞭解德國人們底那一種特質的。我們在這一點上，又經歷了那些並不少見的事例中之一，就是甚至高尚的好人們也竟要相信，其他的人們果然是有最惡劣的過失的，純粹因為有這樣多的人們一律說道。甚至已經到了聖人地步的方德望 (St. Phan Le Fèvre)，他本來是很重視湯若望的，也表示了他的痛惜，不得不聽得見這樣的些事體 (III)。

這樣我們便可以略少明白了，數位傳教士在繼於此後的時間裏所作的一步在其他時候完全不能瞭解的舉動。一六四九年五月二十日有一封文件向在杭州的傳教會副省區長陽瑪諾 (Manuel Dias) 郵寄了去，這件文件底內容是說，湯若望神甫為已經宣誓守四誠的耶穌會會士，

如果預先根據教規向他所下的一個警告再要無所裨益時，他便要認爲不知悔悟與不服會規，開除於耶穌會之外。人們給他所開列的罪狀中之學學大者爲十一條，譬如：接受爲教會及修會所禁止的官差官職，對於天主與道德的過失，對於服從於甘受清苦之教規之違犯。這封文件是出之於北方傳教會長傳教士傅汎濟之手筆的，署名的人，是他和龍華民，利類思，李方西（*de Ferraris*）和安文思各位傳教士。他們這控告是以無賴的基督教徒們底言詞爲根據的（不過這無賴字樣在他們的文件中却並未明確說出），再就是根據混血兒斐爾南得斯底報告，他是曾在湯若望底館舍中作過一番查訪的，並且還根據湯若望所說的各種言詞，這些言詞是署名的傳教士們親自一半聽到耳內的，而現在竟把他的這些言詞作爲最惡劣的解釋了。譬如說，爲證明他的不服從，他們竟引用湯若望所說的一句話：除天主與聖·依格納爵之外，我沒有高頭的人們了。他們抓着他這一句話，就又向下推斷說，那麼他是不承認教皇，和現在管理他的教士們爲上司了（五二）。

更向下所作的些內容類似的控告函件，雖然性質並不那麼嚴重，在後此的數年中仍尚繼續不斷。尤其是安文思憑着他那一隻玲利的筆端，很勤奮地在寫訴狀。

一直到這時完全品端行正，無瑕疵可指的傳教士湯若望對於他們這種種攻訐誣告的憤激，却是真正的憤激了，況且這攻訐誣告中尚有數件，其鄙劣之程度簡直無以復加。他尤其是對於安文思氣憤難平，可是他這氣憤却也是公平的，當然的。他曾說，安文思竟是主使一位「黑人」(三三)到他的館舍中的，這位黑人當着許多的僕人和許多教外的人們，指斥了他一切可能的過失。湯若望底朋友們都爲此驚懼，深恐他在他的憤怒中要不顧一切，作出些不智的事情來。因爲他可以利用他在朝中的情面，很容易要求對這一切攻訐他的人們底處治的。可是他們這一種驚懼並無理由。他對於他耶穌會的愛護過於深厚了，所以決不肯對於一位像安文思的會士爲報復計反而在中國政府方面弄出一場官司來。當潘國光向他出主意之時，他對於他們的攻訐，不過僅止幾聲失笑，而在全盤後此的時間裏，仍並未中止爲俘虜者謀求釋放(三四)。就是連對那一些爲誹謗言詞底源頭的基督教徒們，和對於混血統的斐爾南得斯，他都不曾迫促政府以刑罰加到他們的身上。但是他很深痛地感覺了，他竟會被多半經他親手所付與洗禮的新教徒們之所誣毀誹謗。那位混血兒自然是未被收入耶穌會中，充當了教士的。教徒中誹謗湯若望的人們有十名，竟致遭遇災殃。

而死。湯若望在這上頭又瞧出天主神意之干與及示罰（三五）。

爲這位無過失而受攻訐者，一開頭就有一批來爲他辯護的人物，這些辯護的人物在繼續的年數裏，更是愈行增加了的。

傳教會副省區長之教務顧問——就是潘國光、穆尼各和賈宜睦等三位教士——在他們對湯若望的意見中不會搖動過。一六五〇年五月間，他們爲湯若望所寫的一封上呈的辯護書（三六）中會說：那終究是很奇怪的一點的，就是人們在這兩位教士到北京之後，纔把湯若望底這種種劣跡使人們得知。況且他們說這話，他們並未住在湯若望底館舍中，而那些在他的館舍中居住多年的傳教士們，對於這一切情形反而無所覺知了。利類思與安文思應當受嚴重申斥，因爲他們過於輕信中國人們底言詞。在印度人們所應用的原則，是至少須有十二位土人在他們的言詞中互相合致，纔能作爲有一位證人的效力的。而在中國人，大家還是得要更加多倍小心慎重的（三七）。傳教士安文思所提出的憑證，因他心內本已存有成見，所以就決無價值了。他應受譴責，因爲他不僅在傳教會上司前提出了他的攻訐，乃竟亦在他的同會會士與會士以外的人們底跟前說道了他

這攻訐的言詞。因之各教務顧問便要求，向兩方面諭令各息鬥啄，從此終止爭端。

潘國光在一六五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向耶穌會總會長嘉拉法（Caraffa）所呈一封很長的報告書中（三八），敘述了這誣謗攻訐事件底起源與歷程，並且在極有效的方式中爲受誣遭謗者予以辯護。他這函件底開始便說：「傳教士湯若望自多年以來，已爲入會宣誓之會士，現年已五十九歲，在中國傳教會已有三十年之久，而在這三十年之中始終皆享有一位善良會士，與耶穌會優秀份子之聲望。」關於他們對於他的攻訐告發，潘國光皆指爲純粹的謊言（Pure bugie）。

年高的龍華民，他本來亦要求了撤換湯若望的，不久便變，更了他的這意見了。他在一六五一年八月十七日致教務顧問潘國光的一封信中，這封信是潘國光應行向雙目失明的傳教會副省區長陽瑪諾宣頌的，他已足夠明確表示了他這時的意見。他的這封信中的大意，以爲人們應當儘量急速由北京召回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他們二人把基督教弄到了惡聲名的地步，因爲他們從前不爲他們明朝皇帝盡忠，而依附於一位叛徒強盜之下，並且因爲他們現在是名列奴籍的緣故。朝廷，禮部，和那位爲他們奴籍的戶主的滿人，都要非常歡迎的，如果他們能得擺脫掉了他們

二人時。北京官吏方面，與我們北京傳教會教士有交誼的官員，都迫切請求我們，莫要同他們來往。其他一個應召回他們二人的理由，是因為他們以無賴的基督教徒們底贊襄，另立一派，而與北京傳教會分裂，兼且破壞湯若望底好聲望。至關於指責湯若望有不合的行動的一節，因為我自四年以上之時間以來，我就為他的懺悔告解的神父，所以我敢誓言，他的行為是無污點的（三九）。

穆尼各向耶穌會總會長加拉法已寫過一篇較長的報告，不過這一篇報告到現在已經失沒，未能得以發現了。他在於一六五二年六月三日寫給耶穌會總會長加拉法之繼任者皮考老米尼（Piccolomini）（皮氏這時也已是去世的了）的一封信中，冗長地報告了這件事體（四〇）。

他的信中說，湯若望享有一位虔誠善良傳教士之聲望，已有三十年之久。為這句話的佐證的，是傳濟，他充當了他的上司共有十四年。任何一個人不能越夜即成一壞人。如果他果然這樣惡劣，為什麼十四年的久長，傳濟竟置之不問呢？因此總會長就應使搗亂者安文思離開北京，無須多聽已年事過高，兼且雙目失明，而對於其職務不能勝任的傳教會副省區長底言詞，而更應聽從傳教士們底言詞，譬如潘國光與賈宜睦二人底言詞，因為他們二人對於這一場悲劇所持的態度是無

黨無備的。

最後賈宜睦還在一封較長，但未能得以完全保存，於一六五二年寄給耶穌會總會長之下所設的專管葡萄牙國耶穌會務的協理的一封覺書中，又嘗試着以正當的態度直陳兩方面所犯的過失（四一）。他說，湯若望是有一副強硬不馴順的性格的，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過於長久過慣了獨自的生活。他對傳汎濟與衛匡國的態度，是我們不能認為公正的。但是在一切其他的情形中，他却純潔無過失。為今之計，應請總會協理或會長，向他寫一封信，信中要表現總會長或協理對於他一番如父如母的親愛，並且還要很感謝地承認他對於傳教會作了那樣偉大的事業。

以上是這場鬥爭兩方面底實況，可是居於這場鬥爭之上的各上司們，對於這場爭論所持的態度是怎樣的呢？羅馬最高一層上司們，對於這些彈劾訐告，自來從不會嚴重視之。持同樣態度的，是中國傳教會之各上司們，除去傳汎濟之外，五位彈劾告發者所上之告發文件，並未獲有各上司之批復。雙目失明的傳教會副省區長陽瑪諾，是完全以他的教務顧問為轉移的，可是這些教務顧問都確切知道，湯若望純潔無過失。一六五〇年安文思已經獲有上司之命令，應向湯若望發荊請

罪，恢復名譽（四二）。傳教會副省區長曾表示，他們的攻訐告發都純粹是出之於妄造不實（四三）。一六五三年患失明的陽瑪諾派遣他的教務顧問潘國光赴北京，以便徹底考查這案件。潘國光在北京住有二月之久。他七月二十日之報告，這報告是曾經龍華民底親筆簽名畫押的，其內容如下：「具報告者耶穌會宣誓會士潘國光，於一六五三年奉本會會士兼中國傳教會副省區長瑪諾之命，為中國北部之教務視查員。一六五三年七月間我到北京之傳教會內，確切詳細地考查了當地的事體。我發現關於耶穌會士兼北京傳教會會長湯若望神甫之聲名與令譽之一切攻訐，皆係數位包藏禍心，懷有惡意者所捏造之謊言，與輕薄之謠傳，因為他們意在於耶穌會同人之間播種莠草，發生內訌的原因，而他們肆口妄言，却係意存報復，因為他們欲借湯若望神甫之幫助，以達到目的之種種特殊圖謀，皆未能得以隨願心之故。我現在用眼前這篇報告，指實與證明一切攻訐指責湯若望之言詞，實際上皆係此等懷有惡意之人等之所妄造與假捏。即利類思與安文思二位神甫亦曾向我說，他們並未親眼瞧見湯若望神甫底這些事情，只不過是耳內聽到了這些愚妄的言詞而已，可是這些言詞完全如同我說的與指實的一般，悉係謊言與輕薄的謠傳。（這篇報告

以下的言詞，便是關於證實傅汎濟與陽瑪諾二人勸請湯若望接受欽天監監正之職的信件，係屬實情，原文特從略。爲顧及湯若望神甫之令聞令譽起見，我寫了這報告，這報告是我親筆簽押，並蓋以我職權的印章的，時一六五三年七月二十日」（四四）。

這樣到一六五三年這一場大風波總算克服了。湯若望自是之後，便努力克制他的激烈性格，這是已有一點效果的。賈宜睦於一六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向耶穌會總會長修函報告，湯若望已知悔改了。但是他仍還有些特質特性，使人們固然尚能容忍，但是最好仍應以天主底福祐，經上司們以聰明與慈悲的手段予以指正（四五）。

一六五九年傳教會副省區長郭納爵 (Ignatius da Costa) 在他所寫的一封寄呈羅瑪耶穌會總會長尼凱爾 (Nickel) 的一封信件中，尚又一次證明湯若望底潔白與無過失，這封信因爲志在必欲其確切達到目的地，所以便交給蘇納 (Dietel)，白乃心 (Crueber) 二位傳教士，由陸地携帶至羅瑪。郭納爵還親口向他們二人，把這封信宣讀了一遍，令他們二人把內容記在心裏，然後就把牠付與於蘇納之手，因爲他是領率的人物。因爲蘇納並未實踐他羅瑪之行，並且不久又去

世，所以這封信終究流落在中國。可是後來白乃心到羅馬時，口頭上報告了這封信底內容（四六）。
一六六〇年教務視查員意欲提升傳教士湯若望爲中國北部之傳教會長，這足可爲較高一批的上司們絕對滿意於他的一個表徵了。不過提升終於未得見之施行，因爲利類思和安文思提出種種困難，而加以反對之故。他們二人總還是未能瞭解湯若望底性格而同他們的這位老會友和睦相處的，雖然他們已經早就取消了他們那惡意的彈劾（四七）。可是在湯若望一方面，雖然費了一切力量，然而亦尙不能根本改移他的秉性。誰對於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還能希望他改移秉性呢？

因此我們就仍不得不繼續經歷，在一六五九至六〇年又有兩位傳教士，這次甚至是兩位德國人，就是新到中國來的蘇納與白乃心，暫時誤解起湯若望來了。傳教士安文思會堅強地說，他曾聽到蘇納口裏的一句話，就是湯若望有二十四條理由，值得以火燒殺（四八）。這大概還是出於這種誤解的原因的。蘇納到北京後，無多些時日竟自轉赴濟南。而白乃心於一六六〇年七月五日也還寫了一封攻訐湯若望的覺書，照這覺書底內容來說，他也真够得上安文思第二了。他說湯若望

有幾種缺點，是他會親眼見到了的，其他的缺點，是他由「正直」的中國人底口裏所聽了來的。但是他也還老老實實地加上了一句說，他道德方面的失足，却是他無有所知的（四九）。

因為蘇納神甫逝世過早，所以我們就不能知道，他是否又改變了他的意見。白乃心却確切澈底改變了他的見解。這我們可以由他在北京充當湯若望底文件抄錄者一事中，便可推斷而知。再就是後來他到羅馬時，曾於一六六四年四月七日筆錄與宣誓證明他的一段宣言是真實的，就是宣言傳教會副省區長郭納爵會證明湯若望是無過失的（五〇）。能證明白乃心對於湯若望的意見澈底改變的，尤其是那位在歐洲有名望的耶穌會士阿塔納西尤斯·姬爾雪（Athanasius Kircher）所寫給湯若望的一封信，這封信以十足頌揚的言詞稱讚了北京傳教士與學者湯若望之盛業殊勳。這樣，這封信中要安慰與鼓勵湯若望的目的，很清楚地透出。這封是要請白乃心親自携回北京遞交湯若望，並且是要他把羅馬底一切新情形親口報告給他的。我們不會有所失閃地，如果我們假定，白乃心為恢復他冤枉湯若望的無理行動計，他纔鼓勵姬爾雪寫了這封信，並且還促迫了他，以十分和藹的言詞來寫這封信。信上所署時日是一六六四年四月十六日。到如今僅信

稿尙存在（五一），這信稿已足可爲姬爾雪多樣重視此事的證據了。因爲這位著讀兼忙的學者，除掉給教皇與崇高的王侯們寫信，肯費時間起草之外，向其他的人們寫信，就決不肯起草了。這封給湯若望的信八成不會付郵寄走，因爲白乃心二次赴中國之行並未得以成功，即使這封信會付郵，由尋常之郵路寄往中國，那牠到北京の時日也必是過晚了的。

最後我們竟還能瞧得見，湯若望和他的兩位主要對頭利類思與安文思之間的關係，也能得以轉變到了充分和露地步。

湯若望在他生命上的末後幾年中，就是在他因受誣告，致受種種苦難的期間裏，他獲有機會自願爲他性格上的各種缺點作懺悔補贖，如果他這性格上的缺點實在是有過失可指摘的話。他的貞潔的性格將要由這一番魔難考驗中，愈加純淨光明地精練而出。

最後爲總束上述各方面之言論與情節起見，我們可以在這裏對關於湯若望之性格與美名

令聞之爭論作以下之評議。

如是，我們便可斷定，湯若望爲有過失者，因他素日那過於激烈，過於愛譏誚訕嘲，和易爲怒所激的性情，此外更因他對他那位僕人與其子過於寬縱仁厚之故。在政府驅逐傅汎濟與衛匡國出京的一件事體上，他八成也是負有同謀的嫌疑的。不過這一點，却是我們不能不向他承認情節較輕，而實屬情有可原。因爲我們看他們攻訐彈劾他的情節之重大，從人情方面說，自然就怨不得他激怒懷恨，思所以報復之道了。況且自一六四九年之後，傅汎濟是否仍爲北方傳教會長，尙屬疑問。而這一點在湯若望却是不承認的，這樣他便視傅汎濟爲他屬下之傳教士，而傅汎濟不究事之真相，竟相信人們對於他的上司所造的一切謠言惡評，所以湯若望焉能不加倍傷心痛恨呢？至於說當時北方傳教會長究竟屬於何人，這可是當時不少見的事例之一，就是人們對於羅瑪總會長之命令如何，無從得以確切知曉。這因爲當時歐洲東郵信件大半俱皆中途喪失，未能得達目的地，所以便更屬可能的了。不過我們由時期較後的些信件中竟然得知，湯若望底話有至高度的可信性，八成是沒有說錯的（五二）。傅汎濟這教務職權是否尙存在，雖已可疑，然而實地上人們仍尙一

律承認他爲會長，是湯若望不能不顧慮的。因此他的舉動便不能證明爲正確，亦不過令人略覺情有可原而已。衛匡國是經傅汎濟、利類思和安文思所特選以頂替湯若望底位置的，因爲他們決意要排擠湯若望出北京的緣故。這自然是湯若望所不能同意的。此外當在衛匡國到達北京城外，他並不聽從湯若望底主見，湯若望這時已正式是直接管轄他的會長，而竟要於未獲得官方允准之前硬行進至北京城內。

以上所述湯若望之各缺點，湯若望後來在他的悔過書（*Schuldbekenntnis*）中亦皆一一自行承認。他也曾經很早地——即在一六四九年或一六五〇年——親向傅汎濟請求寬恕。即連對於衛匡國之間的隔閡亦並未經歷長久之時間。在本書稍後，我們更將見到，衛匡國在羅馬竟反而能爲湯若望之辯護者。

這便是我們關於湯若望性格上缺點方面所要說的話了，至關於人們攻訐他的一切其它方面，湯若望底潔白是當時已曾得以證明了的。尤其是人們所指摘的行爲之無檢制，應行斷爲純粹的誣蔑。這個特徵是這些指摘的言詞很清晰明顯地頂戴於門額之上，令人一見，便可了然的。

傳教士中，即連多年同居於湯若望館舍中的各傳教士中，亦從未見有一位，令人得以聞知，湯若望有任何一種不合法，不名譽之行動，這是人們屢屢之所確鑿以言者。人們提出這種指摘時，所根據的據說是可相信的見證們底陳述，可是所謂「可相信的見證們」皆私人方面之仇敵，況且又都係中國人，安知其非別具肺腑者。傳教士中那兩位主要攻訐彈劾湯若望者，當時俱已證明，他們一開頭，便胸中存有成見偏見。至於說，攻訐彈劾的言詞終能邀得少數份子之相信，這也頗有可以令人曉然的地方，因為僅就外面看，有些情形確係能啓人疑竇，而不利於湯若望的。

許多傳教士們，恰切其中之最體面，最有名望者，時常發言證明湯若望之潔白無污。而經傳教會上司之所提起的一次檢查，又已確定了這些攻訐的言詞理由薄弱，完全不能支持。最後所有一切提出攻訐彈劾者，俱已明確地，或至少因他們態度底改變，而取消了他們的攻訐彈劾。

偉大的方濟各會栗安當神甫 (P. Antonio de Santa Maria) 本來時常到北京來的，在許多機會裏都表示了對湯若望的崇高景仰。多明我會兩位傳教士與此相同的態度我們即將在本書下文可得見到。即到北京之荷蘭使團於離開北京後，對於湯若望亦並未有若何怨言。

此外即連教會外的湯若望之對頭中也未嘗有一人曾以與此類似之言詞，攻擊湯若望。在我們馬上就要敘述的大訟案中，人們是嘗試着儘量向惡劣處描畫他的。可是我們由這一批子人們底口裏連一句指摘他個人私德方面的言詞也未會聽到了。

還有可以爲湯若望個人私德方面之無瑕疵爲佐證的，就是當在那些年頭裏皇帝曾令人暗自偵察湯若望道德方面的行動，這些人們無論白晝黑夜，任何一個時間裏，都可以隨意到湯若望底館舍中來。如果湯若望果然有甚麼不名譽的行動時，那當然瞞不過皇帝底暗探。這樣，皇帝對於瑪法底貞潔操守纔得完全證明。自是之後，他方肯只滿腔誠敬向湯若望仰視，彷彿是他的師，他的父一般。皇帝所下的許多詔諭中都很驚奇地稱讚湯若望底貞修與純潔。而湯若望向青年幼主特別之所責難的，就是他道德方面的過失。這種責難是皇帝高傲的雄心之所絕對要反抗的。但是他却因湯若望是一個真正有道德的人物，所以便不能不毫無反抗地接受了。設使湯若望僅僅只有一點惟一的錯處爲皇帝所知，那皇帝對於他的責難便要有一個答覆等候着他，而湯若望也要永不敢再向皇帝動這一點了。

第十二章 關於欽天監監正職務的爭議與關於曆書問題之聚訟

與湯若望爲他名譽的鬥爭同時並駕齊驅的，是他爲曆書和爲他欽天監監正之位置的鬥爭。在這裏應行予以嚴重審查，俾可斷定是否迷信不妥，而與教規相反的問題，悉屬根本重要的原則性質的問題。湯若望用盡了一切心力慎重，希冀將所爭論問題之性質徹底弄明白，而建立自己之立點。這一場爭論在當時，即其他修會之傳教士亦皆參加，而各表示了他們的態度與主張。由此可知關於這個問題當時事態之重大，與教會各方面對此事之熱烈了。而到了現在，我們在這場爭論上可斷言的，是當時各位教士爲使這個問題得以徹底明瞭，確係俱會處之以極端慎重嚴重與精深透徹的態度。現在的人們如果一經見到當時各教士們爲解決這個問題所費的那種大力，和他們所搜集以作參考的一切神學方面之著作之繁夥，便真要不得不深致其驚歎佩服了。

關於這爭論問題的重要論文與信件當時都是寄往羅馬耶穌會總會會長處的。人們向歐洲寄

這些信件論文大半皆係採取經過馬尼拉 (Manila) 與美洲底當時最穩妥的航線，或交付傳教會代表衛匡國和作探險旅行的蘇納與吳爾鐸 (Dorville) 親身携帶赴歐，以期萬無一失。這些信件論文直至今日幾仍全部俱存。如果人們要將這全部存留的手稿墨跡印刷成書冊時，那勢必充卷盈帙蔚為大部巨著了（一）。

欽天監與曆書

曆書事件中所爭論的，究為何種事項呢？這所爭論，並非湯若望是否可以修習數理天算科學，是否可以將科學研究之結果呈報中國朝廷與官廳，並是否可以向中國人授以科學課程等問題。這原為教會之所許可，因為在此等事項上，人們之所希圖的，俱係純潔良善，絕非迷信的目的的原由。即就教會之本身說，此項工作亦係必要之舉，因為教會中每年皆須制定教會年曆的原因，其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傳教會可以藉此鞏固其在中國之地位。因為人們在北京需要歐洲天算家，人們為此特畀與傳教會以自由傳教之權，並處處與以國家之保護，這是我們由以往中國政府對待

傳教會之許多前例中可以顯明看出的。此亦爲湯若望之主要對頭安文思之所承認，而無所反對。一六六〇年五月十八日他曾向耶穌會總會長寫信說：「除天主一位大福佑庇護者之外，傳教會之得以在中國立足，惟一所依恃的，是數學」(二)。其他的科學自然亦爲中國方面之所珍視，但却未有一門能及天算。因此羅瑪耶穌會總管理處很早即已注意派遣教理天算學之代表學者赴中國北京作傳教士。像這樣被派遣到中國來的人物，即龐迪我 (de Paroisse)，和熊三拔 (de Ursin)，其後則爲鄧玉函 (Terrenz)，羅雅谷 (Rho)，及湯若望等數位傳教士。而中國傳教會方面各上司亦時以派遣精通數學之傳教士赴中國向羅瑪進言。

不過中國政府之所注意的，並不在純粹科學方面。他們的目的只在曆法底改良，而曆法改良底必要，是出於國家政治和尤其宗教方面的理由。人們非常重視，而非要有一份毫無舛錯的曆書不可的原因，是因爲全國官吏人民底生活，便可藉此得以循舊日千百年以來所經驗了出來的老規例，按部就班地進行，而更尤其重要的理由，則爲可以藉此使人類底行動與天道，與大自然底律則相吻合，這按照中國朝野底觀念，是與國家與人民底福利安寧有至大關係的(三)。

假使當日湯若望在北京僅止於以私人學者底資格，切實代表歐洲之科學，向他人貢獻他的學識，以及造就門徒，那便不會有人覺有甚不合的了。在這樣不受官方任何職責義務的情形之下，湯若望和他的前人一般，一直到一六四四年作了科學的研究。

然而，他一經中國朝廷和他的傳教會上司之所要求和幾乎是被逼迫，而不得不背反着自己的心願，出來接受欽天監監正之位置之後，登時便有嚴重的疑慮繼之而起了。第一，因他爲耶穌會會士，立有不接受會外職位榮銜之誓願。不過此層尚非不可解除之困難。其最不利於他之點，則在他一經充當監正，則監中一切事務，以及曆書之內容，悉爲人們之所視爲應歸他負責的了。

既這樣，那麼欽天監之任務與曆書之內容究竟如何呢？這是我們首所當知的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要向他們的爭論施以評議時，湯若望和他的友黨與敵黨關於這一點的報告，就大體上說，都還能一致，而不矛盾，所以這便可給我們作這個問題的一個好解答了。

「欽天監」(四)隸屬於禮部，直接歸其管轄。監中分設四科(Ko, scholae)，每科之下又劈分爲若干組別。

四科中最重要者爲曆科 (Li-ko, Calenfarri schola, 原名時憲科) 其職權爲掌管天算天象與編定曆書之事務。這一科之下所劈分之組別有三。第一組專從科學方面司理天空之現象，例如日月之升降，日入獸帶 (Tierkreis) 之各宮，日蝕與月蝕以及其他此類現象。第二組與第三組之所管理者，則係爲祭祀與其他行動確定吉凶時日，不過第二組之工作多偏於普通方面，而第三組之工作，則偏重細目詳列人物與行動之名色。此項天文之知識與吉凶時日之標示俱皆收入每年所制定之曆書中。在明朝每年由政府所頒發之曆書竟有五種不同之名目。五種中有三種經湯若望強行壓制了下去，因其悉爲無價值，不堪當之事物之所充斥之故，這樣所餘賸的，就僅只有兩種曆書了 (五)。

兩種曆書中，一爲「行星曆」 (Planetenkalendar)，係專供朝廷與首都各部院衙署之用者，其中所報告者，爲七行星之運行，及其彼此之位置與其對恆星空之相距相離，而是項情形之在全年各日期中之差度若何，均經詳細記載於曆書之中；不過所謂七行星者，除水星，火星，金星，木星，與土星之外，當時亦是將日與月算在其中的。這一種曆書之制定，是不能從教會方面加以非難的，因

爲這種曆書中所包括記載的，僅是科學觀察之結果。可是安文思竟至宣稱這種科學觀測，如果係以中國政府名義而作的，便爲教會之所不能容許，因爲這樣的觀測是要償還一種教會之所不能容許的目的，就是中國人敬天的目的（六）；但是持這一種峻嚴的見解的，除他一人之外，似是並無第二人的。

兩種曆中之第二種卽「民曆」(Volkskalender, Min-li)這便是當時教士間聚訟點之所在了，民曆因封面係黃色，所以亦名「黃曆」。其實卽這一種民曆內容上之主要成分，也並無甚可非難之處。因爲這裏面之所記載的，爲晝夜之長短，太陽出落之遲早，其在各各地之差度，每月僅約五六次之記載，太陽入獸帶各宮之時刻，月輪之盈虛，每月之大小建，一年三百六十日中之各日份，及其在六十甲子與二十八宿中所佔之位置等等情形。況且其間各推算方法又悉係依照歐洲法則，更且一遇到這些地方，以於其傍邊一律填註明白係「依新法」(Nach der neuen Regel)字樣，所以這便無從指爲迷信，而可加以非議的了（七）。

可是除這些主要成分之外，民曆中是含有一大批稀奇古怪的附屬成分的。據湯若望底對頭

們之所指摘的言詞，這曆書之第二頁上已經列有二十位年中每日值日之「吉神與凶煞」，兼且各繪有其形相。這宗吉凶「神煞」亦會分記於各月份之中。曆書的末端又列舉有住於室內與人四肢內之此項神怪（Geister）十位。

其次就是在每日之下皆記有作此事與彼事「宜」（passend）與「忌」（nicht passend）之二種迷信字樣。我們在這裏可以根據汪儒望（Valat）之報告，對於於此二種字樣下所開列之各種行動列舉一目錄於下，以資佐證：掃除舍宇，安設床鋪，穿井，破牆，修理爐竈，裁衣，絡絲，立磨，立券，娶嫁，訂婚姻，納采，入學，納畜，修治河道，安葬，緝捕盜賊，鋪店工廠開市開張，豎柱上椽，出行，剃頭，會親友，祭祀（八）。此種記錄連續出現，直至曆書終結為止，且大半每遇同名稱之日期，亦必獲得同一之註語。

曆書之尾，簽有監正之姓名，監正姓名之下更開列監中各位共同工作者之姓名以及曆書中其各人所工作之部分（九）。

至曆書之製造與散佈之情形如何，我們現在可以再作一簡略之報告。欽天監之製造曆書，係

於先一年製造次年者，其首先之工作，卽至遲到陰曆先一年二月一日須將上述二種曆以墨筆各繕出四份，分呈皇上，內閣、禮部，與本監監正。俟上級大員批准後，監正便簽名於各繕本曆書之上。這種種手續一經完成，便開始印刷工作。印刷歷時二月，卽到陰曆四月間，卽可成功，而便可將此正式曆書之零散印本發往各省區作爲樣本，由各省區照式自行複印，然後方能散賣到各省民間。爲證明曆書係自欽天監之所頒發者，監中另備有特殊之印章，以資印蓋。此種蓋印之工作，皆係承皇帝諭旨與禮部部令經特爲此項工作所任命之下級官吏之所辦理。但全年之中，此印皆歸監中之二位練習生之所保管（一〇）。每年陰曆十月一日在大殿之中，以欽天監監正爲主席，舉行頒發次年之二種曆書；朝中百官臣工俱皆跪地接受。此外各官員尙可獲得民曆贈本若干冊。據安文思之言詞，湯若望可得這宗贈本六百冊，這六百冊民曆是他或轉贈各位傳教士或向民間售賣的（一一）。根據這宗民曆，教會纔制定教曆。

每年各省省城所見之日月蝕情形如何，欽天監至遲須于六個月之前一一推出，並須將各推算分別發往各省（一二）。

關於欽天監之第一科我們暫且僅作如是之報告。至第二科（原名天文科）並不分組別，工作爲觀察與解釋天空，大氣，與地面上所發生之一切非常自然現象，譬如彗星流星之出現，日輪中斑點之發生，日輪與月輪四週起暈圈，以及風雲雷雨，地動等等大變故。這一科中一經發現此種現象，立即首先呈報監正。如監正認爲這宗變故重要，與國家大事與前途均有所關，那麼這一科底職員即須根據中國自古以來所傳留的關於大自然現象的解釋予以記錄。然後監正在這宗現象底解釋之下簽名，並蓋私人印章，這樣這一科底職員纔向朝中呈遞他們的觀察與見解。安文思在攻擊湯若望的筆戰中曾報告數件這樣的解釋，譬如空中突起暴風，則視爲蠻夷侵入中國邊疆之兆。一種時間長的地動，則解釋爲藩臣叛異，或婦女將要當國之兆（一三）。湯若望曾經皇帝特別准許，遇到此項變故，可以自己的見解上奏。他曾多次利用這宗機會向朝廷警告勢將降臨的國家危機大難，譬如一六四九年八月底對於蒙古之叛變，他便于事前借天象預向朝中作警告（一四）。至於說他作這宗事情，是完全出於爲國爲民與爲宗教的好心腸，這是我們在本書稍後自會明瞭的。

監中第三科（原名漏刻科）下設二組，專管堪輿占卜之事項。這一科爲皇室之陵寢以及國家之大建築相度地勢，選擇適當地點，更確定東西南北之方向，決斷「白虎」與眠伏地下之「青龍」之形勢，此外卽爲建築與爲安葬選定開工開始之吉利時日時刻。這掌管占卜風水的一科從工作方面說，係獨立性質，不歸監正管轄，凡有前來諮詢問卜者，都是經這一科直接與之交涉，監正並不過問。在人所共知的一個時機裏，就是當在挪移首都位置的計劃發生時，湯若望會促使這一科向朝廷上封事，奏明他們的意見。他們的意見以爲舊都底位置非常優勝，而常時人們所設計的新都城底位置，則因水脈與龍紋俱皆惡劣，必將不利於朝廷，故仍以保守舊都城爲宜，不可多事更改。這一本奏疏上湯若望又很小心地添加一段評語，以爲新都城照形式與價值方面說，是遠不敵舊都城的（一五）。湯若望這個舉動是收了效果的，他爲全國轉移了一場害事。

第四科則爲回回曆科，這是湯若望特別恩惠與慈悲，而容留他們在欽天監的。湯若望准許他們豫推日月之蝕，以及作觀察天空之工作，並且可以向朝廷呈遞他們的報告，不過他們這報告仍是由監正之所轉呈的。

爭論之問題與爭論之文件

由上文所敘述欽天監之職務與曆書之內容觀之，其中確有不少情形，令人乍一見到，實不能不起重大疑慮的。而湯若望顯然是直接或間接應爲這一切可疑慮之點的負責人，只除地理風水一獨立科向朝中所上之見解書之外。

當他經過長久拒絕，因受重大外迫而不得不背反着自己，一心一意從事宗教神事工作之志願，接受欽天監監正之位置時，他必不能不瞭然他這一舉從教會方面之可容許與諒解。其實他也是真正明白了這一點的。他的見解，他後來在對他的攻擊開始時，俱已詳細陳述。即在傳教會副省區長傅汎濟當時亦深覺，湯若望可以勿須躊躇，良心不安，而徑行接受這個職位。

很奇怪的一個特徵，便爲當時幾乎並無一人會表示了欽天監監正之職位因曆書內容與監正之責任從教會方面說是不能容許的見解的。可是湯若望於就職視事之始，即自行作有一篇傳佈全國的宣言，敘明他僅只從事於曆書之科學部分，而於吉凶時日之確定工作，並不過問（一六）。

這個舉動是他和其他的教士們俱已覺得爲避免提倡迷信的嫌疑，所表示的足數了程度了。

照所敘述的這情形看，湯若望這方面的舉動是否合與不合，尙屬顯然，易於決斷。而其難於決斷之點，則在修會之誓約方面。這是當在這個問題發生時的那頭數年裏會很費過教士們底腦力苦思的。因爲凡屬入修會舉行宣誓的教士們俱皆根據所謂「小誓約」(Kleine Gelübde)中的一種宣有遵守在未經本會上司予以明確許可之前不向會外謀求主教位置或其他品位，或接受任何一種其他敘任之會規的誓約(一七)。而這一種誓約底解釋，在以前的人們則皆視爲僅限於教會內帶有裁奪之權的職責與品位說的。但根據一六三二年教皇渥爾邦第八(Urban VIII.)之解釋，則此誓約尤其亦係指教會外帶有裁奪權力之世俗職責與品位而言(一八)。那麼這在中國欽天監就是這一宗情形了麼？監正對於他的屬員是有予取予奪的權力的麼？一部分教士們對於這個問題加以是認，一部分加以否認，因爲他們認爲這一種裁奪之權是只歸直轄該監之禮部之所據有的。湯若望和其他代表這第二種見解的教士們，爲使人們易爲明瞭欽天監監正位置之情形起見，都拿歐洲單科大學數學系主任或歐洲綜合大學校長之位置，與之作比較(一九)。

如果遇有因遵守這一種誓約，反而與教會能生出重大不利，或甚至危及傳教會之存在時，他們亦主張應行解除這一種誓約底拘束力。可是特特向羅瑪請求這一種誓約解除之許可，在當時因事機之急迫是不可能的。這一種亦經傳教會長傅汎濟之所代表的意見，當時覺得貫徹。這樣人們方得成功，以克服湯若望開始時之拒絕。於是湯若望便接受了這個職務，三年之久，教會方面並無反對之言詞發生。

教會方面第二個出來對此表示疑慮，而疑慮大半全在曆書之內容與欽天監正其他方面之各任務的，則為艾儒略神甫 (P. Julius Aleni)。他的一封表示這種疑慮，而更出之以代表其他教士與教徒以及友人底名義的信件，于一六四八年之初達到常時正住在山西蒲州的傅汎濟之手(二〇)。這一封信到現在已經無存，不能搜尋得出了。不過其所列疑慮之要點，在湯若望之答辯中俱會將其原文錄出，我們仍可藉以得知其大略。湯若望這答辯係向各教士之間所散佈的一種傳單(爭論文件第一號)。連傅汎濟為給湯若望辯護起見，亦會寫有一張傳單，寄給教會視察員與傳教會中各教士的(文件第二號)(二一)。

關於艾儒略之疑慮以及湯若望與傅汎濟之答辯，我們在這裏皆暫置不提。因為攻擊方面與辯護方面所提出之思想與理由，從大致上看，皆與我們在本書稍後還要詳細敘述的情形並沒有甚麼不同的。這一場風波經過這第一次的答辯之後，本來可以平息，如果這時沒有那一位姓名叫做安文思的傳教人物出現時。他很義憤地引爲自己的責任，對於湯若望以一位剷除齧賊，剷除僞善者，以及正風正俗與真正信仰之維護者登場。

在這一個人物底影響之下，傳教士傅汎濟，他是于一六四九年四月二日到了北京的，竟改變了他的主見，而將他第一次所寫，與湯若望有利的見解書撤回。一大批傳教士——姓名被列舉者爲利類思、金彌格、龍華民、李方西、方德望、郭納爵，——俱皆陷入安文思這位活動而靈敏的傳教士底魔力圈中。這位傳教士於一六四九年八月五日完成了一篇很長的，用拉丁文寫的反對曆書與欽天監監正的大文章，這篇文章連帶九月六日的一篇附文，共包括三十八張字跡密集的對摺紙頁，而藉當時所盛行的經院學派（*Scholastisch*）的方法搜集一切凡屬能想得，而可建立反對立場的理由，悉行分章分段地開列於其中（文件第四號）。在這篇文章底第一章中，文章的作者

發揮了關於迷信問題的根本原則，並且把教會法律上的規定抬了出來做爭論之根據。在第二章中，這是全部文章中的主腦篇了，他嘗試着由欽天監之種種職務與曆書之內容中，證明教會不能容許教士担任欽天監正之職與製定曆書工作之理由。其次在第三章中，又特另列出湯若望因何不得不退職的理由十條。最後在第四章中，安文思駁拒一位為湯若望辯護者底言詞，不過這位辯護者底姓名，却未經他揭露於文章之中（三二）。

這樣安文思便開始了關於曆書之爭論。在這場爭論上，他所懷的附帶目的，是要排擠湯若望離開北京，因為他覺得湯若望是歸罪於他，使他和利類思不能在北京獲得完全行動自由的人物。一六四九年九月十三日他們把要求湯若望退職的正式通知書送達湯若望。這篇通知書是傳教士安文思親手所書寫，而經傅汎濟以傳教會會長之資格，于填註日期之外，更追加附語一小段，以簽姓名於其下的（文件第六號。）在這篇通知書底引言部分中聲稱，十位耶穌會士，其中亦有新任命傳教會副省區長陽瑪諾之姓名，曾在多次之會議中，函件中，與覺書中，表示了他們反對教士充當欽天監正之職的意見。開列於其中的十條反對理由，仍是安文思在他那一篇很長

的覺書中所列舉的那十條，不過形式略有變動不同而已；十條之理由如下：

一、欽天監監正之職與基督教之信仰不能相合，因為曆書與向皇帝所上之呈報，含有許多迷信與占卜之言詞。二、湯若望因充當監正之職，言行多與新舊約，並與教祖（Kirchenvater）之學說相背反。三、因此湯若望就很有被彈劾於教會裁判（Inquisition）之危險。四、如果湯若望不將欽天監監正之職辭退，則教會必將向他加以破門之處置。五、耶穌會之誓約禁止接受會外任何總裁總理之職。六、欽天監之管理，為引起他人厭惡之資。七、湯若望掌管此職易涉重大之生命危險，因為他的呈報一有不實，便要犯國家斬頭之罪。八、湯若望因充當官吏便極易犯教會法律上所說之「故障之罪名」（Irregularität，譯者按：所謂故障，即因意外事故發生種種障礙，致使一位司鐸不得受晉級祝聖之典禮，或不得行使職權之謂），因為他既為朝廷官吏，對於失職不忠之官吏便不能不許發；一經許發，便能為判處一個人死刑的共同負責者，這樣便與教會慈悲宗旨相違反，因而便可為傳教士之故障了。九、他因為這個職務竟能使耶

耶穌會荷荷昇與教會所禁止的星相占卜的迷信以順利的嫌疑。十、總上九條理由觀之，湯若望之担任欽天監監正之職，是與他所入的耶穌會底好聲名有防礙的。

到現在，我們已經不能把通知書中所說的十位同意向湯若望作這一種嚴重的退職要求的耶穌會會士底姓名，確定出來了。至於說這通知書是否於事前呈各位列名者親自閱覽，這是很有可疑的，各位共同簽名者是否確切贊承全部通知書底內容，亦依然很有可疑的。譬如在傳教會副省區長陽瑪諾，我們就知道，他在這一年年期底終結之前，對於湯若望還有很順利的言詞的。繼於這一封通知書之後，還有許多其他的攻訐文件迅速地發表了出來。除此之外，讀者由上文的敘述中總還記得，同時湯若望底性格品行俱都受到激烈攻擊。甚至在菲律賓羣島上，人們亦是不令湯若望得到安寧的。因為那裏那位多明我會士維多理奧·利奇 (Vittorio Ricci) 也還向羅瑪信仰宣傳部 (Propaganda) 寄有一篇很長的發訐文件的（文件第十九號）。

然而為湯若望和為他的曆書方面的辯護，這時已經開始了。湯若望自己自然是尤其努力排

除這一切的非難指責。在一六四九年十一月四日致傳教會各評議員的一封信裏，他對關於他的曆書與其他四項事件之攻擊，作了他的抗辯（文件第七號）。在嗣後全部爭論文件向羅瑪寄呈後，他就又寫了他的一六五二年三月七日的那一篇巨大辯駁書（*Apologia*）（文件第二十一號）。湯若望在這一篇大辯駁書之後，還繼續着寫了些較短的，專呈耶穌會總會長的駁辯著作，並且還給居住在菲律賓羣島之傳教士可林（*P. Colin*）寫了一篇報告的信件，傳教士可林是給湯若望向羅瑪傳遞信件的一個人（文件第二十二號，第二十四號，第二十五號）。

一開始就站在湯若望方面的是傳教會副省區之評議員賈宜睦（*Gravina*），潘國光（*Branetti*）和穆尼各（*Shogulecki*）三人。他們三人共同向傳教會副省區長上覺書一封，為被大家所攻擊的湯若望辯護（文件第八號）。尤其是深為一般人士之所敬重的傳教士潘國光特別為他的老友湯若望仗義執言，他經現在已被勸說了過來的傳教會副省區長陽瑪諾之德意，特向羅瑪耶穌會總會長加拉法（*Caraffa*）與皮考老米尼（*Piccolomini*）以及葡籍協理寫有書信多封，並詳細覺書一封，特為湯若望辯護（文件第十號，第十二號，第十三號，第二十三號）。經過

開始時的一番懷疑之後，傳教會派赴歐洲之代表衛匡國，反而亦竟與這三人結合，而做起爲湯若望辯護的工作來了（文件第十五號，第十六號，第二十七號），他以傳教會代表之資格赴羅馬，除其他教務之外，亦是要在羅馬辦理曆書的事件的，他於一六五一年沈沈重重默載了一大批文件，登程赴羅馬。他到達羅馬之後，立即呈交書面解釋，其後即在口頭方面，亦是在同樣的，於湯若望有利益的意義之下，進行他的使命的。

我們應視爲正式彈劾文件的，是安文思所寫的那一篇大文章，和十位耶穌會會士所寫的那一篇宣言。但對於他們這彈劾方面，我們應視爲正式抗辯文件的，是湯若望所寫的那一篇辯駁書（Apologie）。此外還有其他的抗辯文件，尤其是雷國光所寫的那些，有時亦被引用。

安文思和十位耶穌會會士在他們那彈劾文件中所列舉的十項條款，應行檢查其是否有證明的力量。最主要的就是第一條，在這上頭最關緊要的問題，就是曆書與欽天監，向皇帝所上的職務上的呈報，是否含有迷信的與占卜的言詞，並且是否監正把一切的文件都蓋以自己的印章？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他就應當辭退他的職務，而人們亦無須其他的證據了。然而如果第一個證據

底力量不能支持時，那麼其他的條款自然也要喪失了牠們的證明力量的，只除去第五條中所說的接受監正之職，是與修會底宣誓相觸犯的一條或許不能失効，此外或許第七、第八條，亦是應當除外的，如果人們是真正覺得，湯若望管領欽天監職務，果冒有重大的生命危險，和容易犯教會法律上所說的那故障的罪名時。這樣其餘一切理由，都要喪失了牠們的價值了。因為聖經與各位教祖，僅只是不容許人們犯由天上星宿中預言將來之事體之禁條；只是這一點纔是教會裁判範圍內的問題，而能招致破門的處置，並且纔是為衆人之所厭惡，而使耶穌會到了惡劣聲望的地步的。再者在這論證上，人們之所注重的，僅只是實際上的事實，而不是聖經上與各位教祖以及教會法律中所運用的那些名詞的。譬如說，「占星學」(Astronomie) 一名詞，並不僅限於教會所禁止的天空星象之解釋，而天文學 (Astronomie) 與數學 (Mathematik) 二名詞之用項，亦並不限於嚴重的科學範圍的，若不然，羅馬法 (das römische Recht) 底條文中，決不會將「數學家」(Mathematiker) 與「魔術師」(Zauberer) 相提並論，而一律繩之以懲罰(二三)。這一種的慎重是湯若望底對頭們所不會時時注意的。他們在他們的文件中，往往運用些舊有的名詞，而這些名

詞在他們所採取的那些原書上，竟是另有一種意義的。

抗辯

在抗辯方面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應當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於主要問題，就是欽天監是否爲一所占下的機關，曆書與向皇帝所上職務上的呈報，是否含有迷信事件，監正是否爲一切事務俱皆負責？湯若望和他的一黨子朋友們，爲辯護這個問題，採用了一種雙重的證列，第一列證論，就是：迷信與占卜二者是在欽天監與曆書中決提不到話下的；第二列證論，就是：如果能證明欽天監與曆書中，是有這樣的迷信與占卜的事項，那湯若望亦並非此項事件之負責者，而無須因此辭置他的職務。

如果我們要向湯若望首先所舉示的那一個論證，這論證是湯若望在他的駁辯書中的主要着目點，加以公平之評判時，那我們非先明白了當時物理天算與宗教科學之立場不可。

今日之科學，還只顧及日月與空氣中的種種威力，對於無生機的自然界，對於植物與動物界，

以及對於人類，尤其是對於天性靈敏易於感受，或病態不健全的人們所發生的影響。這種種的影響，船舟之航行，農業，醫術，和日常生活中之人類，都是要注意的。至於說其他星宿之影響，因大自然全部連屬的關係，確係亦能發生的，但是這影響底力量竟這樣輕微，簡直使其在實際上幾乎令人莫可得而計算了。這一種知識是近數百年以來，科學昌明，纔得以漸次達到的。

這是我們現在時代的情形了。在從前，即在嚴重的科學與教會中的神學，亦皆係一律視天空之一切星宿，尤其是行星，各按照牠們在恆星空所佔的位置，與彼此對立的情形，既對於全部自然界，而亦對於人類之性格與命運，為有極深廣影響的事物。因此根據在社會上佔有優勢之一種見解，則謂人們根據一個人誕生時天空星宿之形勢，就是根據八字中之排列與推算，便可以將這一個新出生的人將來的天性與命運，十有八九地預先斷定了出來。

教會中所視為聖人的聖·多瑪斯 (St. Thomas)，他是當在湯若望的時代，即在耶穌會所立的神科學院中，亦是被人備極崇拜，視為他們的指揮大師的，很清晰地代表了這一種觀念。可是他在占星學上分別真假二派。他以為天主是借天空列星列宿底力量，這列星列宿是經天使之所

駕御的，間接發出一切地球上所需要的。這樣天空底星宿對於人類底肉體，因而亦是對於人類底性格，便要發生生剋的力量了，因為人類底性格是以肉體底情形為基礎的。在行動上尋常一個人多半順從他的性格資稟。照這樣說，人類底行動亦是間接要受到天空星宿底影響，而轉移的。星宿對於人類的這一種影響，在一個人誕生的時刻裏，尤其特別重大。因此一個人底生辰八字表，從大致上說，便可以預斷一個人在他一生裏將來所要走的道路。譬如一個在火星(Mars)當權的時刻裏誕生的人，可以預斷他將來必是一個戰士，或一位強霸的人物。一個人因膽汁黑（Bilium salis），而所發生的憂鬱氣質，便是自土星（Saturn）來的，因為人類底脾臟是屬土星克制的。然而一個人生命上的趨向，由生辰八字中之所識出的，亦不過僅是一種約略的估計，而並不是百無一失，鐵板不移的；這一種情形出於兩種理由。第一種理由，是星宿對於人類所發出的力量底影響，亦是與個人感受性底強弱有關的。這一種情形便為同時坐胎，而有時竟能男女性別不同的雙生子，和為在同一時間所產生的兒童們，往往能有不同的性格的事例的理由。第二種理由，是說生辰八字底預言僅是一種大概的，不是鐵板的預言底原因，是因為人類尤其是有自由意志的，因為人

類底意志自由，所以人類便能克服星宿底影響，不受氣化底範籠。古人底一句話：哲人主宰天上的星宿 (*Sapiens dominatur astris*)，便是這個理由底意思了 (二四)。

這種觀念在湯若望的時代，在歐洲學者與受教育者之間，仍尚盛行，並且傳佈得很寬廣的。譬如哥白尼 (*Copernicus*)，嘉利賈 (*Galilei*)，克普來 (*Kepler*)，譚考·布拉艾 (*Tycho-Brane*)，加得隆 (*Calderon*)，麥郎希塘 (*Melanchthon*) 等著名學者，俱都崇尚這一種見解。連萊勃尼茲 (*Leibniz*) 還會容忍人們借他的天文台，為各王公高貴人物們做生辰八字的推算 (二五)。如果他們如同聖·多瑪斯一般，僅只是做物理方面影響之觀測，並且仍堅持意志自由之說時，那人們便不能把神學方面所說的迷信字樣，拿來責難他們了。因為他們是把占星學當做一種科學來研究的，因此人們僅只能責難他們，以為他們物理天算的知識錯誤，而不能說他們是迷信的 (二六)。

在教會中之神學方面，自中古時代這一種見解到近代見解之轉變，似乎是在十七世紀之初葉，已經漸次開始了的。這時教會方面之神學，並不像從前那麼嚴重地研究天上星宿對於人類之命運與性格之影響了。連湯苦望也是緘口不提這一層的。所以從這一點說，湯若望底見解竟是超

越他的時代底偉大天學家了。可是在其他方面，人們還覺得天上的星宿對於紅塵上的事故與人類底肉體，有過於強大的影響的，因此照舊把占星學在這種意義之下做成一種嚴重的知識部門，而從事研究。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舉示一實例於下：

銀歌兒 (Ingolstadt) 城內爲人所重視的神學家兼耶穌會會士亞當·達乃爾 (Adam Fanner) 於一六一五年曾發表一篇論文，題名占星神學 (Astrologia sacra)，所謂占星神學底意思，就是要把占星學做爲神學中的一部門的。這篇論文中之所敘述的，是一六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在達乃爾底主試之下，兩位考試神學博士的學員底論題。兩位學員中的第一位名亨利·拔哈邁葉 (Heinrich Bachmaier)，所獲得的試題爲：「在那一種範圍內我們可以受納占星家之預言？」這位學員對於這個問題的答復，是把根據天空星宿之觀測而做的預言預測，分別爲四類的：第一類爲關於純以人類自由意志爲轉移之事故與行動的預言預測，關於這一點，這位考博士的學員所下的判斷爲：這一類預言預測應絕對鄙棄 (genus est execrabile)。第二類爲關於不以人類之自由意志爲轉移的事態變故的預言預測，譬如氣候之陰晴，田禾之豐收與否等類事故，在

這裏這位學員底判斷爲：此類預言預測就其本體上說，不能斷爲不合或迷信，不過這種預言預測底效力却不準確，這是在那些曆書上所作的這種預言預測之不準確可爲證明的，甚至我們簡直可以說，這一種預言預測是愚妄的與欺騙不實的，因爲我們對於這種事態底複雜原因的知識，過於不完備，並且多半僅只是由已往的經驗中，以推測的原因。第三類爲關於人類可以直接受天上星宿影響的行動上的時間與其他狀態之預言預測，譬如爲醫學上放血（*Aderlass*）與農事上播種等類事體所預定的最好的時間的情形；對於這一點，這位學員底答復爲：像這種預言預測是可以許可的，如果這一類預言預測並未過分，並且如果他們是根據可靠的舊日的經驗而做了的。第四類爲關於天算之過程根據其天然之原因，如日食與月食，列星列宿與諸行星之軌道而做的預言預測；這當然是爲教會之所允許，而絕對不能視爲迷信的了。

這一類的分法爲湯若望在他的抗辯論文中，所盡量引用了，雖然他引用時與原來的前後次序不同，可是，有些地方竟仍是原來的字句，並未加以變動的（二七）。照這樣看起來，達乃爾底論文，決定是他會置之於眼目之下，而獲得閱讀的了。在達乃爾底論文中所代表的原則，登時就被湯若

望運用爲中國曆書中吉凶時日之選擇之辯護了。可是在中國底曆書中僅只是關於第二類與第三類事項的預言的問題，就是關於天氣陰晴一類的天然現象，或關於農民、船夫、醫士等類人物底工作上的順利時刻與狀況。但是那一種天然的現象和這一種順利的時刻，都是與天上的星宿有關係的。不過我們却不可過於相信這一種預言預測，因爲牠們能否應驗，都是未必一定的。至於說由星宿底現象中，做關於人類將來的自由行動的預言預測（*Astronomia divinatoria und indi-caria*），這是在中國底曆書中絕對無有，而提不到話下的（二八）。

這是湯若望一篇抗辯文章中的基礎思想。如果湯若望底言詞能真正對了，那麼人們所控告他在曆書中容忍迷信事項的罪名，便不能成立了。那麼這果然就是真正的對了麼？

在曆書上爲人類許多的行動所規定的吉利時日，顯然是與天上的星宿有關的，這用我們歐洲底名詞來說，就是與「大宇宙底影響」有關的了。譬如一個人要在放假的日期做一次旅行，那麼他當然可預先查看查看陰晴表怎樣的。農夫每日到田野上耕種時，一出門自然要抬頭觀望一下天空的風雲情形，並且人們的朋友，是人們最愛在晴麗的日期中去拜訪的。就是在殯葬的事體

上，這種情形亦然如是。因為一切的中國人們都希望使死者屍體能得盡量長久地保存。因此在殯葬的事體上，便不能不注意到殯葬地點之性質與風水地脈之情形。可是這兩種情形都以空氣底影響為轉移，照舊日的字樣說，便是與天上的星宿有關了。

但是既這樣，那人們在一年以前怎能確定次年全年之吉利時日呢？再者，在曆書上所開列之許多行動，顯然不能說是與天上星宿有關；譬如剃頭理髮，無論在那一天都不見得有什麼關係的。關於這一點問難的答復就是：由數百年積累下來之經驗中，人們差不多可以知道，那些日期是應當做那些事體的正確日期；況且為理髮剃頭與類似的事體，確係有些日期較比其他的日期順利。在這上頭無論如何也用不上迷信的字樣，人們至多可以說，這是錯誤的觀察。湯若望在這裏還引用當時歐洲曆書所用之類似預言預測，以為他曆書底辯護，因為這種預言預測並未受到當時宗教裁判方面之干涉的（二九）。

這是人們對於湯若望的一種駁難，其他一種駁難就是：時日之吉凶與否，並不是與天上星宿底影響有關的，乃是與每日值日之神祇有關的。關於這一個難題，湯若望底答復則為：吉神與凶神，

應當理解爲星宿底力量，或人類肉體的根本原質之力量。這種力量是經中國的人們，很早的就造成了這兩種吉凶的象徵的。後來的時代與尋常的百姓們，都把爲這象徵的基礎的實情忘却，而竟將這人身所取的象徵認爲實有實在了。即人們所說，居住於人類四肢內之神怪（Genie），亦係指人身內所具有之自然能力而言。湯若望在這一點上，曾指出一部保存於欽天監中之手鈔著作爲據，這部書分爲五卷，著作之時間係元朝之初葉（三〇）。在這部書中，曾確切指明各種象徵之真義。這部書會謂，古人特爲大自然之能力，選用神秘之名稱，彷彿謎語一般，使人易於注意，以便引人入勝。在這裏湯若望更補充着指明，在歐洲的預言中，亦是拿神祇與女神維納斯（Venus）來代表天上星宿之威力的，並且在歐洲的地理圖上，製圖者往往畫上些稀奇古怪的人物，以象徵大自然之威力。

再就是中國曆書上所說的「祭祀」字樣，亦應做類似解釋，而理解爲象徵。其實上面所提及的那部書底著者，亦果然是這樣來解釋了祭祀二字的（三一）。這位著者以爲所謂「祭祀」即慎重敬畏與反省自審之謂。因爲敬神與反省，是人們尤其向祭祀者所特別要求的行動，所以這兩種

德行底崇尚，便以祭祀爲象徵，而在曆書中載有這樣多宜於祭祀的日期的原因，是因爲我們應當時常敬慎反省，以進修於道德之大成。這是曆書上祭祀二字底真意，而並不是叫人果然按照着曆書上那些日期去施行祭祀的，因爲實際上老百姓如果要施行祭祀時，那他們決不以曆書上之規定爲依據，乃是以其他的原因爲定奪的。

湯若望和他的朋友們還選擇了一種其他論列，以便使那些決不要明白中國曆書上吉凶時日之選擇係以宇宙威力之影響爲依據的人們得以安然放心對於他的主張加以首肯。因爲他預先臆得出來，他這對於「祭祀」一名詞之解釋，必將爲大多數之傳教士們之所不承認，所以他纔又特行列舉了這其他的一個理由。況且從老百姓一方面說，他們實在是把時日底吉凶歸之於「神怪」的，無論知識者方面對於「神怪」怎樣解釋。

湯若望這個論證的大意，可以歸攝於下列的言詞中。他的意思，以爲反對他的人們之所列舉的事實，也不過一種對於曆書上自原始時代以來，卽行所開各項條目的奴隸式忠實重述而已。這是任何一個人都知道的。湯若望還獲得成功，把曆書上許多過甚的言詞予以刪除。湯若望這一種

的刪除僅可到當時曆書的地步，如果要再向下刪除時，那因富有保守性之中國人民，將於以往時代與以往事物之崇敬，便決不可能了。此外人人都知道，天算上此項附帶工作與湯若望無干。這都是欽天監中屬官屬員之所添加上去的。在每本曆書中，科學部分之旁邊，皆註有「依新法」之字樣，這換句話來說，就是湯若望底工作了。由這一點人人都可以推斷，其餘的工作都不是他做的了。這他在他那一篇已經在前面提及的佈告全國的宣言中，已經向人民十分清楚地聲明了。如果還要再清晰地把科學的工作，自附帶的工作上區別開，或用一附註標明這附帶工作是欽天監屬官屬員底工作，那這便是非常不穩妥的了。因為這便要傷及中國人之尊榮自小心，而在各省複印時，結果人們必將一切之註語刪除的。湯若望之簽名於曆書，並非承認非科學部分之附帶工作之內容，乃係僅為證明舊日條目之印刷無誤。為此項工作內容之負責者，僅為簽名於其下之其他官吏。

曆書上所開列之祭祀行動，亦是有這同樣情形的。此外曆書並未向何一項人物做祭祀行動之要求，牠只不過為那願舉行祭祀者，特把自古以來所視為「宜」(passant)於祭祀的日期一

一標出而已。這並不是要說人們是贊承祭祀的行動的。盛行於羅馬而經本篤會士嘉布理艾爾·布策理尼 (Gabriel Buellini O.S.B.) 所製之曆書上，在湯若望時代也還記載有古代未奉教之羅馬人底祭祀日期，這宗情形與中國曆書底情形是一類的，可是在教會方面並無一人對之不滿，而生異議。況且奉天主教之國君王侯們，俱可爲猶太教與耶穌教規定他們舉行神事之地點與場所，而亦並非向他們表示承認他們的宗教。又譬如說，一座奉基督教城市之市政府，亦可按照地點與時間公然規定公娼制度，而這種制度從教會方面說，決定不能以爲然的，然而却不能不視之爲較輕的一種惡劣狀況，輒予以容忍了。

湯若望担任欽天監監正之職，原懷有極大之圖謀，就是他要藉這個職權，漸次把欽天監完全置入基督教教徒之手，而使中國之曆書化爲基督教之曆書。如果他定要將這個職權辭退，那慶皇帝對於北京有傳教士與否，就決不會再在意了。這樣，中國人舊日對於一切外來事物之厭惡仇視，就又要興盛了起來，而其結果必將大不利於傳教會。傳教會之將受壓迫，自是意中事了。

根據這種嚴重理由，湯若望經其他識見深遠的傳教士們之所贊助，仍堅持曆書，而不肯放

棄。若無這種種使他特別關心的理由，他決計早就把這一個職務放棄了，因為他本來的心願，只是在教會底神事方面的。

關於湯若望對於曆書問題爭論點的答辯，我們的敘述僅止於此。

湯若望在他所寫的答辯書中，也爲他對於大自然界之非常現象，譬如流星，風雨，地動，等等變故所做之解釋，加以辯護。在他這項辯護中，有時也有他的友朋們，爲他聲援執言。他的這項辯護的始末，我們可以約略述之於下。

欽天監中原設有一屬司，專司自古以來所流行的天文解釋之記載。湯若望以監正之資格署名於此項記載之下之責任，僅爲證明監中各該屬下之記載，爲與舊日之解釋吻合無誤。即在這一點上，中國古人底意思，亦係僅指自然界與物理界的影響而言的。這種種解釋俱係由經驗中之所推斷而得。

在湯若望的時代，人們在歐洲爲這些現象，亦做有類似之解釋。湯若望曾舉葡人阿維拉爾 (Avellan) 爲證，阿維拉爾所著而經宗教裁判所承認之著作內，竟含有性質不穩妥，較之中國欽天

盤之天文解釋，還要遠甚的種種解釋（三二）。

在這一項工作上，湯若望是奉有皇帝特別准許，對於大自然界變故之意義，予以自己見解的。他做這一類事情，目的只在藉以向皇帝諫正與警告，他確切相信，天主用非常現象，不僅只可以用視爲神奇的現象，乃亦是用其他的，正因其係非尋常所能得見，因而易使人注意的現象，在迫切的狀況裏，向人類宣告，向人類示警示戒，向人類預言偉大事體之將降臨。至於說，天主在這一種狀況之下，曾向人類做過宣示，這是聖經中許多事例可爲佐證的，譬如：聖經中所說的洪水，洪水後天空所現之彩虹，摩西（Moses）在埃及國所做之神奇事跡，伯利亨穆城（Bethlehem）天空之明星，耶穌臨死時之日食，等等現象，俱都是這一點的佐證。湯若望也在教會底歷史中，指出許多這樣的自然現象，這些現象普通都可解釋爲上帝之顯示，就是：耶路撒冷城（Jerusalem）破壞之前所發生之地動，與聖·克盧梭斯洵穆斯（St. Chrysostomus）被驅逐時所發生之地動，又譬如紀元後七二九年歐洲加里里地方（Gallien）天空兩顆彗星，預兆東方回教徒之將侵至等等情事（三三）。在上面所敘述的銀歌兒城達乃爾神甫，在他的審查學員的博士論文中建立了這一種信仰。

卽在今日，民間還可遇到與此類似的見解。人們都是以爲彗星之出現，預兆瘟疫流行或刀兵的凶事的。所以這便不會有人向湯若望見怪，因爲他和他那時代裏的最優秀人物一般，同心合力地堅持着這一種信仰。至於說，天主用這些現象，會向人類示兆，並且很可能地，還要向人類示兆，與將來仍要向人類示兆，這是任何一位好基督教徒決不可否認的，像湯若望一般，當在他向他的對頭們施以反駁，而特把這一層道理給他們掘示了出來時。

至於說，大自然界裏偶而所起之變故，終究預兆來事，這不是常常易得確定的。譬如湯若望一六一八年在印度臥亞（Goa）所見之彗星，是他後來纔相信，應當解釋爲德國，中國，與印度蒙兀兒帝國（Mogulreich）三國將起之禍災與瑞典王古斯達·亞得夫（Gustav Adolf）將陣亡之預兆（三四）。

湯若望特別相信，這種大自然現象是天主藉以警戒勸化國王們的，因爲國王們是有這樣少的塵世警戒勸告者的。那麼像當時世界最大君主，就是當時之中國皇帝，因爲無人敢向其警告警戒，就不能經天主藉天空之現象予以教訓了麼？至於說，這種警戒只是關於政府政治上之最大惡

劣狀態，這是顯然的，無須說的。關於這種狀態，湯若望都是藉對於天空現象解釋之呈奏，引皇帝注意，而向其揭穿的。在這裏，我們可以舉一例以實此言，即當在順治皇帝完全信任西藏喇嘛僧徒時，在日體中忽然現出非常多之斑點。當時之科學，對於這一種現象之原因，還未曾研究明白。可是湯若望竟向皇帝進言，日體中這宗斑點就是那些喇嘛僧徒，因為他們掩遮皇帝底光輝（三五）。順治皇帝對於湯若望這一種勸諫非常重視，因而纔漸次疏遠起喇嘛僧徒來了。我們確切得知，湯若望因為是一位有深邃信仰的人，所以對於這種天文解釋決非不鄭重其事，而要拿來騙人，自己並不相信的。

羅瑪教廷之裁決

在羅瑪關於這中國曆書問題之爭論，漸次已經堆積了許多材料了。中國傳教會派赴羅瑪之代表衛匡國，經過長久的航行，最後攜帶他那一大批關於這個問題的覺書，到達羅瑪，並且在羅瑪寫了一篇自己的見解書之後，除辦理許多其他事項外，還負有催促羅瑪教廷解決這個問題的使命。

命羅瑪耶穌會總會長高斯文·尼克爾 (Goswin Nickel) 委托羅瑪學院 (Römischer Kollég) 五位教授所組織之一委員會審查全部文件，與決斷爭論之問題。五位教授之姓名爲：弗朗慈·杜乃魯斯 (Franz Danelus)，弗朗慈·賚·魯阿 (Franz Le Roy)，保爾·加撒圖斯 (Paul Casatus)，約翰·巴布提斯達·羅特 (Johann Baptist Roth) 以及采理叻紐斯·阿爾畢超 (Celdomius Arvicio) 等神甫。關於全部事項，他提出下列二問題請求公決，即：像湯若望神甫所製定之中國曆書，是否應予以抗議？假使這第一個問題被否決時，耶穌會本會之一會員是否仍可担任中國欽天監監正之職，如果教皇渥爾邦第八 (Urban VIII.) 所作關於修會會士不許担任會外帶有裁奪權之職位的解釋，仍然有效時？

一六五五年八月三日審查中國曆書問題委員會呈繳了他們的評議書。這評議書是把全部事項做成四個問題，而予每一個問題以裁決之答復。這四個問題如下：

一、中國曆書上湯若望神甫本人所製定之部分，是否無可非議？評議書對於這個問題予以肯定，因爲在這一部分工作上，所記載的僅爲科學研究與科學觀察之結果。

二、中國曆書上果含有迷信之成分，竟能使其從教會方面應視為禁書否？評議書之答復為：審查委員會對於這個問題之解決，有加以肯定之傾向；因為最低限度在中國曆書為祭祀所規定之順利時日上，是免不了有迷信之痕跡的，然而却是以中國老百姓確係按照字面意思，以瞭解這種日期之規定為條件的。

三、如果中國曆書確係含有迷信部分，那麼湯若望神甫仍可擔任欽天監監正之職否？評議書之答復為：否，不可擔任，因為一切其他情形姑置不論，而他亦是不得不督促他的屬司屬員，對於迷信部分予以確切之工作，那麼這便是對於迷信與教會所禁止的事項積極參加了。

四、假使擔任欽天監監正之職，從本體上說，教會可以予以容許，那麼耶穌會底一位會士，是可以擔任這一個職務的麼，如果教皇渥爾邦第八底禁例的解釋仍然有效？評議書底答復為：本來是不可以的，因為由文件中明明可以看出，這個職務上帶有裁奪之權。然而如果接受這職務能予教會以裨益而不接受反能予以損害，那麼也並無去堅持這一種禁例的意志，而會士入會時所發之誓約亦更不適用於此項情形（三六）。

這評議書底聲調是很表示好感的。但是所爭論之核心問題仍未得以解決。因為曆書究竟是含有迷信的言詞麼？尤其是為祭祀的日期的選擇，終究是可貶棄的麼？這句話是對的，如果老百姓們對於時日之決擇與祭祀之名詞，係按照字面意思以瞭解時，這換句話來說，就是他們重視這字面的意思，而以這意思為依據的。那麼實際上果然是這種情形麼？評議書是傾向於肯定這個問題底見解的。

羅馬審查委員會之決斷書於一六五九年纔到達中國，這一年便是衛匡國和一批數目非常巨大的傳教士，其中有一些是姓名已見之於前文者，在不同的道路上到達中國的時期。這時因為這判決書中，仍尚遺有未解決之部分在，所以現在中國之各傳教士們，又可對於這個問題執筆發揮了。

這次首先出來說話的，就是教務視查員瞿西滿（Simon da Cunha），他是經羅馬耶穌會總會長委以到中國後發表羅馬審查會之決斷書的。一六六〇年一月十二日他由北京向全國各位教士發出傳單一紙（三七），在這一張傳單中，他發表了羅馬審查會之決斷，並且同時還對於決

斷書中所遺留未經決斷之問題予以最後之決斷。因為他同教會中之神學家，同湯若望神甫與其門徒做過種種談話之後，他已獲識知，中國曆書上為祭祀所選擇之日，實際上確非應照字面意義解釋的，彷彿其中係含有向人民要求做實地的祭祀一般。這尤其可以說，只是對於古代之習慣之記錄，與本篤會會士布采理尼所製之曆書中所記載的古代羅瑪之祭祀一般。這位教務視查員又向各教士下一嚴厲之諭令，應遵從這個判決，勿再多事紛爭。在這諭令中，他同時還特引羅瑪耶穌會總會長於一六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致湯若望一封信中的一句話，這封信和這句話都是他向湯若望，為湯若望對於中國曆書改良之努力，和為湯若望在天主底葡萄園中多年的勞作宣力，加以感謝褒獎的（三八）。

一六六〇年三月五日這位教務視查員又發出一第二張傳單（三九）。傳單上的言詞是說，為曆書上祭祀一問題，他和其他的教士們終究仍還懷有疑慮。可是湯若望已向他證明，欽天監監正對於曆書上這種記載，無論其是否應做字面意義理解，或不應做字面意義理解，均無所謂直接或間接的參加的。因為曆書上湯若望所工作之部分，均曾經他加以明確之標識的緣故。至關於曆書

上所用之印鑑，則爲屬於禮部者。何時應行應用這宗印鑑，那這皆係禮部之職權，而與湯若望並無所關。爲此教務視查員就又重行嚴諭各教士，遵從羅瑪之判決。

由這一些年數裏，我們直到如今，還保存有湯若望呈羅瑪耶穌會總會長之信件或覺書六份（四〇）。由這些信件和覺書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現在的辯護是多偏重這第二種論列的。第二種論列就是說曆書是含有迷信的言詞的，如果這宗言詞係以字面底意思以解釋時。然而根本上實非這樣解釋的，可是人們如果仍然假定，是這樣解釋的話，那麼他爲曆書上這些部分是不負責任的。這時連青年傳教士南懷仁（P. Verbiest），他是於兩年之前纔到中國的，也第一次出來爲他所敬重的大師湯若望做辯護了。他的一六六一年很長並且很清晰的覺書（四一），大致仍是追步湯若望底思路，而亦是選用了湯若望所用的那雙重論列，不過他却特別注重第二項論列的。並且其中有幾種思想是經他更特別予以有力的發揮的。

南懷仁論文底大意是說，當在上古初創曆書的時代，中國人民還不相信神怪，所以曆書中所書之「神怪」（Geister）字樣，當然不能以字面意義理解。因孝敬的心理，居於後代的中國人

們是要使他們的行動，確切以祖先底模範爲標準的，以便這樣可以能得盡量接近他們的祖先。所以曆書中之記載在他們便彷彿是教會中人們所特別敬重的聖徒遺物一般了。並且因這一種心理，中國人民都是以爲古代的舊日的物事，全是最好的物事的。爲此中國底民族纔要求曆書上，對於這一點予以確切指示。中國民族底理想，是要使生活經過幾千的年數，而仍一律，仍不變的。整個的民族是一個大家族，民族間之交往貿易與行動，俱皆有一定之規律，如同教會中之修會一般。至於說製曆者之腦中，在曆書上絕未思及星宿之影響，這由曆書上各時日之同一名號，卽一律皆以六十日爲循環之名號，一事觀之，便可知了，因爲在這一種編排上，是決不會顧及天然物理界底關係的。

這一篇論文之後，中國北方傳教副省區長金彌格附有小註一段，大致贊成南懷仁之此項言論，而李方西 (Franz de Ferraris) 也還加了一句評語說：如果我們從前曾有了一種這樣澈底的敘述，那教士之間便不會發生這樣一場大爭論了。

既而於一六六一年或一六六二年湯若望與南懷仁，關於曆書之問題，還共同寫有一部中文

著作，這部著作是經監中一切官吏員生簽名證實的，並且其中曾詳細陳明，曆書上經許多位傳教士之所反對的地方究竟應當怎樣理解（四二）。這部著作連帶一篇拉丁譯文，是在繼續的時間裏寄往羅瑪的。

傳教士安文思和利類思讀到了南懷仁之覺書後，仍還表示他們的疑慮。傳教士白乃心（Grueber），他本來是要帶着這本重要著作，即將作赴歐之長征的，在利類思底房間內，還寫下了七條反對的擬題（四三）。傳教士汪儒望（P. Valat）於一六六三年尙向羅瑪寄有一篇反對曆書的文章，可是這篇文章到達羅瑪時，決定是在這個問題最後決斷之後了（文件第三十七號）。倘若不是他們把一本副本預先由海道寄走的話，即南懷仁之覺書到達羅瑪時，也要過晚了。

羅瑪底羅瑪學院四位教授，即彌協爾·巴撒努斯（Michael Bassanus），馬丁·賈塔努斯（Martin Leytanus），弗朗慈·賈·魯阿（Franz Le Roy）和馬丁·艾斯巴爾擦（Martin Disparza）等四人被委任爲重新審查這個問題的人員；除去賈·魯阿之外，其他三人是新派遣的審查人員。一六六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他們向耶穌會副總會長保爾·歐里瓦（Paul Oliva）呈

遞他們審查的意見。這意見書簡短明瞭，而無岐意。其文如下：

「我們已經將關於中國曆書經羅西滿神甫和中國北京欽天監監正湯若望神甫所寄來之文件，俱已披閱檢查。由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該兼任監正之傳教士在製定曆書時，凡關於迷信部分之容納，皆未曾實際參加，本人既未參加，譬如簽字或蓋印等類事項，即其門徒亦並未行參加，因湯若望神甫之門徒皆係獨立從事於他們所担任的工作部分的。再者由這些文件中更可看出，該教士因監正之職守所製定之曆書，其主要目的皆在天文觀察之報告。在曆書上枝節的，令人覺有迷信意味的附屬部分，僅只是一種就本體上說中立知識之媒介，所謂中立知識，即對於在何日何時，此事或彼事，按照舊日習俗，應當舉行，或對何日何時，按照民間迷信爲做此事與彼事能發生順利條件之時日之知識。該教士製曆之工作，從教會方面說，確係有一重大的，甚至迫而不得已的理由，所以在這種工作上，即便果有迷信不妥之處，該教士亦係純粹處於被動地位，而無主動之嫌疑。

根據上述各理由，我們特作下列之判決：審查委員會認為並無任何疑難之點可以阻礙該教士充當此職，該教士經過此次審查之後，仍可照舊担任此職與繼續工作，因為這工作是對於基督教在該國之傳佈與保護以及教會之尊嚴，均有這樣重大關係的」（四四）。

審查會下這個判決之後，約數星期，即一六六四年二月二十日白乃心到達羅馬。三月十七日他呈遞他自己所寫的一篇與湯若望有利的覺書（文件第四十一號。）三月二十六日耶穌會副總會長和他的協助人員，會商做關於決斷曆書爭論，與關於自遠道而來的白乃心和羅特所呈遞之各意見書的問題。根據當時會談，而至今仍尚存在的記錄，當時關於曆書之判決如下：湯若望神甫仍可安然，無須多事疑慮地，繼續充當中國欽天監監中之天算家，但為使一切困難得以一舉而連根拔出，最好呈請聖父教皇（*Heiliger Vater*）做最後之決斷。

四月三日這位耶穌會副總會長根據上述議決向教皇亞利山大第七（*Alexander VII.*）奏明這件事體。他的奏呈底言詞以為：中國欽天監監正之職，是耶穌會以外的一種職銜；有幾位傳

教士懷疑，這一種職銜是與修會底誓約不相容的。因此特請宗座裁決。

教皇關於這個問題的裁決如下：按照他的意見，以為欽天監正之職之接受，是可以容許的，並且因為由這個職務之接受中，可以能為在該國異教徒之間傳佈基督教發生極大之利益，所以他很願意給予所需要的解除修會誓約之允許，並且諭令接受這個位置（四五）。

按照教廷記事錄中這一種記載推斷，曆書是否含有迷信言詞，與欽天監正是否應行為此點覆責等項問題，均未曾向教皇呈請裁決的。然而我們可以確切相信，教皇對於全部爭論問題，必會加以詳細過問。

所以照這樣看，湯若望在這一場大門爭上，竟是獲得了最後勝利的了。然而尚屬可疑，而不能決斷的一點，就是他是否尚在世，當在這個消息到達北京時，曆書之問題到了這個地步，可謂永久解決。湯若望歿後，安文思固然仍向教務視查員得·嘎瑪（De Gara）表示他希望將來人們仍要拒絕這個職位的願望。可是這時却沒有什麼人肯聽他這話了。向羅瑪所又傳遞的他這樣的文件，都是經人們立即存於文卷之中，而並不再事過問（四六）。經過湯若望這一次勝利之後，一直到

教皇克來門斯第十四 (Clemens XIV.) 於一七七三年以宣諭解散耶穌會時，耶穌會士都在中國欽天監中佔據着監正之職。耶穌會之在中國，在教難時期，防止了中國方面最惡劣的對待，和對於一切傳教士一網打盡的驅逐。因此人們簡直可以說，曆書是救傳教會出於滅亡的恩物，對於傳教會之功績極為重大。耶穌會既經教皇克來門斯第十四解散之後，出來繼續擔任中國欽天監天算之工作的，為遣使會會士 (Tzaristen)，至十九世紀，方行終止。

* * * * *

如果我們在這裏向關於湯若望令聞美譽和他所製的曆書的爭鬥上做一返觀時，那我們決定不能不表示一點遺憾的，因為在教士之間，況且又是耶穌會本會底教士之間，竟能發生了這樣敵對情形，而在意見底爭執中失去了許多有益的時間。然而我們亦不可因見到當時爭論文件之繁夥，而竟要斷定，決定是有數位傳教士，棄置了一切正務正事，而專門在做這種爭論問題了。因為這些文件雖然繁夥，然而却是由許多教士處搜集了來的，並且是妥經保存到如今的，不過仍尚有

許多其他信件，未能得以收存，而大半竟皆喪失。再者我們亦不可因見到許多文件內容之宏巨，而竟謂原著者在當時必將喪失一大部分寶貴光陰。因為當時那些傳教士們，寫拉丁文與葡萄牙文的文章，是令人們非常可驚奇地輕快易爲的。在這場大筆戰的時期，就是在一六四八年至一六六二年，正是湯若望立在他有作有爲，爲教會，爲中國宣力的時期的高峰上。人們由對於他那充當傳教士，充當朝廷之顧問與官吏的多方面工作的報告中，絲毫覺不出來，他在他的筆戰中在時間上有所喪失。這場鬥爭都是在附帶的情形中衍進轉變，與他們的正經職務，並無甚顯著的防礙。

一開始本來是經國法所強迫，然而後來却是出於甘心情願，與湯若望分立的二位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最後對於首都傳教會之發展，反而有極順利之影響。一六五一年這二位軍事俘虜，呈請官府與那位監視他們二人行動的滿洲軍人，准許他們自行建立教堂，以便移居其中，可以更方便利地與教友們交往。他們二入底請求，竟獲允許，而他們二人竟能以所捐募之款項，購置房院一所。甚至由福建海盜首領鄭芝龍手中，他們亦募款項，因為他這時正是在北京被囚居住的，所以他們二人向他募捐，就不見得是他們的一種聰明舉動了。那位滿洲軍人却非常喜歡，把他們二人推

了出去，因為照法律說，他們二人是他的奴隸，然而却因他們二人為湯若望之同志，却又不得不以上賓待遇，很是他的一種累贅。

這二位教士所購置之宅院，位置在一所有惡聲名的市區之內，這是在他們購置這所宅院時，決定無所知曉的。可是這個情形也漸次跟隨着改善起來了，當在隣居於他們四周的市民們，漸次被勸化成了一所頗有可觀的基督教區之後，這教區底基本教徒們，就是那些因某一種原因，不能同湯若望相容的基督教徒們，而其中確係有幾位十分惡劣的教徒的。湯若望和他的朋友稱呼這一種分立為叛背分裂（Schisma）。年高的龍華民見到這種情形，直流傷痛的眼淚。但是對於這種新情勢，人們漸次也即習熟相安了。

他們的這新堂址內一座大廳，被改為一座小教堂。皇上為這教堂亦曾賞有銀兩。據傳教士衛匡國底報告，在這教堂底門高頭，聳起十字一架，左右各塑向十字作禱告狀之天使一位。在教堂前立有「官員下馬步行」之石碑，這尋常只是朝廷大殿前，纔能有的一種碑文的（四七）。皇帝對於二位教士的寵惠，亦係與日俱進。至於說，他們仍是軍事俘虜，這時却無人有所知覺了。凡是偶爾來到

北京的耶穌會士，如果宿歇在這二位和露教士底教堂中，那他們都很稱贊二位教士傳教之熱心。一六六二年以奉教王妃尤斯妲·趙（*Princessin Justa Chao*）和一位親王底捐款，纔修蓋了一座正式的歐洲式樣教堂（四八）。這就是大家所稱之爲北京底東堂的了。湯若望底舊教堂，這是一直到這時，經大家所直接稱之爲天主堂的，竟被人們稱之爲西堂了。可是當在後來法國之耶穌會士在皇城內，與傳信部教士（*Propagandamissionare*）在西北城又各另建立教堂一所，而前者稱北堂，後者稱西堂時，湯若望之教堂竟又更名爲南堂了。

湯若望和東堂這兩位傳教士之間，開始時這樣緊張的事體，却漸次竟得以改善，而最後竟成了關於欽天監職務對事上的意見不同的一種性質了，而對人的意味竟得以完全去掉。在其餘的事體上，他們是始終合作的，譬如在拒絕荷蘭使團的一件事實上。

湯若望神甫也是東堂這二位教士底上司。南堂按照耶穌會之規章，本爲耶穌會所屬一學院（*Kolleg*），這到這個時期，可以說是全中國唯一的一個學院了，因爲南京與杭州之教堂，已經失去了這種學院性質。而居住於學院近處之耶穌會會士，按照耶穌會規章，均應歸學院院長管轄。湯

若望已經很寬洪大量地，把人們一切與他爲難的情形，俱已寬恕不究了。當在傳教士安文思於一六六〇年，按照會規舉行最後之宣誓儀式時，他爲這宣誓所應具備的科學知識之條件，頗有可疑時，湯若望竟閉起一隻眼睛來，裝做不見了。雖然當時教務視查員仍在北京，但是他不令教務視察員做監督的人員，他特特出來担任這監督的職務，以便表明他心內早已寬恕，而毫末存有芥蒂了。在下文中，我們還能得以見到，利類思與安文思二位教士在湯若望受姦人中傷迫害時，怎樣很忠心地立於他們的這位老同志之身旁。

第十二章 湯若望晚年所受之陷害及其逝世

在順治皇帝末後之一年中，這位被眩惑的君主日漸增進地嘗試着脫離爲他師友的湯若望底影響時，便有幾位反對基督教，與反對基督教這位至高無上的保護者的人物們，相信已經是可以直接予以進攻打擊的時候了。其後甚至又有一位斷然與基督教爲難的權貴，就是蘇克薩哈，更被容納於輔政大臣之列，於是乃愈加堅固了他們要向湯若望和教會施以迫害打擊的心理。在各省中，已經處處發現輕微的小迫害（一）。湯若望暫時仍尙能得成功，保護各地之基督教徒。但是仇視方面，暗中確係正在準備着大規模的迫害的。

對於繼此而發生之災難時期，和湯若望末後數年之境况，我們獲有至確切之報告。當時有幾位傳教士，俱曾共同親身經歷這場迫害，並且此外他們還可以由其他共同參與這場災難者之日記中，和由中國國家的公文中搜集材料的，所以對於這次變故，便皆各寫有著作或較大之文章。在

這裏尤其應當舉示的，就是畢嘉 (Gabiani) 和聶仲遷 (Greslon) 二人所寫的文筆優美與科學方面地位崇高的書冊。此外可爲這些書冊做有價值之珍貴補充的，尤其是尚有魯日滿 (Rougé-mont) (ii)，方濟各會士栗安當 (Antonio de Santa Maria O.F.M.) (iii)，多明我會士維托理奧·利奇 (Vittorio Ricci O.P.) (iv)，潘國光 (Brancati) (v)，與南懷仁 (Verbiest) (vi) 等位傳教士之報告。

爲這次迫害之發動者與推進力的，當時各報告俱皆指爲楊光先其人。至於說他是否果爲回民，如同大家之所傳說的一般，或爲猶太人或儒教徒，這是未能明瞭的一點。他原籍徽州，即今日安徽省之一縣，而當時他的年齡已高，竟是一位七十歲老翁的。這位老人底性格，經當時各報告者，描寫到了最黑暗地步 (七)。他做了一生誣讒、陷害、與毀滅潔白無過失的人們的事體。人們說，受他的陷害，使他良心負責，而經他冤死的人們竟有百名以上。他尤其所視爲打擊目標的，是那些富有資產的階級，因爲這些人們怕受他的詭詐陷害，而得不到安寧，所以便不能不向他輸款買好了。他這種無賴的舉動，已經給他弄了一份家私了。然而有時他的敲詐不得其法，便也要倒臺的。那麼，官府

底板子與流戍的處置，便是他所得到的報酬了。明朝末後皇帝統治之下，他被判流戍遼東，可是他也竟學會了有利可圖的占卜之術，並且在這占卜之術上，他也還弄得了小小的一個聲名。滿人戰勝之後，他又返回南京，照舊做他那誣讎詭詐的事業。有一次他幾乎喪失了他自己的腦袋。但是他乘時逃亡北京，而在北京便獲得了一位親王底寵幸。這樣他便算有了資格，可以出入朝中，奔走於各衙門之間了。可是他漸次對於基督教竟轉入一種不共戴天的仇視之中。湯若望是他所視爲他的主要仇敵；因爲他也認他自己爲一位最大的天文學家的。他很明白，怎樣可以很靈巧地代表一件不公道的時候，並且他還是很擅長於刀筆的。在他性格上這黑暗描寫，人們無論怎樣打重大折扣，那終究要是一位詭詐的，有綿軟不斷的耐力，而充滿了嫉妬與刻毒的老頭兒立在了我們眼前的，他對於他要毀滅基督教與湯若望的目標決不肯放鬆，而任何鄙惡手段皆所不顧惜。

一六五九年或一六六〇年楊光先已經發表了一篇分爲三章攻擊湯若望與教會的文章，題名關邪論，就是關駁歪邪有害的學說的意思。在這篇文章中，他首先否認天主底人格化，否認造物主，褻瀆基督，褻瀆瑪利亞和全部基督教，並且還嘗試着要把十字架的學說與其他基督教信條挖

入嗤笑之中。緊接着他就開始了他的批駁的議論，他說基督教是與中國底習俗與道德立於敵視地位的；因為基督教向皇帝和向父母拒絕人們所應行具有的恭順孝敬之德，並且輕視祭祖典禮，輕視婚姻與友誼，基督教甚至於破壞人類之五倫與大自然之和諧。最後他竟說基督教對於國家有莫大危險，而在他的文章中盡量發揮了這種聳人聽聞的言詞，他說傳教士們，尤其是湯若望，敗壞國家底官吏，而誘引他們造反。朝廷不可不特別小心預防有鞏固軍事設備的澳門。湯若望在全國暗自理伏對國家為敵的人們。基督教徒之十字與聖牌，便是這黨子謀叛黨徒底信號（八）。

傳教士們對於這本關邪論，四年之久，不屑與以駁斥，而竟置之不理，因為他們相信，這本書底原著者因書中言詞之捏誣難信，已經喪失了他一切威信的。一六六〇年楊光先也竟居然在禮部遞一正式之控告狀文，不過他這狀文當時竟被置入文卷中，而未經禮部予以過問（九）。然而這其間這位誣陷陷害者却在暗中鼓動醞釀。

一六六四年（一〇）有一本駁斥關邪論的著作出現，題名：天學傳概——就是論天主教律之來源與廣佈的。這部著作的主要著者是利類思與安文思二位神甫。奉教官吏約翰·李祖白乃欽

天監一監副，給這本著作加了一番修辭潤色之工，而以自己的名義付印發表。翰林院一位翰林，即許之漸，對於這一本書的批評很好，還爲這一本書寫了一篇序言，而在這一篇序言中，他竟推崇基督教超越一切其他中國之宗教。潘盡孝，就是湯若望底僕人，和太監保祿·許公 (Paul Hsi-kung) 担任在北京發賣散佈這部著作的工作。

這篇駁斥著作底主要思想，我們可以簡略述之於下：基督教爲宗教中之最古與最完善者。這一個宗教是刻在了人類心板上的，而且也是向第一批人類明白宣示了，而後來又經記錄在兩塊石板上的。連中國最初也是奉基督教的，這中國最古的書籍中可以證明。後來宗徒·多瑪斯 (Apostol Thomas) 曾遣派他的門人到中國來，其後又有其他的教士繼續西來。爲此事之證據的，是西安府之大秦景教碑文。最後又有利瑪竇和他後繼的傳教士們，在中國傳佈了基督教。中國第一位大皇帝伏羲，亦爲亞當 (Adam) 之子孫，而係來自猶太國者。中國之哲學，如果與基督教學說赫赫之光相較，則僅爲螢火之明了。

這些言詞未免過於胆大，過於中國之重僞自大心理了。因此在繼之而起的一場大獄中，控告

的狀況，便多半都是以這本著作爲口實，而一切曾與這本著作之撰述及散佈有關的人們俱遭挖累株連（一一）。

楊光先登時也又寫了一本題名不得已的新著作。意思是說，他實在不能默息，而不得不起來予以駁辯了。他在他這本書中，特把教會所發表的那本駁斥他的著作裏使中國人們自尊自大，難以容忍的些言詞，俱都一一拈出，以便使中國人們讀而生恨，並且又從新寫了些褻瀆教會的言詞；他說，基督教聖經會謂耶穌死時，太陽失光，而發生日食，因而天昏地暗，這純是一種欺人騙人之談，因爲當時人們在中國並未瞧見這日食的；他又說，基督是一叛徒，當時的政府判他以死刑，是名正言順的。最後他竟說，傳教士俱爲搗亂分子，因不對於歐洲之國家，被由歐洲驅逐了出來，纔到中國來的，他們在中國依然是做他們那煽惑民衆，而嘗試着由澳門出發，以奪取中國全國的。

利類思對於楊光先這篇誣讒煽惑的文章，也又做了一篇駁斥的答復，而特爲之選了一個不得已辨的尖巧題名，意思是對於楊光先底不得已說，不得不予以駁斥的（一二）。

可惜對於當時教會這兩篇駁斥文章寫作的確切時日，我們不能確切斷定了。至於說，湯若望

在這場筆墨方面的爭論上，是否也會參加，而一顯他那優越的才智，這也是不能從史料方面得以確定的了。可確定的一點，是他在繼續的時期中，竟被中國法庭方面，認為這兩篇著作底首要主使者。可是在這兩篇文章底撰作上，他或許是並未怎樣過問的，而對於第二篇文章的過問更是最較微的了。因為一六六四年四月二十日他忽然染患重病，這場病是使他幾乎不能再有作事的能力。按照所舉出他這場重病的徵兆說，我們可以斷定，他所患的是一種痰癥之症。他的肢體癱瘓癱瘓，行動費力，甚至口舌結塞，而右手不能運用（一三）。這樣，在即將興起的大獄中被控告為主犯的湯若望，竟是幾乎無能為力地立於恰切要毀滅他的那些對頭之前。

這其間楊光先以他這兩篇挑撥煽惑的文章，和他對於湯若望與基督教暗中陷害的活動所造的空氣，已足夠程度了。由他那刻毒的手筆中，也時時寫出了些較小誣蔑歐洲天算的宣言傳單；一六六四年他竟向北京市民散佈了五千份這樣的傳單。再加上他又向各方面納賄行賂，所以他在這場鬥爭上，漸次便就佔了優勢。他納賄行賂的款項，俱都是由回教天算家，太監與僧徒各團體中，豐豐富富捐助到他的手頭之下的。他所仗恃的，是輔政大臣蘇克薩哈。與他恰為一黨而最有能

力與最活動的，却是前被革職的禮部尚書恩格德，這位恩格德自前次皇子殯葬事項以來，對於湯若望神甫卽已懷有至深仇恨，時時思作報復。當時他雖被判處充軍罪名，但是他並未赴充軍處所，或者也許是又暗自返回了北京的。這樣，楊光先便又獲得了大批的助力，而更能向教會作他的重大打擊了。

一六六四年九月十五日（一四）這位誣蔑陷害者，在十全方式之中，向禮部呈遞他的控告教會的狀文，而禮部接到這一紙狀文時，竟在同日又將這狀文上呈輔政大臣。狀文中被控告違犯國法之人物，爲住西堂之湯若望與南懷仁，住東堂之利類思與安文思，此外還有那四位曾從事於教會第一次駁斥論文之撰述與散佈的中國人。散居中國各省之其他傳教士，在狀文中並未被指出姓名，這大概是因爲楊光先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之故，因此這一批傳教士們都是在較後時期中，纔被傳至法堂加以審訊的。楊光先控告教會的條款，爲陰謀不軌，危害國家，宣傳一種應鄙棄而不正當的宗教，以及傳佈舛謬虛妄的天算學說。

這樣中國國家對於基督教所興起的大獄，倏算展開了。可是中國方面在這場大獄上，竟絲毫

不苟且地遵守了訴訟上一切例行手續。因此在這場訴獄上，我們對於當時審判制度亦可略窺一斑。這確係當時一場一等大獄，為全國人民之所緊張注意。並且不僅全國人民注意，甚至最後連天與地，亦曾以裁判權威干涉了這場訴獄的。而在這場真可謂驚天動地事故底中心裏，巍然聳立着的一位人物，便是身患痿痺，而年齡高邁的湯若望。

這一紙狀文遞到禮部後十日，朝中輔政大臣便決斷，此為一最重大之案情，而諭令吏禮二部從事審查鞫勘。

九月二十六日（一五）開第一次大會審於禮部之大廳中。全部官員，吏禮二部大臣，以及各當事人等，俱皆到齊。上述中外八名被控告者，俱係由其住所中被帶至禮部大廳，而分為兩組，立候於大廳之中。湯若望，南懷仁，李祖白和潘盡孝為一組，利類思，安文思，許之漸與許保祿為一組。八人之中皆有監守之警吏一人立於身後。如一人經點名呼喚，即應由行列中走出，跪於裁判官之前。湯若望在這一天與在繼續的時日中，被呼喚的次數最多，但因身患痿痺，起跪不便，便不得不令兩位僕人予以支扶。禮部之一位大臣瞧見湯若望這情形，很表示憐憫之意。他呼他為瑪法，而多次請他按

照滿洲習俗坐於地上。然後他又令人們送來小桌一張與地甃一方，以便身患痺痲的湯若望坐於其上（一六）。

在這第一次大會審的日期之中，僅宣讀狀文要點，與錄取各被告答供。每一要點俱係書於紙條之上，遞於被告，令其自行朗讀，並自行答辯。旁面陪審各書記把一切言詞，俱都記錄於紙上，而呈遞與各會審之人員。因為湯若望口舌結塞，僅能不清晰地發言，所以南懷仁便被命為他的代言者，他們二人彼此可以用拉丁文與德文講談。

告發湯若望第一批罪名中之一罪名，即為他担任欽天監監正之職，並非欲為中國國家出力，乃是意在藉此更易建立教堂於中國全國，以便到處傳佈基督教。關於這一點的答復是很容易的，因為這是皇上逼迫湯若望接受了這個職位的。證據便是教堂前，皇上御筆所賜的題詞。其次就是向各位教士俱皆訊問，他們是否承認，中國第一次的大皇帝係由歐洲來——這是與中國底榮譽很有關的一個問題。教士們的答復俱都謂：他大概是由猶太國來的，可是這猶太的位置是在亞洲，而並不在歐洲，這，人們在利瑪竇的世界輿圖上即可看出。一個其他審訊的問題，則為關於散佈聖

牌、聖像、十字以及教義問答的書冊，頒與教徒的目的何在；人們推測猜想這些事物，為教會中的魔術與陰謀不軌的信號。他們八位人犯中，每位均須說明，他們對於教會中第一次駁斥楊光先之著作，是否參與其撰述與散佈。

這第一次偏重普通審查之高級大會審之後，一切被傳之被告，俱都又被送回他們的住所。湯若望令人們把他先抬至教堂中，在這教堂中充滿了哭泣難過的教友們。其他的教士們把這一日所經過的情形，俱都記入日記之中。這日記是這些教士們，在這場大獄的全盤歷程中，俱未間斷中輟的（一七）。

這一案，經過這大會審之後，便全部交付於禮部之一委員會，繼續辦理。自是之後，這委員會對於所控告之三種罪名，便繼續加以詳細之審訊。各位被告每日早晨均須到庭候審。每次審訊之結果，俱皆繕成文件，而於晚間向上峯呈遞。

三種罪名中之第一種為大逆謀叛，在這個罪名上，楊光先控告湯若望為一黨子陰謀推翻國家的叛徒們底首領，其他的人們則為同黨共犯。楊光先在他的控告的細目上會謂：湯若望底同黨

共犯，就是教會中各傳教士，散佈中國全國。各地之教堂與教士之居留地，俱是他們的窠巢之所，而他們教中那些奉獻聖物，俱爲他們所發出的信號，而教會中之虔誠弟兄會之聚會，皆爲謀叛與爲謀叛事件搜集款項而招集的。他們的洗禮便爲入黨的暗號。他們的告解神事（*Beichte*）便爲宣洩各方面底秘密的組織。教會日曆上之所記載的，皆係監查集會的日期。教會中的表冊以及建造教會的人們，與教會第一次駁辯書上所開列教徒之數目，俱爲謀反戰鬥的實力之登記，並不是別的。在澳門，就是在軍事的根據地上，已經備妥三萬人馬，時時刻刻皆可出發。欽天監所製之曆書上「依西洋新法」五字，實爲中國之侮辱；或許在這五個字後面，藏有一位歐洲王侯之促使的。

這一次的審訊歷時十二日，審訊的官員們拿上百關於傳教會，關於教堂和關於傳教士的各種問題來向湯若望和其他的傳教士們加以詢問，而令他們一一作詳細之答復。他們的目的，是要藉此究出，湯若望是否爲傳教士之首領，並且是否是他招集了他們來的。關於這一點却很容易答復，因爲任何一位傳教士到中國來，都是先獲得皇上之入國准許的。爲證明這一點，湯若望爲其他傳教士，向朝廷所上的請求入國准許的呈文，俱被由文庫中特特取至法庭，給各位審判官員親自過

目。這一點雖然對數過去，但是審訊的官員們總覺得，曆書上「依西洋新法」的字樣特別有可疑。關於這一點，湯若望確能證明，這個字樣是經他的前任監正奉皇帝諭旨開列於曆書上的，因此他當然是不敢擅行私自更動的。同樣容易證明的，是軍事設備非常薄弱的澳門，決不會有危害中國的危險。至於說，基督教徒團體決無任何秘密行動，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因為任何一位教外的人，任何時間，都可到教堂中來參與神事，而可詳細實地考查教會中之一切器物與行動，是否究竟與所控告的言詞相符各。各位教士們皆向審判的人員請求明斷，並且要求人們運用康健理智，不可過受炫惑。因為澳門人口非常稀少，而向中國交納租金，一向俱皆遵守時日，從無拖延遲誤，此足可見澳門政府對於中國向來之信義忠實了。況且由歐洲到中國，途程需兩年之久，接濟困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一位有理性的人怎樣可以相信，寥寥幾位處於中國的傳教士，手無寸鐵，而竟敢要奪取巨大的中國了麼！

楊光先在他所控告的這頭一項罪名上，顯然不能得到勝利。審訊這案件的委員會，並未重視這個案件。他們對於湯若望和南懷仁都非常和霽，而有時竟令衙役給他們遞水遞茶嗎。他們不得

不辦理這一項案件，只是因爲秉承上峯底命令，更因爲是受了賄賂的驅使。因爲在這數月與數星期之內，楊光先會把大批款項向各處分散，爲的是可以促裁判的官員以及各該上峯，尤其是輔政大臣們，從速向教會與湯若望予以打擊（一八）。

關於這第一項罪名審訊之後，繼續審訊楊光先所控告的第二項罪名了，即：基督教是一種應鄙棄而不正當的宗教。關於這一項罪名，他們以教會裏的「教義問答」(Kathechismus) 爲根據，而將其中所列之各條道理，逐條加以審問，這教義問答爲此也特被譯入滿洲文字的。在這一條款上，利類思便成了主要的發言人了。可是向這些教外的與純粹拘泥物質的人們，要想把基督教真理底意義弄明白，却是很困難的。受了楊光先賄賂的審查官員們，都是努力把基督教底真理想量做惡劣的曲解的。從前人們所視爲傳教士底光榮的，譬如：教士不許結婚，以及爲一種更高尚的目的，不得不離家別鄉等等情形，現在却被解釋爲違反對於祖國，對於家庭和對於父母的首要義務了。但是南懷仁在這裏却做了一個極中肯綮的答復，他說，連孔子也會出離祖國。就是現在的中國人們，如奉有皇帝諭令，也是得一樣地離別家鄉而遠出從軍的。關於這第二項罪名的審訊所經

歷的時日，也差不多又有十二日之久，然而却並未能確定教士果犯有任何罪名。輔政大臣們差人打聽湯若望底健康狀況，他們的差人們向湯若望說，請他只管放心，一切的事情都不會壞的。每晚被控告的教士們，都可以自由返回他們的住所（一九）。

審訊委員會這第二次審訊之後，竟做有三個星期之停頓。官府方面在這期間，曾差人到廣東，以便查明是否在澳門果有三萬人馬，候令向中國出發。兩位曾為建築各教堂捐款之高級官員，就是未曾奉教的佟國器（Tung-Kuo-Hi），他本是衛匡國底一位朋友的，和翰林許纘曾（Dr. Ba-silins-Hi），他本是大慈善女士甘第大·許夫人（Candida-Hi）底兒子的，而這位許夫人便是徐光啓底孫女，被召傳做負責之答復（二〇）。

可是楊光先和他的黨羽竟利用這空暇的時間，繼續向前以賄賂促進他的事體。據聶仲遷底記載，在這場官司底全部歷程中，竟散出了白銀四十萬兩。回教徒向他所輸捐的寶珠，竟有十八顆之多（二一）。連傳教士們當然也是謀求護教的人們的。但是他們和他們所獲得的那為數輕微的捐助，怎樣能抵得敵黨那偉大的力量呢？因此北京城內對於教會的空氣，便眼看着仇視起來了。老

楊光先騎着馬，散佈着誹謗譏訕教會的傳單，揚揚得意地穿越街市（二二）。

這一種情勢之轉變，八位被陷害者於十一月十二日顯然覺了出來。在這一日下午五點鐘，他們被傳至禮部。在禮部人們令他們面朝殿闕跪於地上。這時便有一人出來，向他們捧讀皇帝聖旨。聖旨宣讀之後，他們便都成了囚徒。湯若望，李祖白，許之漸與潘盡孝，俱皆被判決分別監禁，但因為他們是朝廷命官，並未加以刑具。其他四位人犯，即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和許保祿，雙手俱被捆於背後，而繫以九條鎖鍊：三條繫頸項，三條繫臂腕，並三條繫腿足。南懷仁因為年紀最輕，所以便繫以分量最重之鎖鍊；而年老的利類思所得的鎖鍊，便是最輕的了。傳教士安文思被他們捆綁得，這樣緊密，竟致手足腫脹。他們每二人被分爲一組，即南懷仁與安文思一組，利類思與許保祿一組，被拖至兩間隔離之獄室中囚禁。在獄室中，他們被連帶頸鍊拴繫於木栓之上。這樣他們便不能立坐，而不得不輪臥於地上，這也是因為那鎖鍊重量，不得不如此的。他們四人之中每人俱有獄卒五名加以看守，時刻不離左右，就是湯若望等未經鎖繫的四人中，也都是每人皆有五名獄卒看守的（二三）。

這些被陷害的人們爲禮部的囚徒約有兩月之久。因爲湯若望現在還能按月領官俸，所以他還能維持傳教士與看守之獄卒飲食等費用，維持獄卒飲食費用是當時監獄規條之所容許的，而這樣便也竟減輕了八人在獄中所受之痛苦。教友們都出來表示他們的同情，他們常到監中探訪被囚禁的八人，並且還以種種的餽贈，使他們心內感到快慰（二四）。

在他們囚禁於監獄中的這些星期內，審訊的官員們同時舉行了兩項的審訊。第一項審訊是關於欽天監七位曾規定了上述皇子殯葬時刻與地點事件的官員，他們現在被告發的罪名，便是錯定這位皇子殯葬的時刻與地點，因爲本來的罪犯，即從前禮部尚書恩格德，現在在用行賄納賂的方法，竟得以把他本來的罪名完全推到他人身上。可是這批被冤誣的官員們多半都是基督教徒；他們這些人物中最傑出的一位，就是同湯若望一致監禁的欽天監監副李祖白，他在當時是大家所公認的中國最有學識的天算家。因爲湯若望原來的志願，是要使欽天監盡量化爲一個奉教的機關，所以欽天監中的奉教官吏，便佔優勢了。然而這在這時却更成了一個，使他們嚴厲對待這羣可憐的官吏們的理由了。可惜他們在審訊中的表示頗行錯亂，他們的供詞推諉躲閃，而不能理直

氣壯的一致，於是便不能不把他們自己都裹纏在糾紛矛盾之中。所以他們這一案底前途，便不能不暗淡悲觀了（二五）。

這一項審訊之外，同時禮部審訊委員會對於基督教學說之第二項審訊依然照舊進行。每日未經鎖繫的一位傳教士和被鎖繫的三位傳教士帶着他們那鎖鍊，好幾點鐘的長久立於法堂之上，受着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苦痛。可是他們並不怨恨愁苦，他們反而心內充滿了快慰榮幸，因為他們明白，他們之所身受親嘗的這苦痛都是爲他們的宗教與他們的信仰的。審判官員們爲要把利類思與安文思所寫駁斥楊光先底文章的著作，坐實罪名，俱係由教會之「教義問答」和由湯若望底兩種著作，即由他向明朝末後皇帝所呈遞之基督之生活一書中，和由「關於基督教來源」的較大著作中，斷章取義地截取證據的。

爲這個大獄中這一批冤枉的人們，現在竟無一人出來說話了，可是人不見憐，而上天竟要見憐了，這時上天竟第一次開始發言了。因爲十一月十三日，就是在這場官司底復又提起之日，天空便現出了一個彗星，這顆彗星一直到一六六五年一月底尚未熄滅，而仍可見，並且曾經中國許多

的地方俱皆見到。彗星出現之後，約二三日，又有一陣大暴風吹過北京。這按照教徒與非教徒底信仰說，顯然是上天示警徵號了（二六）。

八人牢獄中的囚居，和又重行提起的審訊，已經過了六個星期了。所有全案文件口供，俱在吏禮二部全體出席的會議中，更予以考核審查。這考核審查的結果，禮部尙書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宣佈（二七）。

審核的結果，認定湯若望犯有下列罪名，就是他宣傳本來一位被釘死的罪犯的基督爲天地之主。他歷年宣傳這種信仰，而每年付與受誘惑入教者的洗禮，竟有二百名至三百名之多，並且他還把教中的聖物與教中節日的曆書，悉皆分散給與它們。而教中對於楊光先底文章所做的駁斥的著作，也是經他所主使的。他竟擅敢妄謂順治皇帝也曾信奉基督教，在他下論排斥國內僞詐異端的宗教時。此外他還宣講亞當是上帝所創造，而一切人類均係來自亞當，所以一切人類便不得信奉基督教所信奉的天主了。曆書上添印「依西洋新法」字樣，是中國底一種侮辱。他並不能證明，這字樣是在他接受欽天監之職之前，曆書上已經印行。他誘惑國民，因爲他向他們宣講洗禮

(Taufe)，補贖罪惡禮 (Busse)，塗油堅信禮 (Ölung) 等宗教儀式之神奇效力。再就是他宣講天空僅只是天主底靈府聖宮之所在，而並不是天主底自體。他反對中國舊日的禮法，而禁止教中燒紙，酒醮，肉祭以敬祖先。他和其他的教士們，並與澳門，俱皆彼此交往不斷，而跡涉嫌疑。這是在審訊時，曾經招認，而後來竟又予以否認的。所以據此而斷，他竟也是一位謊言者。每月四次，他和其他教士共同招集教徒們做可疑之會聚，而蒐集款項。

因此吏禮二部所擬之判詞便爲：湯若望應行革除一切職位銜號，而交刑部議處。李祖白受同樣處治，因爲他印行那本惡劣的駁斥楊光先的文章的著作，而爲這本著作寫了序言的許之漸以及其餘一切爲皇子殯葬事項確定時刻地點錯誤之欽天監官吏，均一律受這樣之判決。湯若望底僕人因受有朝廷武職的封號，所以應行交兵部以軍法處治。安文思，利類思和南懷仁，因爲都依然是宣講被釘死的罪犯爲天地之主，並且又經參與湯若望之各項犯罪行爲，所以應一律交刑部議處。然而楊光先亦應處罰，因其心性頑強與言詞凶橫，「這便是那些裁判官員們要表示他們的大公無私了」。而那位太監許保祿亦應判罪，因爲他並沒有證據，而加楊光先以死罪之名。中國其他

各地之傳教士，均應鎖繫押送北京，以待審訊。全國一切教堂均應毀滅，而焚燒其聖像聖物。湯若望之教堂則應除外，因其係以皇上所賜之碑文之故。全國各教徒均不予追究，但其所信奉之器物，均應搜出而予以焚燬。廣東總督應向朝廷上意見書奏明，是否仍可令澳門存在。

這全部所擬之判決書是尙須輔政大臣之批准的。可是輔政大臣對於這判決之批准，很費了一番長久的躊躇。因為替代例行的三日後，他們竟遲至八日後，纔把這判決書批下的。輔政大臣對於這判決書除下列之變動外，餘均予以照准，其所變動之處，即「楊光先之罪名全部赦免，」這是當然的了，當在人們以這樣便宜的方式，裝出了大公無私的架子，而又保存了政府底顏面！其次就是各省之傳教士，應以光榮之方式護送，而不以俘囚之對待押送北京，而各省之教堂教會以及聖像聖物等之毀滅，均暫予終止執行，以待後命。

一六六五年一月四日經輔政大臣所批准的這判決書，被宣讀於各位被判決者之前。各位被判決者，即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與許保祿四人均帶鎖鍊，湯若望與李祖白未帶鎖鍊，於深夜之中，在大批的軍隊監視之下，被引渡入刑部之監獄。各教士心內都是充滿了榮幸的。因為他們被判處

的罪名，誘惑國民，傳佈虛偽的學說，按律條是要判處死刑的。這樣，他們便是爲他們的信仰而死，這換句話來說，便是他們要獲得殉教的無上榮幸了。他們心內都是在期待着不久的結局，所以便在這起解的路程上，彼此做告解赦罪的神事。被鎖繫的教士在刑部監獄中，每二人住獄室一間，湯若望與李祖白各分住獄室一間。這牢獄中充滿了罪犯，充滿了被判決者，這些人犯之中，每日於白晝挪出斬首者，竟能達到三十名之數，此外還充滿了一些受苦刑拷打的可憐人們，並且還充滿了死屍，所以簡直是一種活地獄了。湯若望底僕人潘盡孝是第一步已經發交兵部了的，而許之漸僅止革職黜爲平民，並於其後竟被赦免。「這也是當然的，因爲他並不是一位基督教徒」(二八)

上述各人犯及被判決罪名，而爲這罪名規定懲罰的，便是刑部底責任了。各位人犯在刑部又經刑部之兩委員會加以堂訊，這兩個委員會本來是管理陝西河南二省之刑事案件的。這時連湯若望也竟上九道鎖鍊之刑具了，這是法律與刑事訴訟條例底規定。一種特殊的待遇，在刑部的全部審訊時期，並未有一位教士會得享受。因爲這個案件，在官府方面暗中早已有所接洽預謀，所以在這兩個委員會之前，即便有最精妙的辯護，也是決不會發生效力的。在這些時日裏，因居於刑部

牢獄中的傳教士們，又有多次帶着刑具，被傳至禮部，與這時被傳至北京之許纘會當堂相對質。可是這位許纘會底心性，未免過於卑怯了，而在堂訊時，簡直是否認他的信仰的，然而他終究也失掉了他的職位。其他一位被傳至北京的官吏修國器，終被釋放；因為他並不是一位基督教徒，而與他友好的人們又向法官行賄賂。

一六六五年一月十五日刑部宣佈各位人犯應受的刑罰。湯若望以陰謀不軌之首領，于受較長時期之監禁後，擬處絞刑；但對於他的罪名仍應獲有更清晰之新確定後，方可執行。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與李祖白各應杖一百，驅逐朝外。許保祿亦被判處杖刑一百，遠戍邊疆（二九）。

但是這論罪的判決尚須經過控訴院（*Appellationsgericht*）之確認後，方能執行的。兩處裁判團體，即都察院與大理寺，負有精密復核全案文卷之責。都察院與大理寺二處之長官與刑部尚書共同組成三法司，是為最末後之審判階級，經過這一個階級之後，就只有皇上底御批了，在這時，換句話來說，就是需要輔政大臣底批判了。可是因為朝中各高級官位，俱係滿漢各一人之二重設置，所以這三法司之裁判團體便為六人之所組成（三〇）。

這末後之審判階級對於全案之審核，是需要數星期之時間的。這期間湯若望底官司仍在進行，而並未終止。因為對於所控告的第三種罪名，就是傳佈舛錯虛妄的天文學說的罪名，直至這時尚未加以審訊的。因此就決斷，用最簡短與最確切的方法，以證明湯若望之罪名。因為在一月十六日（三一），就是在刑部宣佈處罰湯若望等人之後的一日，爲日食之期。當時之三種天算學派，即歐洲、中國與回回三派，於多日前已各將其推算呈遞部中。所以現在便不要再費人事，而可直接聽從上天之裁決了。這三派底首領以及各閣老，各部尙書，連帶他們輔佐官員，並欽天監之一切官吏，和其他地位崇高之大人，均應會集一處，共同當場測驗，以資證明三派之孰優孰劣。楊光先和他的黨徒們足夠稚傻的了，因為他們竟敢預先揚言，必定會獲勝的。往日經驗底教訓，他們竟完全置之腦後。根據南懷仁之推算，北京所見之日食，應在下午三點二十六分開始。楊光先及其回回派之天算家，冒然逕直地竟確定了一個與南懷仁推算略有不同底的時間，意在希望南懷仁或有略微算錯之處，而他們的確定便不能不對了。回回天算家所預測日食之時間，較南懷仁之所預測者早半點鐘，而中國曆法所預推者，則較南懷仁之所預推者早一刻鐘。

這次日食之觀測，其經過是有着至高度的緊張激動的戲劇色彩的。南懷仁曾把這一場觀測底始末記敘了下來。他這記錄和利類思與安文思底記錄，也俱都被畢嘉在他的著作中之所採用。

湯若望底病勢在短時期之前，又曾經加重一次。他受着呼吸困難的苦痛，而有時竟致喪失意識，昏迷不醒。在測驗的時間，他不得不帶他那九條鎖鍊蒞場，綸臥於風地中的一張牀上。南懷仁令人將他的望遠鏡送來。他們將他手上的鎖鍊去掉，而將他脖頸上的鎖鍊擎起，以便他能得當場工作。日食之時刻漸次移近。在記時儀器之前，立有數位官吏，呼報時刻。「現在是中國曆法所推算的時刻了！」十五分鐘的時間，絕未見有絲毫日蝕底痕跡。「現在到了回回歷所推算的時刻了！」又差不多枉然等候了半小時之久，仍見不到日蝕。「現在是你所推算的時刻了，湯若望！」在這一瞬間，太陽登時便開始昏暗，入於蝕底狀態。當場之一切人們，只除去這時深覺羞愧難堪的回回與中國天算家之外，俱皆顯然露出興奮驚服的神情。他們一方面向大家遞茶，一方面都依次向望遠鏡內觀察日蝕。這一次的日蝕是一種中心的，幾乎全面的日蝕。這也都是南懷仁預先完全推算準確的，而其他之二種曆法，則完全錯誤不對。在這裏南懷仁于他的記錄中却作了一種良心的承認。因

爲實際上日蝕之開始本來是比他所推算的時刻較早五分鐘的。但是上天底神意竟會安排得，使這錯誤令人覺不出來了。因爲記時儀器前呼報時刻之官吏在他們那激動興奮的心情之中呼報湯若望底時刻時，恰恰早呼五分鐘。政府公報登時便把歐洲天算底勝利公佈全國。中國與回回方面之天算家不得不具結畫押以承認他們的錯誤。按照國法與律條，他們應交刑部議處，但以皇帝之恩赦，而得幸免（三二）。

關於湯若望等論罪之判決和他們前途的命運怎樣，懸於三法司最高裁判團之批示者，竟有二十日之久長。最後於二月初，所有被議處判罪者，均被傳至三法司聽候裁判。利類思與安文思二人特爲這堂訊，作有辯護狀文一件。連南懷仁也以湯若望之名義，遞進狀文一件，在這狀文中，湯若望鄭重誓言，他決非一黨子危險會社之首領，他實係一種神聖的敬天的宗教底傳佈者。他又宣稱他接受欽天監監正之職，僅止是秉承順治皇帝一再敦促的諭令的。他尤其引以爲證的，就是順治皇帝所賜與之「通玄教師」銜號。但是他們任何辯護，俱歸無效。因爲三法司中之三位漢官，對於他們的情形固然似乎是很順利的，然而司中之三位滿官，對他們的態度却就決不這樣了。而漢官是

不得不屈服於滿官的。爲了這種情形，這二十餘日之控訴裁判，終久確認了議處湯若望等罪名之判決（三三）。

這判決到這時就僅餘剩輔政大臣之批行了。可是這批行終久是未經批下的。這其中的原因，我們由後此繼之再起的審訊中，便可推測而知。因爲這些輔政大臣們，在這判決上這時心中便不能不起種種疑問了，就是他們知道基督教是曾經順治皇帝屢次予以褒揚崇敬的，所以他們現在怎樣能把這基督教又視爲與國家公安有害的呢？順治皇帝這些褒揚崇敬的題詞，是人們在一切的教堂上，俱能見到的。況且湯若望之充當欽天監正，又確係秉承皇帝之意旨，而關於傳教會中一切重要事件之決斷，確曾一一奏明朝廷，獲有皇上之俞允，所以現在人們怎能據此，議處湯若望大逆謀叛之罪名呢？輔政大臣是不可以這樣完全忽視一位滿洲皇帝統治律條的。他們自然也不得不爲將來一設想。那麼他們如果這樣依議批行，康熙將來就不會向他們追議了麼？他們明白這小孩子是立於他的祖母影響之下，而他這位祖母當初是曾選湯若望爲她的義父（*Vater*）的。因此他們就覺得這頭兩條罪名是決定不可成立的。可是毀滅湯若望與一切傳教士，却是他們既

定的計劃。所以這案件既已到了這個段落，他們便不得不另立基礎，以從新開始了。楊光先所控告三種罪名之中，還剩有第三種罪名，就是傳佈舛謬虛妄的天文學說的罪名，是尙未予以深究的。這在他們的眼目中，却是一個籍以施行他們原定計劃的好機會了，他們要由這裏進行，要由這裏嘗試着給被告的人們拴一條繩索出來，雖然湯若望在這一點所佔的地位是最鞏固的。因此一六六五年二月間，這場官司便又從新開始。

我們暫且把這場訴訟的敘述擱開，暫先一敘述湯若望和他共受苦難的同人們在刑部監獄中囚居的情形，這刑部監獄是他們自一月初至三月中旬，都羈絀禁錮其中的。刑部獄舍簡直可以說是獄穴，其中又冷又髒，他們都是如同野獸一般，在那裏面拴鎖着，每人身邊皆有五位看守的獄卒，這獄卒是連一瞬間也不令他們出離眼界之下的。一到夜間這獄卒們便賭錢嚷鬧。在他們初入獄中的頭一個月中，身上的九條鎖鍊，連一條也不容解開。但是這些獄卒對於身患痿痺的老人湯若望都同起憐憫之心。湯若望也還把每日由他住所，給他送入獄中的飲食，分給獄卒食用。表面上獄卒等仍是很嚴厲的，因為楊光先曾派出些密探特行偵探他們。但是暗中他們却給與了湯若望

各種便利寬和的待遇。在末後數月中，他們在夜間竟致把湯若望手足上的鎖鍊俱皆去掉。但是拴繫罪犯於木栓上的頸鍊，却永不去掉的。人們也向獄中給湯若望送了些溫暖的褥墊。可是他們一切囚居的人們，心中都是欣悅的，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是為他們的信仰而受苦難。獄中苦悶的時間，他們都是以讀聖經，聖書為消磨的方策。城內的教友們也更常來探視他們。利類思與安文思尚可做救渡靈魂之神事，甚至尙能勸教外的人入教。湯若望與南懷仁在白晝，尋常是被傳至堂上過堂的。回到獄中，湯若望便是毫無救濟地躺臥地上，受着呼吸困難的苦痛。南懷仁時時刻刻俱在從事於辯護的工作。湯若望從旁幫助着他，因為南懷仁還不是能完全精通中國語言文字的（三四）。

四十日之久，這換句話來說，就是到三月底了，他們二人，就是湯若望以被告的身分，南懷仁以他的代言者的身分，為天算一案，終日鎖繫，押赴禮部過堂。在禮部他們有時竟須等候數小時於風地之中，然後各位裁判官員們方能聚齊。為這二位傳教士，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體，去向這一批無學無識的愚昧人們，答復與解釋他們那許多往往極其稚氣的問題。他們做答復與解釋，有時竟，譬如說：須要彷彿向小孩們解釋，為什麼緣故金星時而晚上出現，時而早上出現（三五）。

爲的是要在這一案件上，弄得一個極莊重的結局，並且爲防備皇上事後萬一追問時，可以弄得一個遮護的把柄，輔政大臣們便決定，當在禮部關於天算案件，正在進行的時期中，召集御前大會議，以便解決西洋天算問題。這崇高的御前大會議之召集，自一六四四年以來，這是第二次了。這次御前大會議，開會竟有十二次之多。開會的地點，據畢嘉和聶仲遷的記載，是在御殿底大廳中的 (im Grossen Saal des Palastes)，這所謂大廳，當然是指朝中的朝拜大殿說的了 (Ardians-halle)。這十二次威嚴的會議，是分佈在三月至五月之間的，而每次會議均皆經過四五小時之久。類似的情形是人們還從不曾經過的。在墊高的，鋪有氈毯的坐位上，各按照品級之高低，絲毫不錯亂地，依次列坐於殿中者爲二十位王公，十四位閣老，十二位尙書，八位最高將帥和七十二位其他之官員。據聶仲遷之記載，參與這御前大會人員之總數，竟有二百名。這可謂會萃漢人與滿人之英俊於一堂，而予歐洲之科學及其代表者湯若望以裁判了。

湯若望和南懷仁二人帶着鎖鍊，被帶至大殿中，跪於王公之對面。告發者楊光先，跪於大殿之左面。禮部之一位尙書走出行列，跪於殿之中央，宣讀禮部審訊西洋天算時之記錄一篇。這篇記錄

宣讀後，便有許多的發問繼之而起。南懷仁擡起精神來，努力着用帶來的儀器底資助，要把這一些實在所知絕少的裁判人員們，引入歐洲科學之神秘中。湯若望因言講費力過甚，竟致多次疲憊得臥地不起。可是當場的人們並不向他垂憐，或至少是不願意把他們的同情心表示出來的。會議之首席不多時便離坐而去，既而他的代表亦離去。他們是不要過問，這一幕可笑的悲劇的。爲證明歐洲天算之優越，南懷仁提議，藉春分之時刻，可做一次天象之觀測，但是人們並不贊成他這提議。南懷仁又呈遞一冊，兩年前所寫關於歐洲天算之著作。這本著作是他曾在先一日夜間，令七位書記一夜的工夫，繕譯成滿洲文字的。然而他們一切的努力，俱皆白費。因爲由至高權威的地方，曾有命令發下，須要貶棄歐洲之天算。在開第十次會議表決時，有那許多對於西洋天算懷有好感的人們之中，僅止有兩位尙書，就是刑部之一位尙書與工部之一位尙書，纔敢出來反駁要打擊西洋天算的那一批子人們底言論。然而這竟是少數的意見，在大會中不能發生效力的，因此歐洲底天算便被判爲無價值，而應予以革除。輔政大臣登時便依議批准了這判決（三六）。

當禮部及御前會議正在審訊該案之時，關於那七位因皇子殯葬選擇時刻錯誤事件而被控

告的官吏底附帶案件，亦仍在進行，而決未中止，可是這一附帶案件之進行，引起惡劣之結果，最後竟致使一切其他之審訊，悉行退入後幕去了。這樣，湯若望因為是這七位官吏底長官，南懷仁以他的代言者之身分，在許多的日期裏，竟被來回向三處不同之法庭拖帶。

人們現在竟致到了把關於這一件事體之一切過失，由唯一負責之從前禮部尚書底身上，推到湯若望和他的屬員們底身上來的地步了。審判的人員們竟謂他們負有兩位后妃，一位皇子和皇帝死亡之責任。他們又謂當他們在選擇殯葬之時刻與地點時，係用了一本明朝的書籍；而更謂湯若望底目的，顯然是要毀滅滿清的（三七）。因此七位官吏連同他們的子孫們，俱被投入牢獄之中。三月二十五日連湯若望底住所亦被封鎖，而加貼封條，這樣他便不能由他的住所中，獲得飲食之供給了。這是湯若望真正的苦難時期了。這時只是這苦難二字，纔能向這位身染重病，而被窮迫追害的如一位野獸一般的老人，發出了安慰的能力，因為苦難二字是使他能想起，這是追步救世主耶穌底後塵的。恰在這個時期由隣省解送北京傳教士之第一批，共六人，到達北京（三八）。關於他們的審訊，也是登時便開始了的。這種情形竟使全北京的人們興奮了起來。當在有一天這六位

被解送至北京傳教士中之一位，就是多明我會士可羅納多（P. Coronado）在大街上遭到湯若望與南懷仁帶着鎖鍊赴法堂時，他竟跪倒地下，吻親他們的鎖鍊（三九）。

南懷仁爲湯若望底辯護並不困難。因爲湯若望在欽天監中，從不過問吉利時日時刻之選擇，他所從事的僅只是科學的天算工作。連上述之七位官吏亦並不能負責。而真正應行負責犯罪之人，是大家都已明知的。然而湯若望和他的這七位屬員，竟被判處死刑。同樣的運命，亦幾乎臨到了南懷仁底頭上，雖然他是於這位皇子薨逝後兩年纔到北京的人。人們現在竟這樣深的陷入仇視基督教的空氣之中，竟致無理由無罪名，亦要判以至高之刑罰了（四〇）。

這樣，這場訟獄於一六六五年四月中旬，在禮部便到了一個終結全案的判決上。先前已判定的死刑，現在更愈加加重，而判湯若望以斬首之刑，以代先前所判決的絞刑。對於其他七位官吏之判決，亦是與湯若望相同的。現在澈底惡化的輔政大臣們，對於部擬這斬刑，尙認爲過輕，而更予以特別加重。連肢解分屍的刑罰，他們都還認爲不足。他們決斷，湯若望等應受中國刑罰上所有之最殘暴刑罰，就是受凌遲（四一）的處置。照這樣看起來，湯若望和他的七位屬員，竟不得不身受至

可怕的死亡的方式，因為一種他們完全不負責任的錯誤。這是各輔政大臣與各審判的官員們俱皆明知明曉的，所以這真可謂喪盡天良的一個大冤獄了。但是人民一方面，對於這冤獄之底細黑幕，當然是不能得知的。他們僅能聞知西洋人湯若望和他的七位屬員，俱犯有大逆不道的罪名，所以現在便要得應得的刑罰了。這樣，政府方面總算是找到了湯若望底罪惡，而藉可保存政府底面子了。七位屬員之父，祖，子孫與兄弟們，俱被判處斬刑，而他們的妻女以及兒媳，俱被沒入奴籍。

此外還有六位其他中國人，其中亦有湯若望的那一位僕人，亦被判處死刑。至於說他們終久算是犯了什麼罪名，這是無人得知的。控訴院以公文的形式是認了死刑之判決。關於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等神甫，以及由各省已經到達北京和即將到達北京之各傳教士之判決，則為杖百拘禁與流充（四二）。各輔政大臣竟還特行決斷，令御前會議批准這些判決，而預為將來脫却責任之地步。他們還更將這判詞並他們這輔政會議席上之判決，奏呈冲齡之皇帝。

這時冤獄已成，已到山窮水盡無可如何的地步了，然而竟又會陡然一轉，確切為任何一人之所不會預料。因為在四月十三日，天空便已出現一顆彗星，向全北京的人民威嚇示警。到四月十六

日上天竟是向北京的官民，做了一個十分明顯的表示了。這一日是北京的一個大恐怖之日。這日早晨十一時，就是人們正當把判處湯若望死刑之文件，向皇帝與太皇太后遞呈時，北京便起了一陣地動，搖撼宮殿與全城之建築。由地內隆隆發出雷鳴之聲。城內房屋之倒塌者不計其數。甚至城牆亦有百處之塌陷。連湯若望牢獄之牆壁，亦皆倒塌。城內多處地面裂成隙口，東堂房頂之十字，亦被震落於地。同時陡起勁風一陣，吹掃城市。地上吹起之灰塵，遮天蔽日，使北京頓成黑暗世界。人們俱由屋內竄至街上，看守傳教士們之獄卒，亦皆驚竄逃亡。而宮殿中之紛亂則為最烈，皇上及太皇太后，所有宮中之婦女，宦豎太監，以及其他之大人物，俱皆逃至屋外，露宿於帳篷之中。這一次地動之後，同日還又繼續發生三次，在以下的三日中，每日皆發生一次。

這次地震以及其主要附帶現象之事實，是決不能懷疑的。當時過多的人們會親身經歷了這地震，並且皆做有關於這地震的報告（四三），不過他們自然也免不了把許多離奇難信的事件置入他們的報告中的。為這次地震還有可作有力證據的，是人們現在在中國官府地震記錄表中能找得到，因為這是當時的官府也會予以記錄的（四四）。按照當時一切人們，無論基督教徒與非基

督教徒之確信，這顯然是上天底一種示罰示警了。一切參與上述冤獄的人們，心內都明白，爲什麼上天這樣的憤怒與示罰。對於上天是人們不可開玩笑的。政府這喪盡天良的冤枉判決，破壞了宇宙之大秩序，所以他們現在便不得不悔過，以挽回天心，恢復大自然之和諧了。

因而我們現在便瞧見，湯若望底對頭們向後的退步，以便挽回天心；但是他們的後退，却是遲緩的與小心的，生怕退讓得過多了；因爲輔政大臣與崇高之裁判法院，是不可以在國人之前喪失了他們的顏面的。

及至到了大地動後之次日，湯若望和七位被判處死刑的欽天監官吏，已經被傳至朝拜大殿。但是人們在那裏枉然地等候了御前大審人員之蒞臨。這一班子先生們，在地震天罰上，所受的打擊似乎是仍尙未足，他們的精神沮喪粉碎底程度的未到頂，而不能澈底俯首貼耳地潛服（四五）。

四月十九日一道以皇帝名義的上諭，宣佈對於全國犯人予以普通赦免，只除罪情重大者不在赦免之例。這樣在大赦之次日，利類思，安文思，和南懷仁神甫，以及許保祿，俱被赦免出獄。湯若望之刑罰被減等，降爲一較輕之處決罪名。這時人們仍還未做赦免他的思想的。反之，人們在這地動

的時日之內，還想要嘗試着，由各省解入北京的傳教士底口中，探出他是否爲他們的首領，他不是把他們招至中國來的。連對於這一些傳教士們，人們也只是予以外面赦免之虛名。實際上人們又有些時把他們置入一個還要惡劣的獄穴之中，同中國底匪類無賴監禁一處，後經三位被釋放的傳教士們的運動，纔又把他們改禁在一略佳之室間內（四六）。

到了四月二十三日湯若望命運上第一步決定的轉變方得實現。在這一日湯若望和七位欽天監官吏，均仍被鎖繫，解至大殿之中。因爲這一日爲御前大審開第十一次全會之日。南懷仁，他現在是一位自由的人了，跟隨湯若望到大殿之上，以便充當他的代言者。他要當着大衆宣讀一篇爲歐洲天算辯護的文件，但却被阻止，而未能得宣讀。在這一時機裏，大殿上有一位親王，用手向南懷仁指着大聲說：「真是一位勇敢的好朋友」（四七）！其實南懷仁在末後這數月中，爲他的窮困無告的師父，這樣忠心救護，真是堪當各法堂上與老百姓之驚歎佩服的。在這一日，這御前大審，除錄取口供外，並無其他的舉動。這時御前大審，却已暗中決斷，赦免湯若望之死刑，但是他們外面，仍毫不透露神色，大概是他們怕這樣的一種舉動是有傷他們的顏面的了。因此他們就更令刑部準

備進行的步驟。刑部特為湯若望之罪名做一解釋，宣稱湯若望對於皇子殯葬時刻地點之事件，並未與聞，所以情有可原，死罪亦應赦免。已判罪之七位欽天監官吏中，兩位已予以赦免，下餘五位却不在赦免之例，仍應執行死刑。可是這五位執行死刑之欽天監官吏，俱係基督教徒，而邀赦免的二位，則非基督教徒。這樣人們相信，為緩和天意挽回天心，所做的事情已竟足够了。可是一道與刑部這一種解釋以法律力量的諭旨，却並未發下（四八）。

因此上天就不得不繼續予以示警了。四月二十九日（四九）御殿城中，皇上及太皇太后所居住之部分中發生火災，焚燬房屋四十餘間。這已經够了。次日赦免湯若望與那兩位非基督教徒。欽天監官吏之死刑的諭旨即已發下，湯若望因其年齡高邁，因其為國家之天算官吏，為國家做有許多工作，並因其並未參與皇子殯葬時刻選擇之事件，其他二位官吏，則因其對於天算之功績。但是湯若望等暫時仍皆處於獄中，因對於由各省解來北京之傳教士等之審訊尚在進行中，而尚未會得有結果（五〇）。

最後於五月十五日在第十二次，即末後一次之御前大審中，方得決斷，釋放湯若望和他的僕

役潘盡孝，以及二位亦邀赦免之官吏出獄，恢復自由。二日後，輔政大臣下令執行這決議。五位奉教之欽天監官吏，亦蒙赦免凌遲之罪名，而恩賜判處斬首，他們的子孫們各杖四十，終身流戍滿洲。爲他們這罪名的理由的，是因爲他們五人，在關於皇子殯葬事件之審訊時，言詞吞吐遲緩，且前後矛盾錯亂，必係犯罪心虛之表露。次日，即五月十八日，他們五人俱被斬首。他們死時是很勇敢的，因爲他們明白，他們之被判決，是受仇教的影響的（五一）。

在這五人處斬之日，湯若望纔得出獄。但是五日之後，即五月二十三日聖神降臨節之前晚，官府方將封禁之寓所啓封，身染重病的老人湯若望，方得返至舍中。教友與非教友俱成羣結隊奔來，向他致賀慰問（五一）。

可是到了這時凌辱與爲難之事件，仍還長久地未能到底。楊光先和他在輔政大臣與禮部中，志同道合，一鼻孔出氣的黨徒們，仍是前後一致地仇恨的。

聖神降臨節之第二日，禮部這二位尙書即已狂怒着奔入湯若望之教堂中，撕毀聖像，甚至連湯若望住室中牆上所掛順治皇帝會屢次行禮崇拜之基督聖像也都被他們扯下。六月六日與八

日官府底人們，又到湯若望底教堂中，將教堂內部與前院之一切褒揚崇敬之言詞，俱皆去掉，這大概是他們奉輔政大臣底命令而做的了。他們竟將那一塊書有順治皇帝所賜與的「通玄教師」之銜號之大理石板，用錘擊碎，而使人將那些粉碎的石塊，給湯若望送去，這舉動是要做爲一種未之前聞的侮辱的。楊光先在他那仇恨之中，仍繼續向下做他那狂暴的舉動。他又向部中從新呈遞了八張攻訐歐洲天算的狀文。湯若望與南懷仁因此就不得不在禮部，又從新過了三堂，在過堂時，他們自然仍須下跪着的。南懷仁如同一位賢孝的兒子一般，爲他的災病纏身的師父，照管一切，並且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處在他的身旁的（五三）。

一六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湯若望之住宅竟爲一幕令人深刻感動的行動的證見。因爲在這一日，湯若望在他的傳教同人之前，公然承認他的錯誤過失，而請求他們的寬赦。我們會獲有他所口授，而經南懷仁所記錄了下來，並且還經這位病人癱瘓的一隻手，親自簽名的悔過書（*Schuld-bekentnis*）。這一篇悔過書，我們由其內容上推測，可以假定是湯若望令人當着會聚一起的各位教士們，大聲宣讀，或親自用他那啞啞蹇蹇的聲音，努力着讀到了底的。這篇悔過書的原文如下：

諸位尊崇的基督司鐸們！不得我今日仍照樣能穿着和持着我數月之前，爲天主信仰之故，欣然走至外教裁判官之前時所穿的那外面的服裝和所持的那態度，走至諸位跟前，並且如同那時頸項上帶着鎖鍊，伏首至地，罪犯一般鐵鎖啣嘴，恭順謙卑哀怨着舉起手來一樣，我現在向大家表示我的靈魂裏的痛悔與痛恨。可是這因我的病症是不能做得到的，所以我就照着我這可能的情形，來至諸位大會之前，這會是我視爲全耶穌會的一個象徵的，我的目的並不是要爲我自己辯護，如同我數月前在外教之法庭上所作的一書，乃是要由我的悔恨的幽衷裏，對於我自己做一種真實的證據的。我今天把我自己置於大會與大會中每人之前，在這裏向大家明明白白地承認，我在過去的年數裏，在許多的事件中，都是立了一個惡劣的榜樣，和惹起了衆人的厭惡的。尤其是對於我的上司們，他們的注意與勸告，我不會常常遵從了，並且他們的權威，使我不不少的次數以口頭的言語，與筆端的詞句所傷犯了。我尤其要自強自効的，是因爲我對於我的僕人，過於縱容寬待了，他是差不多爲一切的人們，尤其是爲同在寓

所中，同在城內，所居住的耶穌會友們之所特別厭惡，並且爲他的蠻橫無恥，是我應負有大部分的責任的。我覺悟，我違犯甘受貧困的誓願，曾浪費了許多事物於無用之地，我覺悟，過繼我的僕人底男孩爲我的孫子，是犯了一種不智的與醜惡的過失的。我覺悟，我用語言與文字曾傷犯了如兄如弟的情分的，尤其是對於城內的傳教的同人們。再者，我還承認爲我的過錯的，因我寓所內所用的人們的貪婪，竟使會友們得不到他們所需要的種種事物。

在這一切和許多其他的事件中，我招認我的過失，並且我現在痛恨懺悔着捶擊我的胸脯，揚灰塵於我的蒼白的頭上，並且伏首至地；我永久和永久地一再重複着說，只要我的痺癱結塞的舌頭能說得出來，我總要承認，因我的罪過，因我的罪過，因我的重大的罪過，纔給教會招來一場這樣大的，使大家吃苦的迫害。諸位尊嚴的司鐸們！你們大家今天都可以親眼瞧見，我被重大的災病所打擊，手足癱瘓，倒臥牀上，不能起來，這樣我請求大家要確切相信，我是真心真意，如同新近我在法堂上不得不接受他們那裁判一般，我現在也是真願手足鎖繫，跪倒於神聖服從的脚下，以一位罪人的身分，滿心痛恨懺悔着接受諸位對我的裁判。

最後我還請求大家，不要嫌我這悔過的舉動舉行得過晚了，並且不要猜疑，我這悔過的舉動是被我的災難逼迫，而不得不然的。大家尤其應當注意，我這悔過的舉動並非完全出於我自己底志願的，簡直更可以說是經慈悲的天主之所主動的，他是要藉這個舉動，在這個地方，在這個時刻裏，和在這個狀況中，一如他的先見和他的慈悲之所規定了的，溫柔地觸着與激烈地感動大家底心腸的。在這個時刻裏和在這個地方上，天主底聖手不僅打着了我的肉體，亦且是觸着了我的靈魂，他的那隻慈父的手，仁愛的手，悲憫的手。完全如同天主底悲憫，一直到今日這樣寬大地容忍我這一個子孫於耶穌會中，這樣我也要仰望他的這悲憫，因諸位底禱告與神工，也要令我忍耐到底，並且保護我於寵愛之中。謹此敬請公斷公鑒。

時一六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於北京

湯若望敬謹具書（五四）

湯若望經過這樣多為宗教的原因所受的苦痛，並且經過這一次完全表現了一副高尚偉大

的性靈的悔過舉動之後，他可以安然地等待死期之降臨了。但是他仍還受了一年多的罪，纔得逝世的。

當在一六六五年之春季與夏季，對於由各省解來北京之傳教士們之訟獄仍在進行中，關於他們和關於其他北京之傳教士們，我們僅能做一簡略之敘述於下。

在獄中身染重病之方濟各會士可羅納多被釋放出獄，於五月一日送入東堂，在這裏他爲耶穌會士們之所看護與服侍，直至五月九日他逝世爲止。六月二日舉行殯葬儀式。殯葬神事終結之後，一大羣送殯的人們，以傳教士栗安當爲主祭之司鐸，居首領率全部人員，穿越城市步行赴耶穌會士墓地。可是宗教之儀仗，這時是經官方之所禁止，而並未得使用的。所有居住北京之一切教士，其中亦有湯若望和一大些教友們，俱都蒞臨於墓穴之前，向死者致最後之敬禮（五五）。

其餘由各省解至北京第一批教士中之五位教士，不得不繼續着經過多次的堂訊。但是在地震的印象之下，他們外面的情況，却是好的多了。五月二十一日他們獲得諭令，與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與南懷仁，共同居住於東堂之內，在這裏他們經中國國庫給以繕食之費，但是爲數寥寥有限，

而耶穌會士們便不得不以私人底款項添補了（五六）。後來由各省繼續解到北京來的教士們，也都是被安置到這裏來的。由廣東解往北京之最末後一批教士們，到達北京之日爲七月二十九日（五七）。連對這一些俘犯們，官府方面的宗旨，也是不要過嚴對待的，免得又使上天怒，但是亦並不要過於寬厚，以便在國人前不致丟失政府顏面。這樣，禮部於九月七日便判決，一切傳教士連帶湯若望，利類思，安文思與南懷仁，一律驅逐出京，發往廣東。三日之後，這判決便被朝廷批准，而略予減輕，即仍准舊日居留北京之四位傳教士照舊居留北京。但是朝廷同時又命令禮部派一監視該教士等之官員，以便他們這「可鄙棄的邪教」不致再蔓延。二十五位俘犯，即二十一位耶穌會士，三位多明我會士，和一位方濟各會士栗安當，同於九月十三日起程南下，而於一六六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行抵廣東。沿路上無論教徒與非教徒，俱皆向他們表示許多同情（五八）。

我們現在可以返回繼續再敘述湯若望底狀況了。上述各位教士以及其他居留北京之教士們，俱皆常常看望他，以便向他施以安慰。各位教士發往廣東後，他就愈覺冷清寂寞了。但是楊光先並沒有把他忘掉。當在發往廣東的教士們出京之日，他已經就又準備新舉動了。他本來是於略前

的時日，被任命爲欽天監監正的。以欽天監監正之資格，他也要居住於湯若望館舍之中。可是既而他竟爲他自己和爲他的滿籍同寅，要求佔據全部館所了。病入膏肓的湯若望神甫不得不退讓。十一月九日政府向湯若望下令遷出館所。公文上令湯若望於一日之內，檢點齊備，以便遷移。一六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湯若望隨即遷出西堂。楊光先帶領着他的那位滿籍同寅，於同一之時刻大笑着遷入西堂居住。在他壽誕之日，他竟令人們把他的影像，懸掛於教堂內祭壇之上，以供衆人禮敬（五九）。居留北京之四位傳教士，這時乃共同居住於東堂之內。但是他們做禱告的聖堂，已被劫奪一空，況且堂門還是經官府封鎖了的。

可是在陷害者方面意尙有所不足。十一月二十四日，他竟要求政府，把居住於北京之四位教士，放逐至韃靼地域，或予以嚴重之封鎖，不令他們與外界自由往來活動。可是漸次這位黑暗凶狠的人物，竟致也使各位輔政大臣們，覺得他過於囉嗦討厭了。他們禁止他獨自再上呈文，但經他滿籍同寅底同意的，則不在禁例（六〇）。

雖然如此，一六六六年他還又連續上了三張狀文。舊日控告之言詞，他又重新提起。他說，湯若

望要剷除冲齡的皇帝和滅毀皇族，以資洩恨報復。他又說，湯若望曾使先皇帝，一位皇子和兩位后妃喪失了性命，所以朝廷決不可放過他去的。在他的第三張狀文中，他控告湯若望爲一種魔鬼宗教之宣傳者。爲了這個緣故，湯若望仍不得不又有三次出現於法堂之上。他到法堂上去的時候，是人們用一張床把他抬了去的。兩位傳教士跟隨他到法堂上，南懷仁竟有所知並且還會報告了出來。當在湯若望去世之日，楊光先還會向政府遞有一張狀文，要求政府向將死者處以極刑。

在這末後之數月中，湯若望底病痛愈趨惡化。有時他竟因劇烈之苦痛，失去知覺，或以手足亂抓亂打。在他這一種不安定，與因呼吸困難，所激起之急悶情況中，他竟令人們把他穿越屋室，抬至街上。直至一六六六年八月九日他總還能振奮起立。但是自這一日起，他却一時一刻都不能起床了。因此他便做臨終神事，而獲得最末後之塗油禮。從這時起，他便不能把那爲呼吸困難的病源的黏痰吐了出來，並且亦並不能更進飲食（六一）。

一六六六年八月十五日爲湯若望斷氣絕命之日，是日正爲聖母瑪利亞升天節。他絕命的時刻爲下午四時，在他耶穌會會友和堂內共同居住的人們底禱告聲音之下，湯若望吐出了他最末

後一口呼吸，而魂靈離體。八月二十九日，即聖・約翰村洗者（Johannes der Tauffer）被害之祭日，湯若望之遺體被昇至墓穴安葬。教友之送殯者有五百人以上（六二）。

第十四章 後世毀譽中之湯若望

湯若望之人格，以及他爲公家所担任之工作，當他在世之日，卽爲猛烈攻議之點，已有多數年。他這情形是和其他地位崇高，而性格特異之偉大人物們一樣的。但是當時最熟習他的底細，而胸無成見的評論者，都時時爲他辯護，而承認他的偉大的功績。就連那一些在一六四八至一六五二數年間，錯疑了他的人們，到了後來都改口稱讚他，而竟要更正他們以前的評論了。

可是關於湯若望人格聲望之爭論，一直到他死後，仍未曾完全熄滅。

關於他和整個中國傳教會所受陷害之原因，在教會方面首先所表現的意見，並不完全一致。在這一點上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應爲這次陷害爆發負責的緣由，是不是湯若望激烈的性質，和他激起其他天文家嫉妬的崇高位置有以致之。

當在教會的患難極烈之時期，並無一人會說出這樣的話。當時教中三大修會之會士，卽耶

蘇會士，多明我會士與方濟各會士，都共患其難，並且都明白，他們的患難是爲了他們的信仰的原因。人們試一回憶上文所敘述，多明我會士可羅納多，怎樣公然在大街上，跪地吻親湯若望之鎖鍊的情形，便可知他們當時之間的心情了。多明我各位會士和該會的閔明我神甫 (P. Navarrete)，無不稱讚耶穌會士底友善與博愛之德，並無一人把這次迫害的緣由，推到他們的身上，連絲毫這樣歸罪耶穌會士的話，他們不會說過。可羅納多神甫之死，在當時教會內一切人們底心目中，都視爲一種殉教的死亡，都視爲仇教的一種犧牲。(一) 閔明我神甫於一六六五年九月四日由北京寄給羅瑪耶穌會總會長的一封信件，是爲人們之所知曉的。在這封信件裏，他借聖經內的一篇讚聖歌 (Psalm) 把耶穌會之會士，比做栽植於水畔上之樹木，用盛大熱烈的言詞稱讚他們，並且足夠明顯地斷定，這次教難的原因，是起於仇教的醞釀。他信內曾說：「先生雀躍歡欣吧，並且您屬下過於幸福的修會，亦應當同您一起雀躍歡欣……您是有原因去向天主感謝的，因爲他把這樣的會士們給了您，並且爲您選擇了這些爲他，爲他的聖子的名，而忍受了他們財產底喪失，鐵窗底風味，凌辱難堪與判處死刑的罪名的會士們」(1)。

但是此後不久，我們便得聞悉，居住中國和其他東方各國內之數位傳教士，怎樣把這次迫害的主要原因，推到了湯若望底身上。他們以為他在他那欽天監監正底位置上，和因他那自尊自大的心性，便招惹了許多仇視他和教會的人們。而他那位蠻橫無理的僕人，更增加上了他那一份蠻橫無理的行動，所以就更使仇教的人們的仇視愈加熾熱了。因此仇視方面的人物們，於其後便在楊光先底統率之下，勾結連合了起來，以便推倒這位討人厭的異國人氏。而在他們所視為一個最好的攻擊之點的，便是基督教的學說。這樣便到了對於基督教進擊與普通迫害的地步。

多明我會士維托理約·利奇 (Vittorio Ricci O. P.) 在於一六六六年一月一日寄呈耶穌會總會長保爾·歐里瓦 (Paul Olive) 的一封信件裏，已經就這樣或類似的批評起來 (iii)。出身巴黎學院 (Paris Seminar) 的傳教士以·得·布爾介神甫 (P. J. de Bourges) 於一六六八年八月十五日由東印度瑪蘇利帕塔木城 (Masulipatam) 向羅馬信仰宣傳部 (Propaganda) 所寫的一封信中，亦是宣稱，僅中國方面對於湯若望之嫉妬與猜疑，並非對於教會之仇恨，為這次教案之起因 (iv)。閱明我在較後之年期裏，亦是代表這同樣見解的。他甚至還硬謂他會由

耶穌會士何大化神甫 (P. de Gouvea) 之口內聽說：利瑪竇藉數學把基督教輸入了中國，可是湯若望却又藉數學把基督教驅逐出了中國。(五)並且還有一位傳教士竟依據宗徒保祿 (Paulus) 底言詞，而造作了一句話說：在亞當這個名字底頂戴之下，所有頂戴者俱都犯有罪過。(六)

至於說猜疑心與麵包問題所生之嫉妬以及湯若望劇烈之性質，和他那位僕人的無恥，爲這次陷害控告的附帶原因，這確切是不能不承認的。但是全部訟獄之歷程，却明明白白表示給我們，爲這訟獄底主要被告的，是基督教，並非湯若望。在這訟獄上，是把基督教說成了與國家有危險，而將其學說說成了虛僞與有害。他們的控告是由基督教的著作中，就是由利類思與安文思所寫論基督教之來源與傳佈的駁辯文章中，摘取了理由出來的，並且要求立時把一切曾參與這本著作之撰述與散佈的人們，一律逮捕了起來，送法庭究辦。這控告固然也是特別朝着湯若望來的，但並不是攻擊他爲欽天監正之性質的，乃是誣陷他爲經他弄至國內的一黨子對國家有危險的人物們的領袖的，是誣陷他爲一種有害的學說底主要宣傳者，並且是誣陷他爲那本惹人厭惡的駁斥著作底精神方面的主使者的。

至於說中國方面對於基督教，遲早必要起反動，這是人們可以預先瞧出的。因為這時基督教已經發展成了國內的一種權威了。歷史中時時處處基督教都會受了迫害，如果他的影響一令人們覺出了健旺，和一位仇視基督教的人們立在了反基督教人們底頂頭上時，處處時時都是把對國家有危險和學說可鄙棄的同樣罪名提了出來的。當時在中國攝政時期之下，是有一種特別順利時機的，因為當時暗中有了一位操縱指導的人物。維托理約·利奇給他的會長所寫的一封信裏，曾說着了這件事體底核心，他說：外教徒與回教徒久已就嘗試要毀滅基督教的。可是湯若望在朝中的影響令他們不能得逞。這時恰巧便發生了攝政局勢。所以基督教底對頭們便利用楊光先把他推到了表面上來，以與基督教為難（七）。

可是當人們瞧着，藉對於基督教之攻訐仍不能達到目的時，於是人們又轉而攻擊歐洲之科學，甚至最後竟獨獨拈出一件事故來，即皇子殯葬時刻地點之選擇事項，這本來是與湯若望無關的，然而竟硬弄到他的頭上來，使他負責，為的是在這一條屈枉的道路上，可以能得打擊着基督教及其首要代表者。他們的論證非常薄弱不堪。但是因為只有少數的人們知道事件底內幕，所以人

們簡直大大胆宣佈湯若望底罪名，而悍然予以判決。一直到全案之終結，俱都顯然可以省出，人們底意思是要打擊基督教。因為案內所有非基督教徒，最後個個皆落於案外，而得赦免。政府方面後來關於湯若望榮譽昭雪之舉動，仍可以清晰地向我們證明一次，這案中從始到底之所攻擊的主要目標全在基督教團體。

照這樣看起來，湯若望為這次教案的主因，是完全在因他的威望與影響使基督教在國內成爲一種權威的意義之下的。這確是不會有人要算做湯若望底罪過了。當時的中國傳教士們，從人類底先見方面說，都是以爲順治皇帝尚在幼年，壽命必長，所以並未急急更從事於基督教進一步之鞏固，以便遇到反動，易於克制，可是萬沒想到，順治皇帝竟這樣早崩，所以大案一起，便無法收拾了。然而當湯若望望權勢正盛，爲中國全國基督教徒之干城時，並沒有一人出來，因他那崇高與影響巨大之位置，而向他做責難的。

除去像這樣少數不順利的論調之外，各位教士對於這次教難底主因，都同聲一致視爲出於仇教的心理。並且在繼續的時間裏，大家對於湯若望人格與性格之純潔的意見，也竟趨於一致了。

譬如南懷仁神甫，他認識他的師父湯若望，是較比任何人都爲詳盡的。他知道，當初人們對於湯若望所提起種種非難告發，俱皆是些誣罔不實的言詞，他這句話可謂拈出了當時這種情形底真正名稱。在他的那一篇上文已經屢次提及的追悼湯若望的哀文中，他曾把他對於湯若望底性格與人格的印象歸納於下列字句之中：「全仁全愛的上帝令他在這座葡萄園中困苦艱難地做工了四十年之後，便把他一切的，凡屬一個人於這一生裏所珍貴視之的事物都又給他劫奪了去，並且更又給他發下了這樣多的苦痛艱難，足可見天主要玉成他的至意了，也實在是天主慈父的先見和對於死者底選拔上的一個十分特殊的信號的。」並且對於這次教難，他曾寫：「基督主子要以他救世所受的苦難，報答湯若望底虔敬。這樣，他便令他受到告發的處置，純粹因爲他曾在一本書內解釋了受苦難的基督之神秘，並因他更把這本書呈獻給了順治皇帝。而陷害湯若望的人們便由這本書中搜集了陷害他的要點」(八)。

又譬如利類思與安文思等二位神甫們在後來關於昭雪湯若望底光榮的事件與政府的交涉上竟會奮力贊助。由這一點我們便可推斷，他們二人現在也已確知湯若望是一位貞潔純正的

人物了。

又譬如深爲一般人們之所敬重，而亦爲多明我會之所非常珍視的潘國光神甫，于一六六八年十月十三日寫信給耶穌會總會長歐理瓦說：「一六六六年八月十五日湯若望進入天國無若痛之優美生命裏去了。在科學中他是超羣出衆的，在聰明、虔敬，以及勤於神事之心力上，他是特別優異的。他是遐邇揚名的，因他在中國與薩皇帝之下的體面位置。並且他是至堪令人驚奇歎服的，因他在這樣多苦痛之中的毅然忍受，英勇堅強，而始終並無難熬難耐之表示。我會聽見一位在同一獄室內監禁的外教人說，他曾問過湯若望被監禁的原因。據他說湯若望曾答復他說：『這我不知道，然而或許是天主令我藉此做補贖的，因爲我因其他事故底繁忙，竟致耽誤了許多禱告的原因』」(九)。

十日之後，潘國光又向他的耶穌會總會長上書，嚴斥那些要把這次教案底責任，推到湯若望身上的酷評苛求的人們，他說：如果有向鈞座報告湯若望神甫之數學是這次教案之起因的，那鈞座即可確切相信，該報告參劾者之言詞決非誠實不虛，亦決非得事之真像者(一〇)。

又譬如畢嘉在他爲湯若望身後所寫的追悼文中，僅只責難他對於他的僕人的寬縱，然而對一切其他情形，即對於湯若望的爲人，爲會士，爲傳教士，至誠地歎服（二）。

同樣，聶仲遷在他所寫追悼湯若望的文中，結尾的言詞便是：「最大的，我們能贈與他的頌揚，是我們說，他被天主認爲有資格，認爲堪當受監獄鎖鍊之苦，受污辱與誣釀之堆集，而最後竟爲耶穌基督之名義被判處死刑」（一一）。

又譬如恩理格（Herdrich），則稱讚湯若望之智謀，對於宗教之虔誠熱心，以及其學識之優異，他在這教案陷害上，所見到的是天主底一種寵惠，這寵惠是先見的天主玉成了一切奉侍天主最偉大的神僕們底偉大的（一三）。

最後譬如魯日滿，則謂：「凡屬湯若望身上所沾染着的塵土與錯誤，他都因他那纏綿久長的重大病痛，得以補贖抵償。但是已經洗刷了他這污染的，是他對於救濟同人靈魂之熱心與勤奮。在這熱心與勤奮裏，他時時刻刻都在準備等候，到一位最貧窮的人家裏去，爲一位瀕死者做神事，予他以最後的宗教之助，即便在同日是有王公大臣，或甚至皇帝會來拜訪了他。再就是他對於基

督的熱愛，亦是有洗刷他性靈的能力的。在這一種熱愛之下，他都是時時這樣與奮火烈，或甚至往往流着眼淚，宣講了「基督底聖道的」(一四)。

對於這同樣的見解，中國政府方面馬上也要充分和完全承認的。本來中國政府方面從不會懷疑過湯若望操行之純潔的。所以朝廷對於湯若望榮譽之恢復，以及其奇冤之昭雪，俱是按照上述三件控告，而一一澈底予以昭雪的。尤其第一與第二控案，即陰謀不軌，與一種有危害性宗教之宣傳之控案，被認為毫無理由之誣告陷害，而予以根本之平反。這樣，同時基督教所受之侮辱污點亦俱被揭除，況且這還是明明白白見之公文的。

即在當時之輔政大臣們，因受上天震怒，暴風地動，火災之警嚇，已經以釋放湯若望與減輕其他傳教士之刑罰，實際上亦算承認湯若望之潔白無罪，並且這樣也算撤消了對於基督教於國家有害有危險之攻訐。然而一切傳教士却仍還被判決，不許做傳教之活動。輔政大臣們到這個地步，是不肯再退讓了，深恐退讓過分，而在國人之前有失顏面。所以教會之對頭楊光先，便仍得安富尊榮地處於職位之上，而盤踞於西堂之中，這西堂的聖堂自然是在封鎖幽閉的狀況裏了。他這時絕

對覺得高枕無憂。在湯若望去世之日，他在欽天監中宣稱：「這個不堪的老奴可死了。但是在北京還有三隻洋狗哩。我決定會毀滅他們的。」（一五）。一六六六年將近年底時，他竟要把西堂拆毀。各輔政大臣已經批准了他的這主見，但是執行的日期却被延宕，而最後竟致未得見之執行（二六）。可是楊光先底福星馬上也要沈落了。一位這樣淺薄不堪的皮毛天算家，怎樣可以能維持天算科學於他前人所已達到的高峯呢？這是他所絲毫都不能的！況且在東堂還有南懷仁神甫居住着，他時時刻刻都在從旁向他伺查，絲毫都不放他過去的。而在他們那一六六六年六月十七日食，七月二日日食之測算，人們已經就發現起巨大的錯誤來了（二七）。一六六七年輔政大臣獨斷獨行之權威竟被推倒。輔政大臣之一，即索尼，已適於此時去世。年齡已到十四的康熙皇帝遂於八月二十五日開始臨朝親政，裁奪國家一部分之事務。他向輔政大臣們追問種種事件。蘇克薩哈，就是那位仇視基督教的輔政大臣，因犯有貪贓及盜用國帑的實情，被判處凌遲死刑，但後又被降減為絞刑而棄市；他的全家已俱被處決，他的巨大財產悉籍沒入庫（二八）。其餘二位輔政大臣表面仍每日臨朝輔政，但是他們是已經沒有實權了。康熙，他這時已經表明他是一位聰明的政治家，可

是仍不得不謹慎小心走他自己的路子，而對於滿籍之親貴，不能不予以慎重顧慮。他因為他被選擇為大統之承繼者，是多虧了湯若望的，所以他也便不得不以師禮敬重湯若望，況且他對於他的皇祖母，即湯若望之義女，非常高視敬重，所以關於湯若望和教會事務順利進展上之一切先決條件竟已具備。

這樣，為使歐洲之科學重複光榮了起來，並且在這一方面為湯若望昭雪，却就是一件容易辦的事情了。一六六九年之歷書，楊光先這時恰巧已經製出。亞拉伯人吳明烜，他也是湯若望的一位凶狠仇人的，因為他在一次天算觀測的時機裏，曾被湯若望證明他的無知無識，並且還嘗試着要做的欺誑（一九），不得不來幫助了楊光先製定曆書。因為一六六八年十月間，楊光先也猝然間得了一種中風之症，竟致他不能復工作，他這個病症是同湯若望所遭受的那場病症一樣的。所以一般人們的見解，皆謂這是上天對楊光先的一種報應。南懷仁在他們所製定的曆書中，發現許多粗野的舛錯。譬如：在他們所製定的曆書上，竟記有兩次春分與兩次秋分，並且還把一年以後方能實現的閏月，也置入他們這一年的曆書之中了（二〇）。南懷仁關於這一點向皇帝奏報攻訐，可是兩

位輔政大臣竟把他這奏報隱匿不理。然而皇帝終究得以知悉他們這歷書上的錯誤，所以這樣他便抓着這個順利的機會，以便剷除楊光先，使歐洲天算又可到了光榮地步，並可藉以葬送二位輔政大臣之顏面，這自然是他心目中首先之所圖謀的了。

一六六八年聖誕節日，有四位高級朝臣捧皇帝諭旨一道，出現於西城耶穌會會址。諭旨是召集一切大天算家，於次日一早聚集殿中，開天算之大會議的。楊光先與吳明烜，以及其屬下之各天算家，均須應召赴會，參與會議。參與這次大會之各人員，秉承康熙之諭旨，為歷書問題應最後一致議決一確切無誤之推算方法。楊光先之滿籍同寅發言贊承西洋科學，反對他這話的人們，只有楊光先，吳明烜和一位漢籍閣老。開會之後，他們便覲見皇帝，奏明一切。南懷仁在御前提議，對於各派不同之方法，應舉行一次實地測驗，則其方法之可靠與否，自不難立即可見。為施行這一種測驗，應隨便立一長杆於日光之下，而令各天算家預測其正午所投於地上之影（二）。當時與會之各天算家為情勢所迫，俱不得不贊成這個提議。可是楊光先於這時對於基督教，更又胆敢在御前口出粗野不遜之言。如果康熙皇帝不為顧及二位輔政大臣起見，將他的憤怒壓制了下去，那麼他便被

以大不敬的罪名，當場推出斬首的。可是這次試驗竟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和繼續的兩日，爲南懷仁大見成效地得以舉行，而其他的一些天學家，便自然退避，不敢輕於嘗試，以便藏拙了。康熙皇帝現在向南懷仁要求，做關於次年已經散佈在全國之曆書的審查報告。在這曆書上，南懷仁之所刻出的粗野大錯，有五條。康熙皇帝，他現在因爲總還要敷衍二位輔政大臣底顏面，不得不掩遮自己的真意，所以特爲這曆書的問題，又招集一次御前大會議。這次御前大會議決斷，關於這些錯誤應舉行實地測驗，以資證明。這是在緊繼於其後的數星期之內，俱皆一一舉行證明了的。既而於一六六九年二月底，南懷仁卽已受命充任欽天監監正（三三）。康熙特降旨更正楊光先曆書上所錯推之閏月月份。這樣，楊光先之無能，竟被佈告於全國。而附帶着間接受到一種極巨大的挫折，深深感到無顏無趣的，便是那二位輔政大臣了。歐洲之科學與湯若望在天算方面之威望與地位，至此竟一舉而俱被昭雪恢復（三三）。

還在這同一的一年裏，湯若望以傳教士的身分所受之冤枉，亦繼之而被昭雪。由那從始至終堂訊的情形裏（二四），這時清清白白透露了出來：在全部訟獄上的主要宗旨，全在基督教之毀滅

了。

上面所敘述之事件過去之後，約有數星期，皇帝竟敢決斷，也把這末後二位攝政大臣推至一邊去。朝廷關於此舉所降的諭旨，宣稱鴛拜因仗持對於皇室之功勳，竟致專權欺上，姿意妄爲。在他的這傾跌顛覆之中，遏必隆亦被拖入，而遭受同樣之對待。皇帝還更下詔諭，凡受輔政大臣之冤枉者，現在俱可到官府反控鳴冤。

仍尙在北京居留之三位傳教士，登時便觸動關於湯若望與基督教昭雪之問題。可是他們的這個舉動，是他們親自在皇帝御前做了的，皇帝這時已經認識了他們。此外他們還因禮部素有仇教之名，所以竟邁越該管之禮部，而更逕向議政王公團體遞進奏疏一封。議政王公遂奉旨特行再審訊這一案件。

教會方面于康熙八年陰歷五月五日（即一六六九年六月三日）關於此事所遞進之奏疏內稱：傳教士三人爲皇帝受欺枉，並爲楊光先受庇護者（即暗指鴛拜而言）之偏袒，對於無過失者妄用國威之事件誠惶誠恐，敬謹陳訴於御座之前。我們懇求皇帝皇恩爲湯若望所受之冤枉昭

雪。新近御前所開之大朝會已議決恢復歐洲科學之榮譽。現在天主之教勢不能不仍懇求皇帝陛下施恩，亦予以昭雪。在西方對於天主教遵守奉行之王國與公爵國爲數約有三十餘。傳佈天主教於中國的是利瑪竇，時期是在萬歷年間。茲特撮述我們教中之律則於下：我們敬天愛人。我們克己克慾，遵守大自然之律則，我們尤其對於皇帝教忠教義，對於父母尊長教孝教敬，此外我們崇尚節儉與謙恭之德。先皇帝順治曾予以巨大之助力。他在我們聖堂之前院，敕建大理石紀念碑一座，並賜門額「通玄佳境」，而更賜湯若望以「通玄教師」之尊號。若係邪教，先皇帝怎還能予以這樣崇高之禮敬？況且湯若望和其他二十一位傳教士在這種情形之下，怎還能爲陰謀不軌之物？然而他們終被驅逐，他們的書籍均被焚燒，而他們的館舍終被封閉。爲此我們至恭順地懇求天恩，昭雪湯若望之冤枉（二五）。

議政王公之團體很表示好意地接受了這一封奏疏。第一位閣老，即康熙皇帝之一位叔父，並且也是教士們的一位良友，在御前宣讀了這一封奏疏。皇帝這時雖然亦同情於教會方面，然而爲遵守國法底行程起見，仍把這封奏疏批交禮部議處。這一來，教士們底驚恐自然可想而知了。然而

康熙底原意却是要慎重從事，令仇視的方面無話可說的。

禮部底議處果然不出人意料，是絕對批駁的。

皇帝現在又把這事件批交法律之最高行程，即御前大會審，從新予以議處，這御前大會審於數月之前，亦是議決了天文案件的。這時全國人民底眼目，爲這件事體都又注視到北京來了。這次的會審會開會六次。六次之中有三次會傳住北京之三位教士到會聽審。在第二次會審時，楊光先又重新提起基督教陰謀不軌以及與國家有害之控告，但是俱被澈底駁倒。參與這次大會審之滿籍會員，主張登時將他鎖起，加以重刑。可是漢人一方面反對這一種主張，然而皇帝却裁決，他應加以鎖繫入獄。

御前大會對於禮部及其附和份子之異議，經過長久的爭駁之後，終於到了下列決議之地步：鄙劣不堪的楊光先，惡意捏造重大罪名，並強橫控告基督教爲詐僞不正與可鄙棄之宗教，因而竟致枉受政府之判決。我們現在已經完全查明，這個宗教並未含有任何可鄙棄不正之情形。因此基督教徒皆可自由信奉，而不應予以禁止。但較大之傳教區却不能准其存在，而那一本關於基督教

之起源與傳佈之書冊，以及聖牌之分散，均仍應予以禁止。「通玄教師」之銜號仍應照舊給回。吏部應重新恢復湯若望和其他被判決者以往之一切職銜。城外教士等之產業，應發還給南懷仁。解送廣東之傳教士，仍應召回北京。被斬決之官吏獲得例行之昭雪，他們被杖充之家族，應一律召回。楊光先判處斬刑，其家屬流徙鞏（二六）。

皇帝批行這擬處時，曾予以下列之變更：楊光先因其年齡老邁，姑從寬赦免一死，其家族亦同樣不予以流徙處分。解送廣東之傳教士無須召回，以免基督教重行傳佈（二七）。

這一來基督教所受之雙重侮辱，便完全被解除，而湯若望，他本來是被大家所認為基督教之魁首的，亦竟得澈底昭雪，榮譽恢復。楊光先於兩月後，即十一月三日，即行死去。

繼於這全部大獄的一種儀式隆重的終結舉動，便是皇帝為這時榮譽與職銜俱得昭雪恢復的湯若望，所諭令的致祭典禮。皇帝特賜致祭銀五百二十五兩。一篇為皇帝親自所撰擬的祭文，很壯嚴地被宣讀於湯若望之墓前。這一篇祭文於事後是被刻在死者墓前所立之紀念碑上的。耶穌會得·瑪理尼神甫（P. De Marini S.J.）竟有所聞，而報告：皇帝會親自隨同他的皇祖母，以

及朝中最高之大員蒞臨湯若望之墓前，依照中國之禮俗，向死者致敬（二八）。這在一位中國皇帝幾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況且祭文上也曾明明說出，是一位崇高大員帶領一批子王公大臣，以皇帝之名義舉行了這祭祀典禮的。

這一六六九年十二月八日（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之祭文原文如下：

「皇帝諭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級又加一級，掌欽天監印務事，故湯若望之靈曰。

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踪。卹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湯若望，來自西域，曉習天文，特昇象歷之司。爰錫通微教師之號，遽爾長逝。

朕用悼焉。特加恩卹，遣官致祭。嗚呼，聿垂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爾有所知，尙克歆享」（二九）。

在最近一期的政府公報上，對於這致祭的典禮，便向全國人民做了報告。湯若望自是之後，便以一位爲皇帝與國家立有殊勳，而德行純潔，絕非自私自利者，以及以創立中國新曆法之天算家

和任何污點俱皆洗刷的天主教之傳佈者之身分，存留於非基督教之中國之境域內（三〇）。

湯若望之姓名於一六九二年仍尙遺有爲中國全國基督教徒之屏障之能力。因爲在這一年的二月二日徐日昇神甫（P. Thomas Pereyra）安多神甫（P. Anton Thomas）曾向康熙皇帝上奏疏一封，請求自由傳佈基督教之權。在奏疏內他們特別使皇帝憶及湯若望對於中國之宣力與貢獻。決無可疑的，是皇帝絕非末後方行顧及到他的父皇底這位師友和「傳師」而纔下了一六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那道有名的，准許基督教自由佈道之上諭的（三一）。

在中國學者之界域內，湯若望之名字任何時期俱皆光榮，而爲一般學者之所敬重。他對於向明朝末後皇帝以及其他變更名目，向滿清第一代皇帝所進呈的，那部數理天算大叢書所著的爲數豐饒的論述，自是之後永久證明，他爲中國之重要科學所立的功績。在後繼的時期裏，皇帝所下許多關於天算之諭旨，俱皆指引湯若望爲一模範之學者。

明史曆志與外國列傳亦曾提及湯若望之工作。譬如在外國列傳意大利亞條下，對於湯若望及其他耶穌會會士之言詞，便謂：「其國人東來者，大都聰明特達之士，意專行教，不求祿利。其所著

書，多華人所未道，故一時好異者咸尚之。」（三二）。而在清史稿中，關於湯若望（以及關於南懷仁）之生平，亦皆列有一簡短之傳記（三三）。

即其他或經中國官府方面或經中國私人方面所刊佈之著名叢書對於湯若望亦皆以職責之關係，故有論述（三四）。

一八八七年北京總理衙門（即從前政府辦理外交之處所）向皇帝所上之崇尚歐洲學術，尤其崇尚數理與天算之奏摺中，亦曾提及湯若望與南懷仁等之姓名。到上海徐家匯天文台參觀之官員們，人們向他們指示湯若望之肖像時，他們對於湯若望之人物，俱皆早有所知而甚熟習（三五）。

在歐洲，湯若望名姓之被提出於科學歷史中之次數，較少於數位他的繼任者，即南懷仁，戴進賢（Koeler），劉松齡（v. Hallerstein）。由上文我們已經得知，湯若望在他天算的工作中之所追求的，主要的皆在實際方面之目的，因為他只是把這一項工作，視為一種傳教的方法的。為純粹科學工作，他並不要犧牲他的時間。加之他的那些儀器，無論他能多麼很加以改良，終久仍是極不

完備的，迨南懷仁纔又製造全新式之儀器。況且在湯若望還是同歐洲底科學界，缺乏繼續不斷的連絡的，這連絡便是爲許多工作之可以促進科學的進步的。在後一世紀中，北京之天文學家遂可由穿越西伯利亞與俄國之郵路上，與歐洲之學術界做頻繁之思想交換。這更可爲促他們做嚴重科學之研究之動機了。

雖然如此，然而湯若望在歐洲之科學著作中，亦是很光榮地被稱舉的。人們都視他爲一位把西方底數學與天算在東方弄到了統治地位，而且很堪當地代表了這兩種學術的學者（三六）。著名的法國東方語言文化之研究家亞伯耳·賽彌撒（Abel Remusat），對於湯若望，在他的作品中，貢獻極長的承認言詞。他在他這著作中，特爲湯若望解釋，他爲什麼鑄造了大礮。他說：「像這種與使傳教士到中國來的目的這樣相背反的工作，俱都是因環境的權威逼迫他們不得不做的。」接着又說，這種工作，他們是不能拒絕的，因爲他們如果拒絕了這種工作，那便要與他們獻身信奉的教會，有莫大損害的。賽彌撒極其驚奇湯若望之工作裏所表現之剛毅，以及其勤奮，這勤奮是他用到了數理天算著作上的，然而他亦並不因此而荒廢了他傳教之第一義務，並且因他這勤奮之

精神，他雖經朝廷屢屢予以崇敬褒揚，然而竟仍要乘間授入教者以教義之課程，他甚至在他那熱心宗教的心裏中，竟喬裝炭販入獄，爲行將臨刑之犯官做最後之神事（三七）。

湯若望以科學之代表者與信仰使徒之資格，尤其在他耶穌會本會的歷史中，以及在傳教史與教會史上，獲得了一席極榮譽之位置。

湯若望受陷害以及其逝世之消息傳至歐洲時過於遲後。自一六六五年至一六七一年，中國與歐洲之間任何連絡顯然俱皆停頓。中國官府方面長久的時間竟使流徙到廣東之各傳教士同外界之來往幾乎完全不能實現，而留居在北京之三位傳教士，更不得不以極端退縮態度加到自已底身上來。一六六八年之初葉，人們在羅馬方行得知，在中國又發生教難，而湯若望已處於監獄中（三八）。據羅瑪德意志學院內瑪利亞會（*Marianische Kongregation*）底會員名冊中之記載，於一六七二年瑪利亞會方爲湯若望照例舉行追薦死事之神事（三九）。

根據各方面之指示而言，關於這次教難自開始時期以來所有事故之確實消息首先送達到歐洲的，便是傳教會代表殷鐸澤（*Prosper Intorcetta*），他以中國傳教會代表之身分，赴歐洲之

行程是曾經長久之延遲的。一直到一六六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他纔能動身（四〇）。他又在臥亞停留了頗爲長久的一段時間。很少見的，是一位傳教會代表能像他這次帶了這樣多的信件和已付印或未付印之作品到歐洲來。在他所帶來的這些信件著作中，除去各教士自己之作品外，尚有畢嘉、聶仲遷、潘國光三位傳教士對於這次教難所寫的長篇大文，和歷年堆集在廣東而未得送至歐洲之一批信件。即其他修會會士，亦將信件交付他帶往歐洲，並以種種事體委託他辦理。他到羅馬時，便是一六七一年之初葉。

在羅馬，人們根據他的報告，或者是根據他自中國帶至歐洲的一篇稿底，在這同一的一年裏，還爲湯若望望底一生事蹟，寫成了一篇傳略。在這傳略底結尾，曾提到湯若望同其他傳教士，共同寫有中文之著作一百五十卷。由這一百五十卷之著作中，殷鐸澤帶至歐洲一百一十二卷，這一百一十二卷之名目俱經一一列出的。十二月二十二日殷鐸澤便把這一百一十二卷著作，分裝成四開本十四部，進呈教皇克來門司第十（Klemens X.）。教皇克來門司第十將這批書冊，批交華第岡圖書館（Vatikanische Bibliothek，譯者按：即教皇圖書館）收存。

關於湯若望的這篇傳略，連帶進呈教皇書冊之目錄，曾經騷斯威爾 (Southwell) 幾乎字字不變更地探入他一六七六年所出版的耶穌會士著作文庫 (Bibliothek der Schriftsteller aus der Gesellschaft Jesu) (四一)。

歐洲有了關於湯若望底這一篇傳略，連帶許多已經發表之作品，即湯若望之回憶錄 (Eingedenken) 巴爾洵利之傳教史 (Bartolis Missionsgeschichte) 衛匡國之著作和姬爾雪所著之中國 (China)，以及馬上即將付印的畢嘉和聶仲遷之著作，置之眼前，那麼歐洲的人們，對於湯若望之生涯與影響，便可能獲得充足之認識了。騷斯威爾之著作和湯若望之生活回憶錄，為後此一切新出版物之基礎。

騷斯威爾這部文庫，關於湯若望所作之略傳中之種種小錯，以及湯若望之回憶錄中種種不清晰的地方，却非湯若望之錯，這是一位希臘拉丁文學家 (Humanist) 對於湯若望這回憶錄所做的拙劣修正之結果的，便為後此對於湯若望所做之一切傳記，大小皆有缺點之原因了。然而給湯若望做「傳記」的一切人們，都是稱讚他為一位偉大學者兼著作家的，而給他做傳記的天主

教徒們尤其也稱讚他爲一位獲有宏富效果的傳教士和一位優良的修會會士(四二)。

耶穌會之會士月冊 (Menologion) 亦早將湯若望列入該會偉大與模範會士之行列中。在這些月冊中帕特理格納尼 (Patrignani) 稱呼他爲「中國傳教會柱石之一」(四三)。埃賽班·得維賽爾彌 (Mesban de Guilhermy) 以下列的言詞終結他對於湯若望之批評：「湯若望堪當列入耶穌會至神聖會士與最大傳教士之列……除去傳教士利瑪竇之外，人們應稱他爲中國傳教會之建立者」(四四)。

至於說耶穌會後來關於中國傳教會有所寫作之著作家，對於湯若望之見解如何，我們可以將這會中對於中國及中國傳教會認識最清，而亦有最佳史料可供應用者中數人之言詞抄錄於下，以見一斑。

多爾良 (D'Oleaus) 批評湯若望爲「一位宗徒式之人物，他重重受侮辱與誣毀，嘗盡牢獄與鎖鍊苦味，更被判處死刑，完全因爲他宣佈了耶穌基督之信仰……中國虧了這位偉大人物之睿智奮勉，方得在他的民族之間保存了真教之發達與存在。」他在常時接受中國朝廷官職之

原因，多爾良亦謂，只是爲藉此可以更能促進傳佈信仰之事項。中國朝廷加到他的身上來的種種榮耀，絲毫都不會減殺了他使徒使命底熱心。多爾良又說：「滿清底官員都十分驚奇，像他這樣一位爲世界最大君王所選爲師友的人物，竟能時時刻刻起而與至貧窮的人來往，並去拜訪身分最低微的人們」（四五）。

笛·哈爾德 (Du Halde) 在他對於湯若望一生所寫的一篇緊縮的概覽中，特別稱揚這位學識湛深，宗徒式人物底偉大功績，而視「他的光榮的逝世爲四十四年傳教工作之加冕」（四六）。費賴之 (Petzner) 他是將他一生最好的時間都犧牲在舊時代一切耶穌會傳教士傳記與功績之研究上的，稱湯若望爲「耶穌會爲歐洲贈送給中國至大人物與至神聖會士之一」並且還說他是「中國傳教會之第二位建立者」因爲當時是有滿人將要以暴力打倒爲明室這樣所崇敬的基督教之危險的，可是這危險竟也被湯若望一手所轉移了過去（四七）。

可隆倍爾 (Colombel) 在他迄未付印的歷史大著作中，也把湯若望算在「建立中國傳教會著名人物之中的。」他說他的死亡是中國一部分人們對於基督真理之仇恨的犧牲，這基督之真

理是經他以新天算科學予以保護的，而這真理之光明是他在新朝人物眼目之前發射了出去的（四八）。

教會史與傳教史中對於湯若望之批評，從普通方面說，亦皆比附於他這一個判斷。

可惜自十八世紀之中葉以來，有一種怪異論攪擾了素常普通對於湯若望性格之偉大以及其為傳教領袖之重要之承認。這正是當在仇視耶穌會的各派別——即揚森主義派（Jansenism，譯者按揚森（Jansen）為荷蘭之一舊教徒，生於一五八五年，卒於一六三八年，所倡之主義為一種命定說與神恩神寵說，為羅馬教廷之所明令禁止，啓明主義派（Aufklärung）以及國家絕對主義派（Staatsabsolutismus）——在共同連合之攻擊中，予耶穌會以毀滅之打擊，而任何惡劣手段俱皆無所忌憚之時代。在這些黨派中，連湯若望之人格亦被他們利用為損毀耶穌會聲譽之器具。他們對於這一位司鐸與傳教士所能弄出最能動人們名譽心的責難，這時竟被他們揚入世間，他們捏稱他背叛他這司鐸職務，以一世俗人之身分在他為自己所置買的東堂內，為妻室兒孫所環繞，活了一輩子，而在那裏為人之所遺忘地終結了他的性命。

這一種誣毀底破綻過於顯然，人們簡直可以無須費事費詞地予以駁辯的。把一種這樣拙笨的捏造置入世間，而要人們相信，却未免是一種極少見的情形了。因為這些捏造的言詞，在一切瑣碎方面，無一不與實情相反。對於湯若望末後數十年之生活，我們由一些無懈可攻的史料中，亦獲有確切可靠之開啓。捏造了上面這一種事實的人們，並不知道湯若望是住在西堂館舍中的，在這裏滿清第一代皇帝，在十年的時間裏，曾屢次臨訪了他所敬之爲「尙父」的湯若望，並且在這裏傳教士栗安當和許多其他的人們，都是對於湯若望這位傳教士虔誠信念與勤奮工作的目睹眼見的證人的，甚至連當時中國政府對於基督教所與之大獄，這位捏造是非的人都還不知道哩。爲他所捏造的事實上，捕風捉影唯一所依據的一點，便是湯若望過繼義孫的一件實情。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上文已經陳明，這過繼之舉，在湯若望底時代爲一切的人們，俱皆做了正當瞭解的。

對於湯若望的這一種誣毀，也竟是經過了八十年之久，纔敢透露了出來。閱明我在他一六七六年所出版的著作中，曾搜集一切可能的反對耶穌會士的事實，作爲敘述的材料，但是一種這樣的非難，在他這部作品中，却是人們尋找不出的。而這捏誣的事件，在後此一切大著作中也是一樣

找不出的。譬如，在十六世紀之末葉所著作的七大本，目的在欲置耶穌會於可鄙視地步的誣謗作品耶穌會士之實際道德 (*La Morale Pratique des Jesuites*) 裏；又譬如，教廷派赴中國專使鐸羅 (*Tournon*)，亦作多羅，各隨行人員寄往歐洲那爲數宏巨，且經付印之信件中，均並未見有此項事件之記載，況且鐸羅專使之隨行人員，對於耶穌會士之行動確係毫不加以寬貸的；此外在於一七三三至一七四二年所出版，爲世人所稱之爲紅衣大主教鐸羅之軼事軼聞之七本著作中（四九），也沒有湯若望這一種情形的記載，而這一部七本的鐸羅之軼事軼聞，還是蒐羅一切對於耶穌會士之慊惡言詞與事實的；最後在十七世紀之末葉泛濫於世界各國的非難攻訐耶穌會的寫作之全盤洪流高潮中，亦並不會見有此項記載，這一切情形足可證明，這對於湯若望誣毀是多樣無根無據的了。

這件誣毀湯若望的事情，是於一七五一年，即湯若望逝世後之八十五年，第一次出現於倫敦，而由這裏散佈到世界各國裏去的。這件捏造事實之出現，是被編入北京耶穌會會士嘗試着要毒害教廷專使紅衣大主教鐸羅的驚人聽聞的傳說之中的，這件傳說現在也是藉着這個機會，第一

次詳細向讀者端了出來，而在這個時機之前，不過僅只是這裏那裏影影射射略捏造了些簡短之暗示而已。

捏造了這兩件事實並且傳揚至世界各國去的那一位人物，便是從前的嘉布遣會會士 (K. A. Puziner) 惱貝爾特·普拉特爾 (Norbert Platel) (五〇)，以下我們只敘述他關於湯若望所捏造的誣壞事件，而其他關於陰謀毒害羅的事件，則與本書無關，故不得不行棄置。這位惱貝爾特·普拉特爾在傳教之歷史中是曾獲有悲愁的名聲的。根據他一七六六年自己承認的詞，言他自三十餘年以來，「即以毀滅耶穌會為惟一職志」(五一)。法國人名大辭典 (Die französische Allgemeine Biographie) 對於他的批評是：「他以一種極端的直至死時方止的仇恨，去迫害耶穌會會士。」他這一種行動或許是受着一種病態的狂妄思想之迫促而使然 (五二)。

一七五一年惱貝爾特·普拉特爾在倫敦完成了他那部有惡聲名的史事記錄 (Memoires Historiques) 之第三本，這部史事記錄便是上述誣毀湯若望事件首次出現的地方。這部書底這第三本在這一年裏八成還未曾散佈了出去，因為社會上對於這本書所知的，僅是一張廣告與廣

告上所列示之內容（五三）。在這所列示的目錄中，便有上面所說毒害鐸羅陰謀的題目，而間接地亦記有湯若望對於教會之背叛之名目。在這兩個題目之下所捏造的事實是到了一七五四年惱貝爾特著作之意大利版本中方行披露於社會，而自是之後一切續出的版本裏遂皆有這一件事實的記載了（五四）。

惱貝爾特·普拉特爾硬說，他這報告是於一七四四年自鐸羅專使祕書瑪采林·安者利達（Marzelli Argelita）處所得了的，而字字不易地記錄在那裏，這是他記錄這言詞時，所用的引號已經暗示了的。這大概八成是安者利達在北京居住時，曾聞知湯若望之義孫，或許也竟同他或同他這義孫的一位後人會過面的原因了。不過安者利達在當時對於這件事情之實情的瞭解必定正確，若不然他決不肯隱默不言的。不過仍尚有可能的，是誣譏湯若望有家室的這一段虛言，或許是漸次在已入老境的安者利達，纔結聚成了一個形體，而被傳揚了出去。然而絕難令人置信的，便是安者利達於一七四四年，曾向這位以前的嘉布遣會教士惱貝爾特·普拉特爾遞有一篇關於此事的詳細報告，因為設若果有這樣的一篇報告，那惱貝爾特·普拉特爾在他那部著作的一七

四五和一七四七年的版本中，必定已經也會發表了的。

反言之，那也并不是決不可能的，惱貝爾特·普拉特爾所指，而照他那樣發表的那篇報告，是他自己做了的，不過在做這篇報告時，他或許也曾根據安者利達對於湯若望和他的義孫的揭示，而這揭示是他於安者利達在一七四九年逝世後，方行得知的，或者是在安者利達底遺著中所發現的。況且這篇報告也還完全是在普拉特爾那種紊亂不清的筆法中寫出的，他這筆法對於事件發生的時間問題，絲毫都不加以顧慮。所以要說這篇報告為普拉特爾自己之所寫出，那也很是有可能的了。如果人們對於安者利達底著作，肯做一番詳細研究時，那麼人們或許能更確切斷定這篇虛言產生的歷史了（五五）。

此後這段虛言便被探入紅衣大主教帕西奧奈（Kardinal Passionei）所刊行史事記錄（Memorie Storiche）之中。這書是一七六一至一七六三年間出版的（五六）。

這段虛言後來在十九世紀，甚至在最近的時代，仍繼續有多次之出現（五七）。

除去這些受了乖僻不幸的惱貝爾特·普拉特爾神甫之影響的論調之外，傳教史與教會史

對於湯若望都是同聲一致地致其欽佩承認之言詞的（五八）。

在這一派底言詞之中，特別值得注意的，尤其是艾瓦理斯特·賽吉斯·禹克（Evangelist Re-
gis Hue）之評語。禹克至一八五三年爲遣使會（Kongregation der Lazaristen）會士，是一位有
名的中國，蒙古，與西藏之探險家，他並且也還寫有一部關於較前時期中國傳教會之普通歷史，這
部書在科學方面的價值極高。他時時處處，當前一遇到機會，便要稱讚湯若望的。譬如，他稱讚湯若
望爲「具有巨大信仰之勤奮熱心之使徒」，他當在闖賊盤踞北京時，曾做出了些「博愛主義上
的奇蹟」。他又說：「這位學識湛深的數學家，交換着從事於天文，音樂，學術論文，以及繪畫與雕刻
種種學術之研究……或者尤其可以說，使他的精神唯一所從事的，常常都是上帝之光榮，與人
民靈魂之救渡。」人民之安寧，是他時時刻刻在心在意的事情。他曾救澳門出於滅亡，而因此亦是
救傳教會出於滅亡的。他更謂：「那實在是一幕振奮高引的劇情的，去觀察這一位赤手空拳的修
會會士遠處異邦的情形，他身邊時時刻刻都爲兩種情形極其不同的民族裏的至高高的人物之
所圍繞，這兩種民族中的一種，特異之點便在有文彩，有禮儀，謙恭卑下，而知識銳利，性質狡猾，其他

一種，反而仍尚帶有半野蠻之色彩，習俗道德，俱皆粗暴兇野，殘忍好鬪，還酣醉在佔據了世界最大國度的勝利心情裏的……一樣有振奮高引的力量，是從宗教一方面去觀察這位信仰之傳佈者，在那虛驕的漢人與傲慢的滿人之間，怎樣會曉得用他那克己無我坦白直率與真情熱愛，去獲得一切人們的敬重與信仰」（五九）。

到這裏，我們可以把這一項評論完全攔開，而將我們的眼光再轉向北京，略一敘述北京教會之情形了。就是湯若望所建築之教堂，他那個時代與繼續數十年裏的教士居留地，以及城西門之外的安靜墓地，種種場所之結果究竟怎樣了呢？

一六六五年以後的數年教難中，湯若望館舍內與教堂內許多書籍著作，與宗教之器皿俱被毀滅，而教堂亦受有損害。教堂修復後，自十七世紀之末葉起，即行做為北京各主教住紮之本堂。兩次地震——即一七二〇年與一七三〇年九月三十日——致使這座教堂受有這樣重大之損害，簡至是使人們到了一七四〇年至一七四三年，幾乎不得不從新予以建築了。耶穌會會士郎世寧（Castiglione）藉此後修葺這座教堂之機會，曾予以金色與彩繪之塗飾。一七七五年二月十三日

這座教堂竟燬於火。乾隆皇帝爲修復這座教堂，特賜銀一萬兩，這個數目是同以前他的祖先爲建設這座教堂時所用的數目一樣多的。在繼於此時之後的八十五年中，北京之傳教會俱曾爲他們的存在而奮鬥。當時末後的一位主教，即葡國籍之遣使會士畢學源 (Pires)，在他將死之先的短時期裏，（卒於一八三八年，）特將教堂與館舍委託俄國道院院長之忠實掌握中，以便他們在俄國底保護之下，不致完全破壞毀滅，而聖堂此時亦竟被中國政府之所封閉。這一位俄國道院院長之繼任者，於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入北京後，又將天主教之一切財產絲毫不苟地交還與北京之天主教會。這時已經坍塌一半的教堂又被恢復舊觀，而於其旁更開闢了一片愈加闊大的居留場所，場上建有教士宿舍多所，會士所辦之學校一所，味增爵修女會 (Vinzenzsolwestern) 所辦之醫院一所，以及中國聖若瑟修女會之本堂一所。一九〇〇年拳匪之亂，竟將這一切建築物連帶教堂，俱皆毀滅掃平。亂後人們又不得不重新把一切重復建設了起來。所以當在湯若望時代的館舍教堂，俱皆絲毫無存了，而南堂之所餘剩的，或許僅爲一道或兩道基牆，其他的事物是一概無存的了。兩座處於損毀狀況之中的石柱，是唯一由舊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石質物之殘餘（六〇）。

一樣澈底的，是由舊耶穌會士傳教會時代遺留下來的其他教堂與教士居留地底破壞與毀滅（六一）。

耶穌會士們僅只有一種珍貴的產業，彷彿一種神奇的事物一般被保存了下來，就是南堂底圖書館。這圖書館底全部書籍亦是曾經交付俄國道院院長之手，經他們忠實地守護，而於一八六〇年復行交回了的。人們把這批書籍轉藏在新建立之北堂，因為北堂這時已被升為全北京之本堂了。一八六二年之一本目錄冊上，所登記的西文書籍為五千四百部，皆係關於宗教與世俗學科之一切書籍（六二）。這書庫曾逃過一場火災，就是一八六四年一月九日之火災，這場火災曾將北堂焚毀一半，而恰恰在藏這批書籍之房間前就終止延燒了（六三）。因為北堂是北京城內唯一有抵抗拳匪之亂的能力的教堂，所以這些珍貴書籍仍得安然穩渡拳匪之亂。

在這裏有許多本自湯若望時代來的書籍，這些書籍都是經他一如在他之前來中國的傳教士們一般，由歐洲携帶了過來的，或者是人們後來由歐洲給他寄了過來的。這些書籍中也有湯若望親手所書寫之註語。我們甚願一位研究家，對於這些極有價值的書籍，做一確切之報告！

連城外教堂之墓地和其上湯若望末後之安息所亦是有牠們的歷史的（六四）。

直至一七〇八年湯若望底墳墓仍爲順治皇帝所賜之塋地上唯一的一座墳墓，因爲利瑪竇塋地上底空地還足夠用，而當時去世的教士，都是埋在那裏的原因。湯若望墳墓底設計是與爲中國高級官員所例行的設計一樣無別的，並且是全墓地墳墓中最巨大壯觀的。一七二六年世界新聞報（Welt-Bott）（六五）載有描寫湯若望墳墓的文字，說：「湯若望神甫安息在一架真可以說是帝王一般的墓架之上。」繼於湯若望之後，首先得安葬於湯若望塋地之中的，便是徐日昇神甫（P. Thomas Pereira）。在繼續的一七〇九年便爲龐嘉賓神甫（Gaspar Kasiner）安葬在這裏的時期了；在自此以後的繼續的長時期裏，便逐漸墓傍墓地連成了行列。最後湯若望塋地與利瑪竇之塋地，竟打通連而爲一片塋地了。一條寬廣的道路沿這兩塊墓地原來的界線引人們到達一空敞的小教堂之內。這塊墓地到最後竟成了南堂與東堂葡國傳教會士最後之安息所，所以便也被稱爲葡國塋地（Portugiesischer Friedhof）了。耶穌會士之墓旁，還有九位其他會的會士亦在這裏獲得了他們的墓穴，即多明我會士一人（可羅納多 Coronado），方濟各會士四人和方濟

各會第三期主教古維啊 (Gouva)，此外還有奧斯定士 (Augustiner) 一人，味增爵會士 (Lazaristen) 二人 (六六)。西堂傳信部傳教士 (Propagandamissionare) 之塋地，在這兩塊塋地至近之處，稍遠一點便爲北堂法國傳教士之塋地了。

直至一九〇〇年這些亡人俱得安然埋葬在這裏，因爲中國法律與中國習俗，是不容人們擾及死者於地下的，便是在迫害教會的時期裏。況且這塋地依然是曾經交與俄國道院院長之所保管的。當在交還之後，在這裏便又建立了一座教堂，爲在附近居住的教徒和聖母會修道院修士及味增爵修女會等居留地之各位人物們晨夕禱告之所，這一片居留地就是在傳教會之報告中屢屢所提及的柵欄傳教區 (Missionstation Shala)。譯者按：即阜城門外滕公柵欄之傳教區。與國旅行家亞利山大·封·旭布奈爾男爵 (Alexander Freiherr von Hübner) 曾在一八七一年十月間來瞻仰過這一片墓地。他描寫這一帶地域的印象說：「這一片幽鬱的地域，乍一看到時是具有非常震撼人們的力量。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這一些人物們，他們的名姓同着這樣多其他神甫之姓名，一律彪炳於各科學與傳教之書籍中的，俱皆長眠於這聖區最先之部分中。」

這些英俊人物墓穴之印象，是非常巨大與莊肅的。」由他這篇描寫中，我們也竟得知，「在這一片墓地之高處是，還樹立有一非常巨大之十字架」的（六七）。

拳匪之亂中，拳匪之狂怒也並不會停止在這一塊和平地域之前。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七日便是災難臨到這片地域的日期，在這裏所居住的未經及早逃走的基督教徒們，其中有孤兒二十五名，俱被拳匪所慘殺，而一切建築物悉被焚燬。然後繼續着便是他們對於各陵墓的瀆犯行為，這行為竟致延長一兩星期之久。墓前之墓碑被他們擊碎，墓穴被他們掘開，屍骨被他們揚散，或甚至被軋得粉碎。後來亂事平息，人們又將一切殘骸遺骨搜集一齊而合葬於一墓之中，而那些被擊碎之墓碑，俱又被壘在從新建築於墓地中央的諸聖教堂外面之牆壁中。

幸而破壞尚未至十分澈底地步的，則為索智能主教 (Polykarp de Souza)，利瑪竇，龍華民，湯若望，南懷仁，以及徐日昇等六人之墓。人們將這六人之墓又特行於諸聖教堂之傍，一一重新恢復了起來（六八）。

本書本章內所採入之照片（中譯本並未採入），一示拳匪亂前湯若望墳墓幽靜之情形，一

示拳匪掘墓慘劇之殘蹟，以及德國瓦德西將軍（Valdessee）遠征隊之軍士，視查這一片被拳匪所蹂躪的地域時之留影，而立於湯若望被掘墓旁之人物，則爲當時從軍之傳教士（六九），此外墓碑被拳匪所擊毀之情形，亦可由此像片一目瞭然。而康熙於湯若望墓前，勅令所樹立之碑文之第一行上，「湯」字與「靈」字顯然呈現出故意破壞之痕跡。

在這裏我們還可以特別略一提及，各國人士爲使世人對於湯若望之紀念永久活躍不息，而特特所做的那一些宣揚表彰的行動。

荷蘭最大之詩人約斯特·封·登·望得爾（Joost van den Vondel）曾於一六六六年，即湯若望之歿年，寫有悲劇一部，題名崇禎，又名漢人統治之顛覆（*Zungchin oder der Untergang der chinesischen Herrschaft*）（七〇）。這部戲劇之對象，是敘述闖賊李自成佔據北京，與明朝末後皇帝之結局的。這部描寫崇禎的悲劇從戲劇藝術方面看，雖然有不少極其優美的片斷方面，然而仍算不得這位詩人最佳作品之一的，因爲他寫這部戲劇時，過於拘泥嚴格之古典形式，因而不能充分發揮這個材料中所具有的那偉大悲壯色彩了。雖然如此，然而這部戲劇因爲與傳教

會有關，況且已經又成爲世界文學之一部，所以仍是值得我們的注意的。

在這一部戲劇中開列於全書首頁十一位登場人物之名錄單上之第一位，便是出身可崙城的湯若望（七二）。他是這部戲劇中的主要脚色。一切其他的人們都稱呼他爲尊父湯若望，他是十足成色的司鐸與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Franz Xaver）之神靈向他顯示，並且向他預言，他在次代皇帝之下的偉大效果，但却將要在這次代皇帝之繼位者統治之下，受到一毀擊的。照這所敘述的劇情看，望得爾已經是知道了，人們在中國對於湯若望陷害之開始的。

詩人望得爾之做此劇，眼目中所特別注意的，似乎是在頌揚湯若望，而此節亦頗可視之爲實情。望得爾怎樣能會爲湯若望作戲劇，傳其人於萬世，這却是有些奇怪，究竟令人作何解釋呢？

在這一點上會有人假定，望得爾是親自認識湯若望的。甚至有人竟斷定，他們二人是有親戚之誼的（七二）。然而這前後二說，俱與實際不符，而應予以否認。至於說望得爾也出身可崙，也是湯若望同時代的一位人物，這自然是確切無疑的。他是於一五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產生在可崙城內在大威特胡同（die Grosse Wirschgasse）的紫羅蘭宅第（zur Viole）之中的。他的父母俱係

平民階級，因為是復洗派教徒（Wiederstauffer，譯者按：復洗派為歐洲宗教改革時期之一耶穌教派別，因其主張宗教之信仰須有個人之覺悟，故不承認兒童之洗禮，而入其教者皆重施與洗禮，故名復洗派。）所以於數年前便由當時被西班牙人所佔據之荷蘭安得渥伯城（Antwerpen）逃出，而流落於可崙（七三）。但是他們全家於一五九六年或在緊繼續的湯若望還是一個小男孩的數年裏，他們又離開了可崙的。當時這兩位男童或許也會會過面。但是一位奉天主教之青年貴族，和一位平民復洗派教徒之子弟之間，在當時決不會發生一種較為接近的友誼關係。況且他們二人還過於幼稚，而令人們不能將一種七十年久之活躍回憶，結合在他們這幼年的會晤上頭。最後望得爾之全家就留居於亞姆斯特丹（Amsterdam），而在這裏詩人望得爾於一六一〇年與一位名瑪依肯·得·渥爾夫（Maiken de Wolf）的可崙女子結婚。可是因為於一六六五年所刊印的湯若望之生活回憶錄中，曾說他有一位祖母姓渥爾斐亞（Wolff），所以人們便由這兩個姓字之約略近似，而就推測到這二位婦女，因而也竟推測到望德爾和湯若望二人之間的親族關係了。不過為這一種假定的這前提確係不實，因為湯若望祖母底姓氏雖為渥爾斐亞，但却終非得。

渥爾夫的。

望得爾這部悲劇之成立史，却完全與這些情形無關，而另有其所在。

詩人望得爾於一六四一年入天主教受洗禮，因而他對於在勸化他入教的行動上會有決斷效力的各位耶穌會士，時時俱皆懷有感激之心理。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城內，他和著名的出版家約翰·布勞（Joan Blaeu）同為一批優秀出羣的友朋圈團裏的份子，這個友朋圈團對於耶穌會和耶穌會士之傳教工作，俱皆非常關心而感興趣，雖然其中也不免有幾位，原為加爾文派之耶穌教徒（Kalviner）。布勞便是其中之一。到中國來的傳教士衛匡國於一六五四年在自中國赴羅馬的行程中，會在布勞處逗遛過長之時間，衛匡國會將他的著作交布勞刊行，當時他大概也必係在布勞處，同望得爾會晤過的。至於說他們在會晤時，談及湯若望和他為教會為中國的功績，這自然是無須說的了。傳教士哈爾桃格威爾特（Hartoghsvelt），他本來是一位阿姆斯特丹的人，再就是魯日滿（Rougemont）與柏應理（Couplet），在他們赴中國傳教之前，俱曾往來於這一個友朋圈團，而柏應理到中國後尚未中絕他們之間的關係。譬如一六六二年他還託荷蘭住巴塔維亞

(Batavia) 之司令官巴爾塔撒爾·保爾特 (Balhasar Bort) 轉候在阿姆斯特丹 他的朋友們在這些人數之中，他還特舉出布勞和望得爾之姓名(七四)。所以照這樣看來，望得爾對於中國傳教會和對於湯若望的情形，必係知道的很確切，而一六六五年所出版的湯若望回憶錄，他必係也登時購置了一本。況且他時時刻刻對於他生身之地的可崙城，也是真誠向慕的，這是他那許許多多文藝創作和他爲可崙城，向佔據了北部德國的瑞典國王古斯達·亞得夫 (Gustav Adolf) 請命的一舉，俱可證明的。這樣爲這部文藝作品的一切前題俱已具備。於是望得爾便創作了這部戲劇，爲的是要在中國時代史底範圍內，爲耶穌會對於傳教工作之貢獻，並同時爲他生身之地的可崙城，和這城市裏的一位偉大人物湯若望，藉這部戲劇樹立一萬世流芳的紀念碑，因爲湯若望底功績與貢獻，確係偉大超越一切其他中國傳教士，而真正值得流傳的。

再者湯若望也被稱舉頌讚於傳教士斐得理·賚芬柏 (P. Friedrich Reiffenberg) 的一七五八年詩集之一首詩中。這首詩底體裁是感懷詩 (Ode) 體裁，內容是讚揚斐特爾·撒耳穆神甫 (P. Peter Salm) 的。在這首詩裏面有六斷，每斷四行的詩句，讚揚湯若望爲天文家，而連帶三王

冕中學 (Dreikronengymnasium) 歷史中所產出最偉大人物中之三位，約翰·雷就斯 (Johann Rhetus)，弗朗茲·考斯特爾 (Franz Coster)，和斐特爾·布理爾瑪赫爾 (Peter Brillmacher)，共同被視為撒耳穆入此中學之偉大先驅者（七五）。

這是在歐洲對於湯若望的情形，在中國文人學士用詩用散文頌揚他們的朋友湯若望，並不是少見的事情的。這種讚揚之舉當在湯若望西安府傳教時，即曾有一度之發生，而後來在慶祝的機會裏，譬如壽誕和皇帝封典等情形裏，更是屢見不鮮了。像這一種慶祝文件，譬如為慶祝湯若望七十壽誕，大家所送給他的壽文，竟致能搜集成冊，並經付印而這樣便尋到了牠們到歐洲去的路子，所以在歐洲許多圖書館裏，都能發現這些冊子底印本了。

較比這一切文藝上的表現還要為人所知的，是那些雕塑圖像的表現。關於舊時代之耶穌會傳教士中，並沒有一位其他的人物，比關於湯若望能有這樣多的圖像被保存了下來，不過當然應行除去聖·方濟各·沙勿略 (St. Franz Xaver) 的。

首次設計了湯若望圖像的，是中國的藝術家。在勸化那位滿洲貴族之男孩入教的歷史中，湯

若望於一六五一年曾在他的記錄中，敘述他的學生們曾兩次情人給他畫肖像，一次是照着他的身量的原來大小，着滿洲服裝畫的，一次是穿着白色之長祭衣和白肩衣畫的。他曾說這第二張影像，畫得並不十分像他，但是那位男孩却更喜愛這一張影像，他把牠掛在牆上，而向這張影像施行敬禮（七六）。較後年度表現湯若望爲中國朝廷官吏之像片，直到如今在中國並不是稀罕的物件（七七）。

在歐西，在傳教士底作品中，在博物館中，和在從前的耶穌會居留所中，俱都有一些湯若望的圖像，與銅板雕刻。在一切圖像雕刻上，都是一律見到湯若望有一部巨大鬚髮飄然飄洒胸前，但在其他的情形上，所有畫像却往往就很有不同了。

那麼在湯若望一切圖像中，有沒有一張至少可算是近似地表現了湯若望底面容的呢？

這一點是我們在普拉格（Prague）天文台內所懸掛的湯若望畫像上所決不能承認的，因爲這張像片與其他各像片相較，所差太遠了，況且畫像上所畫湯若望之服裝，尤其是頭上之頭巾，決非中國之式樣（七八）。然而在一切其他湯若望之影像上，人們却說不能不承認是有一種一定的

合一情形的，這一種合一情形或許因這其他一切湯若望像片，是由一個公共稿底，甚至最後或許竟是由一個真實的半身像片脫胎來的。在一組關係顯見愈加密切的湯若望畫像中，其彼此之間的區別僅在細小微末處，而大致則無不相同；這當然是同一的一張像片底種種變形，一個系統底演變了。這一組畫像便是荷拉爾組（Hollargruppe）。

文彩兒·荷拉爾（Wenzel Hollar）（七九）為十七世紀中葉最偉大銅板雕刻家之一，為這一組圖像的範本的，便是出於他的手澤。他畫這張像片時，必定是在一六六〇至一六六六年之間。因為這張像片所畫的湯若望身穿朝中一品大員朝衣，可是湯若望被封為一品大員是在一六五八年的，而這一張像片在一六六七年所出版的阿塔納西尤斯·姬爾雪（Athanasius Kircher）底中國一書裏已經刊入，他這張像片會傳佈到極廣遠的地方，並且在荷拉爾組以外的圖像上，必定也會做為藍本的，除去普拉格天文台湯若望畫像之外。

不過荷拉爾畫這張像片時，我們揣測必定也是有所本的，就是本於一張照着湯若望底生活情形，所摹畫下來的像片。

我們由上文總還記得，傳教士白乃心於一六五九年或一六六〇年，曾承教務視察員之意旨，在北京畫了湯若望底圖像。他雖然不是一位職業的畫師，但是他所具有的本領技巧，亦足夠使他同時的人們滿意他的作品了。他這張原畫是被寄往澳門，而或許是失迷了的。不過白乃心決無可疑也會製有他這作品底複本。這樣我們便不能不推測，荷拉爾畫湯若望那張像片時，眼前必定也置有一張這樣的複本。至於說荷拉爾怎樣能弄到了這樣的一張複本爲他畫像的根據，這或者是白乃心親自帶到歐洲去的一張畫像，或者是白乃心以前已經由郵路寄往歐洲的一張複本之所使然的了。

使我們的推測愈加有力的，便是我們如果實地看到荷拉爾所製之湯若望圖像，是穿着帶有補子的中國官吏服裝和中國官帽的忠實表現情形時。如果他眼前不會放置有一張由中國來的像片，這決定不會成功的，可是在那些年數裏，在中國除去白乃心所畫的湯若望像片之外，並未聞知尚有其他像片的。此外尚有一種可驚奇的，能與我們的推測以愈加高度可信性的狀況，即係所有我們會見到的湯若望中國像片，所畫的湯若望的態度但都和荷拉爾所給與他的態度，完全一

樣，即右手做伸出執圓規狀，而左手做下垂執觀星儀狀。最後法維耶（F. A. Verger）著作中所刊印湯若望之肖像，也是很忠實地表現了荷拉爾所製湯若望肖像之面容的。所以由這種種情形看，荷拉爾之雕刻和這些中國肖像之間，決定是有至密切的關係的了。

然而如果我們要從上文底反面着想，而作一我們理智儘可能思議的假定時，就是假定荷拉爾之製定湯若望肖像並未利用由中國來的稿底，乃是完全根據文字之描寫以自己的意思設計了湯若望底肖像的，那麼那也要是可能的哩，一張荷拉爾所製的湯若望之像片，譬如姬爾雪所著中國一書中所刊印荷拉爾所製的湯若望之像片，竟會弄到了中國，而在中國竟會作了人們製湯若望像片之稿底的。不過這却是很難令人相信得過的，因為在中國人們已經有一張照着湯若望底真實情形畫了下來了的像片，用不到再多事去受一位歐洲藝術家底靈感的了。

綜合上面種種情形，我們竟可以極高度之多分性斷定，自乃心給湯若望所畫之像，既是給中國畫師，而亦是給荷拉爾作了藍本的。照這樣說，荷拉爾所彫刻的湯若望肖像，必是與實際相合的，雖然忠實程度自然較比照片減殺（八〇）。

在可崙城內，人們因為中國傳教士湯若望是這城內所產生最大人物之一，所以便在城內瓦爾拉夫·理夏爾茲博物館（Walraf-Richartz-Museum）前，面也建樹立像一座。

這樣，我們便又回到湯若望一生歷程之出發點上頭來了。

他初次所入的中學，一直到今日仍尙繁盛於可崙城內，然而校址却在城之另一部分，和在另一個名稱之下。這個中學在任何時代都是可以敬重湯若望，爲他最偉大學子中之一的，或許是名聲傳播得至遠的一位的。

可崙城很可以他這位子孫自負自豪，因為他是把這可崙城的拉丁名字可羅尼亞（Colonia）傳達到極東的地方，而在當時世界最大君王之朝中，仍能忠實地保守了可崙城與萊因州之風尚與道德。

我們所知道的德國人中，沒有一位會像湯若望能在遠邦異域發出一種這樣大光華燦爛的影響的。他對於世界最大民族之命運，當在這民族立於他們文化之極峰，而走上他歷史中之一

新時代時，所施與的確定力量是非常深遠高厚的，並且他還是在這個民族裏，使歐洲的科學達到了光榮崇高的地步的。

在近代天主教之傳教史中，他將要永久佔據着第一列位置中的一個位置。

即在他的爲人，我們由上文亦可知湯若望之高貴難得的了。對於任何人，任何困難，時時刻刻都願予以接濟救援之心，和一副深邃豐富的情感，是與各方面超羣出衆的非常才智，以及不可壓服的作事精力，混融結合於他一人之身。如果他有缺點，他都克服了他這缺點，並且更爲他這缺點作補贖懺悔。在教難和他受陷害的時期裏，他處處都表現了基督教高尚性之性靈偉大。在受試的鍛鍊烈火之中，他的性靈達到了純潔淨化的地步。這樣，他爲景仰高視他的傳教同人們之所圍繞着，在榮光中他結束了他事業豐茂的塵寰一生。

一九四九年十月初版

⊕(93407)

湯若望傳 一一册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 J.

每部基價貳拾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Alfons Vaih. S. J.

楊丙辰

中德學會

上海河南中路

陳懋解

商務印書館

印務廠

商務印書館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原 著 者
譯 述 者
主 編 者
發 行 人
印 刷 所
發 行 所

724

36124

7

361240



7178

210